



狮城舌战

启示录

——怎样造就优秀的辩才

王沪宁
张霭珠

俞吾金
林尚立

主 编
副主编

SHICHENG

SHEZHAN

QISHILU

上海人民出版社

狮城舌战启示录

——怎样造就优秀的辩才

王沪宁 俞吾金 主编
张霭珠 林尚立 副主编

SHICHENG
SHEZHAN
QISHILU

● 上海人民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1 号

责任编辑 陈 军

封面装帧 甘晓培

狮城舌战启示录

——怎样造就优秀的辩才

王沪宁 俞吾金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2 插页 4 字数 280,000

1994 年 3 月第 1 版 199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0

ISBN 7-208-01773-5/H·4

定价 11.50 元

前 言

从新加坡回来后，应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张德明先生之约，我们写了《狮城舌战》这本书，出版后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其热情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料，《狮城舌战》这一本书的发行量目前已经近 30 万册。同时，我们也应中央电视台“12 演播室”潘跃导演等人的邀请，在中央电视台做了节目；在各种学校、电台、电视台和机关的活动就更多了；队员们也收到了上千封来信。社会各界热情的朋友给了我们很多热情的鼓励，也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批评。

大量的朋友有举与我们讨论辩论的技巧性一和理论性问题，因而我们商量了之后，答应应该把有关辩论的技巧性的问题和理论性的问题再详细地讨论一下，以便和各界的朋友共同来提高对辩论的认识，来领会辩论的美和艺术。

如果说《狮城舌战》主要是纪实性的，那么这本《狮城舌战启示录》就主要是分析性的。从两本书的副标题里可以察觉到这一点，《狮城舌战》的副标题是“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纪实与评析”，主要是记录新加坡辩论赛的幕前、幕后的种种活动和事情，如果说有有理

论的分析，也主要是针对那场辩论赛本身的。《狮城舌战启示录》的副标题是“怎样造就优秀的辩才”，用意在于从反思的角度和理麻的角度来探讨辩论的一般般概念和辩论的理论，虽以新加坡辩论赛为基础，但是不限于新加坡辩论赛。这样一种选择，是为了对辩论的一般艺术和理论能够更开阔地谈谈我们的认识。

本书的基本内容如下：第一章讨论辩论队训练的过程和基本方法，相信对个人的自我训练和集体训练均有一定的意义；第二章分析辩论中最关键的要素逻辑、理论和价值的地位和作用，些要素是妈得一场辩论胜利的关键的因素，也是辩论本身最为核心的要素；第三章讨论辩论中的审美意识，我们认识到辩论是一种美的活动，绝对不只是一种言词和技巧性的活动，因而辩论中的审美活动十分重要；第四章讨论辩论中各种关系的平衡问题，辩论是一种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交融的过程，是一种只有在与各种相关的因素取和动态平衡才能进入最佳状态的活动，因而从生态学的角度来分析辩论是不能忽略的；第五章研究辩论中的“散打”风格，辩论要求一个人有很好的反应和进攻能力，“散打”能力在各种能力之外构成辩论的一种重要的能力，所以我们专门讨论了“散打”风格；第六章研究技巧，辩论是“技巧密集型”的活动，但不是说所有的技巧可以无序的使用，技巧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在辩论中最佳的境界往往是超技巧的，所以如何使用技巧就十分关键；第七章涉及信息和辩论的关系，辩论是一种以语言表达为基础的活动，也是一种以传递信息和接收信息为基本目的的活动，所以在辩论中如何使用信息、如何传递信息、如何接受信息就是辩论的基本点之一；第八章介绍情感在辩论中的运用，辩论同时是一种情感与理性交融的活动，因而情感的运用和把握就不能忽视；第九章研究辩论中的心理活动和心理因素，在现代社会中，可以说任何与人有关的活动均与心理有关联，辩论是一种高度紧张的竞赛性的活动，自然与

人的心理活动和心理素质密切相关,没有良心的心理素质,就没有出色的辩论。

最后,队员们选择一些来信作了答复。因为他们收到的信太多了,不可能一一回答,在这里择其有代表性的信予答复,也同时表达他们对社会各界朋友们的谢意。

我们力求在新的知识视野和知识结构中来理解辩论,所以本书从美学、信息学、心理学、文化学、生态学等视野来透视辩认。这些方法不是一种对辩论的附加价值,而是我们对辩论的理解,是我们在训练和准备辩论的过程中就注意的方法。队员们均是从自己所学的学科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的,这也显示了他们各自的专业特长。这些探讨,对我们深化理解辩论是有积极意义的。

我们并不以为经勃一场辩论赛之后,我们就成了辩论理论的专家了。我们相信辩论本身是一种流动的知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技巧和艺术的领域。我们的目的是:把我们对辩论的有限的所得,奉献出来与热爱辩论的朋友们共享,尽我们的所能来推进大家对辩论的认识,这里也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如果我们的这本书能够使读者对辩论有了更新的认识和更全面的感受,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我们感谢为本书作出贡献的所有的人: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陈昕和陈军先生,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本书的编辑和发行中去,并给我们提出了有益的建议;陈云、肖佳灵和章晓野小姐,她们精心阅读了部分稿件,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

我们感谢所有在过去和现在帮助过我们的人,我们将永远保持这种真诚的谢意。

批评意见会受到最热烈的欢迎。

王沪宁 俞吾金

1994年2月10日于复旦大学

给青年人创造机会（代序）

杨福家

1993年8月，受国家教委委托，复旦大学辩论队赴新加坡参加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经过十天激战，复旦队荣获团体冠军，其中一位队员获“最佳辩论员”称号。中央电视台在国庆期间播放了辩论会的录像。学校对辩论队通报表彰，赞扬他们为祖国、为复旦争得了荣誉。但是，队员们却说，“与其说我们为复旦争光，不如说是复旦给了我们最好的机会”。

确实，复旦是给人以机会的地方。给青年人以创造和发展的机会，是复旦成功的秘诀之一。我个人的成长历程，就足以说明这一点。39年前，我考入了复旦大学，和其他进入大学的青年人一样很快就感受到了一种蓬勃向上、催人奋进的气氛。不到一年，即1955年5月，在党组织的关怀下，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对我一生的发展十分重要，因为它给了我信念，使我进一步懂得了人生的涵义。

复旦有比较浓厚的政治气氛，促使青年人积极上进；有比较深厚的学术气氛，把青年人推向科学前沿；不断提供创新的机会，使人得到锻炼，脱颖而出；能及时把青年人放到合适的学术、工作岗

位,为他们提供到国内外去竞争的舞台。正是这样的环境与气氛下,一批英才脱颖而出。其中有北京高能对撞机主要设计者之、中科院高能所前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守贤;高能物理国家实验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大钊;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和琪;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胡思德;中科院上海光机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徐至展。

因此,当我受命担任复旦大学校长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发扬复旦优良传统,给青年人创造更多的机会,“追求优质,争创一流”,离不开青年一代的创造和奉献。

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我们不仅要为青年人提供大量的机会,让他们尽情施展自己的才华,还要积极提倡名誉校长苏步青教授之所以说的“细培精育勤扶植,不出人才誓不休”那种精神,关心青年人,并为他们创造条件,使之早日成材。

例如:在国际大专辩论会比赛前,我们组织了30多位专家、教授对辩论队员进行专门辅导,国际政治系还派了12位研究生作为陪练队员,学校各部门、各单位都为辩论队的准备工作开绿灯……。当我们的队员从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准将手中接过冠军奖杯时,强烈地感受到了复旦这个大集体的力量。这是一场智慧的竞争,凝聚力的竞争。复旦是蕴藏着巨大潜力的场,复旦人与其他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富有很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但是,怎么把这些潜力最充分地挖掘出来,把这些可贵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怎么增强一个学校的凝聚力?我认为,三个方面是关键:

1. 要有一个鼓舞人心的、合适的目标。纵观世界上成功的企业和学校,可以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Vision),而且其目标是随着时间的推延不断地调整。复旦大学的发展总体目标是:面向新世纪,建设一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综合性大学。其中心是教书育人,其关键是

科学研究。

2. 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需要做思想工作；要使人们进行有益、高效的劳动，思想工作更是必不可少。金钱从来不是最主要的因素。在今天的特定条件下，如何最有效地做思想工作，是各级党组织的一大研究课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做思想工作是教师、特别是资深教师的一项不可推诿的职责。我们要使每一个同学，每一个教师，每一个干部，每一个职工都得天关怀。要在青年学生中开展广泛的中国传统美德教育和民族文化教育，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道德中的精华，能够绵延数千年而不衰。

3. 要有足够的财力支持。高等学校，特别是以“创一流”为目标的重点高校，其财政来源主要应靠国家拨款。“收费”、“募捐”不应居为一所世界著名大学的财政主要来源。同时，办好校办产业，积极加强学校与社会及大企业的联合，这也是增加教育投入的有效措施。

国家要兴旺，经济要发展，关键要靠人才。要加快国民经济发展，教育必须先行。世界各个发达国家的经验早就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不仅要做好校园内的教育工作，还应面向社会，开展职业教育、继续教育，为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积极努力。复旦人将努力使这所具有优良传统的高等学府早日跻身世界著名大学的行列，为培养高层次人才，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兴旺发达作出我们的贡献。

一九九四年三月



复旦大学辩论队与辩论会主办单位之一中国中央电视台人员在一起

东方卫视
PDG



国际大专辩论会评委、武侠小说大师查良镛(金庸)先生(中)和
复旦大学辩论队成员合影留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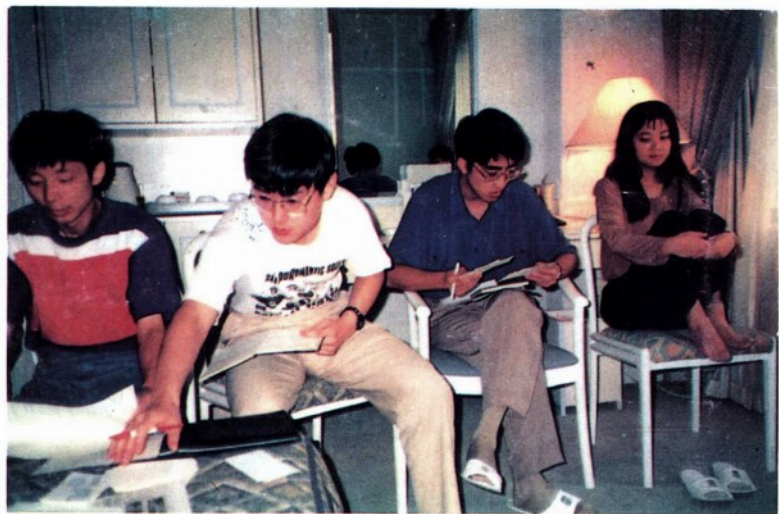
国际大专辩论会评委、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先生(右二)和
复旦大学辩论队成员合影留念



共商对策



赛前演习



有备无患



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复旦大学队和马来亚大学队在一起

目 录

给青年人创造机会	杨福家
（代序）	1
前 言	1
格物致知 修身辩论	王沪宁
——辩才的制造	
一、以开放指导选拔	3
二、以逻辑领导理性	7
三、以广博修炼理论	10
四、以常心进化本能	16
五、以严密要求技巧	23
六、以仿真营造实践	28
七、以艺术冶炼人格	32

逻辑·理论·价值

俞吾金

——生存论本体论视野中的雄辩术

- 一、逻辑是不可战胜的 57
- 二、理论是交锋的核心 57
- 三、画龙点睛在价值 70

辩论的美与美的辩论

姜 丰

——辩论中的审美意识

- 一、游戏：游戏的诞生。游戏规则 80
- 二、拒绝再现：辩论中的审美创造 86
- 三、行江有水千江月：辩论的判别、欣赏与接受 95
- 四、我们和我们追逐的梦：狮城舌战之后 104

辩论生态分析

蒋昌建

——辩论行为和辩论环境的相互关系

- 一、从真理到游戏：用理趣去在乎输赢结果 112
- 二、从抗拒到维持：让自己彻底地反对一次自己 117
- 三、从陌生到熟悉：把我的虚弱传染给你 112
- 四、从博采到精取：我的世界只有他最懂 130

混沌与变幻

严 嘉

——辩论的“散打”风格

- 一、道是无序却有序 143
- 二、世事洞明皆学问 150
- 三、以正合 以奇胜 164

技巧与超技巧

季翔

——辩论技巧的艺术

- 一、攻守辩证法..... 176
- 二、武器和武装..... 196
- 三、技术艺术化..... 208

吩咐彩虹女神

张谦

——从信息看辩论

- 一、哈哈爱兮爱乎爱乎
 - 信息之源..... 212
- 二、到雪地上撒点野
 - 信息之流..... 222
- 三、看得见风景的房间
 - 信息之思..... 233

情理交融的辩论世界

何小兰

——对言辞的超越

- 一、理性、情感、言辞..... 243
- 二、以声传情 以情传声..... 250
- 三、情感的多层表达形式..... 259
- 四、声情并茂与过犹不及..... 264

在成熟中超越 在超越中成熟

张霭珠

——逻辑的心理学与心理学的逻辑

- 一、高尚人格，超凡技艺
 - 辩论员的逻辑与心理..... 272
- 二、整体意识，流动默契

——辩论队的逻辑与心理·····	286
三、兼容并包，积极参与	
——观众的逻辑与心理·····	293
四、铁面无私，公正裁决	
——评委的逻辑与心理·····	299
五、至善至美，不倦诲人	
——教练的逻辑与心理·····	304
附录：辩论队员答来信·····	315

格物致知 修身辩论

——辩才的制造

王沪宁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
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
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孟子·告子章句下》

首届国际华语大专辩论会于1993年在新加坡举行。1993年8月，我们复旦大学辩论队在美丽迷人的新加坡度过了十天，紧张而又富有趣意，激烈而又富有人情，那是令人难忘的时光：在几场精彩纷呈的辩论之后，我们取得了大决赛的胜利，捧得了比赛的奖杯，接受了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准将颁发的奖金，为复旦大学的金字招牌上增加了一道亮彩。

这次胜利令“复旦人”十分高兴，杨福家校长在从美国返回的途中，特意发来传真表示勉励。我们也算可以无愧地面对我们这位严厉而又刻意给年轻人机会的校长了。他在我们训练时说的话，依然在我们的耳边回响：“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样没有余地的要求，激励整个辩论队在四个月的时间里兢兢业业地努力。

回来后，队员们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应各个方面的邀请，去谈辩论的体会和感受。中央电视台把在新加坡辩论的录像放了两遍，在社会上引起了热烈的反响，这是辩论队始料未及的：

——每名队员均收到了数十封、甚至上百封的来信，朋友们询

问了种种的问题,如何进行辩论?你们是如何成长的?你们读什么样的书?有的则是讨论对辩题的理解。

——中央电视台、上海电视台、东方电视台、东方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等均采访了队员和教练,或者专门做了节目,如东方电视台的“芳方直播室”、中央电视台的“12 演播室”节目等。新闻界的曝光,是队员们均没有领教过的,大概从此他们真正体会到了新闻媒介的巨大能量了。

——应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张德明先生的约请,我们编写了关于这次辩论的一本书,题目为《狮城舌战——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纪实与评析》。在短短 2 个月的时间里,印到了 25 万册,不少地方一个电话就订证很多,如云南来的一个电话就要 10000 册,内蒙古的一个电话要 5000 册,武汉订了 15000 册……以至复旦大学出版社没有同样质量的纸张来印书,在整个上海市也找不到充足的纸源。这时才体会到什么叫“洛阳纸贵”。

——《狮城舌战》出版之后,队员们到各处去参加签名仪式,在上海向明中学的首发式上,一次签名售书 600 余本,在上海南京东路新华书店的签名仪式上,一次签名售书 1000 多本,在南京新街口新华书店的签名仪式上,一次是 1300 多本……这个纪录还在上升。

.....

作为老师,遇到的最多的提问是:怎样才能训练出优秀的辩才?说实话,这不是一个很好答的问题。我在 1988 年担任过复旦大学队的教练,在新加坡参加亚洲大专辩论,最后决赛遇到台湾大学队,辩论的题目是:“儒家思想可以抵御西方歪风”。结果我们获得胜利。1993 年担任辩论队的顾问,参加了训练的全过程,也到了新加坡。但是,我还是觉得不能说一名优秀的辩手是如何训练出来的。因为一是真正的辩论高手不是程序化的训练能够训练出来的,而是要在社会、在生活、在人生的实践和砥砺中,才会脱颖而出

出,任何真正优秀的辩才都不是在书本上学会的;二是辩论实际上是一种应变的知识活动,现实世界上没有重复的辩论场景,因为每一次辩论均是不同的题目和不同的对象,即便是同样的题目辩一百次也会有一百次的不同。我们这些辩论队员经过严格的甚至可以说是严酷的训练,但是这些过程以及体验并不能构成规范化的训练过程,因为我们的训练是什对我们队员的特点,以及辩论队设想要完成的任务的。

一、以开放指导选拔

复旦辩论队的队员是优秀的,当然不能说是十全十美,因为他们还年轻。但是,在同龄人中,他们是佼佼者。在新加坡辩论期间,得到当地报纸搞度赞扬,也得到当地民众的喜欢。辩论结束后,在新加坡的最后一个上午,他们才有机会到街上去,民众对他们表示了由衷佩服之感。回来之后,中央电视台播放了辩论的录像,他们的形象和名字在全国热了起来。有的报纸甚至说,他们导致了一群新的“追星族”。作为个人,他们要不时地反省自己,不时地检讨人生,还要不断进步。作为老师,我是为他们自豪的,也为复旦大学有这样好的学生自豪。这些队员是如何挑选出来的呢?挑选出来后又做了什么样的“精加工”呢?这是组织一个辩论队最基础的工作。

挑选辩论队员,也就是挑选我们的材料。正像建筑摩天大楼那样,必须有适合的材料。对辩论队而言,“材料”就是合适的人。选才应该根据要达到的目的来选。如果是做玻璃花瓶,当然要选优质的玻璃,这样才美丽剔透;但是如果是做钢骨,必须是优须钢,这样才坚固牢靠。如果把这两样的材料反过来用,当然花瓶是可以作

出来的，玻璃造的楼房一定会塌下来。

复旦大学可以说是藏龙卧虎之地，集中了成百上千的莘莘学子，有能耐的人数不胜数。我们遇到的问题是：谁是最合适的辩手？我们选的是要参加高水平的辩论的选手，而不是其他类型的竞赛。如何能在茫茫人海中把他们找出来？我们考虑了多种的方法，根据1988年的经验，还是公开的、开放式的选择最能选出优秀的人才。应该把选拔搞成一个开放的体系，让所有有志者全可以加入。这样，才能扩大视野。我们采取了开放式的选择方式，同时也通过一定的渠道来推荐。

在训练以前，分析了我们在新加坡辩论的形式和特点，我们觉得要选的对象是：具备一般辩论所要求的素质，同时具备组队辩论所要求的素质。

合适的人选必须具备一般辩论中辩手的条件，因为本质上来说我们挑选的人是要进行激烈的对抗性的辩论，在辩论的实体上来说与一般的辩论没有太大的差别。合适的人选必须具备一般辩论辩手的条件。一般辩论的基本条件是：

——逻辑能力。有较强的逻辑推理和逻辑思维的能力，能在复杂的现象和严密的理论论述中发现基本的逻辑关系和逻辑结构。

——表达能力。能够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并且，甚至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富有感染力地表达自己，能够深深地打动听众。

——知识能力。具有较为完整的社会科学的知识，这是因为这次辩论的主题是社会与经济；同时也要求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的知识，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对任何社会现象的理解和认识，不能脱离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知识的结构要比较平衡，比较全面。

——机智能力。机智主要表现在反应上，对对方的理论和反驳，对自己的观点和概念，能够根据现场的风云变幻应变，能够在

激烈的辩论中展现自己的风貌和智慧。

——遣词能力。这是辩论的基本功，即对词汇的掌握，对词汇使用的恰当性，使用要念的准确性，这里包括组织句子、使用成语、俗语等方面的综合能力。

——幽默能力。幽默在辩论中可以构成闪光点，是一次成功的辩论必不可少的。辩手的幽默感是基本的素质，必须既有幽默感，又不让人觉得庸俗、趣味低级。

——心理能力。心理承受能力是辩论中内在的素质。心理能力表现在对自我的把握，对自己理论的信心，对场上力量消长的承受力，特别是在优势和劣势下的心理活动方向，对观众反应的心理承受能力。

在开始选择队员的时候，我们组成了有各个学科的教授参加的评审团，负责挑选优秀的队员。在开始报名的 108 位学生中，我们没有进行任何辅导，主要是为了观察队员的本色，在选择队员的时候，“本色辩论”必须让他们充分发挥，这样才能真正看准，如果带上了“装饰辩论”的色彩，反而不易选择出真正有潜力的队员。经过选择，评委选出了人选。然后要进行组队的选拔，主要考虑到新加坡的辩论是组队辩论，对队员还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如：

配合能力。组队辩论对辩手基本的要求是相互配合，不能个人风头主义，不能个人异军突起，也不能不知所措。要求队员在辩论过程中主动地与其他队员紧密配合，联手作战。

整体能力。整体能力实际上在选择阶段不容易看出来，因为没有组成固定的队伍，但是还是可以把不同的人组合在一起，看哪一种组合最有战斗力，哪一种组合最没有战斗力；在哪一种组合中哪一个人最适应，最能发挥自己的特长；在哪一种组合中，哪个人最不能发挥自己的力量、最受局限。

制宜能力。制宜能力主要是因地、因时、因人及时应变的能力，

即怎样使自己的理论最好地适应这样一种“生态的环境”，形成动态的平衡。它既是整体的，又是个体的。在选择作为个体的队员的时候，已经注意到这样的问题；而在一个队中的制宜能力也很重要，即个人在组队中如何发挥自己的制宜能力，整队又如何发挥整体的制宜能力。

在组队辩论的过程中，我们给各队安排了指导教师，基本目的是观察各个辩手领会指导教师意图的能力，轻及使辩论更加激烈和深入。在这样的几轮辩论后，最后进行了文化百科考试和口试，以更全面地了解队员的情况。考卷的设计有一定的难度，主要是了解队员的底务。所以不少辩手考下来，头昏眼花，深感自己的底蕴尚不够。口试就更难，提的问题天文地理、古今中外均有，基本目的蝗马辩手的看家本领全部考出来。所以，张谦在《狮城舌战》中调侃说，这样的考试“不利于年轻人的身心健康”。不要说是学生，就是教授，在这样庞大的考试团面前，大概也是要败下阵来。我们的目的是要彻底了解他们，同时可以确定以后训练的计划和方向。

除了上述的方面之外，在选择队员的过程中，还有一些非决定性因素：如形象条件，大体上形象要得体，但这是一个人没有选择的条件，因而不列入决定性的条件。再如音色条件，因为辩论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语言的艺术，音色当然就重要了，但这也不是决定性的条件，不然播音员就是天生的辩手了。

经过这样的挑选，我们确定了姜丰、季翔、严嘉、蒋昌建、张谦和何小兰作为集训队的队员。他们在上述条件方面比其他的队员有一定的优秀，实际上他们大多是辩论场上的“老将”，已经参加了多次辩论，如学校的系际辩论，上海市的辩论等。姜丰和蒋昌建过去有参加过辩论，是辩论新手，但是有过演话剧、演讲和讲课的经验。选中他们，是因为他们均有不少的优点和鲜明的个性，有的时候，选中的理由并不在于他们有十分高超的辩论技巧，而在于他

们有很好的素质，可塑性强。有的同学很好，但是可塑造性不强，所以也不能考虑。对于他们的优点，这里不可能一一道来，我只说一些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姜丰的仪态和风度，以及在辩论场上温文尔雅的态度，是一般辩手不多见的；季翔的沉着稳重、处变不惊，超过了他的实际年龄，他能够在任何情况下保持自己的逻辑思想，不慌不忙地应战；严嘉在辩论中表现出一定的的辩论技巧和基础，有辩论的经验和感觉，他的反应和知识面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蒋昌建知识面广，语句组织的独特性以及很强的逻辑推进能力和征服听众的能力，在辩论场上收到了出乎意料的效果，以至在选择赛中，他每次出场听众均会报以热烈的掌声。我们选择的的就是这样的“材料”。

选择了材料之后，接着的任务就紧地材料进行加工，进行精加工。我曾和辩手们开玩笑，说过去你们是“散兵游勇”，现在被收编了，将要训练成为“正规军”。实际上也就是一句玩笑，因为他们经过这样严格的挑选，均已经不是凡夫俗子，而是各有一番风采的。

二、以逻辑领导理性

逻辑能力，是雄辩的核心能力之一。辩论场上，雄辩家没有高度的逻辑能力，就象在大海中航行的轮船没有了罗盘，飞机没有导航仪一样，会迷失方向。在辩论中，经常发生“逻辑消失”的现象。“逻辑消失”指的是：一是对方的“逻辑消失”，在激烈的辩论中，不能抓住对方的基本逻辑关系来组织进攻，而和对方纠缠一些枝节问题和鸡毛蒜皮的问题，不能对对方立论的核心给以毁灭性的打击，或者在开始是明确的，但在白热化的辩论过程中，进入逻辑的百慕大三角地带，失去了对方逻辑的把握；二是自己的“逻辑消

失”，在辩论中不能坚守自己的逻辑阵地，游离出自己的逻辑结构，出现立论上的破绽，给对方造成进攻的漏洞。这两种情况，在辩论中均是致命的弱点。掌握逻辑能力，难度很大。逻辑问题不在于心平气和的时候，而是在一扬你死我活的酣战中，在又方辩得难分难解的过程中，如何能有效地运用自己的逻辑能力，将自己在平时状态中的逻辑能力保持不变，并能够超水平地发挥。针对这个问题，我们集中进行了三种训练：

一种我把它叫作是“打蛇打七寸”。也就是抓对方的逻辑结构，抓对方的逻辑关系，抓对方的要害。在对方发言之后，要迅速地抓住逻辑上的关系来组织自己的进攻，而不要纠缠在小的失误和问题上。“摧其坚，夺其魁，以解其体。龙战于野，其道穷也。”在辩论中，往往容易犯的错误是被一些小的错误所迷惑，抓住不放，虽然有效果，但是不对对方的立论给予致命的打击。在一般情况下，可以利用对方的一些小的失误来调节场上的气氛和情绪，如 戊剑桥大学辩论过程中，对方讲“我们李光耀总统……”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但不是对方的逻辑关系。我方四辩蒋昌建起来，接了一首，说：“首先纠正对方一个常识性的错误，李光耀是总理，不是总统。”赢得热烈的掌声。但是，下面的辩论还是要进攻对方关于温饱问题的逻辑立论，而不能在这个问题上纠缠，那样就不能形成强大的打击力。1988 年辩论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例子，在辩论联合国的时候，我们故意问对方，联合国是哪一年成立的？对方一下回答不出来，我方就说：“连联合国的生辰八字都不知道，如何来给联合国算命呢？”但是，些均不是辩论的主要战场。主要战场还是对对方的逻辑关系的进攻。怎样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抓住对方的逻辑关系，然后集中力量加以进攻，这是辩论的要旨。这种能力并不容易培养。逻辑分析能力要强，同时意志要坚定，不为一些次要的问题所诱惑。抓对方的逻辑结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理解对方

的逻辑设计,二是在对方的发言中归纳出内在的加急辑错误,来反驳。因此,在训练中,我们做的一项基本的训练就是要求每次对方发言之后,立即明确对方的逻辑,进攻逻辑核心。这种能力要求较高,因为往往是要求在非常短暂的时间里做出反应,不然就错过时机,陷入被动。只有抓住了逻辑结构,才能“打蛇打到七寸”,才能有较为坚定的逻辑阵地。在同台湾大学队的辩论中,我方抓住对方的逻辑结构的弱点,即“善花中如何结出恶果”,台湾大学队的立场中的逻辑难题是既然人性本善,那么社会上的为什么有恶?第一个恶是从哪里来的?这在逻辑上不好解释。他们归之于社会一半,那么社会环境中的恶又是从哪里来的?我方在这一逻辑点上猛烈进攻,连续进攻,得到较好的逻辑立场,掌握了一定程度的主动权。

另一种是“以不变应万变”。在辩论中,要防止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在激烈的辩论不能守住自己的逻辑结构,发生“逻辑迷失”,离开了我方确定的立场。守住自己的逻辑,也就是说核算得刑事,收得扰,像飞去来器,不能有去无回。一般的辩手在辩论中容易发生的事情是离开了自己的逻辑结构,跟着别人的战线作战,或者跟着感觉走。这样容易造成辩论上的被动,一是逻辑结构渐渐不明确,自己也迷糊了;二是离开了自己的逻辑结构,实际上就是离开了自己构筑的堡垒,容易暴露自己的弱点,结果被对方攻进来。另外,在组队辩论中,一个人离开逻辑结构,可能会给整个队带来不利的局热。因为四人统一的逻辑结构是组队辩论的基本,一个人的游离,会级其他辩手带来被动,不知如何来适应。所以,在辩论中,要明确我方的逻辑结构,有坚定的立场,我方的逻辑结构是“不变”,而辩论中个人和整体的淋漓尽致的发挥和活龙活现的表现是“万变”,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这样的一种能力不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不容易养成。集训时我们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来训练这种能力。有时是整队训练,在陪练队激烈的攻击下,在陪练队花样百

出的进攻下，始终坚持自己的逻辑结构。有时陪练队的任务就是千方百计地攻破正式队的逻辑“城池”，想各种办法，各种花招；有时是一名队员在自己确定一定的立场之后，其他数人猛烈进攻，从各个角度、各个方向、各个领域进攻，这一个人要努力坚守自己的逻辑立场，不发生动摇和“变节”。

第三种是“转换立场”。“转换立场”是辩论的一种战术，也是训练逻辑能力的一种基本方法。这种方法的基本作法是把对方的立论和反驳转换成我方的立场从中找出能证明自己立场的逻辑来。《三十六计》中的第三十六计是“反客为主”，“乘隙插足，扼其主机，渐之进也。”实际上，在辩论中这种技巧十分重要，有时可以使对方一下子反应不过来，或者乱了阵脚。在训练辩手的过程中，大量使用了这样的训练方法。确定一定的题目和立场之后，就让进攻队发动进攻，辩手只能把对方的话转换成证明自己的立场，不能用其他的话来反驳，带有强制性。这样的训练在一开始有一定的难度，辩手们不一定能适应，反应不是很迅速。但是，一段时间后，辩手们就熟能生巧地做到这一点。不论对方说什么，均能巧妙地化解，均能从中找出有利于自己立场的材料、观点、或者量种逻辑关系。当然，“转换立场要防止变成诡辩，否则反而不符合辩论的基本精神。”“转换立场”对队员的要求很高，要有很强的逻辑能力，广博的知识面，灵敏的反应等等。不然，是难以达到“转换立场”的要求的。

三、以广博修炼理论

辩手的基本素质是其理论修养，或者说知识修养。辩论是围绕一定的题目展开的，而任何题目均与非常广泛的社会现象和理论

相关。中国古人把辩论说成是：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如果没有一定的理论修养，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在一场辩论中，优势往往来自辩手对有关题目的知识和理论的把握，这种能力，在表面的能力之外，往往具有决定的意义。

一场高水平的辩论，不仅仅是技巧密集的辩论，而且是知识密集的辩论。一名优秀的辩手，必须知识和技巧比翼双飞，不然汉有在辩论中从容不迫，游刃有余。辩论的综合实力，理论修养占很大的比例。在高水平的辩论中，往往第一层次是技巧和技术的较量，在这个怪次如果平分秋色的话，第二层次是知识和理论的较量，如果一名辩手在理论和知识的把握上占据优势的话，就会在辩论中占据优势，因为如果你陈述观点、你列举的理论、你陈列的事实，对方不知道，或者不清楚的话，就无法与你展开辩论，就无法在同一层交个与你辩论。而反过来，如果你在知识、理论和事实的掌握上不如人家的话，你应付地处于劣势。

这里有一个“知识量”的竞争，就像在战争中一样，弱势的兵器是无法与强势的兵器作战的。当然如果战术得当，一定的弱势也能战胜一定的强势，这是有一定的极限的。汉有想象骑自行车的人可以每每超过骑摩托车的人。第三层次是价值的较量，这一点在辩论中往往被忽视，主要是一般的辩手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不知道价值这一抽象的因素在辩论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技巧和理论不分仲伯的情况下，价值选择就极其关键了。价值选择是人们对一定事物的一种理想和意愿的选择，是对一定题目的主观性的定位，是统领整个理论和材料的应用的。所以，这三个层次在辩论中均不可缺少。而且，一般来说，后两个层次的东西往往更难以掌握。

理论分析能力和价值判断能力的提高，是训练的核心环节，而且我们认为这是比技巧训练更重要的训练。理论和价值训练之所

以关键,是因为在辩论场上,如果对方讲了自己的理论和价值之后,我方不了解,或者不知道,就无法辩论了。辩论是双方各自准备自己的理论,在上场之前并不知道对方会说什么,会选择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尽管在辩论之前,可以有充分的分析和考虑,猜测对方会有哪几种可能性,但是还是不可能面面俱到。而且辩席的一个重要技巧就是要出奇制胜,每个队都知道这一点,都会尽量出奇兵,避开对方的事先准备。这样的话,在场上发生“意料之外”的可能性很大。如果没有较好的理论修养,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汉有战而胜之。最佳的状态是:无论对方说什么,我方均能应对,而我方所说,对方不能应对。

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十分不易。因此我们安排了大剂量的读书计划和讲座计划。理论和知识的修养,一般而论,不是一朝一夕能够飞跃的,有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所以,基于选择的队员有较好的基础,我们的做法是加入最佳的要素,促使辩手的知识结构,主要是已经存储的知识,发生“核裂变”。在整个训练过程中,请复旦大学最好的文理科教授和教师作了50次讲座,涉及历史、文化、经济、政治、国际关系、哲学、语言等,尤其是对一些新兴学科进行了重点介绍。同时,开出一份书单,让学生自己阅读,并且组织讨论。我们到学校大图书馆的藏书库里挑选了一大批书,让学生自己读。另外,辩手们根据自己的体会和认识,也读了不少书。有些书是精读,有些书是泛读。如《四书五经》就列为精读的书目,国为新加坡推崇儒家文化,另外华语辩论必须展示华语的优美,而中国古代经典往往最能反映华语的优美。同时,如果与台湾大学这样的对和相遇的话,儒家文化的知识就成了基本功。《四书五经》是一句一句地读,一句一句地讨论,要完全吃透。

提高辩手的事实使用能力,是我们训练中的重要一环。辩论中最忌讳的是整个发言全部是抽象的理论和概念,这样既枯燥,也会

留下很大的辩论余地。高水平的辩论要有理论，但是不能“理”来“理”去。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列入辩论的“硬材料”，而是一种“软材料”。所谓“硬材料”指的是没有多大辩论余地的资料，或者说可辩余地很小的资料，如世界人口的总数世界上贫困人口的总数、一定的统计数字等等。而“软材料”往往是可以辩论的，可辩的空间比较大。一种理论，一种观念，一个概念，总是可以提出不同的对应，甚至可以提出相反的理论、观念和概念。因为来辩论的人总是选择了一定的理论框架的，没有一定的理论框架，便不能来辩论。来辩论的人也不准备被对方说服，所以一方提出的理论，哪怕再有合理性，也可能会接受对方另一种理论的挑战。迈克尔·A·吉伯特在《如何在辩论中取胜》一书中把此中战术或者态度称为“第一超级法则”：切勿承认失败，除非你已经被彻底说服了；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应该绝口不谈失败，等待日后再说。当然，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应该崇尚真理，随时准备修正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接受真理。但是，辩论不同，辩论如果是竞赛就更不同，如果承认自己输了，那就不能再辩论下去了。辩论中要有理论作指导，但是理论要通过事实来陈述、来表达，尽量减少理论可辩的空间，使自己的理论观念成为一种不能辩的资料。这样，在辩论过程中，使用事实的能力就十分重要。美国第32届总统罗斯福1941年12月8日向国会发表了著名的演讲，是一篇运用事实来讲的演讲：“昨天对自威夷群岛的进攻，给美国海陆军部队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我遗憾地告诉各位，很多美国人丧失了生命。此外，据报，美国船只在旧金山和火奴鲁鲁岛之间的公海上也遭到了鱼雷的袭击。昨天，日本政府已发动了对马来亚的进攻。昨夜，日本军队进攻了菲律宾群岛。昨夜日本人进攻了威克岛。今晨，日本人进攻了中途岛。……”这里他列举大量的事实，来证明日本侵略军的危险性和美国应该采取的立场。

辩论过程中，并不是每名辩手均能自动地掌握使用事实的能力。主要的原因是一般人总是把辩论理解为逻辑和语言的辩论和竞争，会在这个方面下大功夫，而不太注意运用事实。我们在训练中集中训练了这样的能力，要求辩手在一些训练的比赛中，尽量多的使用材料，不使用过多的概念和理论分析，从而掌握使用事实来表述理论观点的能力。事实可以分为多种的类型，如数据性的，如国民生产总值，艾滋病患数量，花费的费用，年月日的时间概念等等。有一种是实例性的，如某某人有什么疾病、某某地区战火纷飞、某某人犯罪等等。将这些事实分类之后，综合加以使用。平时要多积累事实，这样到时候才能得心应手。

价值判断能力的提高也非常重要。价值判断是辩论中极为重要的因素，不少辩论的人不注意这个因素，因为他们不知道在辩论中感染力是从何而来的。在所有的理论和技巧确定之后，人平还有更高层次的竞争，这就是价值的竞争。对同一个事物，讨论同一个对象，双方虽然持不同的观点，但是在价值上必须立意高。谁的立意高，往往可以在辩论中获得一定的优势。

可以看看美国第28届总统威尔逊要求国会对德国宣战的演讲，他在演说的最后说：“把这个伟大的和平民族引入一场空前可怕的战争中去，是一件思之令人恐怕的事情。全人类邀请处于岌岌可危的关头。但是正义比和平更珍贵，我们将为心中最珍贵的事物奋勇作战——为民主，为那些争取在自己政府中有发言地位的人的权利，为各自由民族一致赞同的自由正义统治而战。为了实现这一任务，我们可以骄傲地献出我们的生命财产，献出我们的一切所有。连同我们自己在内，因为我们认识到美国人用自己的热血和力量去捍卫自己原则的时刻已经来临，正是这些原则赋予我国生命、幸福与她所珍惜的和平。”^① 不论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

① 孙全民编：《世界名将演讲精萃》，第14页。

大战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威尔逊所描绘的那样，但是他在演讲中充分渲染了一些崇高的价值，来增加讲话的力度。

许多名人的重要的演讲和成功的演讲，均是以一定的价值观念为基础的。再如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领袖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的著名的演讲，就是非常有感染力的雄辩：“我有一个梦，有那么一天，我的四个孩子，能够生活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皮肤，而是以他们的品性来判断他们的价值的国度里。”这里，并没有谈什么高深难懂的理念，但是她在听众身上产生了巨大的心灵震撼。这就是在这些普普通通的语言后面所渗透的价值。我们的队员在辩论中，也必须以价值来“安身立命”，在价值选择上，要占领“制高点”。

严格地说，价值判断能力是最难训练的。因为对一种事物的价值认识，不是可以教授的。当然，我们可以集中确定几个主要问题的价值选择，如针对辩题来作这样的分析。在一场激烈的辩论中，随时会遇到一个新的方面、新的领域和新的概念，要辩手在辩论过程中有一个大致的价值判断。价值判断与辩手的人生观、理想观、历史观、甚至宇宙观有密切的关联，是辩手对社会、地人类本身、对历史发展的一种综合的态度，对辩手的文化修养、理论修养和人生修养有较高的要求。要在短短的几个月的训练中来完成这项任务是极其困难的，我们只能在最核心的一些问题上来让辩手确定自己基本的价值观。很多是有针对性的，如对传统文化、对社会发展、地经济发展、对政治民主、对国际关系、对人生道路，等等。而对辩论要涉及到的基本领域，则重点加以熏陶。主要是一种判断，即分析未来辩论可能涉及的基本领域和题目。价值判断能力通过训练理论和事实能力来提高，这是一个水乳交融的过程，不能说单独地就提高了价值判断能力，而把其他方面撇在一边。

一个人形成一种价值体系不容易，有时要花一辈子的时间。辩论对辩手来说只是人生大海的一朵小小的浪花，在大潮到来的时

候，这些浪花是会消失的。但是，我们作为老师，没有把对这些队员的训练仅仅看成是一个功利的过程，只是为了对付新加坡的辩论，而是更想在空虚过程中来培养理想的高尚人格，以便他们能够在未来迎接壮阔伟大的人生。

四、以常心进化本能

在《狮城舌战》一书中，我曾经提出了“机械辩论”和“本能辩论”两种境界，并且给了一个初步的规定性。“本能辩论”指辩手能够把所有的辩论要素变成自己本能的东西，能够随心所欲地加以运用。而“机械辩论”是指不能把所有的辩论要素变成自己本能的一部分，只会机械地、刻板地、僵化地运用辩论的各种要素。一般辩论的知识和技巧，在普通的辩论书上均可以找到，而且具有一定理解能力的人，都能在学习一段时间后，了解辩论的基本要素，如逻辑、知识、幽默、技巧、反应、语言、形象、手势等等。但是，知道不等于掌握，掌握不等于精通，精通不等于善用。精通辩论要素的人，可能谈起来头头是道，滴水不漏，但是不能实际地灵活地运用。辩论为什么要进入到“本能辩论”，主要是辩论这种智力活动的本质所决定的。

辩论是不同辩手的较量，但是这一较量发生在有限的时间内，不是无休止的较量，如一个国家和一个国家的较量可以持续半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一场足球可以较量 90 分钟，辩论的胜负则往往是在息之间决定的。新加坡式的辩论有严格的时间规定，即使一般的辩论也是要唇枪舌剑，没有时间等待，不能“让生命去等候”，必须在极短的时间限里做出反应。这里的反应包括了多种方面，对于对方的一句话，可能是在理论、知识、价值或逻辑上反应，可能是在战术上反应，可能需要幽默、表达上反应，其实没有

时间来考虑，不是写文章，可以平心静气地来思考。辩手在辩论场上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做出反应，有时有点像美国西部影片中枪手们较量时的情形，看是谁拔枪拔得快，或者像武打小说中描写的那样，看谁出招出得快，时间就是胜利，就是优势。这样一种境界，必须是“本能辩论”，就像人在遇到威胁和一些场合下会有本能的反应那样，这样才能在辩论场上取得优势。

如何使辩手尽可能地接近“本能辩论”的境界，是训练中的一大课题。我们的基本训练战略是熟能生巧，难者不会，会者不难。通过大剂量的辩论模拟和各种各样的辩论来塑他们的“本能辩论”的能力。在基本的辩论知识和技巧掌握之后，关键就在于得心应手地运用。而“本能辩论”形成的最佳方法，莫过于多辩多体会。让辩手在辩论中体会，在体会中提高。“本能辩论”往往是耳提面命不能奏效的。整个训练的过程，前期是以知识学习为主，后期基本上是以辩论为主。每天均有一场正规的辩论，而且要求辩手在短时间里设计好立场、逻辑关系、理论、整体分工和战术。随着辩论次数的增加，准备的时间也越来越短，这看上去不如精心准备的模拟辩论正式，但是在这样的时间强制下，辩手的“本能辩论”的特性会渐渐强化。

我们在后期的辩论训练中，由陪练队员组成模拟队，并且由较强的教练来指导。每天晚饭后第一项活动就是准备这场辩论，当场宣布题目，大概给30分钟到一个小时准备时间，然后就正式开始辩论。开始的时候有些不适应，但是到后来，就能很快地进入角色，并且往往能打出高潮，有时十分精彩。

一名优秀的辩手，应该是机智的辩手。机智是最难训练的，因为机智不是一种可能灌输的因素，而是一种基于个人的人格、知识、性格、反应、智慧的幽默于一体的东西。

什么叫机智？可以举两个例子来看。第一个例子，有一次，前苏联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参加联合国会议，英国工党的外交大臣

说：“你是贵族出身，我是矿工家庭出身，我们两人究竟谁更能代表工人阶级？”莫洛托夫沉着地走上讲台，只说了一句话：“是的，我们俩都当了叛。”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

第二个例子，在新加坡与悉尼大学队辩论的时候，我方立场是艾滋病不是基学问题，是社会问题，我方强调了社会教育的重要性。对方提出输血也可以传染艾滋病毒，如果是这样一个婴儿传染了病毒，也要对他进行性安全的教育吗？以此来反驳我方的理论，同时证明艾滋病是医学问题。应该说是非常有力的，也是敏税的。我方三辩严嘉同学的反应非常快，马上站起来回答说：“至于说到小女孩，当然我们不要对她进行性安全的教育，但是对她母亲当然要教育，这样才能防止艾滋病的母婴传染啊！”现场我坐在听众席上，听到严嘉讲了前半段话，不禁心里紧张，后面会怎样应对呢？严嘉后半句一转，形势大变，博得一阵掌声。这就是机智。

机智大概是汉有训练的，而是要辩手在自己的生活和人格培养中来体会。应该说，像理论和价值方面的培养，对形成机智均是必须的。机智不仅是头脑灵活，反应快，而且是一种对人生和社会、地历史和未来的判断，对社会中群己关系的判断。一切时间跨度大的判断，如果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做出反应，那就是机智；一切复杂的问题，如果用最简明的逻辑来判断，那就是机智；一切令对方得意的事实和理论，如果能在瞬息之间化解，那就是机智；一切对自己不利的局面，如果能在“弹指一挥间”扭转局面，那就是机智；一切严肃沉重的场面，如能用轻松诙谐来处理，那就是机智；……如此等等。显而易见，这样的能力不是纯技术的，而是一种人生态度和信仰。如幽默，可以学习，但是更基本的幽默来自一个人的生活态度。卓别林说：“所谓幽默，就是我们在看来是正常的行为中觉察出来的细微的差别。换句话说，通过幽默，我们在貌似正常的现象中看出了不正常的现象，在貌似重要的事物中看出了不正常的

现象。”这里关键是一种生活态度。

我认为，幽默不是一种技巧，而是一种生活态度。一个人只有完全超脱了你要发挥幽默的情形，觉得自己完全高于这种情形，可以居高临下地俯视这种情形时，才有幽默可谈。反之，一个人被自己所处的情形所制约、所控制、所压抑，是没有幽默可谈的。这样的幽默例子很多，如著名文学家萧伯纳，一次他在路上被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撞倒，那人十分不安，一直道歉，然而萧伯纳说：“不，先生，您更不幸，要是您再加点劲，那就可以作为撞死萧伯纳的好汉而永垂青史了。”再如，有一次，邱吉尔的政治对手阿斯特夫人对他说：“温斯顿，如果你是我的丈夫，我会把毒药放在你的咖啡里。”岳吉尔笑着说：“夫人，如果我是你的丈夫，我会把那杯咖啡喝了。”这里面均反应了一种超然于生活或对方的生活态度，没有这样一种感觉，是不会有幽默感的。所以在训练过程中，我们十分注意让辩手们形成一种高尚和豁达的生活态度，逐渐形成一种宽阔的生活视野，形成一种对生命的历史和历史的生命的感受。

我们的训练还包括许多具体的方面，如对表情、手势、语气、语调、眼神、风度等等的要求。辩论在这些方面的要求不精致于对一位辩手其他方面的要要。我们要求辩手在这些方面也精益求精。

表情的训练，主要是配合辩论中所讲的辩词的内容来加强语言的感染力。美国作者罗伯特·怀特沙特在《脸部语言》一书中提出了“非语言沟通”的概念，也就是怎样运用眼睛、嘴部等的表情和活动来沟通思想。这在辩论中十分重要。事情就是那么的奇怪，辩论，顾名思义是用语言进行的，否则不叫辩论。但实际上，在辩论场上，很多的信息沟通，辩手和辩手之间，辩手和听众之间，辩手和评委之间，不是通过语言来完成的，而是通过“非语言沟通”来完成的。“此处无声胜有声”。从表情上来说，在辩论中最容易发生的事情是表现急躁、激烈，或者无动于衷。一般辩论者不会过

火，当然不排除有些人会在说论中过火表情。这样对辩论并没有益处。表情的训练主要有两种手段，一是观看录像，如上一次亚洲大专辩论会的录像，大家对台湾大学队的一位同学的适中的表情颇为欣赏。由于表情自己不能看到，因而就录像，有些模拟辩论，录下来以后大家一志观摩，分析每个人的表情及其他各个方面的表现。这种录像不那么好看，不像看奥斯卡奖的电影录像，队员们一直把这样的录像视为“恐怖片”，有点惨不忍睹。有了这样深刻的印象，大家就会下决心去“痛改前非”，“改头换面”。

气质，也是一名辩手最基本的素质。我常对队员们说，最好的辩论队是，人往那里一站，评委一看，观众一看，不用开口，就能知道谁赢谁输。这就是身上无形的气质。在辩论中，气质有时是比巧舌如簧更重要的胜利因素，比所有外在的因素更基本的要素。不过，气质是不能训练的，只能陶冶，只能自己来培养，自己来塑造。我们选的队员，已经有相当不错的气质，姜丰的温文尔雅，季翔的稳重沉着，严嘉的活泼机灵，昌建的朴实忠厚，都是难得的气质。但是，从辩论比赛来说，从要经历的场面来说，从参加一场公开的国际比赛来说，还要提高，还要升华。特别是在辩论方面的气质。在训练中，我们时时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同时观看了一些录像，如《巴顿将军》，里面巴顿出场的时候，有一段长篇讲话，气宇轩昂，显得胸中自有百万兵的样子。再如《JFK》，讲肯尼迪被刺事件的，最后检察官的那一番陈词，在逻辑和气质上，均是一流的。当然这是一流演员演员，普通人达到这样的境界不容易。

语音、语气和语调，是辩论基本功，没有这三“语”，辩论就无从谈起。法国哲学家帕斯卡说过：“说话的语调整可以左右最明智之人，并且能改变一篇文章或一首诗的力量。”语音方面，基本上和自然的基础有关，不太能改变，因而在选队员时要密切注意。语气和语调，则是能够训练的。一般的人讲话，不太有语气和语调方面的

变化和起伏,但是,为了在辩论中加强语言的力度和穿透力,必须加强语气和语调的训练。为此,我们做了多方面的努力。如朗读古文,把“四书五经”拿出来,一个人一个人地接着读,开始读得结结巴巴,后来就流畅了,可以满口之乎哉也。朗诵诗哥是我们训练中的一项基本内容,朗诵过艾青、舒婷、顾城、徐志摩的诗。小兰朗诵很好,经常是她来做示范。诗歌最有利于表达感情。在语气、语调的抑扬顿挫之中朗诵好的诗歌,使人投入。昌建在朗诵艾青的《大堰河,保姆》时,动了真情,泪水涟涟,想起了远在安徽的病重在卧的母亲。这个时候是感情最投入的时候。辩论过程要求辩手能有全身心的投入,要以心来辩,不仅以嘴来辩。

什么时候使用什么样的语气,在辩论中有一个选择问题,不是什么时候均可以划一处置的。需要加强语气的时候要加强,不南非要加强的时候不要加强,不然会适得斯反。有的时候,语气要特别强烈。如在与剑桥大学辩论的时候,对方三辩说,要投票灭充公我方的财产,并以此来证明他们的论点。这是一个有挑战性的问题,同时也比较棘手,我方严嘉站起来,毫不犹豫地说:“如果我的财产充公,能够为更多的人民谋福利的话,那我想,我会选择这样做的,因为要要做有道德的人。”博得热烈的掌声。这样的语气十分自信。我们叫此为“狭路相逢勇者胜”。在这种时候,只能刺刀见红,不能退缩,否则就会陷入劣势。当对方说法律不是道德,季翔就站起来说:“法律中难道没有道德观念吗?从《汉谟拉比法典》到《大清律例》,从宋《刑统》到《权利法案》,请对方告诉我哪一部法典中不包含道德观念??”语气特别自信,特别坚定,给人一种不容置辩的感觉。结果对方果然不再恋战。

而昌建的语气一般是比较说理的,比较地“慈天悯人”,比较地有历史感,有文化,而不是过多地在语气上作文章,总的风格是侃侃而谈,入情入理,以价值判断作支撑。姜丰则给人一种温和的语

气,实际上是棉里藏刀,有几个回合,只能由姜丰用她特殊的女性语气来说,不然是不会有效果的。如:“我方明明回答过了,为什么地方辩友就是对此听而不闻叫”到底是没听见,还是没听懂啊?”掌声很热烈。又如:“不是我们不告诉对方辩友,是我们一再一同志地告诉,你闪都不懂。”掌声热烈。如不这样的话,换个人或者换种语气说,可能会产生反面的效果。当然,对方可能不是不懂,而是故意不懂。这在辩论中是要向评委指出的。而1988年辩论时顾刚的语气就比较锋利和尖刻,给人一种咄咄逼人、势不可当的感觉,他的一些反驳,均是力量型的,如:“我想这位同学搞错了,我们爱孔子,但是我们没有受过孔子的教育,然而受过孔子教育的人像子夏,不晃不晃借伞给孔子挡雨吗??“我们不反对对方同学食古,但是问题是你有没有消化的肠胃?”等等。在辩论中要根据当时的情况使用语气,用得恰到好处。

手势也是训练中的一个重要的科目。辩论中,手势的使用得当,可以增加语言的力度,增加整个形象的完美,反之,可能会起消极的作用。英国人德斯蒙德·莫里斯在《手势新探》中说:当人们进行活生生的感情交流时,手势的重要性甚至会超过语言本身。语言固然可以用来说明事实和表达思想,但若没有手势,人们的社会生活就会变得像机械一样冷漠死板。

我们这些队员,一开动员,在手势方面的水平不高,主要的问题是手势太多和手势单调。可以称之为“格式化手势”。如姜丰总是像“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那样地从上而下地“劈”;季翔总是不停地做向前出手掌的手势;严总是伸直了手然后左右的挥动,昌建总是用手掌在头上的上部“小招手”。这些手势的主要的问题是单调,一种再好的手势,连续做是多了,总是不雅。在训练中,在日常的讲话过程中,一直十分注意要他们修正自己的手势,一是要多样化,二是要点到为止,不能过分。后来发现,手势是极难纠正

的,主要是这些手势已经成为队员雄辩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没有手势,他们就不能那么雄辩,好像失去了什么。有时训练中,辩手们讲到一半,出现了“格式化手势”,我们指出后,他就无法再讲下去。手势有强大的顽固性,特别是对一名原来素质就较好的辩手来说,就更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了。为了手势,的确是花了大的力气。经过一段时间的坚持,手势问题有所好转。但是,有的又形成了新的“格式化手势”,又要加以纠正。最后似乎大部分“格式化手势”又“复辟”了。后来发现,不是说训练没有结果,而是训练形成了一种潜移默化的结果,在真枪实战中,这种手势意识便显示出来,成为一种潜在的意识。在新加坡的辩论现场,队员们的手势尚可。

神态,在辩论中牵涉到辩手的风度,在训练中也是重要的科目。神态包括几个方面,如仪表、表情、姿态、神情等。从小的细节开始,就要追求完美。比如说,轮到自己讲话时,怎样站起来最有风度,太慢不行,显得没有朝气、没有斗志;太快也不行,显得太急躁、修养不够。讲完坐下,速度又如何?怎样把握度,也是课题。有的队员讲话的时候习惯,性地摇晃自己完全没有意识。有的队员站起来的时候,站不直,习惯性地弯着腰。有的队员讲话时习惯性地跟眼看着天花板,不看听众和评委。这些均要加以纠正。

五、以严密要求技巧

辩论对技巧的要求特别高,在这方面已有大量的书籍论述过。我在这里不想面面俱到,只谈在我们训练中注意过的两个问题,一是进攻和防守,二是时间的控制。

辩论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辩手在场上的进攻与防守的二难困境。辩论对辩手有一个逻辑要求,就是要赢得胜利,辩手必须尽

量攻击对方的立论,同时,为了反驳对方的辩论,又要尽力地防守自己的立论。一般人难以摆脱这个困境,容易发生的毛病是进攻攻得太远,开了“无轨电车”,完全离开了自己的立场,不能在自己的立场上来反击对方立场,而是跟着别人走了,逐渐就在辨认中失去了主动权,自己的立场反而不鲜明。另一个容易发生的毛病是守着自己的立场不出击,不能有力地进攻对方立场,结果也不能更有效维护自己的立场。在辩论场上,一般的经验是,进攻是最好的防卫。没有进攻,不能攻破对方的立场,就不可能最终守住自己的立场,赢得胜利。在这方面,我们也设计了训练方案:

第一种是练进攻。在训练中经常安排进攻性的训练,对于一个设立的立场,进行集中的攻击,有时是一具人攻击地方的四个人或三个人,有的是三个人或四个人攻击一个人守住的立场。因为一个人的逻辑性强一点,比较容易前后一致,所以容易守住,可以作为左右效率的“靶子”。

第二种是练防守,设定一个立场后,竭力维护。有时是一个人负责防守一个立场,三个人或四个人来进攻,有时倒过来,是一个人进攻三个人或四个人防守的立场。有时故意要求设定比较荒唐的立场,与常识不符合的立场,主要是为了增加防卫的难度,训练防卫的能力。

第三种是练组队作战的能力。因为新加坡式的辩论是组队式的辩论,与一般的单个人对单个人的辩论还不同,任何个人能力必须是一个整体的能力。进攻和防守自如,不仅要求个人有这种能力,整体也要,不然就不能集体作战。训练中的基本方法是安排陪练队员进攻或者防守,要辩手们防守或者进攻。在训练过程中,也做了一定的程式安排,主要是为了慢慢培养出整体的协调和攻防组合。昌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作首攻的,即每次由昌建首先发起进攻,任务是要攻在对方的立场上,而由季翔来作“KEEPER”,

这是我们发明的一个名词，主要任务是回到我方立场，提醒各位防守，不要脱离太远，同时开辟“第二战场”，即形成新的攻击点，严嘉和姜丰“散打”。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这种意识就大大强化。

在辩论中，我们倾向于打“攻势足球”，主要是进攻，而不是防守，当然这种战术可以应变。在激烈的辩论中，如果始终守在自己的立场上来应付对方的进攻的话，就会限于被动，穷于应付，不能腾出手来有效地进攻对方的立场和立论，在辩论场上会显得观感不好。自己立场的确立主要是为把对方驳倒，如果仅有对对方的立论形成猛烈的攻击，怎么能够驳倒对方呢？一般的心理状态是，正方心理上比较容易陷入防守，而后方比较容易发起进攻，因为这是正反方的地位给人的一种心理感觉。我们在训练中，常常训练正方的立场，但是在正方的立场上要形成反方的“心理”，进攻心理。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大家在这方面的意识大大提高。

时间控制是辩论的核心技术之一。虽然时间控制不是一种直接的辩论技巧，但在辩论的过程中，时间是关键的因素。可以说，辩论过程中，最大的难题就是时间。因为一般人对雄辩的理解是：滔滔不绝，能言善辩，伶牙俐齿。但是，在辩论的过程中，要雄辩和简要同时使用，有时要滔滔不绝，有时要一针见血。

新加坡式的辩论，对时间的要求特别的严格，因此要求辩手对时间有特别强烈的意识，能够在紧张的辩论过程中，把握好时间，不因自己讲到得意之处而不能适可而止。当然也不能在辩论场上无主可说，语塞词穷。新加坡式的辩论，对每一个程式的发言有明确的时间规定，到时间必须停止，如陈述观点是三分钟，总结陈词是四分钟，自由辩论是四分钟。特别是自由辩论，时间就是优势。因为是连续记录时间，每一方发言完毕后，即记录对方的时间，谁的时间先用完，方便就没有发言权，只得任别人宰割，有点像“缺席审判”，因为你已经不能发言。所以，在陈词的时候，必须在规定的

时间里讲完自己的观点；同时，也要充分利用自己的时间，如果讲完了，时间还没有用足，那就是最大的浪费，这在辩论中是最忌的，也就是说，给了你进攻对方和防守自己的时间，你弃权。另一个时间战术，就是在自由辩论地让对方先用完时间，而自己可以有一定的时间来继续攻击对方立场。这个战术非常重要，因为对方对我方的进攻已经不能反驳，除非到总结的阶段，在观感上，会让评委和听众认为，我方比较强。

所以，时间控制是辩论的一个基本战术。在与剑桥大学队的辩论中，我们比较成功的使用了时间战术，在自由辩论阶段，对方的时间用完之后，我方还有足够的时间做了两轮的发言，而且陈述了精彩的观点，取得了时间上的优势。1988年与台湾大学队决赛，也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对方时间用完了，我方还有一分钟，又讲了两圈。可能有人提出问题，余下那么多的时间，没有对手，是不是好？因为没有对手，我方也不能很好地发挥。我想，一是不可能有多余的富裕时间，因为双方均是训练有素的，兴地在时间上完全没有战术；二是如果弱队，让他们讲话对可能有利，但是如果是强，让他们一直和自己同时间的讲话，可能是危险的。因而也要在辩论中灵活地加以运用，因为上场之前，我方不知道对方的实力，等知道了对方的实力，实战已经开始。

我们的辩论队员对时间的把握，一开始能力不强，大部分补学辩论的人也有这样的问题。如在选拔队员的时候，有两位同学的对辩很有典型性。两位都是研究生，修养均很好。但是，对辩论和演讲的基本要求不是很明确。他们在台上，自由辩论的时候，各讲各的观点，一个人先讲了差不多两分半钟，另一位讲了两分钟，再讲了一轮，时间就到了。这就没有能够形成辩论，而是一种演讲。辩论能力不强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没有强烈的时间概念，时间过得很快，在激烈辩论和慷慨陈词的时候，自己觉得时间用的很少，

实际上已经用了大量的时间；二是不能言简意赅，不能在短短的一句话或几句话里说清楚自己的观点，说了一大套，意思还没有到家，只得再说。这两个问题是一般辩手的通病。辩论队花了不少时间来解决问题。

基本的训练在两个方面，一是强化时间概念，二是说短话。时间概念始终贯穿于我们的辩论训练过程，时间提醒队员们注意时间，从而使时间成为每一名队员辩论意识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任何激烈的辩论过程中，均有强烈的时间意识，兴地“忘乎所以”，不恋战。其实，时间控制的本质力量来自能否在最短的时间里讲明白自己的意思。这种能力不容易具备。往往是让一个雄辩家演讲三个小时没有问题，可以讲得头头是道，天花乱坠，但是要他在几分钟、甚至10秒钟内来说明一个问题很不容易。辩论队的队员在前一种能力上是没有大问题的，我们在训练即兴深讲时，一般均能胜任。当场出题目，马上演讲，可以讲得滴水不漏，一二三四，甲乙丙丁，非常精彩。而在训练时间控制上，却花了大量的时间。我们的口号是：“短些、短些、再短些。”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脑子里很清楚要说得短，但一开口就短不了。我们是拿着秒表来控制时间，要求发言在20秒内，10内，5各处内。同时，要求陪练队与正式队员比时间短。有时训练一句话的辩论，只能讲一句话，不能多讲。从这里汉人看出，讲短话，对队员的要求是很高的：一是要有高度的逻辑判断能力，要能即刻把握住对方的逻辑关系和自己的逻辑关系，在最短的话语里来表述自己的观点，如果自己的逻辑判断不强，当然要转很大的圈子才能把话讲清楚；二是要有很好的反能力，能够将自己的话组织在最佳的反应点上；三是要有很强的表达能力，用最少的语言表达最密集的意思，这是真正的雄辩。当然，机智、知识、理论、事实、幽默等方面的能力，均会综合地在这里起作用。

对于所有的训练科目,有整体的训练,也有单独的训练。整体训练就是“吃训练的大锅饭”,一起训练,一起总结,一起交流。单项训练有两个内容,一是针对全体的弱点进行单项训练,二是针对个人的弱点进行单项训练,把一个方面的技巧或者能力强化,进入本能。单项训练在训练中是基本的训练方法,主要是针对辩手的基本弱点来训练,以及根据作战的要求来训练。而且,大部分时间是在做单项的训练,如上面讲的进攻和防守、时间的控制就是单项训练的一具方面;单项训练也包括对辩论的各个有机部分的分解训练,如每位队员均要训练在1、2、3、4辩位置上的感觉,以便相互之间能有更好的配合。每位队员都要训练如何来对方的发言,每位队员均要训练如何在四辩中来“登高一呼”,尤其是在场上来概括对方的基本立论和概念,在很短的时间里抓住要害,集中火力做最后的进攻。比如,吕建在辩论中三场采取了不同的总结方式,得到了很好的效果。第一场辩论道德的温包问题,他用了“李代桃僵”、“扬汤止沸”、“避实就虚”、“指鹿为马”四个成语来归纳对方的立论不当;第二场辩论艾滋病的问题,他用了“逻辑问题”、“理论问题”、“事实问题”和“价值问题”四个方面来归纳对方的错误;第三场集中到宏经,主要是进攻逻辑,不再分成多种层次。这样的处理,效果很好。

对个人的训练也不能忽视,因为辩手们的才能和特点是不平衡的,有的这方面强,有的那方面强,但是对一支队伍来说,应该是每位队员均有较为均衡的能力。

以仿真营造实战

1991年,我到南方一个城市去访问,参观了一个搞高科技的

企业,开发的是国际上先进的“仿真技术”,即用计算机系统来模仿一种现实中的系统运转,如电厂的管理。在军事上,国外这方面的开发比交多,用来训练飞机驾驶员等等。据说,海湾战争的时候,美国就使用了这种先进的技术,对将要执行轰炸伊拉克军事目标的飞行员进行了这样的系统训练,以至后来的轰任务均能出色地完成。现在的一些电子游戏,就带有这样的性质,如一个叫“F19”的电子飞行游戏,和仿真系统很像,当然是比较简单的一种。受这一感受的启发,我们在辩论训练中也加强了实战的气氛,给辩手一种真刀真枪的现场感。当然我们没有计算机来做,只能是“土法上马”。这大概算是我们训练过程中的“核心机密”之一了。

辩手训练必须使辩手有逼真的现场感。一般的训练不容易形成现场感,训练是几个人之间发生的事,即使是在比较正式的模拟训练的场合,在场的也只有十来个人,没有在较大场面的辩论中的现场气氛。在选择队员的时候,我们特意要求在学校最有名的3108教室来举行,主要是要营造一个开放式的环境,让所有的参加选择的学生在一个逼真的现场中来表现自己,这样才能准确地判断和评价一名同学的基本素质。3018教室每次都是人山人海,连窗户外面都站满了人。有一次,选择赛结束之后,外面的桌子被踩坏了近十张。那种热烈的气氛、那种紧张的心情、那种感人的场面,是不可多得的,是花很大的力气都不能制造的,所以要充分利用。有的同学在人少的时候,表现比较自如,在人多的时候,心情紧张,不能自如地发挥。有的人在人多的时候,才能兴奋,才能激昂,而在人少的时候反而发挥不出来。选择辩手的时候,我们有这样好的条件,但是到了训练阶段就没有了,整个训练过程只在3108教室辩论了一次,且几乎“全军覆没”,造成了队员一段时间内的灰心丧气。实际上,训练的时候,十分需要这样的现场,但是学校已经放假,所欲而不可求了。

为了形成逼真的现场感,我们采用了拟音的方法。根据我对

1988年辩论的体会，一名辩手很重要素质是适应现场的跌宕起伏，适应整个程序的影响和音乐。在辩论过程中，听众的反应是多样的，可能会欣赏我方，为我方热烈鼓掌，可能会喜欢对方，为对方热烈鼓掌，可难会在你发言之前为对方的一句话热烈鼓掌，可能你自己认为讲了一句精彩的话而听众不鼓掌，没有引起共鸣。针对可能的情况，我们用拟音的手段来解决，比如说每次训练赛之前均要播放那一段新加坡广播局为大专辩论制作的开始曲，那一段音乐的点雄壮，甚至可以提神。放得时间长了，大家一听到这段音乐就兴奋起来，以至酷暑的下午昏昏欲睡的时候，我们也放这段音乐来提神。辩手们早上起来的时候也是放这一段音乐，成了我们训练队的“军号声”了，一听到这种熟悉的旋律，不会精神抖擞，斗志昂扬。

再一个手段就是在辩论过程中故事先录下来的现场的掌声，声音放到一定的响度，足以产生强烈的心理和感情上的震撼。放得太轻的庆，不能达到效果。我们比较多地是给辩手制造一种不利的现场感，即自己的发言没有堂声，而陪练队习量地多给掌声，造成一种场上劣热的感觉。甚至录下哄笑声，对队员们的发言放哄笑声，让他们适应这种不利的场合。和们在场上辩论的时候，最怕出现这样的情形。一旦出现听众一面倒的情形，如果没有坚定的心理素质 and 性格气质的话，便会慌乱。思路不清，语无伦次，最后一败涂地。特别是在自己受到哄笑时，整个心理防线会全部崩溃。当然新加坡的听众比较有礼貌，一般不会哄笑。在训练中，队员们渐渐适尖了自己没有掌声的局面，坚持在对方掌声比自己多得多的气氛中奋勇作战。这样，他们的心理素质坚强起来。

如何对待对方博得的掌声，我们也进行了训练，就是“压掌声”战术。这样做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辩论要计算时间，在对方讲完之后就计算我们的时间，所以如果等观众的堂所停下来，时间

就白白浪费了，二是让听众长时间的鼓掌对我方不利，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情绪和评委对我们的评判。所以，要把堂扭压下去。在对方发言结束时，如果掌声响起来，汉有等待，要马上站起来讲话，并且要用高得多的声音来讲，把掌声压下去，直到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我方的身上。这不是很容易，因为要有很强的心理素质和坚定的意志。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辩手们在“压掌声”方面已经没有问题。在新加坡辩论的过程中，我队多次使用这一战术，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有时候，训练中，为了鼓励辩手们的情绪，在他们讲出精彩的话和幽默的话时，也给予一定的掌声，尝点甜头，反正是无本的生意。在这个时候，他们往往很得意。

模仿现场感的另外一种方法是利用录像带。我们把1988年的辩论会和18990年的辩论会的录像带放了多遍，每次均有新的体会。一面放，我们一面分析。训练中做的另外一件事就是让辩手们和录像里的队员辩论，同样的题目，在录像里说了之后，我们的队员站起来说。当然，这样的“辩论”不是真正的交流，电视机里面的人不能针对我方员的发言而讲话，他们还是讲他们的话。主要目的是为了了解大陆以外的一些队的风格，同时设想一下如何来回答电视机里的队员提出的问题。这是一种有趣的训练。

制造现场感的第三种方法是到学校的电化室去模拟辩论，完全按照现场的格式来辩论。有强烈的灯光、有录像机有运输，这也是一种适应。有的人在灯光下面会显得手足无措，有的人在录像机镜头面前会瞠目结舌，无所适从。所以要辩手们习惯灯光和镜头，要能够在煤光和镜头前面神态自如，落落大方。经过多次的“灯光烧烤”，辩手们在灯光下和镜头前的表现能力大大提高。

另一种实战气氛是由陪练队来制造的。我们经常给陪练队设定不同的角色，因为陪练队员基本上是研究生，能力也很强，所以可以实现这种多变的风格转换。有时要求他们模仿西方国家大学

· 生的风格，整个立论过程中使用的理论、概念和论据均是来自西方的文化和西方学者的观点，给正式队员一种与不同的知识结构和方法论的队伍辩论的感觉。有时，要求陪练队模仿中国文化基础比较扎实的队，大量使用中国古典著作中的据和理论，使用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观点、思想来辩论，要我方队员来适应。有时候是要求他们完全使用当代的一些中国理论家和学者的观点来辩论，如新儒家的思想和观点。这种是文化背景上的变换。另外还有方法上的变换，模仿完全进攻的队伍，模仿完全防守的队伍；有时要求陪练队不必立论，完全就是根据正式队的发言来即时发起进攻，等等。这样的训练设计，和正式队是“背对背”的，双方各自准备，事先并不知道对方会采取什么战术，而且有时故意把正式队准备的意图和战术透露给陪练队，让陪练队更有准备；而正式队员要到模拟赛正式开始的时候，“面对面”的时候，才知道地方是什么招数。通过这样的反复训练，强化辩手们的应战能力。这种训练的要注是很高的，以至后来的陪练队员也训练得十分善战，得到的收获不亚于正式队员。

七、以艺术冶炼人格

整个训练，概括起来说，就是促使队员从自己的世界中走出来。自己的世界包括个人对辩论的原有认识、个人对自己的特点的认识、个人对一些基本问题的判断等等。在训练中，辩手要走了旧的自我世界，进入新的自我世界，进入更宏大的外部世界，改变自己对辩论的认识，把握自己的弱点，完善自己对一些基本问题的判断。能不能在训练过程中，在自我修养过程中，完成这样的脱胎换骨的革新，是一名辩手能否超越旧我的关键。

怎样叫超越了“旧我”，或者说超越了“本我”呢？那就是我曾经

说过的,要形成“辩论人格”。所谓“辩论人格”,就是所有辩论的要素在一名辩手的无衣无疑的凝聚。这里,我们把辩手在训练之前的人格称之为“自然人格”。在现实生活中,它会在无意识中发生作用。“辩论人格”,是一各优秀的辩手能达到的一种较高的境界,即形成了比较稳定的辩论素质 有了“本能辩论”的固写的结构。当然,不是每时每刻“辩论人格”均要发生作用,在日常生活中,“辩论人格”可以不发生作用,也可以发生作用,一切看生活设定了什么样的场景。在辩论中,最佳的辩手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辩论人格”,而不让“自然人格”起计导作用。怎样把辩论的一切要素匀称地糅进辩手们的内心深处,也就是如何塑辩手的“辩论人格”的问题。

“辩论人格”并非千篇一律的,而是丰富多彩、各有特色的。普遍意义上的“辩论人格”只有与具体的辩手完美结合起来的时候,这种“辩论人格”才能成为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人格。在初期训练的过程中,我们比较强调建立统一的“辩论人格”的模式,主要是为了打破辩手们自己在过去已经形成的“辩认人格”的模式,一名辩手在过去形成的“辩论人格”是很难打破的,是很顽固的。这就像行何的变革一样,不破不立。有位管理学家说过这样一个观点,在变革一种体制模式的时候,有三个基本的步骤,一是要“化冰”,把原来的模式化解;二是要重铸,即把化下来的水铸进新的模式;三是要凝聚,要固化。完成了这样三个过程,才能完成对一种既有模式的变革。训练辩手的过程也一样,先有一个化解、再铸和固化的过程,然后才能有理想的科学的“辩论人格”。但是,形成一种理想的“辩论人格”,或者说比较整齐的“辩论人格”,只是目标的第一步,不是最终目标,如果把这种阶段的结果视为最终目标的话,那欠就汉有贪图辩论真正的美。更重要的是每一名辩手要有自己特性鲜明的“辩论人格”。

辩手的“辩论人格”的特性，是“辩论人格”最美妙的境界。在一般“辩论人格”大体形成之后，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来形成反映一名辩手内在鬼力的两个个性化的“辩论人格”。而且在辩论中这是特别重要的，不仅反映一名辩手的素质和内在鬼力，一反映一个附近不同色彩的“辩论人格”的协调。在实际的辩论中，一支队伍最好是风格各异的，没有是格式化的，一模一样的，那样会十分简单调，观感和效果均不会好。在1988年辩论的时候，我们就研究了这个问题，提出了每名辩手要有自己的特色的原则。当时，罗洁的基本风格设计为甜美，用她天真的性格和甜美的声音来打动观众和陈述我们的观点，娓娓道来，如述如泣。顾刚则要求比较坚毅，比富有进攻性，比较犀利尖锐，给人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鲍勇剑则显得活跃、机灵，在辩论中能够出奇制胜。崐第四位选手李光斗，则显得比较冷，比较“怪”，比较能引导起别人的怜悯。这样的一仲组合，在后来的辩论战中起到了效用。不然均是一种风格或模式的话，不仅辩论本身的审美价值要降低，而且可能不利于一个队从不同的角度来更好地陈述自己的观点。

怎样的个性化的“辩论人格”能够相得益彰，相映直趣。是组队辩论中必须认真研究的。个性化的“辩论人格”牵涉到天生我才与因材施教的关系。因为个性化的“辩论人格”不能是空穴来风，无中生有，必须与辩手本来的风格和特性相结合，使之溶为一体。从这个基本的认识出发，我们根据四位辩手的基本个性和风格，作了一个设计。我们把这种个性化的“辩论人格”称为“风格主义”，即要求每一名辩手有自己鲜明的风格。但风格只能是在普遍的“辩论人格”的基础上产生，没有一开始就设立个性化的“辩论人格”，这样实际上辩手的内功不够，光有表面的个性化，没有内在的魅力。从打破原来的“辩论人格”到形成普遍的“辩论人格”，从普遍的“辩论人格”到个性化的“辩论人格”，可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出于水

而寒于水”。对1993年辩论队的“风格主义”的设计是这样的：姜丰是“静美”，即显得比较文静，同时又比较优美，在陈述和辩论中基本上也采用这样的形象，而不作激烈和高昂的发言；季翔是“重力”，即经较稳重和沉着有力，在辩论中要显得内在和含蓄，说出话来要有分量和力度；严嘉是“俏活”，休一同一定的俏皮和活跃，要充分表现自己的机智和机灵；昌建是“儒博”，即以知识面的广博和深涵来征服听众，以理性的学识和严密的逻辑来说服听众。

这样的设计是根据他们各自的特点定的。姜丰的性格比较文静，形象也比较小巧和清丽，但是和罗洁有点不同，就是一个性格开放，一个性性文静，，因而在风格上设计略有不同，如果在姜丰来表现罗洁的天真和甜美是不合适的，一是风格不同，二是姜丰已经是二年级三究生，心理上已经不能扮演这样的角色。季翔的性格一直比较稳重、冷静，所以这是符合他的自我人格的。严嘉是一个性格活跃、思路敏捷的小伙子，而且性格比较开放，所以在这样的位置上作这样的个性化的“辩论人格”是合适的。昌建的年级高，书读得多，个人比较喜欢逻辑的思维，讲话喜欢引用理论和概念，抽象思维的能力比较强，所以要他做这样的努力。一般说来，一种个性化的“辩论人格”要与一名辩手的特性吻和，不同辩手之间的个性化的“辩论人格”是不能互换的。以上设计均没有互换，姜丰的角色不能由三位男生来代替是不言自明的。三位男生的角色也不能互换，如果李季翔来表现活跃的“辩论人格”，要严嘉来表现儒博的“辩论人格”，要昌建来表现稳重的“辩论人格”，就兴地收到最佳的组合效果，恐怕也会是勉为其难。

设定了个性化的“辩论人格”之后，就要求辩手们在训练中注意往这个方向努力，把个人的“自然人格”中的特性和普遍“辩论人格”的要素紧密结合起来。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逐步地凝聚成固定的风格。

“辩论人格”一方面要强化外来的训练，正如上面我所说的各种方法。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一名辩手的主观磨练的过程。没有辩手的自我磨练，甚至是刻苦和痛苦的磨练，要形成一种理想的“辩论人格”是困难的。我们的队员在这一点上有着高度的责任感和自我意识，他们在训练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流了多少的汗水，甚至泪水。我知道他们都欣赏古希腊的一段故实：雄辩家德莫斯特斯原来有口吃的毛病，但是他不向命运低头，刻苦磨练，把石头放在嘴堍来锻炼发音，结果成为功名名就的雄辩家。他们铭记着这个动人的故事，他们铭记着自己的使命。姜丰在整个训练过程中一直是“多灾多难”的，在医院里，在她病痛难熬的时刻，她念念不忘的还是辩论，坚持来参加每一次训练，并且忍着疼痛，投入地训练。季翔为了纠正自己讲话有点过于平稳的弱点，在每一次模拟辩论之前，总是对着镜子一次又一次地朗诵自己的辩词，一遍又一遍纠正自己的弱点。严嘉为了使自己的发音更加地雄厚和圆润，站在十楼的窗口，长时间地大声朗诵各种各样的诗歌和文章。昌建为了缓和自己讲话速度过快的问题，拿着秒表来算自己在单位时间里讲话的字数，统计了一回又一回。小兰在高强度的训练计划下和高温下，心脏一度严重不适，但是她始终不愿意离开训练“基地”——文科大楼十楼的1004室，直到我强迫她回去休息。张谦每次训练均要作为主力，他付出的劳动和汗水大概是最多的，但他总是寻样默默的奉献。每天晚上，他们就睡在1004室里，席地而睡，他们还要互相总结一天的训练，切磋技艺，一直谈到很晚。那样大剂量的训练，他们没有任何怨言，每天从早上8点训练到晚上9点半，后来一直要到半夜，甚至通宵，可是他们总是要求加大训练的力度，增加训练的内容。

他们在训练中的意志和追求一直令我感动，直到今天，有了这样的精神，怎么会没有长足的进步呢？昌建后来在辩论中讲到的两

句话：“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自苦寒来。”这两句话最能适应他们对自我的要求，以及他们所取得的收获。我相信，这些收获对他们一生均是无价之宝，是可以永远受用的。

从新加坡回来的时候，我说过一句话：在新加坡辩论的胜利，从集体来说，是复旦的胜利，是众人的胜利；从辩手的素质来说，是读书的胜利，是人格的胜利；人更一般的意义上说，是知识的胜利，是智慧的胜利，是智商的胜利。辩论是一种个人的综合素质的较量，更是一种集体的综合素质的较量。辩论对知识、情感、逻辑、事实、材料、反应、幽默机智、价值等方面的条件提出很高的要求。辩手的辩论实力从何而来？我们一直十分强调人格的力量。这不是一种纯理论的结论，而是我们在整个辩论中得出的最最深刻的认识。参军辩，适庆辩论，准备辩论，赢得辩论，均是对人格的一种挑战，也是对人格的一种要求。我们在训练过程中，就十分强调辩手积极主动地认识自己的人格，从而更加有意识地完善自己的人格。在训练和辩论的过程中，所有的辩手的人格均发生了变化，包括我们这些老师，人格也发生了变化。大家对人生、对世界、对社会、对他人的价值和观念，都发生了嬗变，虽然变化有大有小，但是，有变化是毋庸置疑的。

辩论的日子在我们的心中难以消去，我们时时回忆这些日子，时时想念与我们一起奋战的所有朋友们。从新加坡回来以后，复旦大学辩论队的成员各自投入了自己的生活和学习，大家偶尔聚在一起，不像训练和比赛时期那样朝夕相处。但是，辩论给我们的印象是那样深刻，在我们的生活中，甚至在血液里。

我作为教师的感受是：教育学生，如同雕刻家的工作一样，面对优质的材料，开始时是要拿斧头砍，而不是拿锉刀和破皮来精工出细活，那样永远是雕刻不出一件真正的艺术品的。

逻辑·理论·价值

——生存论本体论视野中的雄辩术

俞吾金

天才是使我们忘记技巧的东西。

——维特根斯坦

一提起雄辩术，人们就会自然而在地想起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辩论热情，也会想起中国古代政治家诸葛亮的舌战群儒。在现代社会中，随着人们的交往关系的发展，辩论也就愈来愈成为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了。从法庭上的诉讼到议院里的争论，从联合国大会上的论辩到美国总统竞选中的电视辩论，雄辩术不仅成了个人安身立命的重要艺术形式，也成了国家作出历史性选择时的重要依据。

随着雄辩术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崛起，表演性的辩论比赛也获得了重大发展，由新加坡广播局最早发起并组织的亚洲乃至全世界的华语大专辩论赛就是世界上诸多语种的辩论比赛中的一朵奇葩。它吸引了全世界华人的关注，可以预料，到下个世纪，这样形式的华语辩论将进一步普及化，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

许多人都把辩论理解为语言艺术或游戏，这当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如果仅仅停留在这种更解上，似乎还没有把握其深层的涵义。从哲学，尤其是生存论本体论的眼光来看，辩论不仅仅是一种

语言的艺术或游戏,更重要的是,它是人们生存活动的一种表现形式。本世纪最杰出的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过,语言就是语言游戏,而语言游戏是嵌入生活形式之中的。这一说法显露出人们通常视为语言艺术或游戏的辩论和人的生存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

要说明这一点似乎并不是困难的。无论是法庭上的诉讼,还是议院里的争论;无论是联大上的论辩,还是竞选总统的辩论,其内容涉及的无非是一个人、几个人乃至整个国家人民在生存活动中遭遇到的重大问题。因此,在现实生活中,辩论并不仅仅是技巧,是“耍嘴皮子”,是无聊或无谓之举,人们通过它所传递出来的恰恰是生存的密码和信息。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肯定辩论是生存活动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无可厚非的,但难道以娱乐为目的的辩论赛也是人们生存活动的一种表现吗?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这里有两层意思需要加以说明。第一层意思是:即使我们假定辩论赛的目的仅仅是出于娱乐的需要,那娱乐又是为了什么呢?众所周知,在紧张的劳作之余,人们之所以投身于娱乐,追求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放松,目的乃是为了消除疲劳,保持活力,以便在这个世界上继续生存下去,因而,任何娱乐活动,当然也包含辩论赛在内,正是人类生存活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第二层意思是:任何辩论赛都不会仅仅是娱乐活动,一方面,无论是辩论赛的直接参与者还是听众,他们之所以热情地投身于这一活动,都有一个重要的目的,那就是学习雄辩术,锻炼自己的辩论才干,以便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有了进步之后,能够胜任更好的工作,在社会活动中变得更为活跃,一言以蔽之,更好地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另一方面,只要我们稍稍留心一下辩论赛的题目,就会发现,它们涉及到的都是使当代人感到困惑、烦恼或惧怕的社会问题,如战争与和平问题、联合国存在的必要性问题、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问题、人口素质下降和数量上升的问题、南南关系

和南北关系问题、艾滋病问题、安乐死问题、传统文化与现代关系问题、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的关系问题、亚太经济圈的发展问题，等等。以这些重大的社会问题作为辩论赛的题目正表明，即使人们主要是出于娱乐的目的进行辩论，其意识深处仍然充满了一种生存的困惑和焦虑。

这就告诉我们，不论是生活中的实用性辩论，还是作为娱乐的表演性辩论，都深深地扎根于人的生存活动之中；而华语辩论和辩论赛的兴起和发展还有更深的一层含义，那就是要通过这些活动来推广华语，传播华语文化，使华人在 21 世纪更好地生存在这个世界上。

从生存论本体论的角度看来，任何辩论都是通过语言得以实现的，说得更具体些，辩论词是辩论存在的方式。众所共知，辩论词总是围绕辩论的主题而展开的，既然辩论的主题浸透了生存的气息，那么，这种气息也必然通过辩论词而传达出来。

不管我们进行的是任何性质的辩论，我们都能够从以下三个方面去解析辩论词。

第一个方面：如果从形式上看，任何辩论词都是服从于一定的逻辑法则的，换言之，不存在超逻辑法则的辩论词。举例说来，如果我们以下面的方式进行推断：

所有的人都是恶人，
张三是人，
张三是恶人。

那么，这一推断显然是符合形式逻辑的演绎法则的，因此，从形式上看，它完全是正确的。反之，在辩论词中的任何推断与表达，如果是与一定的逻辑法则相违背的，那就极有可能在辩论的过程中被

对方的辩论词所击败。

第二个方面：如果从内容上看，任何辩论词都是服从于一定的理论的，换言之，它们总是从一定的理论选择出发的。辩论者的理论选择与他的信念并不是一件东西。在实用性辩论中，辩论者常常是为自己的信念而辩论，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信念也就是他的理论选择；但是，在表演性的辩论中，问题就完全不同了，因为辩论双方的立场是由抽签决定的，比如说，某个辩论者内心的信念是“人性本恶”，而他抽到的签表明，他必须为“人性本善”的立场辩护，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不得不抛弃关于“人性本恶”的信念，而服从“人性本善”的理论选择。所以，理论选择是就辩论者在辩论过程中所采取的实际的立场而言的。

逻辑是从形式上的制约说话论词，至于立论词的内容则超出了它的“管辖”范围，而从属于理论的领域了。举例来说，我们上面提一的那个演绎推理，从逻辑上看，似乎是完美无缺的，但从理论上讲，问题就产生了。这一推论的大前提是：“所有的人都是恶人”，这一大前提作为全称肯定命题从理论上讲显然是荒谬的。比如说，一个刚生下来的婴儿当然是一个人，但他（她）是“恶人”吗？退一万步说，邓使在理智健全的成年人中，难道也无一例外地是“恶人”吗？撇开上述大前提的明显的荒谬性不论，至少我们在理论上还有三种不同的选择：（1）“所有的人都是好人”或“所有的人都不是恶人”；（2）“一部分人是好的，另一部分人是恶的”；（3）“人无所谓好人或恶人”。这就表明，对辩论词仅限于逻辑分析是不够的，实际上，理论分析和理论选择是更为重要的。没有正确的理论选择和恰当的理论表述，要想在辩论中获胜几乎是不可能的。

第三方面：如果从思想意境上看，任何辩论词还涉及到辩论者的价值取向的问题。假如我们认可了前文提到的那个三段论推论的大前提，即“所有的人都是恶人”，那末，在这里，理论选择虽已解

决,但价值取向尚未显示出来,换言之,辩论者只是在辩论过程中确立了他愿意为之辩护的真理,但还没有表明他和他愿意为之辩护的真理之间的价值关系。对他愿意为之辩护的“所有的人都是恶人”这一命题,他可以作出不同的价值上的回应:(1)既然所有的人都是恶人,人类社会的前景是令人悲观的;(2)虽然所有的人都是恶人,但人类还是可以通过一定的途径改恶从善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还是有希望的;(3)虽然人人都是恶人,但人类为了不至于在相互残杀中毁灭,会确立一种外在的、强制性的力量相互进行制约,这样,人类社会会至少是可以维持下去的,等等。辩论词的价值取向之所以是必不可少的,一方面,因为它说出了理论选择说不出的东西;另一方面,如前所述,辩论乃是人的生存活动的一种表现方式,自学地说出价值取向,不仅显示了辩论者的思想意境,而且也表明了辩论者在辩论过程中追寻并回应了蕴涵在辩题之中的人类对生存活动及意义的困惑和探索。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那种把辩论仅仅视为“技巧之争”或“语言游戏”的人,必然会忽视对辩论的生存论本体论基础的思索和追问,从而其辩论词必然缺乏力度,也难以引起听众的共鸣,因为听众归根到底是有感于生存和困惑和焦虑来听辩论的,不管是辩论的哪一方,只有当它的辩论词触及到生存论本体论底蕴的时候,才能激发起听众的如醉如痴的热情,从而从根本上战胜对方。

下面,我们将从生存论本论的前提出发,分别从逻辑、理论和价值的角度对辩论作出新探索。

一、逻辑是不可战胜的

乍看起来,逻辑作为人们思维的法则似乎是与人的生存活动

风马牛不相及的，其实，这不过是人类的一种幻觉而已。列宁在读黑格尔的《逻辑学》时，卓有见地地指出：

人的实践活动必须亿万次地使人的意识去重复各种不同的逻辑的格，以便这些格能够获得公理的意义。^①

如果说，在这段话中，列宁还是借用黑格尔的语言来表述自己的想法的话，那末，在下面这段论述中，列宁的意思就说得十分明确了：

人的实践经过千百万次的重复，它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格固定下来。这些格正是（而且只是）由于千百万次的重复才有着先入之见的巩固和公理的性质。^②

在列宁看来，逻辑的法则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不断重复着的人类生存活动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逻辑所具有的那种不可战胜的力量归根到底表明，在人的生存活动中形成的某些客观的关系是不可违背的。

既然辩是通过语言而表达出来的，而语言又必须服从逻辑法则的约束，所以，重视逻辑在辩论中的作用乃是必然的。从我亲身经历的新加坡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来看，在逻辑上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是十分重要的。

1. 对辩题要进行深入细致的逻辑分析

毋庸讳言，任何辩论得以展开的前提是辩题的设定，而对辩题的逻辑分析又构成全部辩论准备的出发点。这一分析主要是通过

① 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03页。

② 同上书，第233页。

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的：

(1) 辩题概念分析

我们在新加坡的第一场比赛是与英国剑桥大学对垒，辩题是：“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我们对这一辩题概念的分析如下：

温饱：饱食暖衣，换一种说法，即无衣食之困。我们大致可以把人类的生存理解为三种状态：第一种是贫困，亦即勉强地能够维持生存；第二种是温饱，表明生存状态较好，已脱离受冻挨饿的境地；第三种是富裕，指称一种很优越的生存状态。

道德：调节人们行为的规范，由社会舆论和良心加以支持。

谈：提倡、宣扬。

必要条件：其逻辑涵义是“无之必不然，有之不必然”。

通过对辩题中的上述四个主要概念的分析，我们发现，剑桥大学作为辩论天方在逻辑上最难跨越的是“必要条件”这个概念。既然这个概念蕴涵着“无之必不然”这层意思，那末对方在逻辑上面临的最大困境在于必须论证：没有温饱就绝对不能谈道德，换言之，在前温饱状态是不能谈道德的，而前温饱状态又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贫困；二是正在走向温饱，但尚未达到温饱的状态；三是温而不饱或饱而不温。也正是从前温饱状态的第三种表现形式出发，复旦四辩手说出了一段很幽默的话：

对方还没有论证如果温而不饱该怎么样？减肥小姐可谓温而不饱。那这个减肥中心不是按照对方的逻辑要变成拳

击场了吗？^①

在第一场辩论中，由于我方紧紧抓住对方在“必要条件”这一概念上陷入的逻辑困境，因而始终处在主动的位置上。

在新加坡举行的第二场比赛是在我方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队之间展开的，辩题是：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我们在抽签时虽然抽到了反方，但在准备时，也准备了正方的立场。从正方的立场出发，我们对辩题中的四个概念作了如下的界定：

艾滋病：即获得性免疫能力综合缺损症，由 HIW 病毒感染引起，无论从病因、性质和治疗途径看，它都是医学上的一种黄型的病症。

是：在这个辩题中是“归属”或“属于”的意思。

医学问题：从产生、根本性质和根本解决途径看都是属于社会学的问题。

社会问题：从产生、根本性质和根本解决途径看都是属于社会学的问题。

从正方立场看来，逻辑上的关键问题是守住“医学问题”这一基本概念。后来，悉尼大学抽签抽到了正方，果然牢牢地守住了自己的逻辑阵地。我们通过“引蛇出洞”的方式（即询问对方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口号是什么），才逐步攻破对方的逻辑阵地，并扩大战果，取得了辩论的胜利。

我们在新加坡举行的第三场比赛的对手是台湾大学队，辩题是：人性本恶。在抽签前，我们也对正方的立场作过充分的准备。从

① 王沪宁、俞吾金主编，《狮城舌战》，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第 236 页。

这一立场出发，我们对辩题中的五个概念作了如下的界定：

人：人和其他动物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科学表明，人是最高等的动物；哲学表明，人是理性动物；人性本善乃是人类高贵性的根本体现。

人性：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属性。

本：“木下曰本”（《说文解字》），此处是本来、本然、先天的意思。

善：“吉也”（《说文解字》），吉祥和好的意思。

恶：“过也”（《说文解字》），过失、罪恶的意思。

从逻辑上分析，这里最关键的是“人性”概念，把它界定为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特性，就为“人性本善”的立场准备了逻辑前提。那么，如果反方用现实社会中存在的许多恶行来质问我们，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把所有的恶行都归结为人的善性，而善性不等于人性。这样，在逻辑上就比较严密了。后来，台湾大学队抽签抽到了正方，由于他们对人性概念未作严密的界定，因而留下了不少逻辑的盲点，从而在辩论中处于被动应付的状态中。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对辩题的基本概念进行逻辑分析是十分必要的，忽略这个环节就好比造房子不打基础，很难在辩论中获得主动权。

（2）辩题类型分析

从所周知，辩题具有各种各样的表达方式，然而，归根到底，它们都可以还原为“A是B”或“A不是B”这种判断形式。乍看起来，有的辩题中并无“是”这个系词，比如“卫星电视的普及利大于弊”，但我们可以把它改写为：“卫星电视的普及是利大于弊的”，这样一

来,这个辩题就被改写为典型的 A 是 B”的判断形式了。

如果从“是”的性质着眼,辩题可以分区为以下三种不同的判断形式:

第一,等同型。如在“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样的辩题中,“现代化”和“西方化”、“美”和“理念的感性显现”是等同的,换言之,A 和 B 是等同的。

第二,归属型。如在“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人性先天地是恶的”这样的辩题中,“艾滋病”是归属于“医学问题”的,“人性”之属性是归属于“恶”的范畴的,换言之,A 是归属于 B 的。

第三,条件型。如在“提高人口素质是实现现代化的先决条件”、“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关键在于发展生产力”这样的辩题中,或者 A 是 B 的条件,或者 B 是 A 的条件,重要的是把握诸如“先决条件”、“必要条件”、“重要条件”、“基本环节”、“前提”、“基础”、“核心”、“关键”、“根本原因”、“重要因素”这类概念的逻辑含义。比如,“根本”这个词与“基本”、“重要”比较起来,程度上要更深入一些;又如“环节”这一概念似乎暗含着这样的逻辑关系,即除了在辩题(如“改革招生制度是提高学生质量的一个基本环节”)中提到的“环节”——此处是“改革招生制度”外,还有“改革课程设置”、“增强师资力量”等其他的环节。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把握辩题中“是”这个系词的确切内涵是十分重要的,对这个词的含义不清,是不可能吃透整个辩题的基本精神的。此外,从 A 到 B 的模态关系入手,也可以从逻辑上把辩题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必然型。如在“经济发展必然怀致文化上的繁荣”、“在当代世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样的辩题中,都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揭示了 A 与 B 之间的必然性的逻辑关系。显示这种逻辑关系的用语除了“必然”、“不可避免”外,还有“必定”、“无一例外”等其他

的形式。必须注意，这种逻辑形式总是作为全称肯定命题或全称否定命题表达出来的，因而极易遭到另一方的反驳，另一方通常只要举一个实例就可以推翻这种形式的命题。比如，就“经济发展必然导致文化上的繁荣”这题来说，另一方可以举这样的例子：香港经济不是发展很快吗，但为什么许多有识之士要称它为“文化沙漠”呢？这样的反驳就是很有打击力的。所以，为“必然型”命题辩护的一方要善于把逻辑上的劣势转化为事实上的优势，一是通过不同的解释方法尽可能弱化乃至否定对方的实例；二是尽可能多举能阐明自己立场的实例，虽然实例再多，也跳跃不到“必然性”上去，但却能对听众的心理施加影响，似乎正方已成功地论证了自己的辩题。

第二，利弊型。像“教授下海利大于弊”、“在中国发展旅游事业弊大于利”这样的辩题都属于这种类型。“利”与“弊”完全是相对的概念，哪一方对方实例的驳斥理妥有力，对自己一方实例的论列更为深，在逻辑上就更容易占到优势。

第三，可能型。诸如“21世纪将是华人的世纪”、“和平共处是人类可能实现的理想”、“联合国应当解散”这样的辩题都属于这种类型。在这种类型的辩题中，核心关系是现实性和可能性的关系。人们习惯于从现实性出发去推断可能性，然而，现实性是无限多样的，从而可能性也是无限多样的。这类辩题为双方都敞开了较大的逻辑空间，但双方都应该明白，现实性是无法从根本上驳倒可能性的，哪一方真正理解并把握了这一点，这统治更易在辩论中获胜。

上面的论述表明，对辩题中A与B之间的模态关系的分析是加深我们的对辩题的逻辑认识的一个基本环节，同时也表明，概念分析和辩题类型分析都还只是辩论准备中的初台性的工作。

2. 归纳和概括是辩论中最重要的逻辑方法之一

归纳和概括从属于形式逻辑中的最纳推理，在辩论中起着最基础、最普遍的作用。

首先，从一、二、三、四辩的分工来看，第四类手是扮演“总结陈词”的角色的，因而地于他来说，归纳和总结的好坏直接决定了他所扮演的角色的好坏，在新加坡的辩论中，我主第四辩手在这方面的工作是做得比较出色的。举例来说，在第一场比赛（辩题：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的总结陈词中，他一开头就迅速地归纳出对方辩论中的一些基本问题：

下面我总结对方的几个基本错误。对方犯的第一个错误是“李代桃僵”，用温饱过来代替温饱，用温饱等同于生存来构建他们的立论基础，这显然是错误的；对方犯的第二个错误是“扬汤止沸”，认为一个贫寒的人只要教他追求温饱就可以了，从来不问用什么手段，我刚才已经说过，如果到麦当劳里面打砸抢的话，难道就能合法地追求到温饱吗？这显然又是荒谬的；对方犯的第三个错误是“避实就虚”，对方始终强调温饱能够给谈道德提供更好的条件，介有说不温饱的情况下绝对不能谈道德；对方犯的第四个错误是“指鹿为马”，把谈道德与谈道德的效果混为一谈。对方今天的论点可谓是云山雾，让我们一头雾水，不知所云。^①

这样的概括不仅条理清楚，而且用词形象化，生动地勾勒出对方的逻辑错误，得到了听众和评委的较高的评价。

^① 王沪宁、俞吾金主编，《跨城舌战》，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8页。

其次,归纳和概括不光对第四辩手,而且对一、二、三辩手的陈述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换言之,一、二、三辩手在辩论过程中的陈述并不是随意的,而是既有分工,又有各自的层次分明的归纳。试以我方准备的“人性本善”(正方)为例:

一辩(逻辑分析)

- ①人是由人性和兽性组成的;
- ②人性是人之为人的根本特性;
- ③人性先天地是善的。

二辩(理论分析)

- ①从哲学本体论看,人性本善;
- ②从日常文化意识悠扬,人性本善;
- ③从现实生活看,人性本善。

三辩(事实分析)

- ①人这为人的关键是人性而不是兽性;
- ②本善的人性是与生俱来的;
- ③人性不善不仅从现实生活也从理想中表现出来。

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一、二、三辩手对自己的陈述都要有精到的概括,明晰的层次,才能给评委和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最后,归纳和概括在自由辩论中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比如,在第一场辩论中,我们概括出来的核心问题是:“在没有温饱的条件下能不能够、应不应该谈道德?”在第二场辩论听核心问题是:“既然医学对艾滋病无能为力,我们究竟怎么办?”在第三场辩论中的核心问题是:“既然人性本善,那末善花是如何结出恶果来的?”只有善于概括和归纳,才能抓住最根本的问题,既把自己一方的思想表达清楚,又能给予对方的要害问题以决定性的打击。

归纳与概括能力并不是自然地形成起来的,而是在训练中得以提高和发展的。我们常常进行这种方式的训练:快速阅读一本书或一篇论文,或听别人朗诵一段话,要求立即把听到的内容用简炼、正确的语言概括出来,有时我们甚至要求队员用一句话来概括看到或听到的内容,从而大大地强化了他们这方面的能力。

3. 总体配合上的逻辑一致性

从所周知,在日常生活中,当一个人表达自己的思想时,稍不留心,前后讲的话、使用的概念就可能发生逻辑上的矛盾。在辩论赛中,一、二、三四辩的思想在逻辑上要保持一致,就是一个更困难的问题了。美国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认为我队在辩论中“能显示一种流动的整体意识”^①,恰恰表明我方队员在整体配合上具有强烈的逻辑意识。

为了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我们除了和队员一起对辩题的类型和基本概念作出逻辑分析,取得共识外,还在第一场论之前确定“底线”,一二、三、四辩的全部陈述和自由辩论中的表述都应以“底线”为基准而决不允许与它发生逻辑矛盾。比如,在第二场比赛前,我们准备的正方“底线”是:

A.

确定问题归属的综合标准是: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问题本身的根本性质,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艾滋病是医学的问题;

艾滋病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但社会影响不等于社会问题。

① 《新城舌城》,第350页。

在第三场辩论前，我们准备的正方“底线”是：

人是由人性和善性组成的；

人性是人之为人的根本特性；

人性作为人类本性先天地是善的，善性先天地是恶的；

个人的机能在人性的引导下是善的，在善性的引导下则是恶的。

“底线”应该用非常简炼、明确的语言表达出来，每个辩手不但要把“底线”背出来，更重要的是理解它。事实上，也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在辩论的过程中轻松地、准确无误地表达出来，才不至于在逻辑上互相发生冲突。

4. 抓漏与反驳也是重要的逻辑手段

在西方哲学史上，苏格拉底在辩论中采用的“产婆术”是非常著名的。根据这种辩论术，苏格拉底先装出无知的样子，诱使对方先对某个概念下定义，然后在辩论过程中又逐步使对方得出与自己所下的定义相矛盾的结论，最后迫使对方放弃先前的定义，并陷入困惑之中。在辩论赛中，由于时间所限，当然不可能照搬苏格拉底的“产婆术”，然而这种辩论术的基本精神——抓漏却是我们在辩论赛中应当加以贯彻的。试以第一场比赛中的自由辩论为例，对方三辩说：

法律不是道德，法律规定了离婚，离婚是道德的吗？法律可以规定公司破产，公司可以破产吗？所以法律不是道德，它是代表最低的道德水平加上风俗习惯及强制力的。法律等于道德是苏格拉底那时候的观点，对方有两位学法律的

应该知道。^①

在这段话中包含着一个明显的逻辑矛盾：一方面，对方三辩主张，法律不是道德，似乎这两个概念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另一方面，他又指出，法律代表最低的道德水平。这样一来，问题就产生了，法律和道德的关系究竟如何？我方二辩虽然未抓住对方三辩在这段话中的逻辑矛盾，但却非常有力地反驳了他的主导性见解：

法律中难道没有道德观念吗？从《汉谟拉比法典》到《大清律例》，从宋《刑统》到《权利法案》，请对方告诉我哪一部法律中不包含道德观念？^②

接下去的几段话也显示了我方在抓漏和反驳上的敏锐性：

对方三辩：我方的论点对方没有任何批驳，所以我方的定义已经成立了。……

对方二辩：你的论点不是自己说成立就成立了，不然还要评判干什么？

对方三辩：对方没有任何攻击，难道就可以不是成立吗？没有攻击，我就失败了吗？

我方一辩：就是因为对方可攻击的地方太多了，我们攻击不过来了啊。^③

在上述对话中，我方队员不仅在抓漏和反驳中能作出迅速的反应，

① 《狮城舌战》第294页。

② 同上书，第294页。

③ 同上书，第296—297页。

而且善于揭明对方的话语和评委、听从之间的矛盾，从而引发了听众和评委对我方的认同。

当然，就抓漏和反驳的逻辑技巧来说，归谬法起着更为突出的作用。这种方法的特点就是顺着对方的思路出发，把对方的观点推以极端，使之显露出明显的荒谬性，然后再加以否定。在第二场比赛的自由辩论中，有一段对白是十分精彩的：

对方三辩：那我倒要问对方同学，如果我们今天发明了一和可以控制艾滋病的疫苗，那会有什么社会问题，请你说明。

我方二辩：用一个“如果”的话，整个巴黎都可以装在一个瓶子里，如果人类不存在，艾滋病还有没有啊？

对方一辩：我们就是因为用了‘如果’，所以人类才能够上月球，艾滋病就不能造成一个引起或者是治疗的方法吗？

我方一辩：你们的前提都不存在，那我们的辩论还有什么意思！……①

在这段辩论中，我方二辩的反驳采用的就是归谬法，也就是抓住“如果”这一概念，把对方的观点引向极端加以否定。当然，对方一辩关于“上月球”的再反驳也是十分有力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方一辩发现再沿着纵深发展这场辩论已不右能，于是马上用总结性的陈述结束这段辩论，把整个辩论引向其他方面。

在同一场比赛的自由辩论中，关于“钥匙”的争论也是十分有趣的：

① 《狮城舌战》，第317页。

对方四辩：艾滋病的病毒是在医院里被发现的，现在世界上有成百上千的医务工作者正在研究解决艾滋病的方法。

.....

我方二辩：在医院里发同的就都是医学问题吗？在医院里捡到别人丢下的一把钥匙，这把钥匙就成了医学问题喽？

对方四辩：对方辩友认为，成百上千的医务工作者在研究艾滋病，只是在寻找钥匙啊。^①

在对方四辩的发言中蕴涵着这样的逻辑：因为艾滋病毒是在医院里发现的，所以它只能是医学问题。我方二辩关于“钥匙”的说法就是采用归谬法来显示对方逻辑的荒谬性，而应当承认，对方四辩的再反驳也是十分有力的，实际上也采用了归谬的方法，意思是：总不见得医院里发生的全部事情都是在找“钥匙”哩。

无数辩论实践表明，在关键性的时刻用好归谬法常常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但如果使用不当，尤其是把它运用一对对方的人身攻击上，那就会适得其反。试以第三场比赛的自由辩论为例：

对方三辩：我想请问对方辩友，请您正面回答我，您喜不喜欢杀人放火？

我方二辩：我当然不喜欢，因为我受过教化，但我并不以我的人性本恶为耻辱。我想请问对方，你们的善花是如何结出恶果的？

对方一辩：我想先请问对方同学，你的教育能够使你一辈子不

① 《狮城舌战》，第318页。

流露本性吗？如果你不小心流露本性，那我们大家可要遭殃了。

我方三辩：所以我要不断地注意修炼自己啊。曾子为什么说：“吾日三省吾身”呢？所以，我再次想请问对方辩友，你们说内因没有的话，那恶果为什么会从善花中产生的呢？^①

在这段唇枪舌剑式的辩论中，对方三辩和对方一辩采用的也正是：归谬法：既然你们认为人性本恶，那你们自己的人性也就是恶的了。而既然你们的人性也是恶的，那你们就应该是喜欢杀人放火的了，而别人和你们在一起也就要遭殃的了。这里的归谬法不但包含着人身攻击的明显的情绪化的倾向，容易引起评委和听众的反感，而且从逻辑上看，也有一种不负责任的跳跃：第一，从某个人认为人性本恶的这一点跳不到另一点上去，即这个人一定是喜欢杀人放火的。否则，我们就可引出另一个结论：只要谁认为人必本善的话，这个人就一定十分善良的。于是，在我们的词典中也可以删除“佃善”、“欺诈”这类概念了。第二，对方在归谬中既然是顺着“人性本恶”这个大前提来展开的，那末对方就不会有一个“遭殃”的问题，因为大家都是“恶”的，对方也“善”不了；反之，如果假设某些人会“遭殃”，也就等于假定某些人是善的，那也就等于放弃了其归谬法的出发点，即“人性本恶”的大前提。

不管怎么说，对方并没有用好归谬法，收到预期的效果，而我方二辩和三辩的反驳看起来似乎不够主动，但实际上已揭明了对方所犯的逻辑跳跃的毛病，因而更能激起评委和听众的理解、同情和支持。

^① 《狮城舌战》，第338页。

综上所述,不管是在实用性辩论还是应用性辩护中,逻辑的维度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尊重逻辑规律,提高逻辑技巧,归根到底乃是对人类生存真理的尊重。当然,就逻辑方法来说,我们这里说的还只是形式逻辑,实际上,辩证逻辑和先验逻辑也是十分重要的。比如,在第三场比赛中,我们把“恶”定义为“人的本能与欲望的无节制的扩展”,“善”定义为“对本能与欲望的合理的节制和引导”。在这里,“恶”与“善”的关系完全是辩证的、相对的,光停留在形式逻辑的视野中并不能把握这两者的活生生的关系。又如“人性本善”这一辩题中的“本”字就是“先天的”意思,因而关涉到先验逻辑的问题。当然,话得说回来,除了极为专门的学术辩论外,一般的辩论涉及的主要是形式逻辑的问题,把形式逻辑的基本法则和要求掌握好了,也就为辩论的取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二、理论是交锋的核心

从生存论本体论的立场看来,正如逻辑法则最终是从人的生存活动中抽象出来一样,任何理论知识也都来源于人的生存活动。马克思说过: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①

也就是说,一种理论知识,不管它看上去如何抽象,如何神秘,也不管它从表面上看到离开现实生活有多少远,归根到底,它导源于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页。

类对自己的生存活动的认识，即使这种认识是歪曲的，甚至是颠倒的，我们也能在人的生存活动中找出它为什么以这种方式来一同现实生活的原因。

当然，与理论比较起来，人的感觉经验更接近人的生存活动，因而也显得更为生动、更为活跃，然而，感觉经验却更具有偶然性和不可靠性。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说一说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年轻时经历过的一悠扬有趣的事。当青年黑格尔 耶拿大学做讲师时，他就常常因为陷入沉思而显得心不在焉。一天下午，他上的应该是三点钟的课，可他竟糊里糊涂地提前一个小时来到了教室里，尽管教室里坐着的是另一批学生，甚至有的沉重向他暗示他把上课的时间搞错了，可是，黑格尔竟丝毫没有理会，滔滔不绝地讲起课来。按照课程表，此时应由奥古斯特教授来上课，他来到教室门口，听到黑格尔的声音，以为自己迟到了一个小时，赶紧退了回去。到了下午三点，上黑格尔课的学生们也来了，他们已经发生的事情，想看看他们的老师如何来摆脱这种尴尬的局同。当黑格尔明白了自己的疏忽后，以平缓的口吻对学生们说：

诸位，感官可靠性究竟是否真正可靠，首先取决于关于自身的意识经验。我们一直认为感官是可靠的，本人在一小时以前对此有了一次特别的经验。^①

无疑地，与感觉经验比较起来，理论知识是更为严密、更为可靠的，然而，理论知识也并非全是正确的，错误的理论知识常是脱离人的生活的，因而也是缺乏生命力的。只有正确的理论知识才真实地反映出人类的生存活动的本质，从而才能激起许多心灵的赞同。

如前所述，在辩论中，理论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某种意

^① 阿尔森·古留加，《黑格尔小传》，商务印书馆 1978 年版，第 43 页。

义上,双方的辩论也就是两种不同理论之间的对垒。即使在表演型辩论中,双方的理论立场是抽签决定的,或辩题本身决定了不论抽到哪一方都只具有片面的真理性,^①仍然有一个系统地、严密地表达自己的理论的问题。当然,从辩论的角度来看理论知识与从学术探讨的角度来看理论知识是不同的,所以,重要的是,从辩论的实际需要出发来做好理论知识方面的准备工作。我们在这方面的主要体会是:

1. 努力做好理论知识的积累工作

新加坡辩论的题目是在三周前下达的,因而我们在理论知识上的准备工作也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题目下达之前。

在这个阶段中,我们对今后辩论的题目到底是什么是心中无数的。于是,我们只能根据前几届辩论赛的题目和当前国际范围内的诸多热点问题估计这次辩论赛可能出了什么题目,并以此为基础来准备队员们的知识结构,但既谓“估计”,当然不一定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在这个阶段训练的重点始终落在基础知识的传授上,具体措施如下:

(1) 制定精读和泛读的书单

泛读的书有近百种,涉及文科的各个学科;而精读的书主要是《老子》、《孙子兵法》、《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候补队员张谦很好地描述了当时读书的情况:

思而不学则殆。辩论是人格气度的较量,也是知识的竞

^① 如“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这一辩题,不论抽签抽到哪一方都是片面的,因为实际上,艾滋病既是医学问题,又是社会问题。

赛。辩论队建立了自己的小书库，精读、泛读的书分门别类。泛读的书常是半小时浏览，半小时讨论；或是六个人一人看一本、评一本，真算得上是“好读书，不求甚解”。精读书留作“家庭作业”，我们便借着宿舍晚上不熄灯的优势，“夜读《春秋》”，房间里读经诵典之声不绝于耳。到了次日要读书汇报或者考查之时，更是活脱脱要拿出悬梁刺股的劲头来。读《孙子兵法》时，我们运筹帷幄；读《老子》时，我们坐而论道；读《论语》，我们又之乎者。所谓书山可攀勤为径，我们便是这样从浩如烟海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典籍中觅得了一条探宝之路。^①

不论是泛读还是精读，我们注重的并不是形式，并不像《死魂灵》中的乞丐科夫的跟丁只知读书，却从不知道自己在读什么，我们注重的是理解。因此，我们不仅要求队员们能用自己的语言概括出所学的东西，而且经常把书中的一些重要观点抽出来，进行一对一的辩论，以便队员们对已学到的知识能做到融会贯通。

（2）组织专家讲座，直接进行灌输

为了快速提高队员们的知识积累，我们利用得旦作为综合性大学的优势，先后组织 30 多位专家给队员们开了 50 个讲座，以弥补他们在知识结构上的局限性。张谦对这一点也有很好的说明。

50 堂讲座，每一堂讲座都在我们脑海里留下了鲜明生动的印象。从朱维铮教授的中国文化史到何思广老师的西方美术史，从谢遐龄教授的中国古代哲学到朱明权老师的当代国

^① 《狮城舌战》，第 111 页。

际裁军，从基督教到艾滋病，从文化语言学到分子生物学，每位老师都有那么多的如珠妙语。哲学系王雷泉老师讲佛教时，把我们带到他的书房，壁立的书柜中是《大藏经》、《华严经》、《法华经》排成的“墙壁”，桌子上是一摞子僧钵，我们则围着可盘膝而坐的圆桌听起佛经来。为了给我们讲环境经济学，经济系已退休的博士生导师张薰华教授特地送我们一人一本他的专著《生产力经济学》作预习资料。讲课时他冒雨赶来，站在陈旧的长黑板前给我们展示他那有名的“画圈圈”的分析方法，真让人觉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①

这些讲座大大地开拓了队员们的视野，使他们对文科各个领域中的情况有了一个大体的了解，为应付各种可能的辩题奠定了基础。

(3)看电影录像

为了增加队员们的感性知识，同时也为了加深队员们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并对紧张的读书和训练活动有所调节，我们借了一批获奥斯卡金像奖的或较好的录像片给他们看，如《巴顿将军》、《刺杀肯尼迪》等录像。队员们看后都觉得很有启发，不仅在知识上，而且在人格力量上也受到了电影中的某些人物的影响，尤其是《刺杀肯尼迪》中的盖尔森检察长的滔滔雄辩更使他们赞不绝口。

第二个阶段：题目下达之后。

新加坡广播局把辩论题目正式通知我们后，我们的理论知识的训练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境地。在这个阶段中，我们采取的主要措

^① 《狮城舌战》第113页。

施是：

(1)组织有关专家对三个辩题进行会诊

由于每个人在理论知识上的局限性，对任何辩题的分析都不可能面面俱到，在这种情况下，组织有经验的专家进行会诊，集思广益，以便对辩题获得比较深入的理论认识是十分必要的。专家们不仅围绕着辩题提供了必要的参考书和资料来源，而且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对我们启发很大。比如，有的专家认为，“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的辩题，只注意到经济状况与道德的关系问题，而未注意到：道德中的相当一部分内容牵涉到性的问题，因而即使完全撇开经济状况，如温饱，只要有不同性别的人存在，应付地有性道德存在，就能够而且应该谈道德。也有的专家提出“饱暖思淫欲”这句古语，启发我们，不仅在前温饱阶段要谈道德，在后温饱阶段也应该谈道德。这一卓有见地理论认识后来在第一场辩论中被三辩手严嘉很好地加以发挥：

即使温饱了，富足了，道德水准也不会自然而然地就得到提高，有时甚至会倒退。中国就有句古语，叫做“饱暖思淫欲”，而古巴比伦王国、罗马帝国的由盛及衰，正是由于其举国上下，不重视道德修养与道德教化、物欲横流的结果。日本可以算是富甲天下了吧，办理政坛丑闻却不绝于耳。竹下登被贿赂蹬下了台，宇野宗佑被美色诱下了水，而金丸信呢，终究未能取信于民。^①

这段精彩的辩词就是在专家会诊的基本上撰写出来的。

^① 《狮城舌战》，第292—292页。

(2)对辩题知识欠缺的地方进行补漏

在这次新加坡辩论赛的三个辩题中,我们最缺乏理论知识的是关于“艾滋病”的问题,于是,我们专门请来了上海传染病防治所的康来仪教授给我们补课,他的讲课不仅把艾滋病的来龙去脉交待清楚了,而且回答了我们本来感到困惑的一些问题。由于我们全面地把握了这方而后知识,后来在辩赛中就始终处于主动进攻的状态。我们不妨看看下面这轮短兵相接的交锋:

我方二辩:我倒想请对方辩友回答我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口号是什么?

对方一辩:今年的口号是“更要加强预防”,怎么预防呢?要用医学的方法去预防啊。

我方二辩:错了!今年的口号是“时不我待”,对方辩友连这个基本的问题都不知道,怪不得谈起艾滋病问题来还是不紧不慢的。^①

“时不我待”这个口号也正是我们从康来仪教授那里接受过来的。他讲的理论知识也为我们反驳对方的观点提供了论据:

对方二辩:1987年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就已告诉我们,他们的研究人员已经分离出一种艾滋病毒,并开展了艾滋病毒和分子生物学研究,已经得出了研究结果并且是有效的。

我方四辩:著名的中国艾滋病研究专家康来仪先生就说,刚才

^① 《狮城舌战》,第316页。

那个所为的研究结果到现在没有办法可以证明。^①

尽可能全面地掌握我们关于某个辩题的理论知识是十分重要的，有了这一条，才能在辩论中有备无患，处乱不惊。

(3)补读与辩题直接相关的著作和论文

比如，为了辩好“人性本善”这个题目，我们专门补读了荀子的有关文献，检索了在人性问题上提出各种不同见解的论文和资料，从而对辩论中可能遭遇到的问题和战场都事先作了充分的准备。

由于我们在队员的理论知识的积累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使每个队员既有面上的比较宽泛的知识，又有点上的比较专门的知识，这样一来，他们在比赛中就显得从容不迫，挥洒自如。

2. 辩论中的理论知识必须准确无误

在训练中，我们要求队员对任何理论知识，甚至是事实资料的引证都必须准确无误，都必须有可靠的来由，既不能断章取义，更不能信口开河，因为理论上的失误一旦给对方发现并抓住的话，是很难赢得辩论的。在新加坡的第三场辩论中，台湾大学之所以失利，他们在理论上的失误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比如，稍稍熟悉中国哲学史的人都知道，荀子是性恶论的倡导者，告子则是性无善无恶论的倡导者，可是，台大的队员却把荀子和告子的人性论混淆起来了；

^① 《狮城舌战》，第306。

对方三辩：对方辩友，请您回答我们，荀子说的是性恶说，还是性无善无恶。

我方三辩：这点都搞不清楚，还来辩论性善性恶？……

对方三辩：荀子说：“无为则性乱有自美”，说性像泥巴一样，它塑成砖就塑成砖，塑成房子就塑成房子，这是无善无恶说呀，对方辩友。

我方四辩：荀子也说：后天的所谓善是在“注错习之所积耳”，什么叫“注错习之所积耳”呀？请回答。

对方三辩：荀子说错了！荀子说他看到什么是恶的，还是说没有看到善，你就说是恶的。没有看到善是不善，不是恶，对方辩友。

我方四辩：你说荀子说错了就说错了吗？那要那么多儒家学家干什么？

对方三辩：儒学就是来研究荀子到底是说了性恶还是性善嘛！

我方二辩：荀子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人性恶，其善者伪也。”①

由于对方三辩对荀子理论的理解有偏差，而又强行为自己的不准确的见解辩护，这就在听众和评委中损害了自己的理论形象，从而为我方提供了可乘之机。在新加坡的第一场比赛中，剑桥大学队在理论上也有失误，试举一例：

对方二辩：据最近的资料表明，二战中英国人民的温饱程度是有史以来没有过的，营养价值在当时食物平均分配

① 《狮城舌战》，第341—342页。

制度下是最好的。因此你不能通过这个例子来否认它是在温饱程度上谈道德的。

我方三辩：《邱吉尔传》告诉我们，那时候好多穷人是怎么去填饱肚子的呢？是去排队买马食，还买不到啊！①

显然，对方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人的生活情况并没有作过认真的了解，也缺乏准确的知识，甚至他连《邱吉尔传》可能也未读过，所以，在我方的旁征博引的反驳之下，完全失去了辩护的能力。

由此足见理论知识准确性之重要。在入手进行辩论之前，对自己立论所依据的理论知识的来龙去脉、基本内容以及可能遭到攻击点都有充分的了解，才不致于在对方的“秘密武器”的袭击下丧失自卫能力。

3. 辩论中的理论知识应当尽可能贴近常识

众所周知，常识包含着两个方面：从一方面看，常识中包含着某种健康的知识，它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投入行动、作出判断的指南；从另一方面看，常识中又包含着种种迷信、偏见和谬误。一般说来，在学术性，尤其是哲学性辩论中，更需要强调的是超越常识的一面，而在日常生活的实用性和表演性辩论中，更要强调的是理论知识如何贴近常识（这里指的当然是常识中的健康的部分）的一面。也就是说，在辩论中，立论应尽可能合情合理，不与一般人所接受的常识离工太远。

在第一场辩论赛中，我方立论主要是通过第一辩手姜丰陈述出来的：

① 《狮城舌战》，第294—295页。

我方认为，温饱不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有理性的人类存在，才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只要有理性的人类存在，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谈道德。走向温饱的过程中尤其应当谈道德。^①

在这段理论陈述中，三层意思表达得十分清楚，使评委和听众觉得，它们是符合常识的，因为道德作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体现的正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要这种关系存在，只要人类是有理性的，不是盲目地按照自己的欲望和情感来办事的，那就应该而且能够谈道德。在尚未温饱而走向温饱的过程中，由于贫困的肆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就更应该多谈道德。

在第二场辩论赛中，我方的基本立论在第三辩手严嘉那里得到了很好的发挥：

要解决艾滋病这个重大问题，必须通过社会系统工程，综合政治、经济、道德、法律、财政、福利、医学、教育、生物工程、基因工程、大众传播和行为科学等多种力量，动员各个阶层综合治理。^②

在这段陈述中，我方既肯定艾滋病是社会问题，必须通过社会系统工程加以解决，又主张，在这一工程中也包括医学的途径，这样听起来就比较符合常识，也易于为听众和评委所接受。如果在我们提出的社会系统工程中，完全排除医学方面，那就会与常识相悖。尽管反方的辩题是“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问题”，为了维护我方辩题，我们不得不证明艾滋病“不是医学问题”，但我们却巧妙

① 《狮城舌战》，第286页。

② 同上书，第315页。

地引入了“医学途径”这一新概念，并把它包容在社会系统工程这个大概概念中，目的下百为了使我们的立论契合常识，从而更易为评委和听众所接受。

在第三场辩论赛之前，我们曾为“人性本恶”设计过一套立论。在这套立论中，我们为了解决“本”的含义，把人性设定为人的自然属性，人性本恶，也就是说人的自然属性，即本性永远是恶的并且是不变的。如果不设定人性不变的话，对方可能会攻击我们的“本”变来变去，于我们不利。但完全不讲“变”字，等于说人性漆黑一团，根本不可能通过教化而转变，这显然也不行，于是我们又设定了“人的本质”这一概念，并把它与人的社会属性对应起来，强调它是可变化的，人们通过教化只能改变其社会属性，即“人的本质”，但其本恶的自然属性却是永远不变的。

从理论上讲，这套立论是比较严密的，对方几乎无法攻到我方关于“性本恶”这一核心观点上，但从常识上考虑，由于设定概念太多，显得过于学究气，反而会增加评委和听众在接受上的难度。考虑到这方面的因素，我们还是放弃了“人的本质”的概念，使之贴近于常识。我方第一辩手姜丰在下面两段话中简要地阐述了我方立论：

我性是由社会属性自然属性组成的，自然属性指的就是无节制的本能和欲望，这是人的天性，是与生俱来的；而社会属性则是通过社会生活在、社会教化获得的，最后天属性。我们说人性本恶当然指人性本来的、先天的就是恶的。

虽然人性本恶，……人性可以通过后天教化加以改造，……如果我们整个社会倡导扬善避恶，那么人性就有可能向善的方向发展，这一点也不正说明了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修养、治平、内王是何等重要吗？对方辩友，如果真的是人性本善的

话，那么孔老夫子何必还诲人不倦呢？^①

这段话听起来既容明白，也契合常识，这种简单化的立论也暴露出了我方的理论弱点，即我们在无表中已假定人性是可以变来变去的，这从根本上看是与“人性本恶”中的“本”的含义相矛盾的，所以，在自由辩论中，对方果然对我方立论的“阿喀琉斯之踵”实施和攻击：

对方三辩：对方辩友，如果人都受过教化的话，但本在哪里呢？

本为什么移来移去，可以从善变到恶，从恶变到善，
本在哪里？

.....

我方一辩：如果我们光说本的话，我们只要说人性恶就行了，
你们论证本了吗？

对方三辩：我们当然论证本了，良心就是本哪！对方辩友，您才
没有论证本呢！您说的本 是跟动物一样啊！^②

应当看到，如果我们实施先前那一套“人性不变而人的本质可变”的方案，对方是很难攻进来的，因为对方就是设定“人性本善”这一点不变为基础的，所以在我们的方案改变后对方可以攻我们的人性可变性。对方的失误在于未能抓住这个弱点猛攻过来，否则我方是很难招架的。当然，从总体上看，我们改变方案是利大于弊的，不然，辩论就会因过分的学究气而遭到听众和评委的批评。

综上所述，辩论归根到底是两种对立理论的交锋，哪一方在理论上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表达得更平易近人，更契合于健康的常

^① 《新城市战》，第330—331页。

^② 同上书，第343页。

识,就更易于起激评委和听众的共鸣,从而也就和胜利结下更多的缘份。

三、画龙点睛在价值

如前所述,不管是在何种形式的辩论中,逻辑和理论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能够忽视价值因素的作用。从生存论本体论的视野出发来看辩论,价值给度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正如在烹调中,不管我们准备的东西(包括佐料)如何齐全,如果没有盐的话,炒出来或者出来的菜就会索然无味,同样地,在辩论中,无论哪一方如果缺乏明确的价值指向和底蕴的话,它的辩论词很难激起听众和评委的共鸣,因而也很难在辩论中摘取桂冠。我们在这方面采取的主要做法是:

1. 深入地领悟辩题本身的生存论涵义

在新加坡的三场辩论赛中,三个辩题都显示出人们,尤其是出辩题的人对人类生存的现状和前景的深刻的关注。我们不妨逐一进行分析。

就第一个辩题“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来说,它显示的正是人们对当今世界中经济上的发展和道德上的提高的关系系的普遍兴趣,努力理清并处理好这一关系正是为了使人类更好地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也就是说,这一层价值关系必须在我方的辩词中表达出来,所以,我方第四辩手蒋昌建说出下面这番回肠荡气的的话就是十分自然的了:

我们今天在这里不仅要谈道德的理念,更要谈在现实社

会当中的人类该何去何从。环顾当今的世界，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人们成千上万，他们怎么办？不谈道德了吗？对方可以设想一下，在纷争四起的社会条件下，丧失人伦能够促成繁荣富强吗？相互残杀的鲜血能够浇灌出温饱的果实吗？显然不能。“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越是贫困向人类发出强烈挑战的时候，就更要谈道德。^①

无疑地，这段话是契合人们内心的欺待的，因而在听众和评委的心里都激起了同情、赞许和共鸣。就第二个辩题“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来说，更直接地关系到人类对未来的生存状态的思考。已有资料表明，目前世界上已有艾滋病毒的携带者 1400 万，患者 250 万，到 2000 年，携带者将达 5000 万到 1 亿，患者将达 1400 万。艾滋病这个世纪恶魔在全人类的生存活动中留了可怕的阴影，这个辩题显示出人类在紧迫的生存问题面前所感受到的困惑和焦虑。我方四辩的总结陈词正是紧紧地扣住这种困惑和焦虑而展开的：

当艾滋病给人类造成巨大的威胁的时候，向人类社会的发展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20 世纪 90 年代，我们在物质昌盛的时候，人类的精神家园究竟如何呢？我们说，我们对这个问题要有一个价值判断。我们说，应该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归依，来修复已经饱经沧桑的精神家园，使我们的生命搏击出生活的健康、理性的美丽，这才能安慰成千上万长眠于地下的艾滋病患者的屈死的灵魂，才能启示将继承人类文明火种的子孙后代！^②

① 《狮城舌战》，第 299 页。

② 同上书，第 321—322 页。

这段充满激情的文字不仅表明了人们在艾滋病的挑战前感到的焦虑，也表明了人类对自己的生存前景的深入思考，使听众和评委在思想上受到巨大的震撼。

就第三个辩题“人性本善”来说，年上去似乎是一个比较抽象的，离生活较远的命题，实际上也表明了人们面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的担忧，对人性发展趋向的困惑和对人类发展前景的担忧。我方四辩在关于“人性本恶”的总结陈词中用简明的语言说出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担忧：

只有认识人性本恶，才能正视历史和现实。回顾历史的时候，我的内心总是因痛苦而颤抖。从希波战争到十字军东征，从希特勒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到日寇在华北的细菌试验场，真可谓是“色情与贪婪齐飞，野心共暴力一色”。以往的人类历史，可以说是交织着满足人类无限食欲而展开的狼烟与铁血啊！可见，本恶的人性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话，将会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呢？①

如果说，我们为“人性本恶”的陈述充满了对生存问题和人生价值的思考的话，那末，在准备“人性本善”的辩词时，这种思考丝毫不逊色。请再读读我方四辩的总结陈词吧：

只有确信人性本善，才能懂得人类之崇高与尊严，才能自觉地确立为人类而生活，为人类的事业而献身的伟大的道德情操和道德责任感。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决不能一念陷溺，使本善的人性蒙上恶的阴影，使放纵和恶行成为压垮脆弱的地球的最后一根稻草，相反，我们应该与善行和美德去重新塑造

① 《狮城舌战》，第345页。

我们生存的环境，使这个伤痕累累的世界多一份温情，多一份爱心。^①

由此可见，在辩论赛中，不管抽签到哪一方，都是有机会充分展示辩题的生存论涵义的，也只有关心并努力发掘出这方面的涵义，也只有关心并努力发掘出这方面的涵义，才能在辩论中显示出高远的思想境界，使辩论词产生出震撼人心的力量。

2. 把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划分开来

重视辩论的价值维度，光停留在对辩题的生存涵义的分析上是不够的，还要善于把对辩题所作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区分开来，然后再紧密地结合起来。

我们对一、二、三、四辩的分工是：一辩从逻辑上、二辩从理论上、三辩从事实上、四辩从价值上论述并阐发辩题。其实，逻辑、理论、事实都是从事实判断的角度来解析辩题，其共同的目标是说明我们的北京日报题“是什么”，而价值则是从价值判断的角度来解析辩题，它关心的是“为什么”的问题，即为什么我们要如此立论。

换言之，在我们的四个辩手中，第一、二、三辩手是作事实判断的，是从理论上来阐明我方的立论的，第四辩手则是作价值判断的，其目的是澄明我方立论的价值归宿，从而显示我方立论的思想意境。

比如，“人性本善”这个辩题，如果我们抽签抽到正方的话，我方四辩将以如下的陈述来阐发我方立论中的价值涵义：

只有确信人性本善，才能对人类发展的前途充满信心和希望。众所周知，科学技术的发展已为当今世界创造了令人目

^① 《狮城舌战》，第378页。

眩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然而，科学技术犹如无缰的野马，如果套上兽性的笼头，它就会把人类引向悬崖，引向毁灭；相反，只有套上人性的笼头，人类才能走上幸福和谐、永久和平的康庄大道。^①

事实上，后来我们抽到的是反方，也就是以“人性本恶”来立论，在这种情况下，我方四辩又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来阐我方立论的价值内涵：

只有认识人性本恶，才能重视道德法律教化的作用，才能重视人类文明引导的结果，培养健全而又向上的人格。”^②

在表演性辩论中，不论抽到哪一方，都能够而且应该努力阐明方立论的价值内涵，以充分显示其立论的高远的思想境界。如果就事论事地进行辩论，举例来说，为了论证“人性本恶”的观点，一、二、三、四辩手都引证各种理论，援引大量事实来论述人性如何如何可恶，那只会给听众和评委留下这样的感觉，即一切都是漆黑一团的，人类是不会有希望的。要激起听众和评委的同情和共鸣，就既要做好事实判断，以无可辩驳的理论和事实阐明人性本恶的真理，又要做好价值判断，表明肯定人性本恶正是为了弘扬教化的作用，从而达到扬善抑恶的结果。

3. 指示辩题的形上学价值内涵

● 哲学告诉我们，人虽然是追求实际利益的，但是在人心的深处潜藏着一种追求神秘的、形上学价值的冲动，或许是在这个意义

① 《新城市战》，第379页。

② 同上书，第345页。

上，黑格尔把人称为形而上学的动物。当听众和评委在欣赏一场辩论时，他们关注的不仅是辩论双方在语言、技巧、仪表、风度、整体配合等方面的高低如何，更关注的乃是一种溢出辩论本身的东西，即通过辩论词传达出来的形上学的价值内涵。我们力图在每一场辩论中显示这种价值内涵。比如，在第一场辩论赛中，我方四辩在总结陈词的最后部分说：

当人类迈向未来世纪的时候，更要基于人的理性来谈道德。当今的世界，环境、人口、饥饿、战争等等的问题都存在于贫困的国家和地区当中，他们不谈道德了吗？不谈的话会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命运呢？从罗尔斯到唐君毅，又有哪个伦理学家不告诉我们要呼唤人的道德感与责任感呢？我们、你们和他们难道还要让自己的心智像风、像雨，以对道德的沉默来拯救这颗越发脆弱的星球吗？

谈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一百多年前生活在哥尼斯堡的一位叫康德的老人说过的一句话：在这个世界上唯有两样东西能使人产的心灵受到深深的震撼：一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①

在这段慷慨激昂、气势非凡的陈述中，尤其是康德的话显示出我方强烈的形上学的热情，从我方四辩发言后激起长时间的掌声也可以看出，评委和听众都被深深地感动了。又如，在第三场辩论中，我方四辩最后的陈述也充满了形上学的热情：

光阴荏苒，逝者如斯。在物质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同

^① 《狮城舌战》，第299—300页。

时，人类的精神家园却花果飘零。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警惕人性本恶这个基本命题。可喜的是，在东方的大地上，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已经从一阳来复走向了新的春天。我们也相信，通过传统文化的精华，必能使人类对无节制的欲望加以合理的遏制和引导，从他律走向自律，从执法走向立法。人类才可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而我要用它去寻找光明。^①

这里关于“精神家园”、“花果飘零”、“一阳来复”、“他律”、“自律”、“执法”、“立法”等用词都显示出我方在形上学方面的宽阔的视野。最后引证的顾城的两句诗更显示出一种朦胧的、形上学的冲动和热情，使听众和评委在精神上受到深深的感染。我想，我方第四辩手蒋昌建之所以特别受到评委和听众的赞扬并获得“最佳辩手奖”，大概和他陈述中的形上学热情有关，因为它触动并唤起了人心中最隐蔽、最深沉的东西。

总而言之，从生存论本体论的立场看来，不论是实用性的辩论还是表演性的辩论都不仅仅是游戏或技巧，即使在表面看来十分轻松的形式下，也潜藏着人们对生存问题的热切关注，潜藏着一种伟大的悲剧式的热情。我们对辩论的认识只有深入到这个层次上，我们在辩论中才会充满激情，才会打动每个听众，才有可能成为辩论的真正的赢家。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说，只有哲学才是通向雄辩术的真正道路，然而哲学的最高境界却不是雄辩，而是沉默，用维特

① 《顾城诗选》，第345页。

根斯坦的话来说,就是:

Wovon man nicht sprechen kann, darüber muß
man Schwaigen.^①

① “对不能说的东西人们只能保持沉默。”引自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舒康出版社 1988 年德文版,第 85 页。

辩论的美与美的辩论

——辩论中的审美意识

姜 丰

佳人不同体，美人不同面，而皆悦于目。

——《淮南子·说林训》

好者不必同色而皆美，丑者不必同状而皆恶。

——陆贾《新语·思务》

曾听队友讲，昌建有一次到电台去作节目，提到我时，说我人和专业一样。我深知这是由于大家几个月来朝夕相处、荣辱与共，才“队友眼里出西施”，因而对于这句体现最佳辩论员专业水平的溢美之辞并未得意忘形。不过，学美学专业的我，确乎地美的事物与美的境界有格外的垂青与偏好。当新加坡国际大专辩论会终于尘埃落定，当我们在数千本《狮城舌战》的扉页上签下自己本是不见经传的名字，当原来平淡平常的我们收拾起盛誉与喧闹重新回到平淡平常的生活，当我们在一个飘了细雪的冬夜里再度聚首检讨得失并决定把这一份收获留存下来的时候，教头、队友和我，几乎同进想到我应该从“美”的角度对我们的辩论做一回顾与反思。想到一句“英雄所见略同”，于是，沾了英雄的光，自己也口头上过了一次“英雄”的瘾。

数天以前的一个中午，我被叫起来，睡眼迷蒙地骑车来到校内张老师那里。在大连经济台的几位记者在等我。女主持人似乎早有准备，按下采访机的录音键，就把话筒伸到我面前：“对于完美，

你怎么看？”瞥到她手里的一份复旦小报，才蓦然醒悟她这一问题的来由。那是小兰曾写的一篇关于我的小速写，题为《追求一份完美》。或许，完美人人想追求，或者人们事事想求得完美。不由得又想起逝去不远的夏天里，王教头那件汗衫上的一行字：“It's not easy to be perfect.”（完美诚不易）。时至今日，纵然我们以5：0的成绩大获全胜而赢得了新加坡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的冠军奖杯，我们依然会在反思与总结的时候发现一个又一个的不足与缺憾。而美，恰恰是在臻于完美的永恒的过程中生动地存在着。

我们在柏拉图早年写的《大希庇阿斯篇》中看到，柏拉图逐一分析了当时流行的一些美的定义，诸如“美就是有用的”，“美就是恰当的”，“美就是由视觉和听觉产生的快感”，“美就是有益的快感”等等，结果发现每一个定义在逻辑上都不圆满，最后依然得不出圆满的结论，不得不感慨“美是难的。”同样，新加坡的大专辩论会赢得了数以百万计的听众，无疑说明辩论之美。但是，要以语言文字对辩论的美加以明确的界定同样几乎是不可能的。我所要做的，只能是描摹一下对辩论的美的感悟历程。

正如美存在于鲜活的、感性的、个性的存在之中，辩论的美也同样是一种鲜活、感性、个体的存在。10个月前，我第一次完整地看了一场大专辩论会，那是1988年那场著名的世纪之辩的录像，由复旦大学队和台湾大学队对垒，辩题是“儒家思想可以抵御西方歪风”。当时，罗洁的端庄大方、顾刚的机智调侃、鲍勇剑的诙谐幽默、李光斗的才情旨趣几乎让人叹为观止。也就是那一次，我每一次为辩论的美深深打动、深深折服。然而，在后来的训练当中，要超越的也正是1988年的经典。如果说，一场辩论会给人以美感、给人震撼，那么它势必有着不同于上一个经典的独到之处。美无法言说，美不可比较，这也正是“佳人不同体、美人不同面”的道理。但另一方面，她们毕竟也还有着“皆悦于目”的共同之处。这也正是在细

历了一次辩论、经历了一次成功、经历了一次反思之后所要寻觅的东西。

一、游戏：游戏的诞生。游戏规则

从某种意义上说，辩论会或辩论比赛中的辩论是“纯粹”的辩论，即为辩论而辩论。它不同于法庭辩护，不同于经济谈判，后者的辩论是为真理而辩、为利益而辩，而辩论会或辩论比赛中的辩论则是为“游戏”而辩、为利益而辩，而辩论会或辩论比赛中的辩论则是为“游戏”而辩。所谓“游戏”，也就是说它具有了假设和虚拟的意味，即辩题是由举办当局事先拟定，辩论双方的立场由抽签决定。换句话说，辩论双方所持的观点与立场并不意味着是辩论员本人的观点与立场。一场辩论比赛所要完成的，并不是当真要辩出一个是非，或者说，取胜一方的立场并不一定是正确的，反之，失败一方的立场也不一定是错误的。一场辩论比赛的真正意义在于：知识与智慧的展现。这种超越是可本身的非功利性质，是辩论所具有的美学意义和美学价值的基础。

现在还记得，3月30日的深夜，我们复旦大学辩论队一行人，结束了狮城舌战，在一种紧张之后松软而惬意的疲惫中走下飞机，走向在机场迎候我们的老师和同学。在新加坡的八九天，无论有无赛事，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在公众面前。为了“保持形象”，我便总是戴着博士伦隐形眼镜。离开文华酒店的上午，我匆匆忙忙地整理行装，连隐形眼镜也没来得及戴，新加坡广播局的陈术说，这样你可以在飞机上好好睡一觉了，直到在樟宜机场，我们已步入了闸门，陈术还在玻璃窗外，双手合有腮边，示意我登机后睡觉。确实，在新加坡的日子实在太疲倦了。然而，飞机在上海虹桥机场一着陆，我

们便倦意荡然无存，迫不急待地等托运的行李，等通过海关检查。一出闸门，就被热情的同学们拥到了那块红色的条幅之下。就在怀里捧着的那束鲜花旁边，一只话筒伸到我面前：“听说决赛的时候，你们的立场是人性本恶。姜丰同学，你本人认为到底是人性本恶、还是人性本善呢？”我想了想说：“我本人的观点，我认为人性本来无所谓善恶，就如同洛克所说的‘白板说’吧。”

说到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的问题，不止在虹桥机场时记者曾有过如此的发问。无独有偶，今年元旦期间，我和昌建去南京签名售书，也曾有记者问过相似的话题；还有好多听众在我们做直播室节目时、在来信中也都曾问过如此话题。还有一些朋友在来信中，就“人性本恶”这一观点本身同我们的商榷，甚至还广征博引，加以论证。其实，人性的善恶，是一个永无定论的千年命题，远非一句“人之初，性本善”就可以涵盖，也不是一场四十几分钟的辩论会就可以辩明的。这正是本届国际大专辩论会决赛辩题的精妙之处。一个好的辩题，应该是一个公正的辩题。所谓公正，也就是辩论的双方都有道理好讲，同时又都有漏洞可抓；没有哪一方的立场在逻辑上是圆满的、无懈可击的，但是，在论辩的过程之中，双方却都要尽量地完成逻辑上的自圆其说，建立起一道牢不可破的逻辑防线，在保住自己阵营的同时，去攻破对方的阵营。这有点像下围棋，双方都尽可能有地多占地盘，扩大战果。一个公正的辩题，双方在逻辑上的困境是对等的。比如这届国际大专辩论会半决赛的辩题，正方立场是“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反方立场是“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问题”。客观地讲，艾滋病既是一个医学问题，又是一个社会问题，双方都在肯定问题性质的一方面而否定另一方面，因而都是片面的，这样双方都会陷入“双刃剑”的困境，也就是说，逻辑上的对等使一方在攻击另一方的同时，自己也陷入逻辑上的悖论。如，若将“问题”界定为由引发因素的性质决定，那

么艾滋病既是由医学因素(病毒)引发的,也是由社会因素(性混乱、管理不当、吸毒等)引发的;若将“问题”界定为由解决途径决定,那么艾滋病的解决既要依靠医学途径(医学研究的突破,找到对症之药),同时也要依靠社会途径(加强管理、倡导性道德、增进性道德、斋医学资金投入等等)。因此,在论辩的过程当中,既要打击对方立论,同时又要避开自己逻辑上的弱点,这一过程,与其说是探求真理的过程,不如说是展现知识与智慧、魅力与风采的过程。与其说是“求真”的过程,毋宁说是“求美”的过程。我们说辩论会有很高的欣赏价值、体现了很高的美学意义,也正是就此而言。虚拟性是审美体验的一个重要前提。无论是戏剧、小说,还是音乐、美术,各类艺术形式说到底都是具有一定程度的虚拟性。克莱夫·贝尔认为:“美是有意味的形式”;在艺术当中,由假拟和虚设一种情境,进而在这种情境当中去展示、去体验、去创造,由此诞生的“有意味的形式”,也就是美的诞生。

一个游戏,必然在一定的游戏规则之下运行和存在。因为游戏是虚拟的、是假设的,人们便可以人为地制定和调整规则,使游戏更加公平合事。辩论最基本的游戏规则就在于:辩论双方真理和谬误各占 50%。一方之所以能够在论辩场上战胜另一方,是因为一场口舌交锋下来,‘似乎’一方拥有的真理多于另一方;或者说,赢家必定要在 50% 的谬误中,巧妙地把一部分“转化”为真理。这在客观的层面上讲是“诡辩”,而在辩论游戏的意义上讲则是“雄辩”。对于辩论的这一感悟,我是在一次演讲时蓦然之中领悟到的。那是在上海浦东的上南中学。本来这一类演讲、报告的邀约大部分不得不婉谢掉。从新加坡回来,或多或少地体会了一点做“名人”的滋味和做“名人”的苦恼:面对大量来信,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一一回复,会感一份对于友善与热情的负疚;和朋友去卡拉 OK,却被服务小姐的慧眼认出,于是,我那“对不起听众”的歌声(如同昌建总

是说自己的长相“对不起观众”)便也不好意思再登台亮相了;午休的时候,有人来访,写个名字倒是举手之劳,只是我的两位室友却常常是被好梦惊散……林林总总,最主要的大概是时间了。那一次去上南中学,却是我的导师朱立元教授的同学相邀,自然是欣然从命。当我在夜色之中乘车经过街灯串串的杨浦大桥,当我回到宿舍、换下一袭湿衣,坐在案前灯下,看窗外的寒风细雨,我还不能忘记,几个小进前簇拥在我周围的那一群中学生……

康德对于美的基本论述就是:“美是无利害关系。”在美学意义上讲,审美与功利果上对举的。只有在超越功利之后,美及美感、审美与审美意识才可能诞生。游戏追求的不是功利结果,而是虚拟当中的愉悦体验。辩论正是这样一种游戏,它不计辩结果(纵然评委北大新技术公司我们持“人性本恶”立场的反方赢家,他们本人依然不会改变他观念中的性善论,新加坡更是不会改变推行儒教的行政方略),而只求辩论中风采的展现。我们知道,在新加坡国际大专辩论的评判标准中,有陈辞立论的分数,有语言表达的分灵敏,有机智与幽默的分数,有风度仪表与举止谈吐的分数,有整体配合的分数,唯独没有双方立场的分数。这是因为立场由举办当局事先设置好,再经抽签决定正反双方。可是,辩论本身是求得辩论过程中,知识的调动、智慧的运用、幽默的显露和应变能力的发挥,一言以蔽之,是辩手及整个辩论队的魅力的较量与争雄。这也正是辩论的美。

一场出色的辩论文本,或许会有幸成为经典。而辩论一旦成为经典,就意味着不可更改、不可仿效。1988年那场精彩的世纪之辩至今让人记忆犹新,甚至自由辩论中顾刚那一句“(子夏)不是不肯借伞给孔子挡雨吗”的辩词,至今仍朗朗上口;李光斗那一句语气坚定、调式铿锵的“请回答”仍不绝于耳;鲍勇剑那富于表现力的手势、罗洁那会说话的眼神还历历在目……然而,我知道我不能再去

扮演罗洁，而蒋昌建纵然把李光半摹仿得维妙维肖，恐怕也不会赢得全场最佳辩论员的殊荣。我们必须走出1988年耀眼炫目的光环。从某种意义上说，前人的光环注定是后世的阴影。朱立元教授曾有一部题为《冲出父辈的阴影》的译著，那是美国著名的耶鲁学派成员之一布鲁姆的美学名作，探讨的是文化的承继与超越。在四个月的训练当中，我们及我们的教头们所做的一切，概括起来，也无非是——承继与超越。四个月以后，我们终于看到了“承继与超越”的结果：在四分钟的自由辩论当中，有15次掌声响起来。回过头想想，似乎所做的一切是最具匠心的安排、组合与配置。如果把这组合打乱，由严嘉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昌建语）；我说“竹下登被贿赂蹬下了台，宇野宗佑被美色诱下了水，而金丸信呢，终究未能取信于民”（严嘉语）；季翔说“我方明明回答过了，为什么对方辩友就是对此听而不闻呢？到底没听见，还是没听懂啊？”（姜丰语）那么，整场的效果恐怕就会两样。辩词已与辩手个人的风格与个性浑然一体，好像只有他（她），才会讲这样的话；只有他（她）讲这样的话，才会有这样的效果。上场之前，我们的顾问王沪宁教授说：最终征服观众与评判的，不是辩辞、不是立论、不是知识、不是逻辑、不是机智、不是幽默……他一口气说了那么多“不是”，才最终道出：真正征服观众的是辩手的魅力。或许，“辩手的魅力”便涵盖和交融了知识与逻辑、理性与意志、智慧与智商、机敏与幽默、优美与优雅、气度与风度、气势与气魄，而最终成为有感召力与感染力的论辩风采，不论是侃侃而谈，还是娓娓道来，不论是排山倒海，还是和风细雨，体现的是魅力，张扬的是风采。弃“术”，求“道”，或许，这也可以称得上是辩论的美学境界一种。

从新加坡回来以后，最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在国际大专辩论会的赛场上，你究竟心里紧张不紧张？我会莞尔一笑，说：“不紧张，真的不紧张。”平心而论，去新加坡参赛之前，我对于自己

上场是否会紧也毫无所握。前届新加坡亚洲大专辩论会的辩手鲍勇剑现在美国留学，暑假他回国探访时，曾来文科楼的训练场地看我们，那时候我就问他在场上是否会紧张，是否会担心突然把辩辞“甚至辩题都忘得一干二净。这个问题，等到我自己有机会坐在新加坡上广播局那窗明几净的餐厅里吃好了晚饭，然后会有一位小姐引我们去化妆室，任凭化妆师的纤纤玉指在脸上略施粉黛、淡扫蛾眉（当然，决赛那场绝非“略施”和“淡扫”，以至于决赛间休时结识我的一位朋友，见了我的“庐山真面目”后大吃一惊，笑说，决赛后的照片好像“一只新加坡鬼”），队友们出来，相见一笑，彼此彼此。到了演播厅的后台，还争相扮着换脸，好像面对的，不过是一场庄严正式的游戏。其实，也只有保持这种轻松的心态，才可能在场上机智应答，才可能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心态，驾驭整个场上的气氛，调侃对方，应接自如。背着沉重的思想负担，承受着沉重的心理负荷，怎么可能有幽默呢？

我一直说，在场上之所以有自信，不是单纯的对我自己的相信，而是对整个队的相信，对我的队友们的相信，对我的教练们的相信，对站在我背后的整个复旦的相信。从绝对的意义讲，一场辩论永远不可能准备充足，总是有无数的资料要充实，总是有无数的言辞要精化，总是有无数的概念要再推敲……准备没有尽头，像无限小，又像无限大。然而，在上场前那一刻，也就是准备结束的时候，无论辩题准备到什么程度，都只能到此为止，要相信自己对辩论已有了足够的准备。说到底，这是一场游戏，游戏意味着要投入要迷恋，游戏也意味着要超脱要潇洒。在过程之中去体验意趣，那是一种审美的境界。

二、拒绝再现：辩论中的审美创造

从唐雎出使秦国不辱使命，到晏子出使楚国力挫灵王，从魏征进谏太宗上封禅，到孙叔敖喻谏楚王罢免芊叔，从范缜辩倒众僧，到诸葛亮智激孙权，雄辩之术作为一门古老的艺术一直流传着，似乎唐雎们都是天生辩才。似乎辩论美在千面，美在千体，却无迹可寻。

今天，当我作为一个亲身参加过国际大专辩论会的辩手，每每被问及辩论之道，我只能说：无它，但嘴熟耳。如欧阳修笔下的那位卖油老翁。

纵然，曾经亲手从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准将手中接过那座国际大专辩论会的冠军奖杯，我也依然不认为自己已是一位好辩手。甚至时隔经年，再让我走上辩坛，也许我会如当初选拔时第一次参加辩论一样慌乱、紧张。但是，从一个普通学生到辩论员的过程，辩论所需要付出的努力与创造，却是难以忘怀。

辩论确乎是游戏，却不是可以“玩”的游戏。

从前并不觉得辩论有什么高深，所以当我看到复旦辩论队要招兵买马的消息，竟然也敢于在辩才济济、强手如云的复旦园中一试。那时候的想法不过是觉得好玩，在单一沉沉的读书生活中，再找另外一种“玩”法。当我们那十个人的辩论集体正式组建，我才醒悟：这种游戏不是可以轻轻松松地玩一场的游戏。

辩论是一种创造，是一种审美创造。

1. 晓之以理与动之以情

辩论不是纯粹的哲学思辨与逻辑推演。辩论会作为一项有观

众参加的活动，具有一定的欣赏价值，因而也就具有一定的表演性质。因此，它要求辩论员在辩论当中有一定的感情投入，使辩论的进行呈现一定的张力。

同时，辩论不是一项演出活动。它首先是一个据理力争的活动，宗旨在于辩驳对方观点，证明己方观点。因此，辩论中的一个禁忌就是虚张声势的情感渲染掩盖、冲淡或淹没了辩题的逻辑认识、理论阐述和事实印证。

在辩论当中，晓之以理与动之以情是相辅相承的，不可或缺的。

从具体的操作来说，接到辩题之后，首先要完成的也就是情与理的认识以及队员们认知的统一。作为辩论员，应该具有素质是通才，不仅要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还要通古博今，学及中西，哲学、逻辑学、伦理学、历史学 美学、文学、社会学、民俗学、心理学、宗教以及自然科学都应有一定的涉猎和基础。比如这一届国际大专辩论会的七个论题分别是：(1)卫星传播利大于弊（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对新加坡国立大学）；(2)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香港大学对台湾大学）；(3)第三世界经济发展必然导致环境污染（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对澳大利亚悉尼大学）；(4)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英国剑桥大学对中国复旦大学）。以上四个辩题都是初赛辩题。(5)安乐死利大于弊（台湾大学对国立新加坡大学）；(6)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悉尼大学对复旦大学）。这两个是半决赛的辩题。(7)决赛的辩题是：人性本善（台湾大学对复旦大学）。从这一届的七个辩题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当一名辩论员实在不易，而且要完成一个立场的论述与维护，首先要在逻辑层面上对其加以剖析与讨论，并达到全体队员的共识；接下来就要对其在理论上加以详尽的论述和阐发。在论证温饱与道德的关系时 我们不能不懂伦理学。二辩季翔从《礼记·礼运篇》到《圣经·旧约》，广征博引，为我

们的论证提供了言之有据的理框架，我们才可能在此框架之内自由驰骋，也才能够做到“言之有理”。否则，那些精美的妙语、精辟的譬喻、精彩的幽默也就成了没有依附的散乱的一堆原料。在论辩艾滋病到底是医学问题，还是社会问题时，我们不能不懂医学。关于艾滋病患者数据的列举，指出目前艾滋病的患者已到了250万，感染者已达到1400；到了2000年，单患者就达到1400万，感染者将达到5000万—1亿。有力地证明了艾滋病的泛滥已使人人自危，从而对方说医学能够控制艾滋病的观点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在论证人性善恶的时候，我们不能对哲学、伦理学一无所知。从康德到黑格尔，从孟子到荀子，从马基雅维里到弗洛伊德，甚至从新儒家的花果飘零、一阳来复到《天龙八部》中的恶贯满盈、无恶不作、凶神恶煞、穷凶极恶这四大恶人，我方几乎无不用拿来主义，使之为我所用。只有辩论员有着深厚的知识底蕴、广博的理论素养，博鉴群书、通古博今、引经据典、广征博引，一场辩论会才可能异彩纷呈，妙语连珠，才可能体现出丰满的立体的美感。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结论：言之成理、言之有据是辩论当中审美创造的一个基础，而这样的审美创造所需要的无疑是厚积薄发。一场辩论会结束，往往最深切的感受就是书到用时方恨少。

一直记得雨果的《笑面人》里的一句话：“机会是不守纪律的。”而我们的列祖列宗相似的醒世恒言就更多。《周易·系辞》当中说：“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国语·越语》则说：“得时无息，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之为灾。”机遇来之不易，而珍惜这不易的最佳方法无疑是为机遇做准备，为你毫不知觉的、可能毫无踪迹的机遇做准备。无论是在报告会上，还是在直播间里，抑或是路遇的一位小同学，以及陌生人的来信，问到我“如何成为一个辩手”，或“如何才能提高口才”，我总会不假思索地脱口说出：读书。确实，这“读

书”二字的益处，实在是多少个字都难以道出的。从参加辩论回来，投入到一种忙碌的生活，也投入到一种惜时的生活，昔日“一处相思、两种闲愁”的中文系女生生活，似乎都已随风远去。

与“晓之以理”相对举的另外一种审美创造是“运之以情”。辩论当中所需要的动之以情不是情感没有节制的泛滥，像在这次大专辩论会决赛当中，台湾大学就被评委在评决时指称为“情绪有点激动”。无论如何，这不能算作对一位辩手的赞誉之词。辩论当中的“动之以情”应该是与说理和论证水乳交融。辩手对于辩题的论证不是枯燥的、冷漠的、疏离的，而是付诸情感的投入，才能使辩论有色有声、富有感召力。比如本届大专辩论会的另外一场半决赛是由台湾大学和国立新加坡大学对垒，辩题是“安乐死利大于弊”。半个小时的场上鏖战，唇枪舌剑，难解难分，正方说，安乐死可以使绝望中的病人早日摆脱苦海，为什么不给一个毫无生的希望的人死的权利与自由呢？反方则认为，只要病人还活着，就该尽全部努力救治他，人们没有权利结束另一个人的生命，否则无异于是杀人。双方各执一端，也都言之成理，似乎一时难分高下。而台大队之所以能以一票之差最终赢得角逐冠军的入场券，动之以情无疑是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从整场的辩论来看，台大队也是以动之以情而见长的，这也确实场上为他们赢得了一些掌声与支持。当然，如果动之以情走到另一个极端而成为“煽情”，那么也会带来相当的负面效应，在辩论当中实在不足仿效。

总之，理是情的基石，情是理的翅膀，二者只有相辅相承，相得益彰，才能起到珠联璧合的效果，取得最佳的审美创造。理趣与意趣，交相辉映，和谐统一，才是圆满的审美境界。

2. 遇强不弱与遇弱不强

辩论赛常常会遇到的情形是：遇到一个强队战胜它固然不容

易，遇到一个弱队要打败它也并非轻而易举。

复旦辩论队当初组建的时候，队员个个都是身经数战、过五关、斩六将，才杀出重围得以入选。或许藏龙卧虎的复旦园还有未曾露相的真人，但入选的队员毕竟也是复旦的“辩才”。除了小兰、昌建和我是“后起之秀”，张谦、季翔、严嘉他们都是辩坛宿将、久经辩场。季翔甚至在中学时代就曾在辩论方面崭露头角。新人昌建则在选拔赛中表现不俗，曾令 3108 教室举座皆惊。这样的一支队伍，无论如何，还算得上是有实力的队伍。就在辩论队集训满一个月的时候，我们要在复旦园里亮相了，这既是一次实战演习，也是对我们一个月训练的检验。对手是学生会组织起来的一支志愿军，好几位都是初登辩台。那天晚上，3108 教室早就坐满了人，那情景令人想起一个月前的盛况：人头攒动，沸沸扬扬。我们上场的四个队员是：我、张谦、蒋昌建、季翔。四个人踌躇满志，服装整齐划一，台上端坐，看上去就像一支训练有素的正规军。而对垒队伍则处处显露出一不规范，相形之下自然像杂牌军。然而，比赛的结果却出人预料，正规军在杂牌军手下败走麦城，台下嘘声四起。直到现在，每每掌声响起来，每每有人为我们喝采，我还会清晰地记起 3108 教室里的距声。季翔也说，那是他辩论几年中从来未曾遇过的情形。比赛结束后，我们去学校宣传部的那幢小楼里总结。当时王海峰老师刚刚出差回来，带给大家山东特产高粱饴，可能谁也没吃出甜味。不过，我一直引以为自豪的是，在辩论队中，失败的时候谁也以为自己是失败者，胜利的时候谁也没以为自己是胜利者。从宣传部出来，我们几个队友呼呼啦啦地相约相引着，一道去了旦苑餐厅，吃了酒酿小圆子和小笼蒸包一类的夜宵。

有了那次 3108 教室遇弱不强的教训，我们在后来的训练当中也就格外地注意强敌与弱敌、优势与劣势的交替模拟、训练。当时

为了给我们训练心理承受能力，王教头不惜用录音机一手炮制了“掌声”和“笑声”。通常在对方偶出妙语或我方“马失前蹄”的时候，为对方的“喝采”或对我方的“嘲笑”使出呼海啸而来。经过这种高强度的训练，再进新加坡广播局的演播厅，已经如入无人之境。在初赛辩“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时，剑桥的一辩汤之敏气宇轩昂，先声夺人，一口气提了十几个问题，连评判钟志邦先生也认为：“正方在开始的时候，第一位队员气势庞大，非常肯定、非常有把握的，好像连珠炮那样自问自答，一直以一些机要的问题要对方来回应，非常有效，非常有说服力。”评判甚至在主席宣布评决结果之前就说，“如果他以及其他三位队友都能够这样持续下去，今晚的情况可能不太相同。”或许是长期经受过“掌声”的考验的缘故，我才能做得到对敌手的掌声置若罔闻。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心理基础，才能够赢得比对方更金、更热烈的掌声。

其实，强与弱，本来就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强与弱的变幻交叠，也是辩论当中的审美创造之一。辩论之所以有趣味、吸引人，也同其他所有竞技性的比赛一样，是有对手、有对抗、有输赢的一项活动。在对峙与相持当中，在强与弱的转化当中，在优势与劣势的交换当中，辩论的张力与美感才得到体现与实现。如果谈一点作为辩手的体会，那么我可以说，在辩论场上，最重要的一点是遇强不弱，最忌讳的一点是遇弱不强。在一个辩论场上，什么样的对手都可能遇到，而一支取胜的队伍必须保证遇到怎样的队伍都保持强大的攻势与旺盛的论辩激情。强和弱，在美党章民义上讲，是一个气势的问题。辩论的美不仅体现在语言的优美、辞章的华丽、逻辑的缜密、思辨的严谨，同时也体现在辩论员气度的从容，气势的磅礴和气魄的宏大。正是滔滔论道、口若悬河的气势，才使得巧舌胜强兵，才呈现出思想与思想交锋、观念与观念撞击的惊心动魄的美。

在两兵相接的辩论场上，一方面要做到遇强不弱。这不仅仅是单纯的心理负荷问题，心理的优势要有实力作为基础和后盾，否则只能是妄自尊大，对于赛事的取胜毫无裨益。没有辩实力与技巧的气势只能是“虚张声势”，结果自然是贻笑大方。记得我们刚到新加坡时，最关心的是对手的情形。初赛的对手剑桥大学队竟由三位博士、一位硕士组成，着实令人不可小觑。后来这场初赛一直被称作“不是决赛的决赛”。但是，我们采取了“我自岿然不动”的心理态势。而这份坚定的自信背后，是教练们的付出、是一百多个日夜的磨炼、是成长过程中全部的积累。另一方面，要摆脱“遇弱不强”。“弱”，好像一个巨大的磁场，要把每一个“强”同化。强队往往会受到弱队温吞水的影响，无论是语速、语调、语气，还是思维与反应的调度，都会受温吞水的浸染，从而发挥不出自己本来的优势。棋逢对手，是一种精彩的境界，但是如果恰恰对方不对己方的路子，这个时候最要抵制的就是随时可能松懈、缓怠下来的诱惑。我们在半决赛中就遇到相似的问题。对手悉尼大学不紧不慢，主动出击也不多，反而使一向以词锋锐利、反应机敏而见长的我方难于展开攻势。场上的感觉，是随时都在提起自己的兴奋，以免跟着对方走。对于英国剑桥大学和台湾大学而言，悉尼大学是我们遇到的较弱的队，但却是唯一的使我们失掉一票的队。

不论对手强弱，都能够有条不紊、从容镇定地打出自己固有的风格，发挥自己本来的优势，这，是辩论当中的一种审美境界。

3. 刚柔相济与虚实相生

刚柔相济是一种风格，虚实相生则是一种技巧。

在一个辩论队当中，通常是有男辩手有女辩手。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本届国际大专辩论会的参赛队伍中，剑桥大学清一色四位男士，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则清一色四位小姐。我对举办当局没有安

排一场剑桥大学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对抗而非常遗憾。男女有别，辩论场上也不例外。男辩手与女辩手在场上发挥的作用、充当的角色都呼不相同。如果说男辩手要更多气势，女辩手则要相对平和；如果说男辩手以幽默见长，女辩手则往往以优取胜；如果说男辩手要晓之以理，女辩手则要动之以情……当然，这些并非原则，男辩手和辩手的配合正是体现这样的美学原则，一张一弛，使得整个队伍有攻有守、有起有伏、错落有致、相得益彰，从而呈现出一种“整体的流动意识”（决赛评委杜维明教授评复旦辩论队语），从而创造出和谐的美的境界。

其实，刚柔相济不仅体现在男辩手和女辩手的关系上，也体现在一个队伍里每位辩手的特点上。辩论是队员朝夕相处、荣辱与共、一个走过一段“同吃一锅饭，同举一杆旗”的日子，每个人的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都那么熟稔：小老头走路鸭子一样的八字脚、小兰那成为队里经典的笑声、季翔会动的眉毛、自耕农谦儿那小师哥的标准做笑……一切都还历历在目，恍如昨日。小兰是个开朗热情的小女孩，也是一个有些任性的小女孩，跟他训练期间共住一室，才知道身为复旦学生会副主席的她，心情也常常“像雾、像雨、又像风”，一个又一个夜晚，同为女孩的我们，彼此细诉着女孩子的心事、女孩子的秘密、女孩子的烦恼、女孩子的爱与愁。不仅我喜欢小兰，全队上下也都喜欢这个最小的女孩，小兰的歌声，常常使和“辨认队的天，是晴朗的天”。张谦则是我们辩论队的一位“功臣”，在训练中，他攻的凌厉、守的严密，常常令我们感到难以对付，不得不绞尽脑汁，以求出奇制胜。张谦是我认识的最为机敏、聪明、幽默的辩手。然而，他也是队里最难缠的一只小刺猬。我当时训练的最初动力，就是如何练就一张铁嘴，至少跟这只小刺猬。我当时训练的最初动力，就是如何练就一张铁嘴，至少跟这只小刺猬打个平手，免得尽受刺猬的刺。至于同赴新加坡的三位队友，也是各具

个性、风格迥异。新加坡报界的评语一经渲染，似乎已成为每个人头上的标签：“记(季)理论”的严肃理性与冷静缜密、“加(嘉)事实”的活泼幽默与机智伶俐、“唱(昌)价值”的风度翩翩与词锋锐利，都成为经典辩手的范本。而、“讲(姜)逻辑”也在混水摸鱼当中捞到一块不温不火“雅典大方的标签。四块牌子并举，追求的也无非就是“刚柔相济”。

刚柔相济不仅体现在辩手的个性组合上，甚至也体现在教练与顾问的风格搭配上。我们的教练俞吾金教授，和顾问王沪宁教授，都是年轻的博士生导师，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内造诣颇深。这两位各具魅力、风格迥异的大家默契配合，从而培养和造就了一支刚柔相济的辩论队。

具备了刚柔相济的风格，在实战中还要讲求虚实相生的论辩技巧。避实就虚和避虚就实一样重要。为了提供尽量大的论证与辩驳的空间，每个辩题都人双方同时留下漏洞，每一方都有自身致命的逻辑弱点，这是需要全队齐心协力、小心保护的阿喀琉斯之踵。当对方的长矛直指己方的要害而来又无法招架时，只有虚晃一招，才能化险为夷、转败为胜。初赛当中辩“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时，剑桥的四辩季麟扬一开头就提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颜回一簞食、一瓢饮，固然是圣人。请问，在座的四位有哪个人做得到？在各位的复旦大学里面有多少人做得到？如果只有少数人做得到，这样能算是这样的道德在社会上得到推行了吗？第二个问题，我们李光耀总统当初在推行道德建设的时候，是不是也同样发展了经济建设，不然哪会有今天丰衣足食的新加坡社会。请不要回避这个问题。第三个问题，请教对方二辩，您引《礼记·礼运篇》上而‘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请问‘皆有所养’是温饱还是道德？”平心而论，这三个问题确实是抓住了我方逻辑要害，同时也有有力地维护了正方立场。要知道，参赛的队伍毕竟都是有备而来，这

那个时候如果硬碰硬地迎住这些问题，无异于是以卵击石，自投罗网。我方四辩蒋昌建则是以幽默轻松化解了这张网，这既给己方赢得了掌声与笑声，又使对方陷于尴尬的窘境，场上气氛顿时倾向我们。正是这样避实就虚的做法，才收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应。当然，避实就虚仅是一种场上策略。如果在整场辩论过程当中，一味地避实就虚、一味地回避对方的提问也是极不可取的做法。有交锋，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论争与辩驳，否则，只是两条互不搭界的平行线，那可真是“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了。不破不立，没有对于对方立论的精当分析和实质性打击，己方的立论也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论证和有利的维护。而且，一味退缩，在场上的观感也相当不好，给评委和观众的印象是不敢接迎对方的诘问，自然就是在强攻之下节节败退的形象，无论如何，这不是赢家的形象。因此，当时在场上的时候，昌建在化解了对方的质问之后，马上把兵器从质换成矛，直指对方的逻辑困境，针锋相对，以牙还牙，据理力争，这样全场的辩论才可能赢得最终的掌声。

虚实相生，犹如中国古典哲学所讲的有无相生，是美的创造、美的感悟、美的升华与超越。

三、千江有水千江月：辩论的判别、欣赏与接受

有一则土耳其童话故事，讲的是巫婆守护着一面魔窗，过路的人只要交一块番薯干或一块奶酪，就可以透过魔窗看一看，白发苍苍的老人看到的是年轻的小伙子，年轻的小伙子看到的是美丽的姑娘，美丽的姑娘看到的则是华丽的新嫁妆……实际上，魔窗里只是一个空空如也的小屋。

姑且不论这则优美的童话的寓意到底何在，如果我们从接受

美学的角度来诠释这个故事,那么本文(小屋)只是一个尚未实现、尚未完成的客体存在,而接受主体则被赋予了崇高的意义和价值。在不同的接受主体那里,本文会呈现不同的价值,也就是所谓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当我们从接受的角度去看待辩论,将它视为一个等待评判与赏鉴的本文,辩论就如同巫婆魔窗背后的小屋,我们很难为评判与赏鉴辩论而找到一个真正客观的标准。一场辩论给观众以震撼并令人久久难以忘怀,我们很难说清楚打动观众的到底是优美的陈辞、滔滔的雄辩,还是机智的应对、幽默的谈吐,抑或是辩手的风度与气质。

从某种意义上说,欣赏与判别辩论比辩论本身还要难。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辩论是玄而又玄的东西,根本无从把握。毕竟,关于辩论的欣赏与判别还是存在着基本的共识,这大体上可划分为语言艺术、逻辑思辨和风度气质三个方面。

1. 从语言艺术方面看

辩论毕竟是以有声语言作为载体的一种活动,它反映的首先是辩论员对于语言的驾驭与运用,而辩论的魅力在某种意义上讲体现的也是语言的魅力。这不单纯是指发音的字正腔圆、音质优美、语调错落(当然,这些因素毫无疑问是构成语言美的一个方面,昌建之所以有魅力的一个原因便在于他那淳厚的男中音罢),更重要的是语言所体现的优美与智慧,所传达的深厚的文化底蕴。好的辩论语言应该是雅俗共赏的、是文野相映的、是正奇互补的。辩论是说理,是维护己方立场,是批驳对方观点,但我们不能忘记,在游戏意义上的辩论还是一种有表演性质的展示,它追求的是美。新加坡广播局自1986年起承办大专辩论会,并不断扩大辩论会的规模、范围 and 影响,直至把它从亚洲扩展到国际。同时,他们在新加坡国出售也每年举办大、中学生的辩论会,其初衷之一就是为体现

化语的优美和魅力,促进华语的推广和运用,让人们认识到,华语不仅可以用于日常的交际与交流,还可以用来谈政治、谈文化、谈学术。而我们在本届国际大专辩论上获得一致好评,基保的一个方面,就在于我们对于华语的驾驭博得了从观众到评委的一致首肯。钟志邦先生曾代表评判团称赞我们复旦队“引经据典,上下古今,妙语如珠,出口成章”,这些体现的正是语言艺术的魅力与高妙。

首先,辩论的语言要相当严密,力求做到简洁明了,言简意赅。如果说话罗哩罗索,辞不达意,不仅丧失和损害了语言本身的美感,而且从战术上讲,也拖延和浪费了时间。辩论赛上的辩论是有时间限制的,双方都要力争在有限的时间之内,传达尽可能多的信息,时间双方一样,谁传达的信息更多、提供的论据更多、进行的论证更充分,谁就更可能取胜。相反,如果一方时间先到,不得不停止发言,而由另一方滔滔陈述或轮番轰炸,无异于是出席一场缺席审判,这时候纵然有无数有力的道理可讲,却也不再具有申辩和反驳的机会。另外,辩论由于采取交替发言的形式,听众总是在记忆的同时遗忘。因此,当然是对后面的发言印象更为深刻,这种意义上讲,就同样时间的的话,后说比先说更具有价值,更能够发挥功效。教练就曾一再告诫我们:在双方时间持平或所余时间少于对方的情况下,节约时间比说一句精彩的话更为重要。在与悉尼大学的半决赛时,似乎对手也注意到了这个战术。二辩陈慧反应敏捷,词锋机智,短句频出,与我们自由辩论时间相差无几。越是到了这样的时刻,语言的简洁明了就显得越为重要。

其次,辩论的语言还应该优美典雅,体现一定的文化底蕴。当然,这是对语言更高层次的要求,也是更直接地体现了辩论的审美价值。辩辞的优美是在字里行间,而非刻意的雕琢与粉饰。无论是诗词妙语还是名人名言,都是出于维护辩题设定立场本身的需要,而不是以生硬的镶嵌来“美化”辩辞,那样的结果只能是以辞害

意。中国古典文论当中所讲的“文胜质则野，质胜文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很好地揭示了作诗吟赋中“文”和“质”的关系，对辩论的语言运用也不无启示和裨益。在辩论当中，引经据典、广征博引能够为论点提供鲜明生动、富有说服力的论据，同时，也美化了语言，使辩论更呈色彩、更具张力、也更加华美、更加典雅。季翔在辩论当中负责理论阐发，同时还担当着场上 keeper 的角色。本来枯燥乏味的理论阐述，在我方二辩的口 却妙趣横生，他讲南非的布希曼人、讲马来西亚的“莫莫啞啞”（一种食品，新加坡广播局在互换礼物后的冷餐会上曾用来招待各队代表，并专门就此发表过一番高论，当时引得席间笑声不绝）、讲澳大利亚携带艾滋病病毒的猫、讲《天龙信部》里的四大恶人，让听众目不暇接，又忍俊不禁。相同的内容，不同的语言表述，收到的效果确实截然不同。四辩蒋昌建则以另一种方式体现语言的优美与典雅。初赛的总结陈辞，昌建引用康德的那一句名言——“这个世界唯有两样东西能让我们的心灵感到深深的感撼，一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曾深深震撼了多少人的心。

再次，辩论的语言艺术还休在语言所蕴含和包纳的幽默、机智与意趣。幽默是一种较高的言语境界，及至 17 世纪末，才有人在近代美学意义上运用“幽默”这一概念。1682 年版的《牛津英语词典》将“幽默”解释为“行为、谈吐、文章中足以使人逗乐、发笑或消遣的特点；欣赏和表达这些特点的能力”。这里它已指称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指审美主体的能力（欣赏的能力和表达的能力）；二是指作为审美客体的现象，当然这现象与其他现象有所不同，它必须是人的行为表现，具体地说，辩论中的幽默是一种语言行为，主要诉诸听觉。列宁把幽默说成“是一种优美的健康的品质”。^①幽默在美

^① 高尔基：《列宁》第 26 页；转引自扬辛《喜剧的特征》，《美学与美学史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学上确实具有极高的价值,其深层的话语结构是基于心理期望的突然落空所产生的岔断——倒置,以及经验与现实的矛盾冲突所产生的转移——干涉。辩论当中的幽默同样蕴含着这一机制,它体现和凝聚人高度的智慧和极高的审美内涵。在论辩的实战经历中,深深地感到幽默是赢得场上效果的最佳途径。而场上效果对评决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观众不参加评决,但评委不可能对观众的掌声听而不闻,同时场上气氛对辩手的心理影响也不容忽视。场上赢得掌声和笑声最多之处,往往就是“幽默眼”。严嘉在论温饱与道德的关系时,巧妙地把先温饱才能谈道德的逻辑归纳为“肠胃决定论”,把裴多斐的《自由与爱情》诗按对方逻辑改成“爱情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若为温饱故,二者皆可抛”;在辩艾滋病是医学问题还是社会问题时,严嘉又巧妙地运用诗词,说:“在非洲很多地方,艾滋病已经导致了‘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还要让医学这个‘孤舟蓑笠翁’来‘独钓寒江雪’吗?”这些体现了幽默、机智与旨趣的语言都收到了很好的场上效果。也正是有了这些既让人忍俊不禁,同时又耐人寻味的妙语,整场辩论才异彩纷呈,高潮叠起。

2. 从逻辑思辨方面看

辩论的生命在于逻辑。对于一场辩论的欣赏,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所谓的门道,也就是辩论双方在立场设定之后,理论的建构、事实的认证以及价值的取向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以逻辑的认识为基础并在逻辑的构架之内完成的,无论是语言的表达还是情感的投入,无论是事前的准备还是临场的发挥,都必须以逻辑线索作为依据和依托。因此,每当一个辩题下来,在逻辑层面上充分讨论并达成一致的认识都极为重要,这样才能够保障每一个辩手都不游离开底线,否则的话,出现自相矛盾被对方抓住,就会造成难

以收拾的局面。整体的默契配合最基本的一点就在于对辩题有着一致的逻辑认识，这是“攻守同盟”的坚实基础。

逻辑思辩能力是一个辩手的基本素质。也是评委打分的一个基本依据。

我的队友们都按长期承担的角色分工叫我“讲(姜)逻辑”，其实我对这个角色安排曾心怀嫌怨，认为这是个吃力不讨好的角色。后来才知道，在一场辩论当中，启承转合的完美组合才能完成对一个论题的完美维护，而逻辑的开启恰恰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辩论中的逻辑思辩要清楚、明晰、谨严、缜密并保持一以贯之，整场辩论的展开——无论是理论的阐发、还是事实的推衍——都要紧密地围绕着逻辑底线，才能做到散而不乱，错落有致，好似“大珠小珠落玉盘”。

辩论当中的逻辑思辩最高境界就在于形散而神聚。因为辩论是游戏，是展示，具有表演性质和欣赏价值，因而它不是抽象的逻辑推演，不是乏味的学术论证，而是要求有声有色、有血有肉；另一个方面，辩论是有中心宗旨的行为，是以逻辑作为贯穿的活动，因此不能离题万里，信马由缰，这两方面结合起来的最佳境界，也就是形散与神聚。辩论当中，从古到今，从中到西，从数据到事实，从理论到坐标从名人轶事到街头见闻，无不拿来为辩题服务，只要他们能统一到一致的逻辑底线之内。辩论切忌死板，空洞说教、抽象证明的辩论是没有审美价值的辩论，毫无生气，更无魅力可言，辩论要广征博引，方能显出书生本色。辩论员不能被辩题框住手脚，而是要大胆培养、追求、运用求异型思维和发散性思维，以收到“江上有奇峰”的效果。说到温饱与道德，我们会想到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埃塞俄比亚，想到国困民乏、战火连绵的索马里，还会想到一箪食、一瓢饮的颜回、想到茅屋为秋风所破的杜甫，论证从率弟子“在陈绝糖”的孔子到二次大战时期在法西斯空袭下的英国

民众，从物欲横流的古巴比伦王国到当代日本的政坛丑闻，从欧阳修、笛卡尔和范仲淹这些仁人志士、再到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甚至连《汉谟拉比法典》到《大清律例》，从宋《刑统》到《权利法案》这样的法律典籍都被囊括在内。上下古今，不拘一格，这是发散思维的功效，同时它们又全部由一致的逻辑底线统领着，也就是：温饱不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有理性的人类存在才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只要有理性的人类存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谈道德，走向温饱的过程当中尤其应该谈道德。以上那些看似分散零乱、天马行空的材料，实际上都是由这一灵魂统率的。

如果说在论证温饱与道德关系这一较为具体的命题时，我们需要不断发挥求异型思维，以突破辩题给人的束缚，尽量求得对辩题的超越和驾驭，那么，在决赛论证人性善恶这一较为抽象论题时，我们则更多地要抵制古今中外的无限诱惑，时时回到底线上来。关于人性善恶，这是一个千古命题，争论不休，尚无定论，太多的人发表过太多的关于人性的高见，这一论题的高妙之处民就在于给双方辩手留下了最大的自由驰骋的空间。在可以援引、可以旁证的材料越是丰富的时候，辩手也越是容易迷失方向。在论辩难解难分的时候，辩手有时会情不自禁、身不由己地耽于精彩的事例或华美的妙语当中，而不知不觉地远离了底线，远离了辩题，这样做的结果，无是捡了芝麻却丢了西瓜。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忍狠割爱，大刀阔斧，舍弃过于繁杂琐碎的材料，而抓住主干，咬紧不放，一追到底。决赛辩人性时，我们便有意识地注意了发散与敛聚的关系。我们自始至终，抓住对方逻辑上的“阿喀琉斯之踵”。在抓住对方的要害之后，我们便乘胜追击，不断扩大战果。纵然关于人性善恶，我们做过充分准备，有好多精僻的格言警句、好多生动有趣的故事、好多幽默诙谐的譬喻，我们也都割爱，暂将它们弃置一旁，围绕核心问题连续发问，“善花如何结出恶果”

这一问题，贯穿了整场自由辩论，季翔问了第一次，严问了第二次，紧接着昌建又问了第三次，季翔不诊不饶地问了第四次，昌建再不无调侃地问了第五次，以至于场下观众席间笑声、掌声四起。这样从发散的材料回归到集中地核心问题，连续发问，不仅紧密地扣住辩题核心立论，而且造成一种排山倒海的气势，给对方赞成了强大的心理压力，同时这种明确、强大、凌厉的攻势也给观众和评委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使我们全队呈现一种“流动的整体意识”。当然，在就核量进行连珠炮打击对手的同时，我们也贯穿了丰富翔实、多姿多彩的其他材料，从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到孟子的“形色，无性也”，从孔子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到荀子的“注错习之所积耳”，儒家经典语录自是烂熟胸中，信手拈来；另一方面，从《联合早报》、报道的台独千面迷魂到佛祖释迦牟尼，也都容纳进我们的逻辑框架之内，这样，整场辩论才不会机械呆板，枯燥乏味。从抓住核心、连续发问到博采众说、引经据典，这种形散而神聚，与其说是语言的胜利还不如说是逻辑的胜利，体现的与其说是语言的魅力，还不如说是逻辑的魅力，与其说是语言的美，还不如说是逻辑的美。

3. 从风度气质方面看

一个好的辩论员必须要有好的气质与风度。气质与风度，毫无疑问是辩论审美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评委为辩手打分的重要依据，观众衡量辩手的重要尺度。风度和气质，是一个人的知识、修养、情趣的外化，从根本上说体现的是一个人的内在素质。如我们前面一再说过的，辩论具有一定的表演性质和欣赏价值，而辩论之美正是辩手才华与感情、知识与智慧、风度与气质的综合体现。

记得临出国前，我们集体去南京路逛街。我对于男士的西装

毫无兴趣，而尽在彩衣花布间流连，在红妆粉黛前驻足。在华侨商店里，他们忙于试西装，我则趁机独自溜到女装柜台，看中一条黑色的真丝宽松长裤。待我穿了新衣得意洋洋地找到队友，不禁大吃一惊，真是“士别一会”，就要“刮目相看”了。三们队友装在1000多元一套的名牌西装里，季翔再没了昔日的顽皮而显得成熟，严嘉再没了闰常的活泼而显得端庄，昌建则没了素日的嬉皮而显得稳重。本来我一直嫌藏青颜色太过老成凝重而不喜欢，在看到他们三位并排走来的一瞬间，便也就和大家统一了思想。第二个星期天，在俞总的带领下，去锦江饭店定制了一套同样面料的女装。说到出国前添置服装，也真是件让人煞费苦心的事。平日不买衬衫的时候，衬衫满街满眼都是；等到要买的时候，却整条南京路逛下来，找不到一件满意的。为了我的衣服、我的皮草也着实拖累了我的队友们。心下暗想，权且作为他们陪女士逛街的超前训练罢。后来，还是雷厉风行的王教头陪我再次上街，用先集中后民主的办法，才算将衣物悉数采购齐全，满载而归。

穿衣戴帽，看似生活小节，其实对一个辩手来说也不可忽视。《国语·周语》说：“观其容而知其心矣。”《管子·形势》解说：“衣冠不正，则宾客不肃。”《孟子·先子》则说：“有诸内必形于外。”当然衣着修饰不是一个人风度、气质的决定因素，徒有其表而无内在的学识涵养，只能是“金玉其外”罢了。

场上风度和气质的体现是多方面的。首先，一个辩手应该从以辩会友、交流思想的初衷出发，才能态度平和、诚恳，而非盛气凌人。在论辩当中，一定要尊重对方人格。尊重、平等和宽容，是辩论场上的美德，也是美的风度和气质的表现。其次，辩手无论在自己陈述观点时，还是在批驳对方时，无论是在听自己队友的发言，还是在听对方辩友发言，都应该保持稳重、从容、端庄、大方，切忌浮躁、措辞激烈、言语刻薄，否则不但对论述和批驳毫无裨益，则且会

使自己大失君子风范。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非易事,因为辩论是一个有对手、有对抗、有输赢的活动,场上刀光剑影,短兵相接,很容易导致情绪的兴奋和激动,尤其在取胜心切的情绪下,更是难以保持冷静的头脑和儒雅的气度,就连颇具实力的台湾大学,在决赛当中也“情绪有点激动”(评委语)。在这方面,悉尼大学可谓是处变不惊,从容镇定,受到评委的赞扬,也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在参加、观看了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的七场比赛,在风度风范、气制裁气势、言谈举止方面给我留下最好的观感印象的一位辩手,是剑桥大学的四辩季麟扬。他是学习社区医学的三年级博士生,从台兹去英国,有一次朋友在酒吧小聚,我还曾向坐在身边的他请教过一个“社区医学”的问题。台上的季麟扬从容儒雅,娓娓道来,台下的季麟气扬也温文尔雅、文质彬彬。回国后看录像,看到赛场上身着燕尾服的季麟扬侃侃而谈,还由衷地感到风度之美,气质之美。

四、我们和我们追逐的梦： 狮城舌战之后……

不知是传媒的威力,还是辩论一身的魅力,一夕之间似乎我们都成了“名人”。

从新加坡回上海的当晚,我没有住在宿舍。因为我们乘的是最后一班班机,飞抵虹桥机场已是深夜时分,经过一个简短的欢迎仪式,再乘车回复旦,早已过了女生楼的关门时间。

醒来时已不是早晨,而是临近中午12点。因为12点之前要结帐,服务小姐才打电话到房间叫醒我。窗帘低垂,白昼里让我感到依然在静夜。第一个冲动是要同什么人讲讲话,我抓起话筒,却想不起一个电话号码。只能在朦胧想象中,想起队友们如何打着哈

欠、伸着懒腰，极不情愿起床，或许睁睁眼，又从一个梦堕入另一个梦。确实，训练以至后来比赛期间，大家的夙愿就是懒觉要睡个足。

又走在南区门外极为熟悉的那条政肃路上。不曾好好洗漱，就往宿舍走，想留住那一点睡意。8月底的上海的正午，依然骄阳似火，我没有撑伞，感受着上海的阳光和新加坡的阳光有什么不同。

辩论结束了。然而，辩论似乎还拖着一个长长的尾巴。我们去大学、去中学、去工厂、去宾馆，面对一个又一个讲台；我们去赴那些热情友善的宴请，觥筹交错之间，私下回味新加坡赞助商宴请的那道元鱼汤的美味；我们去叫台、电视台作嘉宾，讲述那些或称作故事或称作感受的东西；会收到热诚的信，会收到美丽的卡片……所有这一切，都提示着刚刚逝去的那场狮城舌战并未走远。在上海电台偶遇《青年报》记者姚明强先生，听说上海的女中学生当中出现了新的“追星热”：——崇拜国际大说论会最佳辩手蒋昌建，昌建词锋锐利，风度翩翩，又是博士，满腹经纶，也难怪会成为少年偶像。

辩论使我们结识了那么多的新朋友。当我10月中旬沿长江顺流而下回到上海，回到南区的窄舍，我的小床上堆积了那么多来自五湖四海、异地他乡的信，甚至还有海外飞鸿。一个叫刘若欣的新加坡女孩，刚刚18岁，在通信中跟我成了好朋友，后来她随旅游团到上海，虽然她在国内时同我几经联系，最终还是擦肩而过。好的来信都叠成玲珑可掬小帆船，或贴上一个精致小巧的饰物，这份美丽会和这份温情一道，成为今生的财富。

《狮城舌战》一书出版之后，我们曾应邀在上海、苏州、无锡、镇江、常州、哈尔滨等地签名售书。元旦期间我和昌建去南京那一次令人难忘。临行前，上海的天气好象冬天里的小阳春，一直穿着薄呢裙，没想到，抵达南京的当晚却风云突变。昌建因为忙于论文答

辩的最后准备工作而未能与我同车赴宁，总算事先得到了降温的消息。穿着单薄的我在南京却着实吃了苦头。没想到的是，在那样寒冷的天气里，南京人还是上午9点之前就在新街口新华书店门前排起了长龙。签名持续了整整一上午。中途我和昌建不得不去稍事休息一下，返回书店门前，秩序依然井然有序，没人离去，没有人抱怨。一位读者看我的手在冷风中冻得僵硬，就穿过人群递给我一付新买的手套，书店的职工则给我送来了热水袋。下午在山西路门市部签售，盛况依旧，只可惜昌建为了赶回上海准备论文答辩，不得不留下热诚的读者先走一步。而我则在山西路遇到和我同是本命年的董伟，我们还互赠了画满了千姿百态的小狗的贺年卡。在南京结识的另一位朋友是当地著名的节目主持人黄凡。我们和黄凡一同度过了辞旧迎新的时刻。我们彼此没有言语的祝福，我们唱了一夜的歌。他们费尽苦心要教我练会一支歌，我却依然没有长进，只好自暴自弃，最后听昌建、黄凡还有一位姓钱的歌手唱摇滚。我们从1993唱到了1994。凌晨时分，三个人并排走在古城的大马路，走小巷深处寻一碗热砂锅。然而，直到临行前，我都没有机会如约将一张名片当面送给黄凡，只能在上火车之前匆匆打个电话向他道别。在南京只逗留两天，31日分别在交能台、新闻台和经济台做了三档节目，元旦则一整天都在签名。然而，即使在来去匆匆之中，还是有太多太多的回忆。

辩论的故事太多了无论赛前训练期间，还是从狮城回到上海以后，不管走在哪里，知情的人总会把我们当作新加坡辩论会的辩手看，甚至和朋友们在北京逛书城，也有人轻拍一下我的肩：“嗨，一辩！”

不知要远离什么，还是要追逐什么，从新加坡回来不久，我就匆匆地踏上了西游的旅途，在辩论的美之外，将身心浸润到另一种美和辉煌之中。从上海出发，洛阳、西安、敦煌、乌鲁木齐、成都、重

庆……途经一个又一个文化古都，好像走在一条漫长古老的路上，走过一座又一座寺庙，晨钟暮鼓、香烟袅袅之中，仰望佛的宽容、平和与慈悲，在“欲辩已忘言”的情境里，早将个把月前的唇枪舌剑弃之九霄云外。我们在鸣沙山的沙漠里骑骆驼，看沙丘上那一抹落日残霞；我们在天山上骑马，遥想太古之时西王母和周文王瑶池边的幸会；我们在哈萨克人的蒙古包里喝奶茶，听哈萨克老大妈讲博尔古斯峰巅的雪莲；我们登上峨眉山的金钗去看日出，却被一场大雨淋湿了所有的梦……站在尘嚣之外，感受那种空灵、那种宁静、那种感动。

我们两个女孩，背着简单的行囊，走着西行的路。我们没有如行前之约，每到一站给季翔拍电报，（他们笑说发现我失踪后好赶快登寻人启事，还叮嘱我若被“拐骗”之后，赶紧声明上海有人肯出高价“买”我。）我们一路上撕掉了所有朋友的介绍、引荐信，甚至行万里路也未带回一件旅游纪念品。

似乎人会莫名其妙地隐入到一种渴望之中，弃置曾有的一切，如同那种想挽留曾有的一切的渴望。

星鸟和星岛的梦都远去了。而生活了四个月的文科大楼依然在复旦图书馆的对面安然矗立。夜晚时分，走过冬夜寒风中的小路，不再能仰望到十楼的灯光。

儒雅宽厚、平和待人的俞总又回到了他的书斋。偶然一次去凉城新村看俞臻，轻轻推门，俞总的小书房里灯光宁静，四壁是无言的书，空气里荡漾着莫扎特的音乐。俞臻的妈妈笑容温馨，端来水果热茶。我要俞臻在送我的一张照片上写句话，12岁的俞臻写道：我不孤独了。这句话曾在我的队里广为流传，作为这位哲学教授女儿的名言。

林副教头去了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学作为期半年的研究工作。那天我拨好闹钟，起了个大早（对我来说的“大早”），和昌建去送林

教师，发现王教头早已站在国权路的路边。我们没有去机场送行，不好意思去看副教头和娇妻“执手相看泪眼”的那动人一幕。

张老师才卸了复旦辩论队领导小组组长的大任，又担起筹划21世纪学会的负责人。和善、慈爱也不失严格的张老师总是担当“领导”，而担当“领导”的张老师却也不失童心的天性，爬香山的时候，张老师不会落在队里那两只年轻力壮的黑猫白猫后面，张老师唱阿庆嫂的噪音让人不难联想起她学生时代的活跃。

最难找到的是大名鼎鼎的王教头。这位训练期间就常常“神出鬼没”的顾问在辩论“功德圆满”之后，更加难觅踪影，或许是在做什么更加意义重大、非同寻常的顾问吧。偶尔在政修路的小面馆里相遇，只见他穿着灯芯绒的宽松裤，满面春风，风采依旧。想问一句，做“武警总队大队长”时的大棒，是否已好好收藏起来？

从新加坡辩论回来，正逢学校里新学期开学。经过一个暑假，我们都升了一级，以至于队里的“南北”力量对此发生了变化（复旦研究生宿舍在南区，本科生宿舍在北区）。严嘉结束了四年的本科学业，入主南区，成为南区新人。昌建、摇身一变，从硕士晋升为博士。三个人共处一间斗室的我，每每拜访在博士楼里养尊处优的昌建，都艳羡不已。小兰和张谦继续学习，季翔则已定要直升研究生。

筵席散了，人情更浓。当我发掘着辩论之美的时候，最深的感悟还在于：辩论原本是一种对抗和竞争，它却使人结成真诚亲密的朋友，或许，这是辩论最动人的美。

辩论是美的。我也知道，辩论的美是恒久的，而我成为一个辩手却是偶然的。这是我青春岁月里美丽难忘的一页，这也是很快就会翻过去的一页。在六位队友当中，我将最早收拾起行囊，离开复旦。读了17年的书，我终于要走出象牙塔，学以致用去了。接下来的日子，上班、下班，买菜、烧饭。我会在庸常的生活里，

望一望平平常常的蓝天，数一数平平常常的星星，看天边云卷云舒，庭前花开花落……这样，我很满足，也很快乐。

我们年轻，便有无数的愿望；

我们年轻，便有无数的可能。

于是，我们带着我们年轻的梦想，迎候下一个平淡或辉煌。

辩论生态分析

——辩论行为和辩论环境的相互关系

蒋昌建

一件事不会因为被说得天花乱联合会就是真的，也不会因为被说得语无伦次就是假的。但……话又说回来，一件事并不因为被说得语病百出就一定是真的，被说得词藻华丽就一定就是假的。这就像睿智与愚钝同有对健康的食物与不利健康的食物：两种食物均可见于盛宴和便餐之中；如是，则平淡的词语与华丽的词藻也同样可以用以装饰睿智的或愚钝。

——奥古斯丁：《忏悔录》

用生态学的方法分析辩论，简单地说，就是认为辩论与辩论的情景和环境之间存在着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关系。个人观点、辩题、立场、观众、评判、主办单位的意旨等作为辩论系统的各个因素，彼此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构成辩论的生态关系。

辩论会由主办当局、辩论题目、辩论单位、场上主席、评判团体、辩论观众、传播媒体等构成。主办当局是辩论会是否举办的决定因素，辩论题目的设计是辩论会成功的关键因素，参与辩论会的辩论单位的层次决定辩论会的级别高低，场上主席则是辩论会的规则得以贯彻的保证因素，评判团体执掌决定谁胜谁负的大权，传播媒体决定着辩论会的影响面与辩论会的社会意义。

辩论系统由非辩论环境和辩论群落组成。非辩论环境，指的是

形成辩论但本身不具辩论性质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例如,语言是辩论的基础,不使用语言就无所谓辩论,而语言本身不具辩论性,它成辩论的一咱非辩论环境。再如,“在辩者不善,善者不辩”的社会精神氛围中,辩论就不会有生命力,辩论会就无从谈起。辩论群落,指的是主办当局、辩论单位、观众、评判团体。主办当局是组织者,辩论单位是直接参与者,观众是间接参与者,评判团体是裁决者。

辩论生态分析具有三个方面的特质:1. 构成辩论生态的各个因素具有功能依存关系。例如,辩题的普遍性和非歧视性,使得辩论会有意义。辩论肝人意义,受邀的辩论单位才有参与的积极性。辩论单位的积极准备使辩论走向深入,辣题的深度挖掘,又激励新的辩题形式的产生。2. 构成辩论生态的各个因素之间具有动态平衡关系。例如,辩论单位从辩论情景和环境获取物质和能量,转换的物质和能量通过辩论行为作用于辩论情景和环境。辩论生态的各个因素在产织着的各种投入和产出中结成动态平衡关系。这一动态平稀关系形成辩论系统的良性循环。同时,辩论系统的良性循环还需依靠反馈的作用。辩论单位须根据由自身的辩论行为刺激辩论情景和环境的新需求来调整自身的立论、逻辑和技巧,也就是求得辩论摧部的发展,以适应这一需求。3. 辩论生太分析涉及多个学科。生态分析本身离不开生物学、物理学和化学的方法和资料,辩论生态分析除了需借助生态学的方法之外,还涉及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伦理学等学科。

辩论生态分析总体上不外乎涉及两个层面:分析辩论所在地的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特点及其对辩论单位的潜在要求,以及主办当局的意旨和期望达到的社会效果;分析辩论个人、辩论单位集体、观众、评判团体等的精神气质、知识结构、观点偏好和心理机制及其对辩论形式的影响。

以下主要选择四个角度展开对辩论的生态分析。

一、从真理到游戏：用理趣去在乎输赢结果

从以往的辩论会的辩题看，没有一个辩题是为诡辩设计的。辩论会的辩题或直接就是真理性的命题、或可用真更改一的观点和原理来推导。在一定意义上，辩论会上的辩论过程以说是对真理的探讨过程。因为围绕如月亮是三角形的这一命题展开辩论，除了单纯训练辩论技巧之外，没有其他任何意义。

卫星电视的普及令某些国家引以为自膏，同时，也令某些国家头痛不已。在一些国家，政府、议会、法庭和民间为此争论不休，至今尚无定论。卫星电视的普及究竟是有利还有有弊、是利大还是弊大，任何一项结论都会决出某一特定的国家政策：支持卫星电视的普及、控制卫星电视的普及、或是禁止卫星电视的普及。支持卫星电视普及的一方认为，将信息控制权归还给社会是进步时代的要求，控制和禁止卫星电视的普及，实际是垄断信息资源和实行信息专政；控制卫星电视普及的一方认为，卫星电视普及与否，依赖于政治共同体内社会处理信息的能力，部分社会精英能够较为理智地分析和接受信息，卫星电视可以有控制地向他们普及，信息的开放不能不考虑受体的状况；禁止卫星电视普及的一方认为，卫星电视传播的信息将大大冲击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文化的入侵直接威胁社会稳定的维系基础和淳朴敦厚的民风。可见，各方所持的理据都有一定的道理，卫星电视的普及利弊之辩，决非是在无意义的诡辩一气，而是涉及到某项真理性判断的辩论。

1993年在新加坡举行的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初赛的辩题之一，就是：正方，卫星电视的普及利大于弊；反方，卫星电视的普及弊大于利。该辩题也曾为复旦大学辩论队的训练辩题。综合起来，

此处取其中的四个回合：

正方：如果卫星电视的普及不是利在于弊的话，对方辩友如何解释有那么多卫星电视波道，且有更多的卫星电视波道正在开通？

反方：多的就一定是有利的吗？我们不是经常遭遇到衣服颜色太多，让我们挑花了眼，结果无所适从的事情吗？东西多有利还是少有利，关键在于你的消化能力。

正方：卫星电视的普及，促使更多的卫星电视波道的开通，更多的卫星电视节目才有播出的可能。对方辩友难道不认为，丰富多彩的精神食糖对人类的发展有裨吗？

反方：不可否认，商业利益推动了卫星电视的普及。就让我们看看是怎样的一个丰富多彩，恐怖片、暴力片和色情片丰富多彩地充斥着各个波道。难道像玛丹娜那样，歌唱得越来越多，衣服却穿得越来越少的精神食糖是有利的吗？

正方：把眼光只对准阴暗，难免得出世界一片黑暗的结论。对方辩友难道真的没有看到众多的卫星电视波道中，教育波道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丰富多彩的教育节目对少年儿童的成长到底是利是弊？

反方：教育从来就不是抽象的，教育只能在一定的历史、文化的背景中展开。卫星电视的普及，为将某种价值观强加给异己文化背景不成熟的少年儿童提供了便利。再说，长时间看电视对少年儿童的视力伊朗不利。

从这四个回合来看，关于卫星电视的普及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的辩论，双方都投入极大的激情和理性为某一个论断的真

理性辩论。其中，不乏辩论的技巧运用，但整场辩论并没有流于诡辩。

接下来举一个纯粹为了训练辩论技巧的辩题和同学辩论中的几个回合。

辩题：癞蛤蟆能吃天鹅肉

（注：即兴辩论，不得事先准备，不得引申开）

正方：天鹅固然飞得很高，癞蛤蟆无法接近。但天鹅也有歇脚的时候，癞蛤蟆并非如对方所言，其对天鹅无机可乘。

反方：请允许纠正对方，天鹅歇的是翅膀，不是脚。能够亲近，就一定能吃吗？再说，癞蛤蟆那么小的嘴能吃那么大的天鹅吗？

正方：蛇不是能吃那么大的海鸟吗？

反方：癞蛤蟆是蛇吗？按对方的逻辑，一只蚂蚁也能吃掉一头大象喽？再者，蛇那不是吃，是吞。

正方：对方学富五车，不会不知道蚂蚁啃骨头的意思吧。我们倒要请教对方，吃和吞有何区别？

反方：难道您吃药不是吞下去的吗？

正方：对方将吃等于吞，那中国人见面时的招呼语：您吃过了吗？不是要改为：您吞过了吗？

反方：让我们回到辩题上来，就算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天鹅不可能束手就擒。

正方：活的天鹅癞蛤蟆吃不到，并不意味着死的天鹅癞蛤蟆吃不到；聪明伶俐的一鹅癞蛤蟆吃不到，并不意味着呆若木鸡的天鹅癞蛤蟆吃不到。

反方：对方的癞蛤蟆能吃天鹅肉，原来是吃呆或死的天鹅肉

噢！

正方：呆或死的天鹅就不是天鹅了喽？

反方：在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的环境里，即使呆的或死的天鹅也等不到癞蛤蟆下口，蛇早已捷足先登了。

在这段辩论中，双方的辩词尽管有诡辩的成份，但大多数地方还讲求逻辑、论据和情趣。然而，辩论会是不会出这样的辩题来组织一场辩论的。辩论会有存在的必要，是由于借助辩论这一形式让辩论单位就社会关心的焦点问题充分地表明不同的观点，进而能引发社会对该问题的深度探讨。另外，辩论会的社会效果好，也能促进辩论本身的发展。倘若辩论会以月亮是三角形的、癞蛤蟆能吃天鹅肉、掩耳能够盗铃等为辩题，那么辩论会使会失去社会意义，变成纯粹游戏的场所。

奥古斯丁说过：“我们要特别留心那种口若悬河，但废话连篇的人；更要留心听众对那种本来不值一听的胡说八道却听得喜不自胜，并认为演说者说得如此之动听，其所言之事必事必无疑的情况。连那些主张教授修辞术的人均有这种看法，如他们承认：虽无雄辩之智无益于国本，然无智之雄辩则有害无益。”奥古斯丁的这段话可引出三点启示：1. 辩论内容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辩论会才真正是锻炼和培养雄辩之才的场所，若辩论会以没有丝毫社会意义的辩题来组织辩论，辩论会只能成为制造一批虽口若悬河、但言之地狐的巧舌如簧之徒的工厂；2. 任何一种竞争形式都能吸引观众，辩论会这一形式也不例外。以没有实际意义的辩题组织辩论，必使辩论单位游离辩论的实际内容，只注重语言形式、辩论技巧、逻辑手段和表现方法。在单图形式的辩论会上，观众被华丽语言所感染，以情感代替理智去把握观点；观众被巧妙的技巧所迷惑，为诡辩的手法喝采，结果，观众在接受浮华的形式的同时，也一并接

受了空泛的内容,甚至是错误的观点。3. 这种无智的雄辩倘若形成社会精神氛围,必将混淆视听,颠倒黑白,遗害无穷。

辩论会式的辩论不同于其他辩论,辩论会式的辩论是遵循一定的规则进行的,总的说来,规则包括七个方面:辩论单位的人数,即确定是个人参与还是组队参与;辩论发言秩序,即确定对立双方谁先发言、谁先质询和谁先总结;辩题出处和立场,即确定辩题设计单位以及立场抽签方式;辩论队员发言时间,即个人在不同秩序上的发言时间,或组队中的每一个人在不同的位置和秩序上的发言时间;辩论评判原则,即确定辩论评判标准和评判团体组成办法;辩论公约,即辩论单位相互之间可约定不得以敏感事件作为攻击对象;辩论持据方式,即确定辩论单位采取何种方式出示支持自身观点的论据。

由此可见辩论会式的辩论是带有游戏的色彩。首先,辩题是由主办单位给定,不是辩论单位根据现实生活的需要和理论研究的需要自发酝酿出的。其次,辩论发言有严格的人数限定和时间限定,由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时间内展开和结束。再次,辩论有胜负结果,决定胜负大权掌握在评判团体手中。最后,辩论的胜负与围绕辩题的不同立场的真理性与否没有必然的联系。既然有游戏色彩,输赢是每个辩论单位相当在乎的一件事。因为,除了各辩论单位通过对某个辩题是否具有真理性的辩论,加深了辩论单位彼此在该问题上相互的了解和沟通以及社会对该问题的深入探讨之外,通过辩论还能检验各个辩论单位的实力和技能,国际性辩论会的输赢得失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关系到辩单位所代表的国家和地区的教育水准。于是,名个辩论单位都会使出浑身解数,力图在短短的几十分钟内将对方的立场置于死地。辩论技巧的运用、逻辑推理的演绎、立论基础的构建、事实依据的配合、价值取向的高扬、辩论单位应变能力气质风度的展现等都是评判辩论单位实力的指标,从辩

论的效率出发,各辩论单位会极力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计划达到这些指标的量值,因此,各辩论单位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的地维护自身的立场。这就引发出一个矛盾,一方面辩题可能是具有广泛社会意义的真理性判断,其需较长时间的讨论才有可能获得某个结果;另一方面,辩论会又人为地设定规则和限定时间束缚辩论的充分展开,只有辩论胜负的结果,没有确定哪一个立场具有真理性的结论。辩论会式的辩论与一般辩论的不同也就体现在这个矛盾上。

辩论会式的辩论不完全是真理之辩,也不完全是游戏之辩,它体现了真理与游戏的辩证。决出输赢与赢结果是游戏规则的要求,也是吸引社会各界参与的一个手段,但对各参加辩论单位来说不是最终的。辩论会的宗旨也应是希望各辩论单位通过辩论会的形式表现出对真理执著追求的精神、语言的优美、逻辑科学的力量、理性的风范和人类智慧的荣耀。真理与游戏的辩证赋予每个辩论单位一个基本信条:用理趣去在乎输赢结果!

二、从抗拒到维持:让自己彻底地反对一次自己

由于辩题是预先给定的,作为辩论单位的组成人员,即辩论员,可能对辩一开始就有抵触情绪,甚至不管自己的立场如何。对辩题的意见,直接影响辩论员的辩论行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对主办单位出题用意的误解(在训练中,对教练意图的误解)。对主办单位的用意和能力的揣测,必命名辩论员高估自己理解辩题的能力。辩论员花大量的时间研究辩题之后所掩藏的并不存在的动机,就辩题本身却不愿费一定的功夫,结果,在辩论中,由于辩题中某一关键词没有把握透,遭遇对方的质问时无法有效的应对,痛失某一回合的主动权。(2)对辩题作主观的篡改。在辩论过程中,

双方唇枪舌剑地我来我往，延续皮神经紧，加上原有的抵触情绪，辩论员极易抓住去理智，一遇导线便转而质问和攻击辩题，将辩论的以方转换成主办单位，从而游离了原先的战场。(3)对特定的合作格局给予毁灭性的打击。作为组队辩论成员之一，由于对辩题的分析不利和随意篡改辩题，他(她)在辩论过程中造成的泼洞和游离，给自己的队友带来很大的压力，原先良好的合作格局遭破坏，自己的队伍则由优势转为劣势。

下面举一个辩论的例子：

辩题：经济发展必然导致环境污染更加严重

(取其中的一段)

正方：经济要发展，就要遵循最小的投入最大的产出这一经济运行规律。企业主不可能花钱去治理环境，所以环境污染会更严重。

反方：不错，是要遵循最小的投入最大的产出这条规律。请问，环境遭到更严重的破坏，人类生存受一威胁，这是最小的投入呢？还是最大的投入。

正方：那么请问，环境遭到更严重的破坏又是由什么造成的呢？

反方：难道是经济发展导致的吗？菲律宾火山爆发释放的有害气体不是更严重地污染了环境吗？

正方：对方能不能告诉我们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污染是怎么一回事，日本的痛痛病是怎么一回事，印度化学工厂毒气泄漏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又是怎么一回事？

反方：那么对方如何解释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问题远不如落后国家严重呢？发达国家的经济是不发展的吗？

正方：谢谢对方退出了一步，他们承认了发达国家也有污染问题，他们经济的确在发展，这不是在论证我方的观点吗？

反方：发达国家的确有污染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在加重，而是在减轻，我方观点到底是进了一步呢，还是退了一步？对方是不是高兴太早了呢？

正方：那么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随经济的发展更加严重，对方作何解释？

反方：我们不得不提醒对方，你们要说明的是经济发展必然导致环境污染更加严重，无论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正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就不是经济发展吗？本来辩题中的经济发展是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嘛！*

反方：吃梨子能去火，吃桔子却能上火，对方能告诉我们吃水果就必然能去火吗？请正面回答！

这是一场组队辩论的实录，其中有“*”号处是正方由优势转为劣势的关节点，辩论赛之后，正方辩论员说他本来就对辩题有看法，一遇到对方紧逼盯人的问题，自己一时没有想到好的应答，不知怎么就把自己不同辩题设地的观点说了出来，造成了不可收拾的局面。

抗拒心理不公反映在辩题上，而且也反映在自己被安排的立场上。辩论员可能对辩题没有意见，而对自己抽到的立场会有看法。当自己的立场是站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已被普遍接受的观点的对立面时，在辩论立场上的抗拒心理也会严重地影响辩论行为。它表现在三个方面：(1)辩赛情感不投入。立场是事先安排好的，而不是自己自愿要维护的，但迫于作为辩论员的职

责,又不得不捍卫在日常生活中那些与自己观点极端对立的立场,辩论情感远不如自己站在对方立场上那样投入。(2)误入对方立场。当对方立场较符合辩论员自己的观点时,辩论员在紧张激烈的辩论会中,极易突然丧失自己的立场,为生活中自己所主张的观点辩护,从而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枪们辩护。(3)频频出现口误。虽然辩论员可能不会跑到对方立场上去,但由于在克服抗拒心理的过程中,注意力过分集中,把安排给自己的立场始终作为外在强制的因素,没有变为内在可接受的观点,在辩论场上,由于潜意识的作用,就会发生似乎在站在对方立场上的口误。口误如太过明显,很快被对方捉住,自己得费很大的劲去弥补,宝贵的时间白白地浪费掉,要取胜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了。

以下举一个例子,它取自复旦大学辩论队员选拔赛初赛辩论内容:

辩题:经济发展必然导致道德水准的提高

(一对一辩论)

正方:经济发展必然导致道德水准的提高是有事实依据的,广州、深圳的经济发展速度高于全国其他地方,那里的社会治安就特别好。

反方:广州、深圳的经济发展确实很快,但到过广州、深圳的朋友都知道,那边的居民用钢筋铁条从一楼一直焊到四楼,凉台成了人们的放风的地方,而经济发展慢的地方就没有,对方如何解释?

正方:请问,什么叫防患于未然啊?有钢筋铁条来防御盗窃犯罪,盗窃犯案率低,社会治安好就说明道德水准的提高吗?

反方:那么不用钢筋铁条作护兰的地方,盗窃案就特别多喽?

正方:当然,有防备总比没防备好,经济不发展何来钢筋铁条来作护栏啊?

反方:按对方的逻辑,当一个地方的居民都用坦克大炮来防卫的话,这个地方的道德水准就特别高喽?

正方:高然不是,经济发展不必导致道德水准的提高,但经济发展有利于法制建设,法制搞好了,道德水准也就提高了。*

反方:看样子对方有点思路混乱,请问法律和道德的区别到底在哪里?一个靠法律维系治安的社会与一个靠道德维系治安的社会,究竟哪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准高?

正方:道德有社会繁衍性,经济发展为道德教育提供一定的物质保障,经济发展当然会导致道德水准的提高。

反方:经济发展要遵循最小投入最大产出的逻辑,而道德讲求无私奉献,经济发展的逻辑灌输一道德领域,难道是道德水准的提高吗?

正方在打“*”的地方有个明显的口误,极易被对方捉住自己处与被动挨打的局面。辩论选拔赛后,正方同学自己也认识到自己的失误,他觉得自己平时立场是辩论选拔赛时反方的立场,辩论时自己的感情怎么也投入不进去,虽然想争取主动,但又过于紧张地怕跑到自己平时的立场上去,始终使自己处于被动防御的状态,结果口误频频,只有疲于招架之功。

辩论员如何在辩论中摆脱这些抗拒心理呢?主要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认识到辩赛不完全是辩真理,而有很多游戏的成分。所以辩论员在辩论的过程中,一方面要严肃认真地对待每一场辩论,用心听准对方的观点,以理申辩、以情动人;另一方面又要机

动灵活、巧弄机关，以术惑敌、以趣博众，不能过于紧张，因为围绕辩题的是是非非不可能单靠一场辩论会就能解决得了的。其次，要认识到自己的立场也是可以改变的。辩论员自己在平时维护的立场未必经得起仔细推敲，往往在仔细地研究对方立场的蛛开始怀疑自己原先的观点。这说明当辩论员抽到某个不同于自己平时观点的立场时，并不意味着他原先的观点是永不改变的，在很多时候，通过与自己平时相对的立场所持论据的了解，自己的抗拒心理是可以缓解的，甚至会彻底地为自己原先的看法。再者，要认识到辩论也是一种表演。既然辩论是表演，就要求辩论员按一定的规则确定自己的角色，不可能在场上都出演自己喜欢的角色。舞台上，好的演员要胜任分配给自己的任何角色，辩论场上也是如此。况且，围绕辩题的两个对立立场本身具有可辩性，在形式和内容上一般对任何一方没有偏袒，辩论员应该在准备的过程中就作好自己的心理调适，充分收集相关资料和严密策划自己的立论。最后，要认识到抗拒心理也有其优越之处。辩论员越是恪守自己平时的观点，越是了解这一观点的论证过程，一旦自己处在自己原先立场的对立面，辩论员可较容易地把握对方的强点和弱点，使自己的辩论攻击火力更加集中。

辩论会有时与其说是与对手较量的场所，不如说是与自己对抗的场所。好的辩论员在辩论会的准备阶段就要迅速地完立场的转变——从抗拒到维持；让自己彻底地反对一次自己。

三、从陌生到熟悉：把我的虚弱传染给你

常言道，事料胜于雄辩。辩论一方的逻辑技巧再好、立论再严密和调子再高，如果没有强大的事实支撑，这一方必败无疑。如，

给天鹅的颜色下一个判断：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无论辩论员如何竭尽全力为之辩护，只要对方举出一个不同该判断的事例，即在某地发现了一只黑色的天鹅，这位辩论员的立场就会彻底坍塌。在辩论中，合理有效地应用事实对辩论行为将产生如下影响：

(1) 两“驳”千斤。辩论人坟办单位一般是将辩题在辩论会正式举行之前两三周交给辩论单位，辩论单位有一段时间对辩题进行有针对性的准备，每一个辩论单位都在立论、逻辑、价值和事实上作大量的文章。严格地说，由于辩题并不偏袒任何一方立场，任何一个辩论单位都不可能作到滴水不漏，尤其在事实方面，更不可能面面俱到，这必会留下一些薄弱环节。对方或许在立论、逻辑和价值上非常严密，没有供别人可归谬之处，这时用事实加以攻击是最好的办法。

(2)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一般说来，一方辩论单位对另一方辩论单位要求解释的事实问题，或者立刻回应、或者抛同样性质的问题过去，不管怎样，总要回答一些事实问题。任何一方提问题都是有特定用意的，一旦你把所提的事实问题纳入自己的逻辑框子里来，就给自己带来麻烦，即等于给自己的逻辑结构注入病毒。就算自己想绕开问题，或用另一套逻辑程式去解释对方所提的问题，同样也会遭致自我矛盾，或是立论和事实的矛盾，或是逻辑和逻辑的矛盾。

(3) 权操我手。这里的权字指的是场上的主动权。在辩论中，各个辩论单位都力图引导整场辩论，同时，各个辩论单位都想摆脱引导。如何从不利于自己的双方酣战中脱身，需要高度的辩论技巧，倘若撤离得不好，容易给评判留下战败一个回合的印象，以事实作转换主动权的信号，待对方回答出现漏洞时，穷追猛打，转移战场，回到自己得在手的方，不易为评判察觉，这样，既摆脱对方的纠缠，又转而掌握了主动权。

下面是第二届亚洲大专辩论会半决赛的一段辩论：

辩题：庞大的人口是第三世界的负担

（正方复旦大学队对反方马来西亚大学队）

正方：为什么要控制出生率呢？如果没有负担，如果庞大的人口不是第三世界国家的负担，那么，贵国总理为什么要说“为了保障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必须特别注意人口增长”呢？

反方：控制人口也是我们的计划之一，对方同学，有了计划之后你们还敢说庞大的人口是个负担吗？

正方：为什么需要控制呢

反方：那就是有规划，如果没有规划的话，则不是庞大的人口，任何因素都将是一个负担了吗？

正方：对方同学，让我们再来看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例子吧！印度人民是勤劳勇敢的人民，但就是这个在亚洲六七十年代的绿色革命中比较成功的印度，1950到1980年的粮食产量虽然以平均每年2.7%的速度增长，但在同一时期，却又保持了2.1%的人口增长率，其结果是30年来的人均产量维持在200公斤以下。

反方：哦！印度的人口真是个问题呀，但是其关键还是其他因素所造成的，比如种族问题呀、宗教问题呀，等等，与庞大的人口完全没有关系。

正方：庞大的人口难道不正是雪上加霜吗？

反方：只要没有零星贡，那么，不管在西方国家还是在东方国家、不管人口少还是人口多，都是一样的问题。请问对方同学，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正方：你们坚持衡量是否庞大的标准不是负担，那究竟何以为据呢？对我方提出的在政治、社会、文化、科技、教育等方

面的问题，你们作何反驳呢？

反方：对了，有了规划之后，你们所举的问题就全部能解决。

正方：请你们举出一个规划成功的例子，好不好？

反方：就是日本啦，日本以前是第三世界国家，它也有庞大的人口，今天却成了先进国中的先进国，这正是因为日本有好的规划。

正方：日本什么时候曾是第三世界国家呢？那是远在明治维新时期，但那时候日本的人口并不庞大。

反方：那么亚洲四条小龙又怎么讲？

可见，马来亚大学辩论队的观点是，有规划的庞大的人口不能称其为负担，他们认为没有规划任何东西都会成为负担。复旦大学辩论队并没有在逻辑上与对方纠缠下去，而是用印度的事实作战场上的转换，把逻辑的战斗转换为事实的战斗，然后借机反攻。果然，马来亚大学队就进入圈套，举出日本的例子，并提出日本在还是第三世界的时候人口已经很庞大了，这有悖历史常识，从此马来亚大学队就在复旦大学队的火力网中艰苦作战了。

围绕辩题的两个不同立场都有可辩之处，双方都可收集到作其立论支撑的大量论据和事实。在辩论场上，每一个辩论单位都举随意地应用已收集来的事实材料，都会将事实材料预先筛选，并且根据辩论场上的需要规划和组织材料的抛出时机和份量。根据以往的辩论会各个辩单位扫出的事实材料分析，所抛事实有四个特性：一是不易辩驳性。这主要是指数量分析方面，引用大量的统计数字来证明或反驳他人的观点。数量统计是辩论员最不易反驳他人、却较易维护自己的一种论据，一旦辩论员遇到这种情况，大多会将这些论据归入自己的逻辑框子里，但这也有危险，如果

技巧粗糙，往往给评判留下牵强附会的印象。二是针对性。事实的抛出不能随意，要针对对方的立论和逻辑，否则，大量的事实堆砌在一个战场有两个结果要么落入对方的逻辑框子为对方的观点论证、要么只将辩论会变成单纯事实比较整理的讨论会，而不表现一点逻辑与技巧的力量。三是权宜性。当无法正面对对方的严密的逻辑体系再作质疑时，用事实材料从侧面攻击对方的立论和逻辑不失为一个好方法，让对方在对事实作解释中和自己方才的逻辑和立论发生矛盾，与此同时，不失时机抓住机会全面反攻。四是趣味性。辩论会评判标准中，幽默和趣味是很重要的内容。在准备和整理资料过程中，辩论单位特别要注意哪些是容易出效果的资料，以及预先策划抛出的时机。

下面是复旦大学辩论队模拟赛的一段辩词：

（正方复旦大学队对垒反方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研究生陪练组）

正方：……自从1981年首例艾滋病人被确认，这场“黄色瘟疫”从美洲到非洲、从欧洲到亚洲，东进西渐，肆意横行，迄今已波及173个国家，艾滋病患者已达250万，感染者达到1400万，到2000年，患者将达到1400万，感染者将达到5000万—1亿。80年代初，艾滋病在亚洲还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今天，亚洲有了150万艾滋病感染者。艾滋病成为公认的医学问题。

再看看复旦大学队对垒悉尼大学队时悉尼大学队的辩词：

正方：……我们都知道艾滋病的途径不仅是同性恋或者性滥

交，输血不慎也能引起。在苏俄有 2/3 的患者就是在医院里不慎被传染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第二届亚洲大专家辩论会正方澳门东亚大学队对垒反方复旦大学队的一段辩词：

辩题：在目前的国际局势下，联合国没有存在的必要

反方：我方就是那个宗旨，所以认为联合国现在的所作所为正符合它的宗旨，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起了很多的作用，所以它才有存在的必要。

正方：它的第一个宗旨是什么呢？不是维护世界和平吗？可是现在和平又怎样了呢？

反方：所谓只见其一，不见其二，正是不幸应了今天的对方同学，联合国是 5 个宗旨 6 个机构吗？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下，联合国宗旨的生辰八字，那就是 1945 年的 10 月 24 日生效。

正方：你们是不是认为地区战争会诱发世界大战呢？

反方：其实，对方第一位同学在刚才犯的两个基本错误的同时也说明了一个真理，那就是联合国的存在像空气、水份、阳光一样重要。

正方：既然你们把联合国说得那么至高无上，那为什么还有大概 48% 的会员国拖延缴付会费呢？*

反方：哦，这个问题太好了，真的，我对会费问题同样非常地感兴趣。但是，难道你不知道那些拖欠的会费最近又减少了许多，现在已只剩下 3. 亿美元的拖欠额吗？这个数据请不要忽略。

正方：这不是正好说明联合国是可有可无，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吗？

从以上的辩词看，各个辩论队都力图采用事实攻击的战术，都想通过事实的掌握来争取场上的主动机，其中不乏将貌似枯燥的数据作幽默的表达。这一切都建立在辩论员对事实材料的准确掌握之上。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事实攻击中的以毒攻毒法。主办单位在拟定辩题时特别注意辩题的普遍性，尽力避免出现某个辩题直接针对某个辩论单位国家社会和政治的过去和现状。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从发生在对方国家中的事例来反对方的观点，其中并没有令对方尴尬的论据。另一种则不同，所举的事例缺乏善意。在辩论会中，哪壶不开提哪壶的事情经常发生，主要表现在用令对方感到尴尬的对方国家社会和政治事件作自己观点的论据。虽说措词较为隐晦，却也极易使人心领神会。遇到这种情况，开始，从风度和友好出发，可以置之不理。但若对方一再纠缠，就要给予还击。

在第一届国际大专辩论会上，正方的剑桥大学队对桑反方的复旦大学队的辩论中有这样一段辩词：

辩题：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

正方：（陈词）……对方从中国大陆来，对中国十几年来来的经济变化所取得的成绩，一定是感触颇深。世界上对这个问题有目共睹。这些成绩都是在中国政府坚持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手抓的情况下所取得的。如果中国政府还像过去一样，像“文革”时期一样，只顾道德建设，而不讲经济的话，那么我们就很难想象中国会取得现

在这样的成绩。……

反方：……而《圣经·旧约》里亚当和夏娃偷食禁果和原罪的传说，不也表明了道德的最早起源吗？有关贫困中人们谈道德的文化学和人类学的证据在大英博物馆里是汗牛充栋的。

二次大战的时候，面对法西斯的疯狂空袭，英国民众也并没有放弃他们讲求道德的绅士传统。热爱祖国、伸张正义的信念使得众多尚处在不温不饱状态下的英国民众顽强抗争着。面对着这些贫寒但是高贵的灵魂，来自英国的对方辩友难道还要告诉我们“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吗？

从这一段辩词中，我们不难发现双方都举对方所生活的国家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的实例作证明自己观点的论据。其中，双方相互之间并没有使对方威吓怪尴尬的诨，相反，事例中溢美之词赫然显见。反映第二种情况的例子不便在此例举，读者朋友可以从辩论会上相关的辩词中觉察到。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对方提出的事例是针对辩论员自己的，即给辩论员两难的事例选择，要对方辩论员依据自己的立场和逻辑作答复，这要求辩论员无论是提问者还是回答者要有极快的反应能力和判断能力。

下面是第一届国际大专辩论会初赛中的一段辩词：

辩题：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

正方：对方同学一直回避一个问题，你们总是举仁人志士的超前道德行为，告诉我们社会上每一个人都做得到。请问

对方，你们认为今天在座的各位，包括你们在内，有几个人做得到颜回一箪食、一瓢饮？有几个人是欧阳修？有几个人是笛卡尔？有几个人是范仲淹？

反方：既然对方辩友不喜欢谈仁人志士，那我们谈谈普通人。刚才对方三辩讲到一个小孩的例子，那我问对方辩友：如果你吃不饱的情况下，你就不谈道德了吗？

有许多事实上的辩论回合是在极短的时间完成的，辩论员的反应犹如条件反射那样迅速。俗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辩论员不可能对对方所在国家的社会、历史、文化事先就很清楚，有的可能对对方的社会背景情况一无所知，因而在准备辩的一段时间里，辩论员要收集和阅读大量相关资料，对方所在国家的社会、历史、文化状况要从陌生走向熟悉，这也许是知己彼彼、百战不殆的道理。

事实是遇对方的有效武器，也是对方遇自己的重要方面。在这个意义上，每个队都有一些弱点。如果两个队旗鼓相当，在事实的战场上，双方会交个平手；如果有一个队在事实的某一环节上出现差错，另一个队又立即死死咬住不放，场上就会出现一边倒的形势。相对说来，每一个队都有强项，也都有弱项，场上辩论员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握对方强弱的所在，对方逻辑、立论强，我就打事实，对方事实强，我就打逻辑、立论。总之，辩论员若要己之长攻他之短，就要对方，从阿陌生到熟悉：把我的虚弱传染给你。

四、从博采到精取：我的世界只有他最懂

对辩论感兴趣的先生女士不在少数，复旦大学辩论队选拔赛

就有 108 位同学参加,如何从这么多的同学中选出几个同学组成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对辩论选择小组来说是有有一个从博采到精取的过程。对于被选拔者来说,最关心的是:选拔一个辩论员的标准究竟有哪些?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好的辩论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观点,但大体上不外乎:

人格建设方面。辩论式的辩论具有强烈的竞争性,个人对己对人对事乃至对整个环境的适应方面的个性特征,可在这种场合中尽显出来。选拔小组要从观察、合作、自主、友善、攻击、刚毅等角度关注辩论员。必须强调,观察力的强弱直接制约着辩论员的反应能力的高低。观察力包括听力,这是辩论员尤其重要的能力之一。辩论员的听力不只包括听懂对方说话的意思方面,而且有要从中寻找这句话同前锯话是否有矛盾、是否不符原先的逻辑和立论、是否是在埋设机关、是否是转换战场的信号等方面。如果一个辩论员没有良好的听力,势必会在场上王顾左右而言他,自说自话,一意孤行,无的放矢。组队辩论着重强调辩论员的合作能力。三个队员或四个队员维持一个立场,坚持一个立论,沿着一个逻辑线路,实际上是三个或四个脑袋当一个脑袋使,这就要求辩论员相互之间能够彼此沟通了解、彼此心心相印,如果辩论员生性较为孤僻、不易合群,或重自我表现、推迟占风头都会破坏整个队的良好配合。没有一个队能在每场辩论中一个队员一点差错都不发生,而体现在合作上的辩论技巧之一是补缺补漏,即当辩论员在轮到发言时,对对方的攻击不能即刻反应,队友要迅速补上此发言时间空缺;有时辩论员会发生一点口误或逻辑错误,其他队员要立即弥补同伴的漏洞。因此没有合作能力、没有合作精神,辩认单位要想在组队辩论形式中取胜是不可能的。当然,强调合作精神并不意味鼓励一个辩论员对其他辩论员的依赖,合作能力的高低建立在每一个队员的自主性高低基础

之上。在组队辩论的形式下，辩论会评判在给整个队的合作情况打分的同时，也给每个队员打分，目后者占总分相当一份比例，每位队员除了认真表达属于自己的一部分陈词之外，需投入大量的精力在陈词和自由辩论中去反驳对方，只有自己的阵地巩固好了，才谈得上帮助队友。辩论会不是以决出输赢、发放奖金为目的，对青年同学来说，更重要的是以辩会友、交流思想、彼此沟通、切磋技艺。辩论会上难免会有许多唇枪舌剑的场面，辩论员在攻击对方论点的时候，用词用句都要尊重对方和主办当局所在地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法律规章，以及对方辩论员的人格。辩题是由主办单位拟定的，立场又由抽签决定，并不代表对方辩论员自己真实观点，辩论员没有理由在攻击对方论点的同时，去攻击对方的短处和易使人尴尬的地方，越是辩论处于紧张状态，辩论员对对方的攻击越是要友善。一个辩论队不可能在每场辩论中都处于优势，可能在整场辩论中的某一阶段处于劣势，此时，辩员会出现急躁、紧张、慌乱、懈怠的情绪，辩论队要稳住阵脚，需要每一个队员沉着、冷静、稳健、有序，要有必胜的信心和乐观的态度。要做到这一切，要求辩论员有百折不回的刚毅秉性，倘若辩论员每每一遇挫折，就气馁懈怠，整个队消极应战，不但会失去比赛，更会失去观众。

请看下面的一段辩词：

辩题：教育发展要以市场经济为导向

正方：教育离不开市场经济，教育要培养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需要的人才。教育发展当然要以市场经济为导向。

反方：好，就依对方的逻辑，对方二辩的发展离不开母亲的关怀和培育，在道对方二辩这样的男子汉的发展就是以母亲为方向吗？对方是不是也属于抱大的一代啊？

正方：哦，对方三辩的发展难道不是以母亲为导向吗？若真的这样，那问题可就大了，有些事情就说不清楚了。

反方：当然说得清，好男儿志在四方！在祖国母亲的广大怀抱中，我们才能有所作为。

正方：那不是恰好证明我方观点吗？个人成长当然离不开祖国母亲的引导。

反方：对方弄错了，此母亲非彼母亲也！

这是一段选自系际辩论的题材，从打“*”号的地方明显看到有对对方进行人身攻击的嫌疑，尽管双方都很机敏，逻辑推导能力很强，且很快就进入正轨，但前面的相互攻击的语句引起评委的强烈不满，给评判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知识结构方面，尽管有识之士最近在大声疾呼要搞通才教育，但大部分学生的知识结构不够谨严和全面，即使是正式成为辩论队队员的同学，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交锋的两个辩论队的辩论员大有可能是在不同文化背景 and 不同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学子，任何一方的辩论员都应有相当谨严和全面的知识结构。否则，当对方突然用出一个令自己相当陌生的理论，或提出一个自己从未听到的问题，自己只能俯首称臣，而无半点还手之力了。知识结构的谨严和全面，不是靠短期训练所能成就得了的，而是集中了辩论员长期的教育成果。训练只是给辩论员强加一些有目的性的知识快餐，帮助辩论员恢复记忆和加深理解，在知识拓展方面多少会有一些进步，但不可能有长足的进展。所以选拔小组要特别注重同学在辩论选拔赛的知识方面的表现。一是知识的全面性，即看一个同学的知识是局限在本专业上，还是对其他专业和学科有一定的了解。辩论会主办单位拟定的辩题涉及经济、文化、社会、历史、伦理、传媒、医学、法律、哲学等诸领域，这

自然要求辩论员有较宽的知识面。二是知识的扎实性。辩论会是高知识容量的竞争游戏，辩论员的知识面宽，但不等于知识就一定扎实，甚至自己所学的专业也很虚空，当对方就某一学科的特定问题连续发问，辩论员较易露出知识虚空的马脚，陷入被动的境地。三是知识的契合性。组队辩论非常讲济南市辩论队员之间的配合，因此，选拔小组必须非常留心比较不同队员之间知识结构。当然，知识的契合不是指契合的天衣无缝，这是不能绝对而论的，在相对比较契合的队伍中，不排除有个别同学特别突出的存在。

下面是第二届亚洲大专辩论会决赛的几段辩论：

辩题：儒家思想可以抵御西方歪风

（正方台湾大学队对垒反方复旦大学队）

正方：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儒家的确是它的一部分。我想请问对方同学，如果说今天的西方歪风是一种慢性病，尽管这不是一天就能治好，但是我们能不能在治他的时候，一看到就说“啊呀，他现在还有病，这个药是不能治病的”吗？我们应该知道良药苦口，治病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你能因为他病还存在，就可以不要他再吃药了吗？

反方：请不要叫内科医生去开刀。孔子早就说过，画饼不能充饥，巨象不能捕鼠。胡适先生在1934年就曾经告诫我们：“不要穿古代的戏装，演现代的悲剧。”

辩题：在目前的国际局势下，联合国没有存在的必要

（正方澳门东亚大学队对垒反方复理大学队）

正方：我方认为，联合国不能让所有的会员发挥它的作用，就是不能实现国父孙中山先生“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

精神。请问，不能联合各国的联合国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反方：所谓“体健不用药，心好不用斋”，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战争的新闻，没有饥荒的新闻，那么，我们也可以同意联合国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正方：可是你们不知道全世界的灾民有 120 万之多吗？联合国对他们又做了些什么呢？

反方：哦！也许你要说这是杯水车薪了。可是沙漠里的一杯水有时是能救人一命的。对方同学难道不也认为“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吗？

辩题：庞大的人口是第三世界的负担

（正方复旦大学队对垒反方马来亚大学队）

正方：对方同学不要指鹿为马，我想送对方同学一句话，中国有句话的意思是说“井多桶也多”，可见即使它再规划，也是井多桶也多，这样，第三世界国家的庞大人口不仍然是负担吗？

反方：我请问对方同学一个问题，如果今天中国的人口不是那么的庞大，是不是会有那么多的国家来重视中国领袖的言论呢？那么，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是否还会有否决权呢？华语是否还会成为联合国的用语之一呢？请对方同学回答这个问题。

正方：这完全是两码事，中国之所以在世界受到尊重，是因为它一直站在正义的一边。

反方：可是正义也需要庞大的人口作它的后盾啊！

正方：如果庞大的人口可以决定这个正义的话，那么中国就不

要计划生育了。

这些是选自复旦大学参加三场比赛的辩词，三场比赛的辩题涉及文化、国际政治、人口等方面。参加1988年这场辩论会复旦大学的四位同学，分别来自新闻系、国际政治系、经济管理系，可以说辩题涉及面大多都超出了四位辩论员的专业范围。1993年的情况也是如此，辩题涉及伦理学、医学、社会学、哲学等方面，四位复旦大学的辩论员却分别来自中文系、法律系、国际政治系。从同学们机智的应对上看，辩论同学除了对自己专长知识已有较好把握外，对其他领域的问题也有一定了解，辩论同学的知识面相对比较宽。

逻辑方面，辩论会式的辩论是有严格时间限定的，这就要求辩论员有较强的逻辑能力，不但做到单位时间的信息量要大；而且要使信息之间的逻辑联系严密合理。一个辩论队的逻辑能力强具体体现在：归谬快，即辩论员能在相当短的时间内，迅速把握对方论证观点时所运用的概念、判断、推理，并即刻将对方的思维形式中的种种错误一一指出。效率高，即辩论员能够将对方所犯的最致命的逻辑错误加以指出，而不是在有限的时间内集中自己的一切力量针对无关痛痒的枝节问题穷追猛打。表述准，即辩论员能在有限的单位时间内，能够中心明确、条理清楚、结构严密、情理相容地表述自己的观点，准确的概念、准确的逻辑、准确的论证较易使评判和观众接受自己的立场。因此，选拔小组会十分注重同学在选拔赛中的逻辑方面的表现。

以下段落是选自亚洲和国际大专辩论会的辩论内容：

辩题：儒家思想可以抵御西方歪风

（正方台湾大学队对垒反方复旦大学队）

正方：对方辩友举出了民初年所产生的对传统的不信仰现象，如果说，那各项就是对方辩友所说的西方歪风普遍地进入所有东方社会当中，所以我们今天的抵御，就是把这咱潮流渐渐地往上升。我们看到的，就是台湾地区非常地尊师重道，我个人的老师，我现在仍然非常敬仰，我的小学老师，我还经常回去看他，这不正是抵御了西方的歪风吗？

反方：我很想请对方同学回答，儒家思想到底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抵御了西方歪风？请注意是抵御，抵御当然是御敌于国门之外。请对方同学回答。

正方：抵御当然不是说在一夜之间把它全部赶出去，要杀敌也要慢慢把敌人赶出去，尤其西方歪风是这么可怕，这么恶劣，因此我们要好好地缓慢地有耐心地贯彻儒家思想。

反方：“乱邦不入，危邦不居。”乱邦危邦孔子都不肯去，这怎么抵御呢？

辩题：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

（正方悉尼大学队对垒反方复旦大学队）

正方：艾滋病的病毒是在医院里被发现的，现在世界上有成百上千的医务工作者正在研究解决艾滋病的办法。

反方：我们从来没有否认过医学参与，请问，医学参与就一定等于医学问题吗？

正方：请问，成百上千的医务工作者在研究，这只是简单的医学参与吗？

反方：在医院里发现的就都是医学问题吗？在医院里捡到别人

丢的一把钥匙，这把钥匙就成了医学问题喽？

辩题：人性本善

(正方台湾大学队对垒反方复旦大学队)

正方：环境天险，天险较恶。对方辩友，您没有听说过吗？环境会让人去行恶的。

反方：对方似乎认为有了外部恶的环境，人就会变恶。请问在南极，在一种非常艰难的沙漠之中，人就会变坏了吗？

正方：我方没有这样说，对方又在第二次栽赃，我是要告诉大家，是说人有善端，你在哪个环境，好的环境会变好，坏的环境会变坏。

反方：如果都哪对方所说的那样，人性本善，都是阳光普照，雨水充足，那还要培育它干什么呢？让它自生自灭好了。

由于自由辩论规定每一方只有四分钟，采用累加法，所以辩论员的逻辑反应能力要特别的强，从上面几段自由辩论的辩词看到，反方能在对方话音落定不到一秒钟就即起反驳，这样迅速的反击，没有必要的逻辑知识是不可能达到的。

辩论过程与其说是在说服对方，不如说是在说服观众和评判。尽管辩论可以称作是知识和智慧的较量，但在辩论场上过于表现高深莫测的知识能力，很难令观众和评判在短短的时间内把某一种观点理解透，辩题的难度相对较大，观众和评判主要看辩论单位是否能在短时间内，把某个立场既深入浅出，又令人信服地谈清楚。可见，辩论员在辩论场上调动自己的知识资源的时候，一定要

考虑观众和评判的理解状况，而不能一味追求晦涩抽象、光怪陆离的理论表达。由于辩题所确定的不同立场具有很强的可辩性，每个辩论队都可调动大量的知识资源作为自己观点的支撑，然而要取得一定的场上效果，辩论队都力图在旁征博引的同时，有的放矢地引用辩论会举行当地的知识材料和引用评判学者的相关观点作为立场的佐证。

下面几段辩词选自亚洲和国际大专辩论会：

辩题：儒家思想可以抵御西方歪风

反方：……而我们又怎能要求一个自己没有淫秀的思想去超度西方歪风之与的芸芸众生呢？这是不现实的，请对方同学三思而言之。至于“游必有方”，我想，游来游去千万不要游成乌节路*上的游荡少年。如果按照对方同学的思路，让儒家思想一个一个疗程地来，就算能到那个时候，恐怕乌节路上的彩装少年至少已经变成彩装老年了，到那时对方同学将何言以谢新加坡？何言以对儒家文化？

* 新加坡最繁华的商业街，如同上海的南京路。

辩题：人性本善

反方：人性本恶是日常生活一再向我们显示的道理。从李尔王的不孝女儿们到《联合早报》*上拳击妻子的丈夫们，从倒卖血浆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到杀人 不眨眼的拉美毒枭，恶人恶事可谓横贯古今，不胜枚举。对方辩友，难道你还要对着《天龙八部》**中恶贯满盈、无恶不作、

凶神恶煞、穷凶极恶这四大恶人谈什么人性本善吗？

* 新加坡的一种华文报纸。

* * 评判团成员之一查良镛先生的一部武打小说。

反方：光阴荏苒，逝者如斯，在物质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同时，而人类的精神家园可谓是花果飘零*。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警惕，人性本恶这个基本的命题。可喜的是，在东方的大地上，我们说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已经从一阳来复* * 开始走向新的春天。我们也相信，通过传统文化的精华，必将使人类对无节制的欲望给予合理地扼制并加以引导，从他律走向自律，从执法走向立法。人类才可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 *

* * 新儒学用该词来描述文化衰败景象。

* * 评判成员之一杜维明教授常用该词描述文化振兴的新希望。

* * * 与新儒学若干观点相同。

反方辩论员引证的大多是观众和评判非常熟悉的知识和理论，这样拉近了观众和评判与自己观点的距离，引发出了良好的场上效果。与此同时，对方可能还弄不清你方的真实用意。这真是，从博采到精取；我的世界只有他最懂。

以上主要从四个方面对辩论进行一点生态分析，任何的辩论行为都受到主客观辩论生态环境因素的影响，辩论行为与周围环境的联系相当复杂，单靠这几方面的分析是极不够的。要把辩论行为的真切情况勾画出来，需将眼光扩大到整个社会人文体系的各个相关因素，这是笔者能力所不能及的。

混沌与变幻

——辩论的“散打”风格

严 嘉

透辟的论辩应该是最能使对方茫然失措的；因为这种辩论是最能触及痛处的。

——亚里士多德《论反駁术》

参加辩论比赛，我是从本科一年级便开始的。虽是一项专业学习以外的活动，但因其独特的魅力和我自己的兴趣与特长，几番反复，最后竟由系际辩论赛进至首届国际（华语）大专辩论会。其中固然甘苦互见，冷暖自知，而对于辩论这一智慧与口格相较的“雅斗”，倒确是觉得越嚼越有味儿了。

无疑，一次比赛的冠军所能说明的问题是有限的。我是攻读法律的，不少熟识或不熟识我的人们在不同的时空里不约而同地向我说起同样意思的话：“学法律，做律师，口才很重要，你一定行的。”我不愿妄自菲薄，但我深知，从在确定规范下进行操作的比赛进到面对错综复杂、变幻莫测的现实生活而运用自己的能力，鸿沟之宽无异是远超于一般科技开发中的中试到投产批量生产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事理毕竟还是相通的，也正因为此，从新加坡回来，主要的精力自然是重新入到“社会契约”、“法系”、“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银团贷款”和“民事责任”之类的“正道”上去了，然而，有时在傍晚，泡好一杯茶，欲要“寄至味于淡泊”时，眼

前又浮现出一些曾经挥洒过我汗水与豪情的训练和比赛的片断。于是，伴着兴之所至，进行我的关于辩论的思索。对于既有经历的体味，也是生命感受的一种方式，如能“温故而知新”，那自是更高境界了。

最初参加的辩论队是自发组建的，在仿新加坡辩论赛制之下，我最初的位置是四辩，那时比赛的背景和定位的原因记得在《狮城舌战》一书中已经谈过了，倒是当时自定规矩：三位男生，二辩的打扮要自由新潮一些，三辩穿西装，四辩我则穿中山装，以求风格各异和相映成趣，尤其是四辩当借助报装的“郑重”来稳住阵脚，现在想来颇为好笑，实在有点过于诉求于外且有哗众取宠之嫌了。但是，这反映出那时已有追求风格鲜明和总体协调的取向。四辩的位置一直到法律系队得复旦系际辩论赛冠军的那次决赛前才告结束，原因是大多数同学觉得我和季翔交换一下更合适。于是，在我得到我的第一个辩论冠军时，我是三辩。就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冲进了1993年的复旦辩论集训队。大概是我的反应“灵颀度”较高的缘故，开始，教练们又半我安排到二辩的位置上。当然，那时的位置还有很大的相对性，因为更多的是二对二，一对一，或者一对三、四、五，而且组队训练时也会让每人在不同的位置上“客串”，以体会队友的感觉。在多次的“学习”中，各人辩论的特点逐渐规范和突出起来。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我终于确定了自己最后的位置：三辩。集训时我就曾开玩笑：此之谓位置的“复归”。王沪宁老师以两个字交待了我作为三辩的主要任务：散打。

1988年时，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的鲍勇剑同学作为复旦队三辩参加亚洲大专辩论会，王老师交给了他同样的任务。我们俩人都是当三辩获得冠军的。应该说，在全队总的风格设计之下，位置的确定与各人的特质有着密切关系。在“起、承、转、合”的功能排列和“逻辑—理论—事实—价值”模式中，三辩队员的具体分工如下：

一是对对方的立论基础进行进一步攻击(配合我方二辩),对对方的主要论据在时间许可的情况下作全面攻击(因为此时比赛应已进入双方主要论点论据已经表述清晰的阶段);

二是以强有力的事实支持我方已经表明立场;

三是对我方立论作出转折,以新的视角、思路深化我方观点。

加上从已在新加坡举行过的四次亚洲或国际华语大专辩论会来看,较为成功的队伍中三辩在形式上一般比较活泼、幽默,因此三辩通过“散打”常常会成为团队内获得场上效果的一个重要“亮点”,是有机整体内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一般而言,这是舆论与公认的了。

不过,辩论比赛与更广泛意义上的辩论还是有着相当的差别。在学术论争、法庭辩论、商业谈判、外交周旋中,是不会有“三辩”这样一个特定概念的。但这是否就意味着“散打”作用只局限在作为新加坡赛制下比赛的辩论中呢?随着“实战”、求教和思索的深入,我认为,“散打”作为一种辩论风格,是有着普遍意义的,“散打”式辩论风格在各领域成功的论辩中时常可以见到。我将它的特点归结为十六个字:“多点攻守,以点带面,适机而动,乱中取胜”。

一、道是无序却有序

1. 辩论与“混沌”

在辩论集训期间,为了增强底蕴,每个队员连粗读带泛读,看了不下百本书。而被顾问、教练们指定作第一本精读书的,是《孙子兵法》;与之相配套,《三十六计》是第一本指定泛读书。

给我讲授中国法律制度史研究生课程的一位学者曾对我说过,他出国时,常要随身带一两本篇幅小但内涵很丰、常读常用所

得的书,《孙子兵法》便是最多的选择。对于人生阅历丰富、经历过生命体验的人,从中确实可以开掘出不少人生的真谛。但我阅读“功利目标”很明确的那个时候,通过对前述两本书的重新阅读,引发的却是对“散打”式辩率风格开始有所感悟。正所谓“开卷有益”。两书都是兵书,但其指导功效不限在军事领域。学《孙子兵法》重原则。正如在正义之战中不避“兵者,诡道也”一样,追求雄辩亦不避“知彼知己”、“示形”、“动敌”等的策略。孙子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这与辩论同理。通过“我专而敌分”达到“以镒称铢”、“以段投卵”的优势,以及“利而诱之,乱而取之”的主张,乃是我后来认识到“散打”式辩论风格的重要来源。至于“途有所不由,等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和“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动而不迷,举而不穷”的灵活性的启发意义也是显见的。读《三十六计》就更侧重于具体了。其中的第四套“混战计”特别地吸引了我的注意,因为在以前参加过的一些不很正规的辩论赛中,我常力图在保持自己头脑清醒的情况下将局势引向混乱,从而农点得分,这或许在形式上容易让人想起中国围棋手刘小光的棋风。虽然“釜底抽薪”、“混水摸鱼”、“金蝉脱壳”、“关门捉贼”、“元交近攻”和“假途伐虢”这六计从逻辑上来说,并不全属于一个层面,但一个“混”字统领,见其精神。以其中“混水摸鱼”为例:“乘其阴乱,利其弱而无主。随,以向晦入宴息。”讲的是乘着对方内部发生混乱,利其弱而无主。随,以向晦入宴息。”讲的是乘着对方内部发生混乱,利用他们力量虚弱而没有主见,使他随从我就像人到夜晚,必须入室休息一样。在辩论之中,在对方没有防备的点上予以切入,乘势前行,就是此道理之中的。

不过,读两本兵书时因角色定位尚未完成,所以所获的启发还比较笼统、朦胧,让我觉得受到“顿悟”,有种豁然开朗感觉的,倒是那本名叫《混沌》的书。

在我们四人任务大致排定后的不久，林老师又从图书馆借来一批资料。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周六的下午，天很热，训练室里只剩下张谦和我留守，其他人都上街去采购尚未买齐的出国服装了。我从资料里随手抽出的书便是《混沌——开创新科学》。这本书的著者是《纽约时报》科技部主任、名记者格莱克，他在同大约二百位科学家谈话的基础上创作了这部关于混沌学发展历程的大型报告文学。书一出版即在美畅销，1990年译为中文本后，也曾在大陆高校中掀起过一阵小小的“混沌”热，我在当时即浏览过该书，但印象深刻的也就是书中“洛伦兹吸引子”、“科克曲线”、“曼德勃罗集”和“木星大红斑”等奇异而精美的图形插页了。而时隔近三年，再次阅读时，收获大不一样了。

书中文本的校者引《易乾凿度》中、气似质具而未相离谓之混沌”之句作题记，更指出混沌(Chaos)“正在成为具有严格定义的科学概念，成为一门新科学的名称”，混沌研究“正在消除对于统一的自然界的决定论和概率论两大对立描述体系间的鸿沟，使复杂系统的理论开始建立在‘有限性’这更符合客观实际的基础之上。”而“跨越学科界限，是混沌研究的重要特点”。就全书而言，由于混沌学更多是从物理学中发展出来，并存在于对各自然科学学科内“深刻”的问题的理解中，因此，坦白地讲，对于书里的普适性”、“标度律”、“自相似性”、“分形几何学”、“符号动力学”、“重整化群”等概念和方法，我很难有基于数理领悟的深刻把握。我不知道混沌的“覆盖面广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几乎各个领域”是不是有点夸大其辞，我也很难确认是否真的“读了《混沌》之后，你就决不会再再用老眼光来看世界了”，但以“混沌”作为一种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方法，一种思维模式，运用于对辩论的认识，我觉得无疑是可行和有益的。

在一场辩论开始之前，双方共同构成一种隔膜态，因为除了对

方主要的论点之外,很难确认其已作了怎样的准备,将从何种角度切入,以怎样的序列作辩论攻守。而随着论辩的进行,双方开始“刀来剑往”、唇枪舌战时,各方都会力图按照己方的意图引导辩论,使之进入经过了设计的本方“战场”;然而在对方的制衡之下,这种走向又必定会是在合力的作用线上,偏离预设轨道而被划定的。互相的辩驳,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在具体点上的争夺,对方会在该点上进行怎样的回击,又将以什么样的点的进攻来扼制己方;前一个点落定之后,双方又会在什么点上继续争夺,这些在事先都是很难预见的,其过程呈现无序状态,给人的初步感觉是点点之上的混乱。对这种状态不妨以混沌视之。《混沌》一书记载了巴恩斯利以随机性作为模拟自然形状的技术基础,做“混沌游戏”的故事。按照包含了全部所需信息的几条简单规则,在巴恩斯利的计算机屏幕上,从机器内部产生的新点随机地落下,这些点闪过时,谁也猜不出下一个点将在哪里出现,但逐渐地,各点会使得蕨类植物的形状显现出来。而辩论也正是一种以无序状态表达出来的有序,混沌状态是由其特质所导致,每一方在其中寻求己方逻辑的贯彻,这种贯彻又通过各点得以实现。由此,“散打”式作为辩论的风格是合乎辩论本身的属性的。

在这里我想应该进一步明确的是:各领域内的论辩由于自身特性,混沌态的表现是有相当差别的。比如作为比赛的辩论,特别是新加坡赛制之下的辩论,,各方所持观点是由抽签决定的,对应于现实生活,与法庭辩论中律师的立场比较相似,而与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争相去甚远,因为后者要求各人观点是经过探索而形成的;另外,从形式上看,辩论赛是口头的,限定时间的,而学术论争更多地是以书面形式出现,每一方都有充足的时间来力求透彻研究对方的观点体系。说服对象的区别也相当重要,辩论赛的目的是通过对对方的辩驳,来说服评委,赢得观众,所以俞吾金老师提出

辩论赛中要有“哥白尼转变”，至于不少的学术论争以至日常生活中的辩论则是以说服对方，大家达成共识为目的的。因而面对在不同条件下产生的混沌态，要有不同的对策。“散打”式辩论风格可能在对抗强度较高的情况下使用更加适宜，所以我对这一风格的思索与分析也就是以辩论赛这种高强度的形式为主要例证，兼其他的。

2. 从“自在”到“自为”

对于辩论状态的把握与其他事物一样，也是要经历从“自在”到“自为”的过程的。就辩论赛而言，刚开始参加的人们往往容易凭想当然，把激烈的辩论理解为完全的自发、随机。有这样一则材料，是我旁听某学院一场系内辩论赛的片断：

正方：即使在政治文化中，中国传统文化里也是有其精华的，像孟子的民本思想，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不是可以经过阐发，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吗？

反方：孟子的民本思想和现代社会的民主思想不是一回事，对方辩友不要搞错了。

正方：请对方辩友不要忽视，民主与效率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矛盾。两者难以协调统一，这是当代四方学界所面临的公认难题，请问这如何解决啊？

反方：民主与效率是可以统一的，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还是中国社会的进展都已经有了这一点，请对方辩友才不要视而不见。

正方：对方辩友，你们不是恰恰证明了我方观点为吗？

反方：恰恰对方辩友有了我方观点。

.....

这一片断中，双双可谓是“针尖对麦芒”，寸步不让。同一点的争夺即来往了几个回合，煞是热闹。可是，稍一分析就会发现，双方实际上都已经部分地违背了本方逻辑，跑到对方立场上去了。这场辩论正方的观点是“中国传统文化有利于现代化”，反方的立场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利于现代化”。在上述片断这一点中，正方是试图举出传统中存在的民本思想来论证传统的政治文化里是有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的，因此其论证逻辑应该如下：

- (1)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民本思想；
- (2)从民本思想中是可以衍化出现代民主思想的；
- (3)现代民主思想是有利于现代化的；

结论：在这一点上，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利于现代化。

而反方试图通过指出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之间不等同性，来回击对方，阐述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利于现代化，其论证逻辑如下：

(1)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与现代化民主思想是格格不入的；

(2)现代民主思想有利于现代化，而民本思想对于现代化却是不利的；

结论：在这一点上，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利于现代化。

然而，在现场由于辩论“温度”很高，正方在反方一指出民本不等于民主时，即去对“民主”这一点加以攻击，而反方立即维护“民主与效率”的关系，双方都开始撇开原来论辩的民本与现代化的关系，在不知不觉中变为正方阐述“民主不利于现代化”，而反方谈“民主有利于现代化”，并且，或许是由于口误，讲到“中国社会的进展证明了这一点”，确实也让人感到是在维护正方观点了。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暗含的原因就在于双方将辩论的混沌态理解为了完全的无序，对对方的观点不管青红皂白，抓住一点即从相反的方向加以驳击，置本方的“底线”于不顾，脚踩西瓜皮，滑到哪儿算

哪儿。至于该片断中语言不够洗炼等问题,由于不属于本章范畴,在此就不讨论了。试想一下,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在两位律师或贸易谈判对手之间,那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呢?

在辩论中还人有怀之相反较为极端的情况,即把辩论这种要求高度灵活、多点攻守的活动完全程序化了,对辩论对手置若罔闻,在自己设计的套路里打转。如果双方都是这样,那就会出现没有实制裁性交锋,呈“平行线”发展的状态。这种情况在刚开始参加辩论,而又了解了规则和一点所谓“内幕”的选手身上常会出现。实际操作往往是这样:半所有的陈词在讨论的基础上全部写好,抄在卡片上并力争背熟;每一段陈词的开始部分是准备好的几个套头,根据对方论证的主要框架,在场上勾好选用;就连自由辩论也是绝大部分写成文字,即制好“炮弹”,稍微搭点边,甚至全不搭界的情势下,抛出去再说。观看这种比赛,往往所能感到的便是:索然无味。而如果其中一方能够领悟到辩论的混沌状态,灵活应对,那么常常是赛程刚过半,就已稳操胜券。

类似的情况,甚至也出现在1993年国际大专辩论会的赛场上。预赛第一场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队对垒新加坡国立大学队。哥大四位女辩手由于长期生活在英语语境中,对华语的操演比较生疏,难以应付场上的快节奏,所以在整个比赛过程中,她们几乎都不对新大队作出反应,而是自顾自地读自己的卡片,训练有素的新大人自然是甚得便宜,占尽优势,这场比赛可以说结束之时,即胜负立判了。当然,对于哥大的女辩手而言,在使用事实上是自己的第二语言时能进行辩论,其勇气与参与精神确实是值得钦佩的,何况比赛中有时也显露了她们独特的智慧。但如果辩手是在以自己日常运用的语言进行辩论,还出现受制于稿的刻板,便是应全力去消除的了。

以上分析的是对辩论状态的理解还处于“自在”情形下所出现

的两极,而要从“自在”走向“自为”,除了理论认识之外,还需要较为艰苦的磨炼。

辩论的状态,可谓“道德是无序却有序”。只认识到“无序”,或把它当作从形式到内容的彻底“有序”,都会将辩论水准停留在“自在”层面。对应于辩的“混沌”,“散打”式辩论风格所表现出的应是“浑然一体”,达到此目标需要从积累和运用两方面去下功夫。

二、世事洞明皆学问

1. 走出误区

有关辩论的书籍,虽说不上汗牛充栋,其委篁却也是颇为可观的。仅我在集训期间翻阅过的书就有《雄辩术》、《辩论技巧》、《如何在辩论中取胜》、《雄辩大全》、《通往雄辩家之路——辩论学导论》、《讲演辩论中的逻辑诀窍》、六本;如果把与口才、演讲和语言相关的书都包括在内的话,那还有《讲演心理探讨》、《语言的文化阐释》、《语言逻辑引论》、《脸部语言》、《演讲与美》、《最新谈判竞争术》、《祸福一句话》等等。不必全部列出了,因为后面一部分书好些我自己也没有看过,只是当时抄录在案备查询的。如果谁有兴趣的话,还可以出更多的作品来。对于不是以辩论演讲为职业(包括我们辩论队全体在内)的人们,要把这一领域的书全部读完,那是不现实也不必要的。这方面的书我认为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有关技巧的理论书;二是各种精彩辩论、演讲的集子。当然也有些特定的书是两者兼而有之的。如果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对这方面书上,特别是上述第一类书的研读上的话,那结果常是走入“死读书”的误区。

1993年11月,一些刚进校的同学参加辩论比赛,请我去帮他

们作些辅导。倒也不是“好为人师”，只是情面难却。讲了一些具体技巧之后，和他们聊起在看些什么书。一位胖嘟嘟的同学颇有点自得地跟我说：他那些天一直在看《辩论家手册》，其他书都不看，在这本书看完以后再找几本书类书来钻研，争取在短期内使自己的辩论水准有一个大的提高。我听了以后说了自己的三点想法：第一，在具体的辩已临近时，把时间更多地放在对特定题目的准备上，收获会更大一些，所谓“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在此时作“长线投资”是不适宜的；第二，辩论技巧和个案分析方面的书要看，但更需要博览群书；第三，从较长时期看，要切实提高论辩能力，必须阅读与“实战”结合为。顺便提一下的是，那本《辩论家手册》对辩论爱好者来说倒的确是一本好书，国内1991年的译本依据的是英国米契尔·雅各布逊编著的第17版，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该书众1896年问世以来所受欢迎的程度。书是“围绕若干人类历史上的经典论题”和“世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展开针锋相对和全面系统的辩论”的集子，属于我在前面提到的第二类书的范围。辩题虽从形式上立足英国，但实际上涉及的面很广，将它称作“论辩经典”并不为过。我在大三的时候阅读过，觉得无论在技巧还是知识积累方面都是获益匪浅的。不过“过犹不及”，所以才对那位同学说了我的前述想法。

我不知道那位同学会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我的意见。但我想，要有鲜活的辩论，一味钻在一类书的堆子里总是不行的。鲁迅先生说：“不要‘读死书’、‘死读书’，是很值得玩味的。”

记得在复旦的系际辩论赛和上海市的校际辩论赛中，都曾有过关于“通才”和“专才”孰优孰劣的辩题。客观地说，当然是要“一专或几专多能”。而对于“散打”式辩论风格形成所需的知识积累而言，无通才是应被提倡的。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博士生导师陈鸣树教授在一篇题为《我赞成通才教育》的文章中提到，他在美国访问

时,得到某著名大学给该校所有博士生开列的必须通读的书单,其中包括柏拉图的《对话录》,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中国的《论语》、《庄子》,印度的《吠陀经》,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康德的三大批判等,因为校方认为,作为学历层次在到博士的人,必须是经过人类最优秀精神财富的熏陶的,而不论他从事的是哪个专门方向的研究。举这个例子,并不是说所有欲要提高论辩水平的人都要接受与此相同的训练,但是雄辩的境界是只有在雄厚的知识底蕴之上才能达到的。

2. “九流十家”与“五花八门”

“散打”式辩论风格要形成,应该有一个较长期的知识积累过程。因为为了实现多点攻守,必须有在各点上的知识准备。在辩论的混沌态中,我们很难事先知道对方用什么理论和事实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如果对对方的材料不熟悉甚至不知道,一场辩论中这样的情况多了,那想要表现出“散打”式风格,也必是捉襟见肘,“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

辩论所需的知识,可以说既要“九流十家”,也要“五花八门”。

“九流十家”之说最早见于西汉刘歆《七略》中的《诸子略》,其将先秦和汉初诸子的思想分作儒、墨、道、法、名、阴阳、纵横、农、杂九流,这九流加上小说家又成十家。其本意是先秦至汉初学术思想流派的总称。吴晗先生讲提倡“杂家”,也是据此为基的。不过,在这儿,我用这个词来泛指书本知识。“九流十家”在其本意上即已是社会生活的诸多侧面所提炼而形成的,而在后来的历史流变中,其内容又不断增加,早已超出“经”和“史”的范畴,即便是《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之类也是远不能涵盖的。再论及“古今中外”,那么书本知识又已不知翻了多少番,尤其是在今天这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

说到“五花八门”，最初的五花指五行阵，八门指八门阵，都讲的古代战术中变幻多端的阵势。现在的使用义当然和原来的意思相去较远，主要是用来讲事物的花样繁多了。而我在此用来指超出书本范畴，不可胜计的各种知识。

辩论从其最终功能来说，应当是交流思想，明辨事理，不能以辞害意，不应为了炫耀知识的“渊博”，而使论点淹没在既有的知识之中。但真的学富五车者是何其的少，“半瓶水效应”又是何其的多见。因此，提倡“九流十家”和“五花八门”利大于弊，如果把它当作一个辩题，那么反方实在太困难了。

先说说“九流十家”。在激烈而正规的辩论场上，对信息量（在此仅以书面信息为限）的要求是相当高的，我的发言所涉及的书面知识可以归纳为如下诸方面：

(1) 历史(含典籍)

第一场：《论语》中“在陈绝粮”、“君子固穷”等；

—— 伯夷，叔齐，苏武，陶渊明，朱自清；

二战时的英国民众；

古巴比伦王国，罗马帝国；

欧阳修，笛卡尔，范仲淹；

《邱吉尔传》；

《荀子》中“争则乱，乱则穷”。

第二场：越战。

第三场：《论语》中“吾日三省吾身”；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真龙天子。

(2)新闻

第一场:日本政坛丑闻。

第二场:盖洛普民意测验关于美国人对艾滋病的心理恐慌;

《侏罗纪公园》;

纽约曼哈顿的防止艾滋病游行;

艾滋病患者数字统计;

世界艾滋病毒携带者数目澳洲人口数。

第三场:《联合早报》报道的台湾“千面迷魂盗”。

(3)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与宗教

第一场: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杜维明:《新加坡的挑战》;

和尚尼姑修身养性。

第二场:娼妓、一夫多妻制、同性恋、性教育;

社会系统工程。

第三场:周口店猿人遗址的同类相噬痕迹;

《人类的起源》;

佛祖释迦牟尼。

(4)自然科学

第二场:艾滋病的要传染;

安乐死;

艾滋病疫苗。

第三场:可白尼的日心说;

达尔文的进化论；

弗洛伊德学说。

(5)诗歌和书面欲语

第一场：“饱暖思淫欲”；

裴多菲的《自由与爱情》；

“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

第二场：“此恨绵绵无绝期”；

柳宗元《江雪》。

第三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学好三年，学坏三天”；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心有灵犀不点通”。

从上面的清单可以看出，一个辩论员在三场比赛所提及（当然不是全部展开，的书面知识即达五大类（属于相当粗线条的划分）42点，涉及的范围可以说相当广，而这些是在大约12分钟的讲述中表述出来的！没有一定的信息量，要想以“散打”的方式在辩论中取胜是很难想象的。至于较为广博的知识积累，自然不是“临时抱佛脚”便可以完成的。

接着再谈谈“五花八门”。书固然是要读，但正如孟子所言：“尽信书不如无书”，如果读书的结果是在中世纪的修道院里辩论“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或如原来的浮士德，在其书斋中一坐50年，那是一种悲哀。书外的世界很精彩，中国的古人讲“读书卷书，行万里路”，叶圣陶先生在他的读书诗中讲：“天地阅览室，万物皆书

卷”，确是很有见地。

读本科时很喜欢上一门叫“律师实务”的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少疑难案例中表现出深谙世情的律师等人有过人的才智，能依靠书本外的知识赢得了论辩的成功。

“揭被夺镬”是一个很有名的个案。清朝的一个男子抢夺一位熟睡女子手上的镬子事发，判状上原来写的是此人“夺镬揭被”。官衙内的一个聪明师爷受人之托为其开脱，于是建议将案情陈述中的那四个字变了一下顺序，变为“揭被夺镬”。这样男子之罪一下被减轻很多，因为第一种情形下，“夺镬”和“揭被”可以构成两个单独的罪名，而且后者前者更严重；而第二种情形下，“揭被”成了“夺镬”的条件、预备，此人仅有“抢夺”一罪了。清朝时各府衙内养了不少师爷，其中尤以绍兴人居多，因为主体性很弱，并常有“挑讼”等事，所以后来民间流传把“绍”字说成“一张苦嘴，一把刀笔，搞来搞去，终是小人”，成为对绍兴师爷的讥讽，但平心而论，其中的优秀者不拘泥经书，经留心生活，灵活应对，巧辩脱罪，还是有很多可学习之处的。

再早如明代冯梦龙所辑的《智囊》与《智囊补》中“语智部”里的善辩之士，莫不是通达世故的人。

在《狮城舌战》中，王老师提到选拔赛时的一个回合：“当对方一位同学说‘毛驴没有污染，但是你能骑着它走上杨浦大桥吗？’这位队员的反应是‘难道你认为毛驴真的没有污染吗？’引起了听众的热烈反响。”其中的“这位队员”就是我。王老师对这一回合表示“欣赏”，认为“这一回合，不能说特别的精彩，但是一种‘本能辩论’的最好的反映。”并指出“只有当辩论发展至‘本能辩论’的时候，才可能会有机智和幽默，有知识的最恰当的运用，有灵敏的反应。”王老师从这一角度作的分析应该说是独到而粗当的。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一回合的成功也在于迅速调动了“五花八门

中的生活知识。

至于说到“五花八门”的具体内容，正如其字面表达的那样，试图作穷尽列举是没有意义的。综合“九流十家”和“五花八门”，一言以蔽之：世事洞明皆学问。从形成“散打式”辩论风格的“知识积累”之准备来说，是没有止境的，正是“学海无涯”。不断的积累，其意义自然绝不仅在于辩论：

刘向说：“书犹药善读之可以医愚”。

诸葛亮说：“才需学也，不学无以广才”。

顾炎武说：“君子之学，死而后已”。

苏格拉底说：“知识是最美的，无知是最丑的。”

门捷列夫说：“生活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寻求新的知识。”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

3. 绝知此事要躬行

毫无疑问，知识积累对于“散打”式辩论风格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辩论毕竟不是知识的堆积，仅有关于辩论的理论素养和其他较为广博的知识也还是不够的，必要的准备是不能将实战训练排除在外的，正如陆游所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对于以“散打”的方式进行辩论，我自知离“绝知”还相去甚远，但对提高水准需“躬行”却是有切身的体会的。

第一次上场参加辩论，能听到自己心在“咚咚”地跳，自由辩论开始后，老觉得节奏特别快，想以自己一方准备的框架去对照对方所说的话时，常是跟不上，自由辩论我说了些什么，守则虽即几乎回忆不起来了。幸好情势在对方回避发言时有了改变，因为对方四辩一位女同学，也是第一次参加辩论，讲话很轻且条理不甚清楚，

我忽然觉得有了信心，相信自己一定能比她讲得好，果然发挥还可以，不过也基本上是准备好的稿子的表述。很显然，以这咱状态，要进行“散打”是困难的，因为“散打”还有点似散文，要“形散而神不散”，只有在全局上有较强的驾驭能力，头脑清醒，才能实现。后来我的一位队友告诉我，那次他在场上时觉得腿肚子打颤。

多少不等、程度不同的怯场或许会在每个刚开始参加面对公众进行辩论的人身上出现；而一旦紧张，要想挥洒自如，压制住对手，调动现场的观众，都是相当困难的。有效地办法是多经一些场面，多参加辩论的实战，从而丢掉包袱，轻装上阵。因此，实战的第一点功能是减轻怯场感。

然而事物的变化又往往很容易地会导致走向其原来状态的反面。辩论过几场以后，发现自己还能赢得几次观众的掌声和笑声，于是自我感觉便有些良好起来，依仗一些积累，开始大量地在辩论中抛诗词、歌名、广告语、俗语以及名人名言等，有哗众取宠之状。这种情况在我第二次参加系际辩论赛时的一场复赛里达到“极致”，我的陈词和自由辩论可以说从头到尾都充满着了为获得现场笑声效果的“材料”，说得不好听点，就是“噱头”吧。结果，比赛是赢了，但评委和观众对我这场表现的评价却不怎么高。辩论也是要讲求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的，如果观点都被淹没在为了取宠而制造的“繁花艳草”之间，甚至以辞害意，那是得不偿失的。话又说回来，在场上辩论时所使用的语言又应是与日常用语有较大差别，需更加凝炼、优美，不然，当人们兴致勃勃前来观赏比赛时，发现场上双方论争所使用的语言产实得如自己在场下和别人闲聊一般，那么，失望之情的产生便是不足为怪的了。因此，形式选用上“度”很重要。我还记得从新加坡回来后，辩论队参加上海市东方电视台“东方直播室”谈放节目时，张谦讲过的一个故事：

富兰克林·罗斯福第四次当选美国总统，一次，一位记者采访

他，请他谈谈四连任的感受，罗斯福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拿了一盘色拉请这位记者吃。总统请吃东西，记者当然受宠若惊，风卷残云，把这盘色拉吃光。罗斯福便又拿了一盘同样的色拉请他吃，记者还是努力很快将它吃完了。结果罗斯福又拿出第三盘来，记者觉得很在些诧异，但还是硬着头皮把这盘色拉吃下去了，这时，罗斯福竟又拿出了第四盘！记者吃了两口，终于实在撑得吃不下了。于是，罗斯福对他说：当总统和吃色拉一样，重复得多了，便会乏味、倒胃口。

辩论中也有同样的道理。我这里不是指参加辩论多了兴味减弱的问题，而是说为了吸引观众注意等的技巧用得过多，效果会适得其反。而以在场上过度兴奋导致“张狂”回落，也是需要在辩论的实战中摸索、体味的。

就在经历了上述复赛之后，我在半决赛里有了良好的发挥，那场辩论的题目是“商品意识排斥理想主义”，由于充分的准备和曾有的经历，在场上始终保持很强的自信；又由于有上一场失误的教训，“幽默炸弹”、新奇事实和精彩的名人名言等的使用也是适量、适时。比赛结束，我被评委评为那场比赛的“最佳辩手”，我们队自然也是顺利闯入决赛。而就在不久前，我现在同寝室的一位同学跟我说：他仍然对那场比赛中我的表现有相当深的印象，认为从反应灵敏度等自由的方面来说，决不亚于我在新加坡参加大专辩论会的三场比赛中的表现。

因此，实战训练的第二战功能是可以消除场上的过度兴奋，达到适宜的“表现度”。

我曾对辩比赛的认识过程作过一些思索，认为存在这样的“复归”：

第一阶段：辩论难。

对于没有或极少参加过辩论的人来说，当观看过诸如 1988 年

亚洲大专辩论会决赛录像以后，会觉得真是唇松舌剑、反应奇快，字字珠玑，水平之高实在有些不可思议，如不是有极高天份者，难以胜任，辩论实在是太难了。

第二阶段：辩论易。

如果自己参加过几场辩论，或是了解了一些辩论准备的情况之后，“神秘感”大概会急速地减弱，知道了原来辩论不都是场上临时的反应，而是要经过较长时间的材料收集、立论设计、“炸弹”制造等工作的，可以写好陈词稿子，带着卡片上场。原来辩论没什么了不起，辩论易！

第三阶段：辩论还是难。

随着辩赛场中感受的进一步增强和对辩境界更深的领悟，身在辩论之中的人对第二阶段的认识一定会有根本性的修正：要以程式化的准备和拘泥于卡片的发言去赢得辩论是不现实的。称辩论是“知识的较量、智慧的较量智商的较量”并不过份，雄辩需要有深厚的底蕴，需要包括心理、语音语调以至手势、形态在内的综合配套支持。在新加坡赛制之下，两队之间的对抗其实从辩题明确之后便开始了。而要以准备的材料在场上灵活运用，对对方的言辞作出恰当有效的反应，更非一日之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认识完成了其复归的过程：辩论还是谁！

而唯有在这样的认识指导下，辩论的实战训练才能得到更为有效的展开。

在集训期间，我们受训的主要内容是两大块：一是知识的补充。听“九流十家”的讲俯，看“九流十家”的书，还有观摩录像资料和出门参观访问。另一块便是实战训练了。

进行辩论的训练，必须天天“开口”。训练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既有前面已提及的完全仿新加坡赛制的四对四辩论和作强化的三对三，二对二，一对一以及一对多辩论，也有对给出的材料作

反驳的与假想对手辩论。

四对四的辩论在集训中期以后几首是每天一场，我们的主要对手便是由林老师指挥的国际政治系研究生陪练队，有时俞老师和林老师也会亲自披挂上阵。记得一次辩题为“后现代主义是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的主流”，俞老师做二辩和我们四人对垒，他对当代西方哲学深奥理的娴熟把握，令我们不断露出破绽，疲于抵抗。辩完后，我们都很“忿忿”，说他“以大欺小”，我则归其为法律逻辑上的“诉诸无知”。随后，我们即向俞总发出“通牒”：一定要给我们开几讲关于当代西方哲学的讲座，俞老师欣然应允。那段时间，由于白天都有一台精彩的学术讲座，所以晚上的辩题便往往由讲座内容引发出来，比如白天讲军备控制问题，晚上就会辩“核扩散是可以控制的”。这样一方面提高辩论技巧，另一方面也是对所学知识的巩固。

三对三的辩论主要在我们六个集训队员内部进行，三人一组以“同室操戈”；二对二的辩论主要练两人之间的小配合；一对一的辩论则主要是使每个人体味总体框架在整场辩论中的逐步展开过程；一对多的功效，很显然，是强化单兵作战能力，确保能在高压之下产生迅速的反应。

与假想对手的辩论也往往是有趣而有难度。这种形式的一般与朗诵练习和阅读相联系。其程式是这样的：在给定的材料朗诵或阅读完毕后，在极短的时间内概括出该材料的几层意思，然后马上对这些意思逐层反驳。王沪宁老师曾经说过：“对作为比赛的辩论而言，天下没有不可辩的题目。”因此，即使选用的材料是经典性的学术名著片断，也要针锋相对予以驳击。于是，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密尔的《代议制政府》、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以及尼采的《查拉斯图如是说》等名作中的一些风点纷纷被抽出来作“攻击”的靶子，不知这些大师若地下有知，是不是会对这种缺乏“费厄

泼赖”的“竞争”表示强烈抗议。

专项训练也有不少，练得最多的是成语和下定义。

成语训练先从“接龙”开始，即六个人，一人说完一个成语，下一个人要在三秒钟内讲出以那个成语最末一字开头的成语，依次进行，循环往复，尽最大可能不出现中断。在辩论比赛中，成语以其言简意赅“富有美感的优点而有着重要的作用。能够准确、灵活、适量地运用成语，将使辩论员的表达锦上添花。而要在高度激烈的对抗中将成语脱口而出，不至于“语到用时方恨少”的感觉，频繁出现，首要的就是掌握的成语要多、要熟。“接龙”中有时卡了壳，顾问教练们就会让大家将相关的成语都念出来，倘遇着不知其义的成语，那更是要迫个“水落石出”不可。接着，在尽可能多地掌握成语的基础上，开展“成语辩论”。这种辩论训练，主要是看谁成语运用得多，有的虽然牵强一些，或同样意思用许多成语来表达，都可以，以量为上。在这种专项训练中，由于“政策倾斜”的激励作用，成语便源源不断地涌流了出来，有一场不到半小时的辩论训练，一共竟用出了350多个成语，我一个人就用了98个成语，算是创下了纪录。在训练的后期，我们还以成语作辩题。老师们拿起成语辞典，预先说好页码和序号，翻开后，只要那个位置不是特别不能辩的成语，就将该成语用作辩题，譬如正好翻到“掩耳盗铃”的话，那么正方就辩“掩耳可以盗铃”，反方则辩“掩耳不能盗铃”。

“下定义”的训练也别开生面，往往在两人之间进行。由教练指定某事物后，稍作几秒钟准备，一人即对该事物下一个定义，另一个紧接着便起来对此定义予以反驳，抓其漏洞辩论便展开下去了。有时这样的辩论也由人员自己的确定物事。以下一段是一次我和李翔进行的小辩论节选（根据回忆整理）。

严：酒杯就是供人饮酒用的一种容器。

季：北方一种供人饮酒的容器，但那叫酒盅，不叫酒杯。

严：酒盅难道不是酒杯的一种吗？

季：当然不是。而且有人直接用瓶喝酒，此时酒瓶也是供人饮酒用的一种容器，难道酒瓶又成了酒杯的一种吗？

严：酒瓶是供人装酒用的一种容器，“供”表示目的，饮酒和装酒是一个目的，饮酒和装酒是一个目的吗？

.....

这一绝对算不上是“下定义”训练中的精彩之作，但比较典型。从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出这种训练还是容易操作的，并且由于准备的时间极短，又以抓漏和护短为明确目的，所以难免有诡辩的成份在其中。但这种训练无疑也是有益的。下定义方要力求做到民维缜密，“定义”圆而不滑；反方则须提高判断力和求异思维力。至于可用作定义的事物那可说是包罗万象：桌子、沙发、电视机、显像管、风筝、雷、电、咳嗽、历史、爱情、伦理、美……

专项训练除了上述两者之外，还有排比训练，反诘训练、简明用语训练等多项，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辩论能力的提高必须通过多次专项和总体实战训练才能获得。如果说“散打”式辩论风格体现出来的是“合零为整”的话，那么实战训练则要反过来进行，更多地是“化整为零”，每次练习，有所侧重。

散打式辩论风格的有意识培养，无在知识还是实战训练方面都是没有终极的，提高能力总体上是一个渐进过程，而有时在阅读或论辩之间，也会有“顿悟”。王国维先生对治学之境界有过粗辟的论述：“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

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其实，对辩论的理解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三 以正合 以奇胜

在进行了比较全面而自觉的准备之后，“散打”式辩论风格会在正式的辩中逐渐显现出来并得到完善。对于风格，代表复旦大学参加1988年亚洲大专辩论会的罗洁和鲍勇剑同学曾有这样的论述：“辩论风格是否特点鲜明并适合题目的性质，对辩论效果有着极大的影响。它可以烘托、渲染战略意图，使论辩具有丰富的感染力，进而调动场上场下的情绪，而对对方的情绪产生抑制的作用。”“然而，风格的合理确定有较大难度，它需要考虑多种复杂的因素。大而论之，是要考虑辩论场内观众的文化背景和他们对语言的美学态度，还有对手的文化层面、语言风格交锋时的效果等等；小而论之，是要考虑针对辩题性质所使用的严肃程度，幽默程度、气势和轻重缓急等等，甚至在辩论过程中，还要考虑一些突发因素。”这段论述强调的是，整个辩论队要根据各种因素在可能的范围内对风格进行选择。而就一位辩手而言，在他表现出的是“散打”式辩论风格时，他必定是在辩论的前期准备和舌战过程中也进行了多次选择的，选择的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咱风格运用的成功。

1. 材料、材料、材料

在各种选择之中，材料的处理无疑是最重要的，尤其是事实材料。对于在新加坡赛制下确定为担负“散打”任务的选手，其任务用“事实”来概括也是可以的。对于其他形式的辩论，没有大量事实的

支持要形成“散打”，同样不可思议。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1988 年亚洲大专辩论会时鲍勇剑的一些发言：

第一场 辩题：“在目前局势下，联合国没有存在的必要”

(正方：澳门东亚大学队；反方：复旦大学队)

联合国是具有成员最广、职能最齐备的国际组织，经社理事会、世界银行、贸发会议都作用非凡。这些组织在成员结构上，包揽南北、聚集东西。在职能上，可以说是上至天文地理、下到衣食住行，大至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到关心渔民的工作条件。真可谓是想人类所想，急世界所急。

第二场 辩题：“庞大的人口是第三世界国家的负担”

(正方：复旦大学队；反方：马来亚大学)

……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就造成了庞大的人口，造成了庞大的消费需求，形成了与弱小的生产能力之间的畸形对比。这样，将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就是寅吃卯粮，坐吃山空。以粮食为例，在非洲，70 年代的年平均增长率是 0.1%，但是，到了 80 年代的今天又怎么样呢？竟是以 1.1% 的速度在递减，这种危害，这种负担，难道还不够沉重吗？君不见，在墨西哥，在孟买，几十万人奔向了城市，他们曾经满怀希望，但却都加入了失业的大军，他们过着天当房、地当床的流民生活，哪里还有什么温馨和幸福可言呢？

第三场 辩题：“儒家思想可以抵御西方歪风”

(正方：台湾大学队；反方：复旦大学队)

我请问对方同学，如果有入持刀抢劫你钱包，你是对他念一段《论语》呢？还是让警察把他抓起来呢？我想大家都会选择后者的。新加坡正是这样一个以法治国、综合治理的好例子。

以上三段辩词分别出现在那届比赛的预赛、半决赛和决赛中，其共同特点是都通过事实来映证观点，而再分析一下，则可以发现还有如下一些特点：

- (1)事实点”跳跃性大。围绕一个主题，从某事例可以跃迁到时空差别都相当大的另一事例，以多点强化对问题的阐述。
- (2)对事例的表达凝练。事实的主要优点在于证明性强，易被观众接受，主要缺点在于信息量相对较小，这就需要通过对它的提炼，扬长避短。
- (3)事例扣题紧。虽然“散打”的思路要开阔，但切忌“放得开而收不拢”，而而无当。

对于辩论比赛，在材料运用上仅做到取舍这一步是不够的，必须“深加工”。深加工的成功与否，往往直接关系到材料的运用能否产生效果。在“儒家思想可以抵御西方歪风的辩论中，那场的最佳辩手顾刚就充分展示了对材料驾驭和加工的能力。以下是他的两段发言。

陈词之一：

在孔子的时代也有歪风，正所谓歪风代代都有，只是变化

不同。孔子做鲁国司寇(相当于今天的司法部长)的时候,齐国送来了一队舞女,鲁国的季桓子马上“三日不朝”,而对这股纵欲主义的歪风,孔子抵御了没有呢?没有,他带着他的学生“人才外流”去了。(知声、掌声)这能叫抵御“西方”歪风吗?

这段陈词中顾刚巧妙地古今连用,以纯粹当代的“抵御纵欲主义的歪风”之语来统领孔子离开鲁国这个本来大家都很熟悉的故事,切题而有新意:“人才外流”一语更是神来之笔,勾画出了儒家面对“东方歪风”手足无措的窘态,且由于台大队在前一场比赛中辩论的主题是关于第三世界国家人才外流能否抑制,因此立刻取得了很好的现场效果。

陈词之二:

我们还可以看看,在儒学数千年的流变过程中有没有抵御呢?没有。董仲舒的“天人相应”变成了迷信;宋明理学的“天人欲”又是何其残忍;至于八股举士更是扼杀了多少像对方这样的青年才俊啊。这些糟粕都已被从戴东原到胡适,从鲁迅到殷海光的诸位大师们否定过,难道能凭这些儒学来抵御现代的西方歪风吗?显然不可以。关于新儒学在当代的地位问题,对方同学可能是想得太好了,不知对方同学可知道台大历史系的黄俊杰先生有查个著名的论断,那就是:“儒学在当今的东亚社会还是一个命运未卜的风凰,”它要涅槃,首先要完成它对自己的道德观的约束的解脱。也就是说,如果它不摆脱自身旧有的道德观,它就无法在现代社会立足,而我们又怎能要求一个自己没有涅槃的思想去超度西方歪风之下的芸芸众生呢?

这段陈词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听来确实让人有气贯长虹之感。在材料加工上，首先由古及今，对各最重要之点择需而取，由点串线，给人以历史的纵深感，说服力很强，在一定意义上，是有效信息量的胜利。而选用对方所在的台湾大学学者之论断，则可谓“借力打力”，别具匠心。其次，在言词对材料的“包装”上，前段的排比，简明而层层递进，散而不乱；用凤凰涅槃作比，结合引用，既雅又全合底线（我们也爱孔子，但儒家思想不能抵御西方歪风，因为它理论上没有这个功能，实践中不可能，抵御西方歪风必须依靠综合治理。”）这段陈词的最后以反诘句结尾，力度颇足。

当时比赛在双方直接对垒之后，还有一段时间是留给观众提问的，结合辩论回答问题，亦是颇需功力。也正是在这一场，顾刚曾有过一段堪称“经典”的问答，摘于下：

观众问：

请教反方同学，刚才在对儒家思想的历史性的分析时，大致上有这样的意思，儒家思想是先天不足而后天失调，后天失调仿佛尚能接受，但是何为先天不足呢？谢谢。

顾刚答：

很高兴这位先生接受了后天失调的观点，那么我们再来说说它的先天不足。我很爱孔子，孔子是一个坦荡的君子，孔子做事从来不隐讳自己的失败，也子当鲁国司寇的时候，曾要根治鲁国的淫风，鲁国有一个人叫公慎氏，有其妻而淫，孔子很愤怒，要他改正，但是这个人改正的方法是什么呢？是“出其妻”，离婚了。也就是一个歪风没有治好，离婚率又上升了。（笑声、掌声）像这样的例子实在是比比皆是。我在看典籍的时候，常常为之而叹息，但我也就此而理解：为什么孔子老是说

“吾道不行矣”，为什么孔子老是说“凤鸟不至，河图不出，吾已矣失！”对方同学是不是也“心有戚戚焉？”（笑声、掌声）

这一段不是辩词，但如果没有辩论到一定境界，是很难有这样“嘻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应答的，其具体的精妙之处不用赘析亦已是能让人立时感受到的。我想再提及的只是如果没有对事实等材料的深加工，是不会有这样的文辞的。当然，这里所说的“深加工”，不可能是对特定问题分析、琢磨很长时间，其发生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的，然而要具备这样的能力却需要长斯的积累，厚积才能薄发。

“散打”式辩论风格中材料的处理可以归结为以下四原则：

- (1) 在大量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必须对材料进行取舍；
- (2) 所选用的材料应是主题密切相关的；
- (3) 材料的面要广，切忌相似材料的叠加；
- (4) 对选用的材料应深加工，包括用语凝练。

如果作再细微一些的考察，还应有如下一些注意点：

(1) 材料的雅俗搭配很重要，雅与欲的选择既应根据论辩对手、现场听众等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也应根据主题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 (2) 不同句式表达出来的材料给人的感染力往往是不同的；
- (3) 准确的数字无可辩驳；
- (4) 名人名言必须是在一定范围内具有高度权威性才予引用；
- (5) 诗词和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必须确切无误；
- (6) 加工材料印证观点不能牵强附会。

一场辩论比赛，如果一方能在材料运用上进退自如，洒脱遣调的话，那对于争夺胜利是相当有益的。我们不妨看一下1988年亚洲大专辩论会大决赛的时常驻评判谢雪华女士的一段评决发言：

“正方理论比例子多，反方例子比理论多。正方谈理想，谈潜移默化，从积极的一面来谈怎样用儒家思想去改变人性，这些是很抽象的概括，假如能够举出更具体的例子，那就会更有说服力。反方谈实践，他们提出了要用综合治理来抵御西方歪风……”

谢女士温文尔雅的不俗谈吐中委婉地指出了台湾大学队的弱点：事例运用不够成功。

而当时新加坡《联合晚报》的一篇评论文章则明确冠以《复旦重实践举实例 台大败在空泛理论》的标题。其中有两段这样的点评：

“正方台湾大学队虽由辩题为‘儒家思想可以抵御西方歪风’而占据预想中的有利地位，但论点趋于说教，‘理论比例子多’，未能打动人心。”

“反方上海复旦大学队技高一筹，不谈空泛的理论而谈实践，‘例子比理论多’，从历史观至现代观证实孔孟之道对东方歪风、西方歪风皆无能为力，论据较能令人引起共鸣。”

应该说，这两段评论是点出了那场比赛胜负天平倾向产生原因的关节的。

散打式辩论风格在辩论的各种风格中属于特点相当鲜明的一种，而其“多点攻守，以点带面”便是在对材料的选择、加工过程中得以实现的，并且这种选择“加工都不可孤立进行，必须相互呼应才能生出无穷变化。孙子认为“战势不过奇正”，“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辩论也正是如此。材料之涌流而出，“正”“奇”叠现，将辩论的混沌态放大，在与对方各点的短兵相接之中，将大势引向己方，乃是“散打”式风格中“适机而动，乱中取胜”的意旨。

当然，“散打”式辩论风格不仅体现的对材料的处理上，它也是

各因素综合的结果。

2. 材料之外的选择

“散打”式辩论风格的落脚点在“打”，因此在面临对方的攻击时，主要选用的战术是“强压”。辩论比赛中，对方取得效果的攻击，尤其应作为强压的对象。

在1993年国际大专辩论会的赛场上，我所采用的第一个战术便是强压。那场比赛，就在对方三辩陈词即将结束，下面应由我来反驳时，他的话锋突然一转，直逼我而来：

“人一生只有一次，你不能用社会逼人。假如我们现在十个人投票，赞成说将对方第三辩的财富充公，来满足大家的需要（笑），这是公认的，这样是她的吗？（铃响）谢谢。”

他的这段话进攻性相当明显，使得在一点上“冲突”已被挑起，而且该点又是小处见大，直接影响对双方论点的论证的，因此，如果采取回避的态度，那无疑在该点上要失分。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即是：从原路将坚决顶回去。于是我说：

“如果我的财产充公，能够为很多的人谋福利的话，那我想，我会选择这样做的，因为人要做有道德的人。”

此语一出，立刻赢得了掌声，压住了对方的势头，为我接下来的辩论作了较好的铺陈。这一战术选择我称之为“抢占制高点”。

同样这一战术，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不选用原路回击法，而是“迂回包抄，断其后路”。

比如我们参加的半决赛中，对方三辩在陈词的开头部分就讲道：“那么我想请问对方同学：如果有一个1—2岁的婴儿被感染，你对他进行性安全教育是必要的吗？”

这个提问直指我方立论的关键：社会系统工程的功效。而且问题本身又是“出乎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场上的笑声和掌声表

明了观众的赞赏。这样，大家就都在等着看我如何对付这个棘手的问题，回避是不行的；原路硬冲回去，讲“就是对婴儿进行性安全一教育”，无疑是荒谬之至，结果我采取了迂回的办法：

“至于说到小女孩，当然我们不要对她进行性安全的教育，但是对她的母亲当然要教育，样才能防止艾滋病的母婴传染呵！”（掌声）

一下子将该点上的形势扭了过来。

有时候，如果对对方产生强烈现场效果的辩词不置可否的话，那便意味着在该点上的完全退却，将该回合的分数拱手相送。大决赛中的一个例子是典型的。季翔说：

“对方辩友，难道你们还要对着《天龙八部》中恶贯满盈，无恶不作，凶神恶煞，穷凶极恶这四大恶人谈什么人性本善吗？”

其时《天龙八部》的作者金庸先生就在现场当评委，题材又是东南亚一带观众相当熟悉的（季翔讲这段话时，电视镜头正对准了来出席的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准将，只见他也在开怀大笑），现场效果相当好。对这样的话不采用强压战术，那对正方必定是相当不利的，然而，比赛自始至终未见台湾大学队队员提到这一点，对他们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那么，这段话是不是不可驳呢？并非如此。

当我们在中央电视台“12 演播室”制作专题节目时，主持人问道如果我们是正方，面临这样的攻击时将作什么反应，并和我们作了一个简短的模拟辩论，当时我说道：

“就让我们来看看对方辩友爱谈的‘四大恶人’吧，所谓无恶不作叶二娘，原来也是良家女子，只是由于后天环境才导致作恶的；至于位列四大恶人之首的恶贯满盈，不是也在父子亲情的感召下，对延庆太子的本善人性复归了吗？”

这样的反驳是基于小说的内容，由原路回击和迂回相结合而完成的，朱路回击指的是反方讲“四大恶人”表明了人性本恶，而正方分析出“四大恶人”表明人性本来是善的，迂回则指正方反击时不是正面辩论“四大恶人”是不是恶人，因为这没法辩，而是追根溯源，看他们本来的状况。

那么，正方如果辩到这一步，反方是否就没法回击了呢？也不是。比如反方可以进一步追究：“导致叶二娘堕落最终的后天因素是什么呢？是当时人视作至善至德的少林寺方丈年轼时无凶制的本能和欲望啊。”这样应答还是和小说内容相扣的。毕竟，“天下没有不可辩的题目”。不过，一点的攻守也要适可而止，否则就是“散打”，而是局限于一点上的“死搅蛮缠”了。

在谈完“强压”的各种变化之后，还是要回到“适机而动”上来，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对方攻击都要强压下去的。有一些是攻击本峰无力，还有一些则是如予回击，耗费的时间太长，或是可能扰乱本方整体攻防的部署。

体现“散打”或辩论风格，不仅要通过对内容的选择，还要辅以对手势、语气等的灵活运用。

合理手势的设计、选择，本身即已构成一门学问，无论是演讲还是辩论，富有个性而又切合主旨的手势可以起到很好的增色作用。在“散打”式辩论风格中，由于点点之间跃迁大，手势更要随之而有变化，在手势种类单调而又习惯性频繁使用时，首先必须做到“宁缺毋滥”。

语气与内容的联系更加紧密一些。而表征于外的语气来源于对所讲述内容的理解。比如：

当我讲“孔子对子路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时体味的是一种浩然之气，而当我讲“面对着这些贫寒但是高贵的灵魂，来自英国的对方辩友难道还要告诉我们‘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

件’吗？”时，我使用的是恳切坦诚的语气。至于在讲“日本可以算是富甲天下了吧，但是政坛丑闻却不绝于耳。竹登被贿赂蹬下了台，宇野宗佑被美色诱下了水，而金丸信呢，终究未能取信于民”时，谨慎的语气自然要被选择了。

“散打”式辩认风格的内容是丰富的，运用是高度灵活的，真正的钻研是没有止境的，契合于辩论的混沌态，有其绰然独特之姿。作为初窥门径者，我对它的感悟可以用龚自珍的一句话来概括：

天下没有八百年不变之天下，而有亿万年不变之道，道即变。

技巧与超技巧

——辩论技巧的艺术

季 翔

雄辩就是说话艺术，其要求如下：（一）

听我们说千方百计的人不会觉得是一种痛苦，而觉得是一种享受；（二）他们自己感兴趣，而至爱会使他们更加乐于对我们的话反复进行思考。

——西赛罗《论义务》

自从《狮城舌战》问世以来，不少朋友看了我的文章都说“一点正经也没有”，心里颇不是滋味，于是毫不犹豫地写下了这个正而又经的题目，冒着板着脸孔教训人的危险，预备讲一些枯燥的甲乙丙丁。

所谓技巧，是谈论怎么办的问题的，而不是讲是什么或为什么的。

所谓超技巧，是当别人也知道了该怎么办的时候，你再怎么办

的问题。

好在接下来要讲的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切身体会，如同“钢铁是怎样烧成的”一样真实。

一、攻守辩证法

至今，还记得我们为四个月的训练中苦读《孙子兵法》的情形，将兵法用于辩论，虽不能严丝合缝，却也颇多相似。当然由于年轻人有求完美的性格弱点，故对不能通达之处也尽量穿凿附会，比如读到“计篇”中的“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我就把它戏解成“听王总俞总的话，可留下；不听王总俞总的话，就赶走。”

几千年前的田忌用兵法指导赛马，几千年后的日本人靠《孙子》管理企业，前者成为千古美谈，后者造就了当代奇迹。可见，兵法是用入竞技之法。

攻与守是相对的两个端点，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构成了一条轴线，所谓兵法便是以攻守为两极围绕这根轴线旋转而成的一个球，外圆内方，绵里藏针，含而不露，蓄势待发，这便是中国学问的大境界。

1. 以攻为首

孙子曰：“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①①} 这位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军事家的阐述他的军事思想时一点都没有小农的保守消极。同样，在凝聚着人类几千年智慧结晶的辩论术里，“进攻”也有着执牛耳的作用。

辩论是进攻与防守的综合艺术，顾头不顾尾的蛮攻和忍气吞声的呆守都会造成灭顶之灾。但一支队伍在决定采用什么战略时，

^① 《孙子·虚实篇》。

即是取攻势还是守势时，往往只有一种选择，分散力量，平均用兵只会一事无成。所以，本节先介绍攻术，下节着重谈守术。

新加坡式的辩论由于提前将题公布，使得在正式比赛前有相对较长的一个缓冲区（二周左右，但双方立场须临时抽签决定），选手们有足够的时间对辩题进行深入的剖析，构建自认为最坚固的理论体系，精雕细琢，直到感到无懈可击为止。对于一支经验不足的辩论队伍，到了场上他们就会洋洋洒洒地把准备好的东西一一抛出，这便是俞吾金教授定义的“翻斗车心理”。这种源于人们追求尽善尽美的本能冲动，表现为敝帚自珍行为的辩论方式将导致陷入被动的防守（不同于下一节论述的主动的防守）。这也是我们在训练初期经常犯的错误，后来通过一系列强化训练，其中包括鸡里挑骨头式的抓漏练习，终于得以改善。

所以，对于一支素质较好、人员整济、准备充分、训练有素的辩论队伍来说，最经常、一般也是最奏效的战略就是进攻，进攻，再进攻。

在我们舌战狮城的三场比赛中，每一次上场后，我们都会从文件夹里拿出一张被称为“最高指示”的电脑打印纸，上面记录着一些关键性的提示语，第一条便是“攻势足球”，其他诸如“狭路相逢勇者胜”也是进言。我们正是挟着这把尚方宝剑，攻城掠地，一往无前。

那么，如何进攻呢？我认为可以从攻击的对象、方式、载体这三方面加以分析。

（1）从遇的对象上来看，可以分为以下几点。

其一，攻其要害。这是进攻的核心部分，是场上所有队员的兴奋点。如何才能发现对手的要害呢？杜维明先生讲要“目明耳聪”。目明，即要善于察言观色，从对手的一举手一投足之间发现端倪；

耳聪，则要做到耳听八面，从对手的话语和话语背后找到目标。

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训练，一名队员快速朗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某段3分钟，紧接着由另一名队员概括大义。艰深的哲学思想，译文特有的繁杂句式往往使得概括者不知所云，但也正是由于经过这样的严格训练，昌建才能抓住英国剑桥大学队辩手的“李光耀是总理而不是总统”的一字之误，发起进攻。

找到要害之后，接下来便是判断问题，特别是当发现对方有几个“要害”，就像姜丰所说的：“对方可攻击的地方太多了，我们攻击不过来啊。”这种时候，就不能感情用事，抓起机枪，猛扫一气，或是狗熊掰棒子，看见后面的扔掉前面的，而应统筹分析。

在辩论场上，一般我们要求在听完对方一辩发言之后，便应将对方立论的一二三四记录下来，至多在对方二辩巩固论点后，就必须找到对方立论的逻辑起点——要害，然后实施第一次打击。比如在复旦大学她们对悉尼大学队的半决赛中，悉尼大学队的一辩、二辩都没有阐述什么叫医学问题、什么叫社会问题，而这一点正是辩题中为双方预设的争论焦点。对方有意回避这个问题，说明这是他们的软肋，根据这一判断，我在辩词结尾的时候，便问对方：“艾滋病究竟是医学出了问题，还是社会出了问题？”果然对方难以回答。正如上面所述，一般反方二辩就担负着首攻要害的任务，这也正是我在场上的职责。但因为时间有限，有时二辩不可能将所有要害问题都点一遍，那么三辩就应自觉地继续进攻。对于这一点，严嘉在首场对剑桥大学队的比赛中就有上乘表面。剑桥大学队的立论基础是，“温饱是人类生存最基本最必需的条件，我们不能脱离温饱而空谈道德，道德就是看事物是否符合人的需要，所以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这个三段论中蕴含的矛盾是比较明显的。必要条件应该是“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的条件，在数量的要求上是极严格的，任何一个反例都能将它推翻；而不是像对方认为

的那样，少灵敏人温饱之前谈道德也不影响必要条件的成立。于是，我人首攻便确定在“请对方举出实例，哪怕一个，人类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一点道德都不谈呢？”但对方虚晃一枪，换了一个战场，仍坚持他们的温饱生存论。这是他们的另一处要害。此时，严嘉敏锐地指出“对方辩友将温饱这个衣暖食饱的概念混同于了生存。如果照此办理的话，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不温饱的人了，因为他们都不生存不活着了。”观众热烈的掌声说明对要害攻击是奏效的。

在判断出对方要害之后，还应克服另一种诱惑，那就是另的易于取得效果的攻击的诱惑。还是拿半决赛中的例子来说，当我听完悉尼大学队二辩陈慧的发言后，我的纸上已记了密密麻麻的半页，其中有“（对方说）在某些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在内同性恋是合法的，而且娼妓也在某些国家得到认可。娼妓不正是一个合法的职业吗？又是什么社会问题呢？（反驳）合法的就不是社会问题吗，美国的离婚率之高举闻名，离婚是合法的，但高离婚率不仍和高犯罪率一样是美国重大的社会问题吗？（对方说）如果对方讲不出用什么办法对付同性恋、性滥交，改变宗教观念或社会道德标准，只告诉我们这是社会问题，那又有什么意义呢？（反驳）如果我们现在就有万全之策对付同性恋、性滥交，那艾滋病早就不是社会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答案了。……”^{*}这些话如果讲出去，场上效果一定也不差，但这只是些枝节问题，不会使对方吃痛。权衡之后，我还是决定，首攻对方的要害——社会影响与社会问题截然不同，艾滋病造成的是社会影响，而不是社会问题。虽然这样的反驳未能赢得掌声，即战术效果不佳，但我想在战略上还是必须的。

这使我联想起有些朋友来信询问，“辩论是不是什么话能赢

* 这是经过整理的文字，辩论场上瞬息万变，语句自然不可能如此完整。

得掌声就说什么。”我认为并非如此，哗众能不能取宠姑且不谈，真正对观众有震撼力的还是那些有独到见解、言之有理的话语。

其二，攻其一点。刚才讲的是攻击目标的确定，现在我们来谈谈如何对目标进行攻击。毛泽东曾指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我想这也应是辩论中攻击者的座右铭。

新加坡式的辩是有着严格外在规定性的辩论形式，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时间有限，每场比赛，一到三辩的发言时间总计各人只有4分钟左右，四辩稍长，也只有5分钟（均包括自由辩论），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用言辞打动评委和观众，只有集 势兵力打歼灭战才能做么。

攻其一点中的“一点”，首先是指对方的观点，可以是其要害，也可以是我方事先设计的突破口。在这方面有大量的例子。比如初赛，我方抓住“对方须证明的是没有温饱就绝对不能谈道德”；半决赛中，要求对方拿出“判断医学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标准”；决赛中，追问对方“善花如何结出恶果”。既然是“一点”，就要求所有攻击者在攻击时打得稳、准、狠，信心十足，排山倒海，给对方造成巨大的场上压力，让评委和观众的兴奋中枢转移到这一点，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劲头。在采用这种方法时应特别注意的是，一旦攻击奏效，便果断转移战场，切忌死缠乱打，软磨硬泡，因为在这样做的时候，心中往往都存着一丝对方会服输的幻想。之所以说是幻想，是因为任何一支稍经训练的辩论队伍都不会低头认输的。辩论如同击剑，尽管伤痕累累，仍要拼命厮杀，最后让点数去定胜负，半途而废只能被视作懦夫。在辩论场上，既要有强者的坚毅顽强，又要有强者的当机立断。

攻其一点还可以指攻击对方的某一特定选手。既然伸出手指都有长短，那么一支辩论队中必然有强有弱，常常会有一两名队员相对弱一点。作为对手，一旦在定时发言阶段探准了虚实，就会在

自由辩论时集中火力，拣软柿子捏。

怎么样的对手可能成为“受害者”呢？一种是说话矛盾较多，容易让对手扩大战果的；一种是说话时间过长，容易浪费己方机会的；此外，反应较慢，知识面较狭窄者都可能不幸入选。一旦发现了猎物，猎手们就会设下天罗地网，常用的方法有：一是提示法，复述对方刚才讲过的一句话，找出漏洞，进行攻击，迫使讲话者补漏，这种方法较适合对付那些说话矛盾较多的辩手；二是点名法，提出一个刁钻的问题，指名由对方几辩回答，这种方法对付说话滔滔不绝的人特别有效，它能让对手宝贵的时间消耗于无形。另外，点名法还有其他一些妙用。在训练赛中，最令我们感到头痛的一件事就是不停地被对手点到名，回答吧，有受制于的感觉；不回答吧，又显得理屈词穷。几次下来，自由辩论的秩序就会被打破，情绪也容易波动。事实证明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但它并不是不可战胜的，辩论如同比武，你有蛤蟆功，我有降龙十八掌，你有伏魔杖法，我有打狗棒法，绝招从来都是相对的，有矛必有盾，又会再发明更厉害的矛。破解“点名法”的方法我将在以后的章节中介绍。

对于人的进攻也不能无的放矢，因为这种方式烈度很高，使用不当往往易造成人身攻击，所以使用时要很慎重。一是不宜多次使用，同一场辩论中以二至三次为宜；二是要注意对象性，一般对女辩手不宜追问，特别当追问者是五大三粗的男访问手时，颇有以大欺小，以势压人之感，不仅不会取得排山倒海的效果，反而会使评委和观众感情的天平向对方倾斜。

由此可见，所谓取胜之法，不过是统计学上的一组数字而已，如何运用，还须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

其三，攻其不备。医学和生理科学研究表明，人是一种很敏感的动物，换言之，对外界刺激有很强的生理性反应。当突然受到惊

吓时，肾上腺皮质激素分泌加快，表现为心跳加速，脸色苍白，呼吸急促，就是通常所说的大惊失色。攻其不备利用的就是一般人的这种生理弱点。

来狮城参加辩论的选手都是有备而来，志在必得的好汉，每一个辩题的前前后后，正正反反都是思之又思，所以一般不会有什么遗漏。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是不移的真理，越是多虑，自信心越强，攻其不备的意外感就越强。这项战术的摧毁度正是和对手的准备度成正比的。在对悉尼大学队的比赛中我们便使用了这项战术。

根据事前的分析，我们意识到悉尼大学队与我队相比，其优势在于信息拥有量大且新，他们在辩论关于艾滋病这一前卫性课题时，占有较大的物质优势。相比之下，我们国内对艾滋病的研究起步晚，病便少，可运用的材料相当有限，面对这种条件，我们通过看书、看幻灯、听专家讲课，调动了几乎所有可调动的资源，才对艾滋病的来龙去脉有了一个较清晰的了解。但我们觉得，法守还不够，在一个要求实证的辩题中，事实性材料占有一言九鼎的地位，不能轻易把这个战场让给对手，一定要在这个战场上给对手来个出其不意的攻击。于是，教练和队员们翻阅了大量的资料，分析对手的特点，终于设计了一个进攻点：“请问对方，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口号是什么？”这是一个听起来有普通的问题，如果答不上来，会让人觉得对艾滋病知之甚少。但这个问题又确实不易回答，因为比赛时是8月份，离世界艾滋病日12月1日还有三个多月，不是专业人员谁也不会关心。我们发现对方要蒙混过关，为了扩大战果，在对方回答后又临时加上一句：“对方辩友连这个基本的问题都不知道，怪不得谈起艾滋病问题来还是不紧不慢的。”以“不紧不慢”扣世界艾滋病日的口号“时不我待”相对应，这样的对比造成了比较好的效果。

(2)从攻击的方式上来看,可以有以下几种。

其一,强攻。就是针对对方立论的核心问题进行直接性的进攻,强攻不拐弯抹角,不作比设喻,中心就是一个设问句或反问句,但往往有一个铺垫,以帮助评委和观众了解发问的情境,为感情的拔高作好过渡。比如初赛中,蒋昌建说:“我方认为‘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我请问对方一个问题:贫困的社会中有没有道德?”这个问题针对的是对方立论的基础,可以说是攻其不得不守,很符合强攻的要件。

强攻一般宜由男辩手进行,因为男辩手大多嗓音浑厚,气守轩昂,有一泻千里的阳刚之美。但在特殊情况下,也可由女辩手选用。比如同一场比赛中,姜丰说:“既然对方辩友不喜欢谈仁人志士,那我们谈谈普通人……”,将对手牵扯进辩论中,这本来是烈度很高的一项进攻,但我相信任何一个看过这场辩论会录像的人都不会从这段发言里闻到火药味,因为姜丰用的是执象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的音调。倘若换成一个关东大汉,歌“大江东去”般地诘问,恐怕就会有人要说“先问问我的拳头答不答应”了。姜丰的这段处理将阴柔之美化入进攻,赢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其二,巧攻。这是当强攻无法奏效或根本不适于进行强攻时的选择。不适于强攻有两种情形,一是场上剑拔弩张,双方都过于强悍;二是强攻点是对方生死攸关之处,明火执仗不易得分。巧攻通常采用的方法是变形,如对剑桥大学队一役中,蒋昌建说:“对方认为,教唆一个人追求温饱这就是最道德的。我们教唆一个贫寒的人去抢麦当劳,看样子是最道德的喽。”这里利用了对方逻辑上的不严密,即追求温饱的过程中也是需要道德的,而抢劫麦当劳符合对方所说的追求温饱,而这种行为又是公认的不笔行为,这就使对方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从而产生了从抽象到形象的力量。试想,如果

最人士辩手不是用这种提问，而是生硬地来一句：“教一个人追求温饱难道是最道德的吗？”不仅不能打击对方，而且会在听众心目中造成一个“我方不赞成追求温饱”的不良印象。

巧攻有着事半功倍的效果是无可争议的，但是对辩手的素质要求也非常高。比如刚才那个例子，短短的两句话就包含着正反两套逻辑和三种语言范式。首先是对方的逻辑，即追求温饱是最道德的，但这套逻辑并不是对方明明白白告诉你的，任何一支高明的辩论队伍都不会轻易亮出自己的底牌，剑桥大学队也不例外。他们只是反复强调“对饥寒的人，我们最应该做的是让他们解除饥寒”（一辩语），“温饱是人类生存最基本最必需的条件”（二辩语），“资源要有，而且你分配后要达到温饱，才能产生道德”（三辩语），蒋昌建正是从这些语言中归纳出了对方的逻辑，并用形象语言加以表达——“教唆一个人追求温饱这就是最道德的”。我们且把这一语言范式称为“形象语言 A”。与对方逻辑一加对照，我方逻辑便清清楚楚，用我方的“抽象语言”范式加以概括，那就是“追求温饱过程中不能不谈道德”。为了增强攻击力，必须对我方的观点进行加工，把抽象语言变为形象语言，于是，说出了符合己方逻辑的形象语言——“我们教唆一个贫寒的人去抢麦当劳，看样子是最道德的喽！”且把这称为“形象语言 B”。这一个从对方逻辑——形象语言 A——我方逻辑——抽象语言——形象语言 B 的转化过程都发生在从剑桥大学队三辩吴俊仲坐下到蒋昌建站起这两秒左右的时间里，“谈笑间檣灰飞烟灭”，正是“厚积而薄发”的结果。

其三，反攻。当对方进攻时，就对方所使用的理论、事实等材料，就地加工，予以反击。

反攻要求辩手知识面广，反应敏捷，言语幽默。既不能答非所问，又不能不事论事；既要前后照应，又要推陈出新。比如在与剑桥大学队的比赛中，剑桥大学队二辩孙学军说：“据最近的资料表明，

二战中英国人民的温饱程度是有史以来没有过的，营养价值在当时食物平均配制度下是最好的。因此你 cannot 通过这个问题来否认，它是在温饱程度上讲道德的。”我方严嘉立即反攻：“《邱吉尔传》告诉我们，那时候好多穷人是怎么去填饱自己的肚子的呢？是去排队买鸟食，还买不到啊！”

对方的进攻实际上是对多方定时发言的反击，可能还是他们预想的得分点，但没有想到撞到了枪口上，反而使我方取得了极好的效果。原因就是严嘉具备了反攻对辩手的要求，由他进行反攻再合适不过了。

其四，对攻。对攻与反攻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针对对方进攻的反击，不同之处在于反攻是在原有战场上，对攻则开辟出一个新的战场。

开辟新战场的原因各有不同，可能是因为原有战场已多次厮杀失去新意，也可能新战场对我方利益重大。比如在决赛中，台湾大学队一辩吴淑燕说：“我倒想请问对方同学了，如果人性本恶，是谁第一个教导人性要本善的？这第一个到底为什么会自我觉醒？”听毕，我马上反驳：“我方三辩早就解释过了，我想第四次请问对方辩友，善花是如何结出恶果的？”在这里，我采用对攻的方法，是出于两个方面的共同考虑。对于对方的提问（实质就是“恶花如何结出善果”）这一点，严嘉在定时发言中已清楚地阐明，“人人皆自私，则无人能自私，权衡产生节制，这便是最初的善源。”对方继续纠缠这个问题，显然是想置我方于被动，这时应当机立断，脱身而出。另一方面，“善花如何结出恶果”是对方始终没有回答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对方的立论基础。即便对方四辩后来回答“因为后天环境跟教育的影响，使他作出恶行”，这也不能自圆其说。因为我们都知道，对方所谓的环境也就是物质的自然，这是无所谓善恶的，而教育则是人的教育，如果人性都是本善的话，谁会教人行恶呢？出于这两

点的考虑，对攻是较好的选择。

其五，蛙跳式进攻。蛙跳战术最早是由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发明的。当时日军占据着西太平洋上数以百计的岛屿，这些岛屿扼制着通向日落帝国的海上交通线，美军要逐一攻占这些岛屿必将付出惊人的代价。于是美军统帅部制订了跨岛作战方案，只对具有战略意义的岛屿进行重点占领，对其他小岛则只实施海上封锁。这样，美军如青蛙一样几下便逼近了日本本土，为投掷原子弹的 B—29 找到了前进基地。随着帝国的崩溃，那些孤岛上的守军只好不战而降，蛙跳战术也由此声名鹊起。

在辩论场上，同样也有一个从外围到核心的剥笋过程，对方对于重点防守的目标必然会设置重重障碍，如果逐步推进，必然会付出沉重的代价——时间。因此，蛙跳战术也同样适用于辩论。

比如在初赛，剑桥大学队三辩说：“我请问对方一个问题，又饥又寒的小孩子偷你一块面包，你会用道德惩罚他吗？”我立即反问：“难道法律中就没有道德观念吗？”在这里，原来的逻辑关系应该是：小孩偷面包能用道德观念吗？在这里，原来的逻辑关系应该是：小孩偷面包能用道德惩罚吗（言下之意是先温饱，后谈道德）——不能用道德惩罚，而应用法律惩罚——法律中也是包含道德观念的（不温饱时也要谈道德），但我在反驳中跳过了第二层逻辑关系。我这样做是出于以下两点考虑，第一，如果我按部就班地回答，既浪费时间，而且对方很可能不等我引出下一层逻辑关系就此转移话题，那样再回到这一战场就很困难了；第二，这样的跳跃一般人能够接受，不会产生思维断裂。如果跳跃再进一层，设有铺垫，直接说“从《汉谟拉比法典》到《大清律例》，从《宋刑统》到《权利法案》，请对方告诉我哪一部法律中不包含道德观念？”那么恐怕听众就难以理解了，这里就有一个度的问题，当年美军要是步跳到冲绳，而不经吕宋、瓜达卡纳尔，那么很可能海上生命线就会被

日军切断，腹背受敌。同样，在辩论中，采用蛙跳式进攻的时候，也要时时注意保护自己的生命线——逻辑联系。

其六，快攻。这是一种抢时间的方法，其目的是在自由辩论己方时间消耗过大的情况下，尽量缩短自己的发言时间，拖延对方时间，以期扭转局势。

比如在决赛时，我方自由辩论的提醒铃早于对方响起，这时，正好轮到一辩发言，姜丰果断地采用了快攻战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到底何为善？何为恶？”不仅句式短，而且语速快，对方如果接手，就会大量费时。快攻类似排球比赛中的短平快，追求的就是这种出其不意、落地开花的效果。

(3)从进攻的载体上看，可分为以下几类。

其一，进攻性的理论。它包括两类，一类是引用别人的理论，在这里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来不得半点虚假。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寻找和整理。比如我们决赛的观点是“人性本恶”，有关人性的理论几千年来林林总总，蔚为大观，讲性善的有孟子、朱熹、唐君毅；讲性恶的有荀子、弗洛伊德、马基雅维利；无善无恶说的有柏拉图、洛克等等等等。辩论的双方会根据自己的需要选取有用的观点构成各自的进攻性理论。但在各取所需时，千万不可一厢情愿，否则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比如决赛中台湾大学队一辩吴淑燕以康德的主张作为全篇的开头，听完她的发言，我和严嘉几乎同时各递了一张卡片给姜丰，上面写的是“恶折磨我们人”时而是出于人残忍的本性，时而是出于人的自私性”，这是康德的一句名言，对方在准备康德有关人性的观点时，竟然没有想到这句话，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失误。可见准备进攻性的理论一定要全面。相反，对于对方可能采用的进攻性理论要有所了解，以便借力打力，为我所用，达到出奇致胜的反攻效果。

进攻性理论的另一类是指己方的理论框架,这是活的理论,是可以根据己方对辩题的理解和论证的需要设计的。我们常说,为一场辩论作准备,就像创立一种学说,因为它具备一种学说的全部要素:鲜明的观点,翔实的论据,严密的论证。但是,这个框架不能只是一个四平八稳的系统,而应有针对性,是与对方可能的框架或者与辩题规定的对方观点针锋相对的,这说法是进攻性之所在。比如我们在初赛设计的框架:人类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谈道德,在追求温饱的过程中尤其应该谈道德。所以论证出温饱不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在这个框架中,第二句话的攻击性是很强的,我们举出的任何一个例子,都将不仅论证我方立论,而且同时反驳对方观点,因为“在追求温饱的过程中”这一时空限定把战场放在了对方的论证范围内,既然是对方的“领土”上作战,就不怕打碎瓶瓶罐罐,放开手脚,战力加倍。

其二,进攻性的事实。这是一个可塑性很强的领域。由于事物的两面性,一件事往往可以同时为正反两个观点作佐证,只要进行一定的加工。比如,我们地半决定担任反方时,用过“澳大利亚 1/4 的猫是艾滋病毒携带者”的例子,读过《狮城舌战》的细心读者可能会发现我们为正方准备的辩词中也有这个例子。同一个例子,用法不同,起到的效果就截然相反。在论证艾滋病是社会问题,而不是医学问题时,举这个例子是说明艾滋病造成的危害正波及社会的各个领域,连家养宠物也难以幸免,由此得出这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的结论。相反,当我们要论证艾滋病是医学问题,而不是社会问题时,那么针对全澳 1/4 的猫染上艾滋病毒这个事实就应强调另一个侧面,即艾滋病不是人的专利,不会对人构成的社会情有独钟,无社会性可言的猫也有生这种病的可能,这只能说明病毒是最主要的原因,而病毒是医学问题。这就是加工方法不同所造成的事实论证的天壤之别。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事实材料都有这么强的可塑性，不偏不倚地等待你的雕琢，相当一部分材料本身已有倾向性，不是偏向正方，就是倒向反方。这时，对辩手的要求就是通过进一步的加工使原来的倾向性更显著，更突出，从而铸造出见血封喉的利刃。

使事实材料具有进攻性，从实质上说就是在事实材料和辩论之间建立某种对话关系。

首先是与对手对话，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比如在和剑桥大学队比赛当中，我引过一段莎士比亚的名言“如果丧失天良，即使用钢盔铁甲包裹起来，也如赤身裸体一般。”这里用著名英国剧作家的话来反击“来自英国的对方辩友”，就在无形中增强了攻击力。同样，刚才那个例子，如果染上艾滋病毒的猫不是澳大利亚籍，而是日本的、阿根廷的，那么效果也会大打折扣。这里与对手的对话，不是为了加深双方的了解，而是为了加深对方的“伤口”。

其次是与辩题对话。初涉辩坛的朋友常常面对一大堆事实材料，却苦于找不着合适的论据，结果在辩论时枯燥无味，就事论事。这里面就存在着一个发散型思维的问题，在我们撰写这本书期间，昌建一位同学的女儿来上海玩，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叫王昶颖的小女孩，有一天，七岁的上学生突然大声宣布：“我知道她为什么叫姜丰了，‘江(姜)枫(丰)渔火对愁眠’嘛！”当时，大伙都吃了一惊，就问她是怎么想到的。她回答说从小她妈妈教她读唐诗，今天突然来了灵感。这个发散型思维的例子还不算典型，因为小女孩很可能是无意识。但这个偶然的例子给我们的启示是，发散型思维能不能培养？回答是“能”，在辩论的训练过程中，我们有一个专项训练就是“发散型思维训练”，方法是编故事，一位辩手在一分钟内想出一个荒诞的故事。在这里，一反平时的训练要求，越没有逻辑越好，越脱离现实越好；接着由下一位辩手来圆梦，“从无序走向有序。”刚开

始，我们对这项“新游戏”欣喜不已，觉得这是教练们给予的变相休息，但实践起来才发现编谎原来也不容易，费尽心机想出的东西往往三言两语就被搞定了。姜丰最喜欢讲童话式的，什么在漆黑的大森林里，杳无人迹，突然一位穿着白纱裙的少女翩翩而至……遭到的反驳不是跳伞说就是挖地道说，弄得姜丰一脸不高兴，认为“你们这些人根本不懂审美，把美好的事物庸俗化了”（在姜丰的心中，美丽的女子一定都是御风而行的）。正是经过一次又一次这样殚精竭虑的编造和揭露，才有了严嘉的那段信手拈来的《寒江雪》。材料与辩题在这个高度对话确实是很难了，但经过训练毕竟还是可以做到的。

最后是与情境对话。其中一种是与场景对话，即把辩题和辩论现场结合起来。比如姜丰在半决赛中的一次发言：“一个人打喷嚏不是社会问题，但如果我们全场的人同时打喷嚏，还不是社会问题吗？”原本虚无缥缈的辩题突然被镜头拉近定格在每一个观众身上，能不取得效果吗？另一种是与语境对话，即在特定的语境中使用特定的材料，以制造特殊的意义。也是姜丰在同一场的发言：“但是医学起作用吗？是DDI起作用，还是DDC起作用？就是连那个‘艾之敌’不是也敌不过艾滋病吗？”（艾之敌是一种药物AZT，我们把它音译加意译了一下）这是一轮谈药物的发言，文章就做在最后那个“敌不过艾滋病”上，如果平铺直叙地说“‘艾之敌’不也没起作用吗？”而没这个对话，对充其量不过是一次药物广告，而不能成为有杀伤力的武器。

其三，进攻性的语气。说到进攻性的语气，很多人会立刻联想到声色俱厉，义正辞严这些成语。不错，质问式的语气是很有进攻力的，它会在心理上给对手以压迫感，意志薄弱一些的对手甚至会在几问之后发生动摇。谎言重复千遍都会变成真理，更何况本来就带有真理性力量的进击呢？

但是，过犹不及，如果满场是质问，用单音量来表示力量的话，只会成为声嘶力竭的口技表演。语气只有丰富多彩，才能熠熠生辉。我一直难以忘记1988年第二届亚洲大专辩论会大决赛中顾刚的一段发言：“就让我们看看对方同学爱读的民国初年吧，从袁世凯到吴佩孚，到孙传芳，哪一个不尊孔，哪一个不读经，可是中国还不是被他们读得——百孔千疮吗？”“——”表示一个短暂的停顿，整段话气势磅礴、一气呵成，但最后对“百孔千疮”顾刚采用了一种快速轻声的处理方法，这一神来之笔立刻将这段反驳的风格由申斥转化成了挖苦，赢得满场掌声。这个事例说明，有时候重扣解决不了问题，轻吊却能完成。

在不同的情况下，不同特点的辩手宜采用什么语气，张謇珠老师在《狮城舌战》中开出了详尽的药方。总之，一个好的辩论队员，不仅应该是一个好学生，还应该是一个好演员。

其四，进攻性的气势。“复旦队学术底子较厚，言词精晰，临场反应迅速，整体呈现出一种能言善道、咄咄逼人的气势。”（摘自《中国时报》1993年8月30日）写这篇专稿的徐宗懋先生可谓是精于辩论之道的行家里手，早在1988年，他就对复旦的辩论风格有着较高的评价，这两次评价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咄咄逼人。

咄咄逼人可以说是理论上针锋相对，事实上寸土必争，语气上软硬兼施，但也可以说都不是。它是一种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感觉，是各种进攻性要素聚合裂变的产物。率复旦大学辩论队两次夺魁的主帅王沪宁教授对这种气势曾有过一个形象的说法：“当你面向对手时，你要觉得自己对这个题目全知全能，而对方是无知的，你不是在和他辩论，而是在教他。如果他反驳，那是说明他没听懂，你可以再教他一遍。记住你始终是老师，而他是学生。”辩论场上的为人师绝不是循循善诱的和风细雨，而更类似于禅宗的当头棒喝，直指人民性，从而气贯长虹。

“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①对于进攻者而言，到这样的风卷残云、雷霆万钧之势，便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2. 以守为攻

这里所说的守不是墨守陈规也不是守株待兔，而是孙子所说的“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守的结果是立于不败之地。

对进攻者而言，可以选择不同的进攻方向，优点是灵活多变；对防守者而言，可以构筑坚固的工事，强处在于以不变应万变。

好的防守者不是当敌人进攻时才披挂上马，匆匆应战，也不会去修筑一条大而无当的马其诺防线。他们像精明的猎人，寻踪访迹，在猎物的必经之途上巧妙地掘下一个陷阱；他们是智谋过人的统帅，不屑于疲于奔命地寻找战机，而是在自己选择的战场上和敌人作战。“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

面对这样的防守，进攻就从主动就成了被动，进攻得越是凌厉越是深受其害，就好像一只落入蜘蛛天罗地网之中的昆虫，每挣扎一下，身上的纹索就收紧一分。这使我想起一种对“读书无用论”的反驳。其实，用是否能带来经济效益来作为评判读书有没有用的标准，这本来就是提出“读书无用论”的人设下的一个圈套。反驳者拼命论证读书的人赚的钱比不读书的人多，结果就变成了造原子弹和卖茶叶蛋的比收入，拿手术刀的 和拿剃头刀的比工资，怎么比也比不出读书有用来。当然比不出，你用的是人家的标准，左冲右突仍然在如来佛的手心里。要跳出这个怪圈，首先就要打破旧的坐

^① 《孙子·势篇》

标系,建立新的标准,衡量一种行业有没有用,不仅是看自身的经济效益,还要看社会效益,读书能陶冶人的情操,丰富人的知识,其潜在的投资回报率岂是眼前的一两张人民币可比的。从这个例子中可见防守与进攻实在只是相对的一组概念,高明的防守者实际上是游戏规则制定者。

防守的过程一般包括构筑阵地、坚守阵地、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这几步。

(1)构筑阵地

辩论这个词实际上应该说是论辩才切更确切,因为总是先有论,才会辩。构筑阵地就是立论的过程。一个好的辩题有相当大的包容性,甚至有不可穷尽性。如何在这一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中间选择有利的战场是大有学问。如果选址不当,就会痛失街亭。

我们在半决赛中抽到了“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问题”的签,这个题目可以从艾滋病的易发性、高传染性、高死亡率的角度的来阐发,也可以从医学的无能为力来论证,但这似乎都不是最好的战场,因为对方对这些问题可较容易地进行反驳。比如艾滋病的种种特性都是源于 HIV 病毒,而病毒是医学问题;医学目前的无能为力并不意味着永远回天乏术,更何况正因为还未解决,才成其为一个问题。可见,这样的立论体系不容易站住脚。

上下求索,我们终于找到了建筑工事的地点,那就是判断问题的标准,提出“判断一件事是什么问题,就要看它在什么领域内发生、发展并加以解决。”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首先,艾滋病源于社会机体的综合病症;其次社会机体的腐烂使得艾滋病的蔓延如虎;最后,解决艾滋病的问题,只有依靠社会系统工程。环环相连,紧扣“社会”,形成了对我方较为有利的战略

态势。这所以有利，是因为利用了辩题给予我们的一个天然优势，即社会问题比医学问题的范围大，因地制宜自然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2) 坚守阵地

阵地一旦构筑成功，就不能放弃。在辩论时，就是要有一种誓与阵地共存亡的气概。

我的案头上放着一本《舌战大师丹诺辩护实录》，我最喜欢其中有关丹诺少年时的一段描写：

“丹诺家的人总是‘反对分子’。丹诺是传统的最新成长中的分子。人们可以信赖他接受一个题目不受人欢迎的一面，也就是听众中几乎每个人都不同意并且事先知道自己会说错的一面。他喜欢以下这种辛辣的感觉，当听众对他的对手报以的喝采声震撼了吊在墙上的煤油灯时，他却站起来，面对一群具有坚决敌意的脸孔，面对四五百个人，虽然他们的表情混合有嫌恶、不信和怀疑。”

丹诺就是由此而具备了超常的信心和毅力，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律师”，他那种知其不可而为的勇气产生了超乎寻常的力量，“每次辩护完毕，法庭悄然无声，法官都为他的辩护词感动得流泪。”

辩论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信心的较量，这种信心不是盲目的夜郎自大，刚愎自用，而应该是来自对辩题深入研究之后源于内心的充实与强大。它是因为对真理的信仰而产生的，这种理性的力量使得任何技巧都黯然失色。

我们前面讲进攻时曾提到过一种令人生畏的杀手锏——点名法。如何打破它的威力，我们在训练时曾长时间对此一筹莫展。有一次，当我们也依葫芦画瓢地追问陪练队的一位队员时，他身旁的辩友不慌不忙地站起来，从容不迫地说：“我来告诉你，……面对

这样的回答，我方立刻感觉到一股逼人的气势，如果继续追问，无异于街头小痞子的纠缠不清，无理取闹，在这轮“斗气”的较量过程中，自信的一方取得了胜利。

辩论就是朝对方说“不”的游戏，当你胆怯时，当你动摇时，就想想丹诺吧。

“他最大的狂喜就是孤军反击，他常常扮演未开始时就被打败的人，为一个无望的主张而作战。”

(3) 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进攻者往往盛气凌人，急于求成，这使得有耐心的防守者有机可乘。孔雀在开屏时，才会露出平时不易发现的丑陋部位。

有一个著名的关于哲学家和船夫的例子。一位哲学家坐船渡河，突然，睿智的哲人问正用力桨的船夫：“你懂数学吗？”船夫摇摇头，哲学家不无遗憾地说：“那你就失去了 $1/3$ 的生命。”隔了一会儿，哲学家又问：“那么你懂哲学吗？”船夫还是摇摇头，哲学家感慨道：“那你只剩下了一半生命。”这时，一阵大风掀翻了船，哲学家和船夫都落到了水中，精通水性的船夫从容地划着水问哲学家：“你会游泳吗？”苦苦挣扎的哲学家大叫：“不，我不会。”船夫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那你将失去全部的生命。”

相信读过这个故事的朋友都会讥笑哲学家的浅薄和卖弄，而我注意的则是船夫，他的摇头使得哲学家一步步落入自己设下的逻辑陷阱，此时无声胜有声，这是一种高超的诱敌深入的技巧，而最后的神来之语将哲学家在一招间击垮。这位船夫绝对不是那位自负的哲学家想象中的无知粗人，他对哲学的理解、对生命的感悟远远超过了那个“自作孽，不可活”的对手。

以静制动，后先制人是讲求含蓄容让的中国哲学所推崇的，早

在几千年前的春秋时代，那位布衣出身的军事家曹刿就提出了“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著名论断，这和孙子兵法中“击其惰归”的思想不谋而合。防守不是作茧自缚，而是以守为攻。好的防守是比进攻更高明的艺术。因此，一旦确定了防守反击的战略之后，你就要修炼鹰一样的眼睛，狼一样的耳朵，豹一样的速度，熊一样的力量。

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

二、武器和武装

如果说攻守之道是兵法中形而上的部分，那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之类无疑就是形而下的那部分“器”了。在战略上藐视敌人之后，该是到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时候了。

1. 常规武器大观

(1) 速战速决

孙子说：“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辩论时如果能用三个字讲清楚的事决不用四个字。听众是根据你话语的说服力而不是成语的富集度来打分的，千万不要以辞害意。

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个哑谜，那是在新名词盛行的年代里刊载的一篇学术论文中的文字：“审美主体对于植物的生殖器官这一审美客体生理上的冲动所引起的内心愉悦的感受。”这句玄而又玄的文字，说的就是“闻花香很舒服”。辩论中千万不要打这样的哑谜，否则会有很强的“可笑性”的。

(2) 因粮于敌

“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敌二十钟；食敌一石，当敌二十石。”这确实是比较粮烧草更厉害的一招。

当然，辩论时的因粮于敌不可能把对方的话照单全收，但有选择地“来料加工”还是可以的，这种策略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

相传禅宗五祖弘忍传授衣钵之前，便令众弟子写偈语，选来选去，悟道最高的一张是他的得意弟子神秀所作：“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不使惹尘埃。”弘忍思忖之际，忽然一位扫地的僧人贴出了一张偈语，内容与前一张丝丝相扣，弘忍一见，立刻授以正果，这个僧人就是后来光大禅宗的六祖慧能。那张偈语是这样写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山有相至无相，窥破了佛学的不传法门。这种因粮于敌的境界恐怕不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可及的了。

(3) 排山倒海

排山倒海是形容气势极盛的词，实际上是一种规模效应。规模效应最初是一个经济学用语，但在日常生活中也普遍适用。举一个常见的例子，一位相貌平平的姑娘走在街上是不太引人注目的，倘若是一群姑娘走在街上，即便没有一个是相貌出众的，也会引得较高的回头率，是这个群体使得她们光彩照人，这便是审美中的规模效应。可见，经济学上的规模效应是扩大规模以减少投入，而我们这里所说的规模效应则是扩大规模以增加产出。

在新加坡的辩论当中，我们有着大量的这样规模的效应的例子。“荀子早就说过：‘争则乱，乱则穷’，所以我们走向温饱的过程中，更要谈道德，否则不就是越走越穷，什么时候才能达到温饱呢？”（初赛姜丰语）“对方认为贫困向温饱的追求过程中，可以不谈道德，这就告诉我们一个所谓基本的理论，就是‘天下大乱，才能天

下大饱’。”(蒋昌建语)“如果这样的话,恐怕不是‘争则乱,乱则穷’,而是‘争则乱,乱则饱’了。”(严嘉语)在较短的时间内,三位辩手围绕着荀子的“争则乱,乱则穷”进行了多轮进攻,这样高密度地使用同一项材料使得攻击首尾相应,联为一体,比“零敲牛皮糖”要有力得多。另一种方法是高密度地使用同一类材料:“我来告诉你,治疗现有艾滋病患者需要的钱相当于澳大利亚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这是医学界能够担负得起的吗?”(半决赛,季翔语)“世界上已有 1400 万艾滋病毒携带者,相当于澳大利亚全国的人口,这个问题难道不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严嘉语)两次用“澳大利亚”的情况来比较,使得对方有口难辩,确实起到了排山倒海的效果。

(4)别出心裁

如果说,“排山倒海”追求的是语言和材料的共性的话,那么“别出心裁”的追求的则是与众不同的个性特征。

这样的例子出现在 1988 年亚洲大专辩论会决赛中,李光斗的总结陈词:“我们迢迢于秦皇的铜车马前,无一不感叹它的精美,但是谁也不会驾着它驶上薛尔斯桥。”薛尔斯桥是新加坡最大的一座桥,将秦皇铜车马和薛尔斯桥这两样时空悬殊巨大的东西突然结合在一起,可谓是别出心裁,这种方法常常取得良好的幽默效果,我们管这类幽默叫作“反差型幽默”。可见,“别出心裁”的威力就在于这个“别”字上,思路越特别,前后文的反差就越大,效果也就越明显。

(5)强加于人

强加于人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根据对方已有的逻辑推理出一个必然的荒谬的结论,归谬的目的是使得原本不很明显的错误成倍地放大,直到能被第三者识别和判断的地步。比如在半决赛中,

在讲到吸毒是导致艾滋病泛滥的一个原因时，我就用了这种方法：“如果吸毒不是社会问题而是医学问题的话，那么新加坡中央肃毒局就要改成中央消毒局了。”这里，对方的逻辑是，造成艾滋病的原因不存在于社会机体当中，而众所周知，吸毒是造成艾滋病蔓延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且按照对方的逻辑进一步推演，必然导出“吸毒不是社会问题而是医学问题”的结论”那么原来担负解决社会问题任务的肃毒局就要转变职能，成为解决医学问题的消毒局了。这最后的引申部分对方并没有说，而是我们加上的，但从必然性上看，这个结论并不是与对方逻辑毫无关系的，这就是“强加于人”的要点所在。

2. 核武器揭密

在辩论中，有一些技巧是具有普遍性的，它们不会因为时空的变化而失去作用，掌握这样的技巧，无异于拥有了一枚具备超强威力的核武器。

(1) 高空爆炸

张谦在《狮城舌战》中写到，“辩论和书画是一个道理，入了门之后就不再是口舌之争了，而是比文化底蕴、比气质、比智慧。”一句话，立意要高。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场下的深谋远虑带来的是场上的居高临下。纵观新加坡的三场辩论，我方立意均要比对方高出一筹。

初赛辩题：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

（正方：剑桥大学队；反方：复旦大学队）

正方:有充足的资源,并且分配后能达到温饱才能产生道德。

反方:谈道德是基于理性的人,只要人类存在着,就能够谈道德。

谈道德是基于社会整体发展的价值选择。

谈道德是基于人们摆脱贫困的热望。

半决赛辩题: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

(正方:悉尼大学队;反方:复旦大学队)

正方:人得了病就要从医学角度去治疗和防范,因此艾滋病是医学问题。

反方:判断艾滋病是什么问题的标准是看艾滋病在什么领域里发生、发展并加以解决。

决赛辩题:人性本善

(正方:台湾大学队;反方:复旦大学队)

正方:人性本善,恶源自外界环境。

反方:从事实判断,人性本恶。

从价值判断,人可以扬善避恶。

一方较高的立意使得双方在不同的层次上作战,其产生的辐射性效果波及到整场辩论。

(2)理性冲击波

常有人问我,“你认为辩论场上最有攻击力的是什么,是事实

的生动吗？是感情的丰富吗？是语言的幽默吗？”我觉得，辩论场上没有一样东西是最重要的，也没有一样东西是不重要的。只能说什么比较重要，而理性的力量正是比较重要的因素。

新加坡报界曾对我们四个人的风格有过一次总结，给我的评价是“严肃理性”。而我自己觉得是严肃有余，理性不足。真正有贯穿力的理性不是靠板起面孔、压低嗓音获得的，它是知识和人格综合的体现。

在这一点上，我们的主教练俞吾金老师给我们的影响很大。俞教授不仅有渊博的知识，而且有高尚的人格，他是集哲学家的微言大义和教育者的身体力行于一体的典范，在我们的辩词中，时时体现出这样的影响：

“我当然不喜欢（杀人放火），因为我受过了教化。但我并不以我的人性本恶为耻辱。”（决赛，季翔语）

“我们相信，通过传统文化的精华，必将使人类从无节制的欲望作出合理地扼制并加以引导，从他律走向自律，从执法走向立法。人类才可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而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决赛，蒋昌建语）

这样的力量是一般的理论、事实和情感都无法阻挡的，这种冲击波所引起的是心灵的震荡。

（3）寸土必争

王沪宁教授对于辩论的胜负之道曾有过一项精妙的比喻：“辩论队就像是一个手里捧着水的人，滴水不漏是不可能的，关键是漏得少一些、慢一些。”滴水必争，寸土必争也就成为辩论的准则。

我们在场上有一张清单，上面列明对方所有值得攻击的地方，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方取得效果的话，对于这类话，是必须予以从严、从快惩处的。

对方取得效果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得分，这里颇像票据中承兑制度，出票人开出一张汇票并不意味着付款人就有了付款义务，只有当付款人承诺汇票将兑现之后，付款关系才确立。同样，在辩论时只有当我方默认了对方的攻击，对方才会得分。如果我方不予“承兑”，相反进行有效的还击，则对方不仅可能得不到分，反而会失分。比如在半决赛中，悉尼大学队的蔡美龄提出了要不要对小女孩进行性安全教育的问题，这个讲法很诙谐，取得了很好的现场效果。我方三辩严嘉本着寸土必争的原则，对这个问题知难而上，取得了更好的效果。像这样精彩的对抗除了知识的对抗之外，更主要的是心理的对抗，要相信自己急中生智的能力。事实证明，“防冷涂的蜡”不仅仅出现在舞台上。

3. 武装到牙齿缝

参加 1988 年亚洲大专辩论会的复旦大学代表队曾经把自己叫做 B—52，原因是每个人上场时都挂著各式各样的武器。我们这次虽然没给自己贴上 F—117 之类的标签，但在西装革履这内，个个也都是“面目狰狞”的。

根据俞吾金教授的统计，场上一方灵活对应的时间只有 6.5 分钟，占总发言时间的 38%；而全场比赛时间有 17 分钟之多，也就是说 62% 的时间是可以精心准备、能够进行充分的战前武装的。而另外的 38% 的时间，辩手也不是赤手空拳的，这个问题留待以后再谈。

(1) 底线与分工

每一场辩论，双方都有一个对辩题的基本认识，是防守的基线 and 进攻的出发点，退此一步，绝无生路，这个共识便称为底线。底线一般包括以下几部分：一是对辩题的解释，二是对辩题的论证，三

是对与辩题有关问题的协调。下面以初赛为例说明底线的构成。

辩题：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

复旦(反方)论点：温饱不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

对辩题的解释：

温饱指的是“衣暖食饱”，即社会总体上无衣食之困。

谈道德包括个人修养品德，社会弘扬公德，政府倡导美德。

必要条件指的是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

对辩题的论证：

在不温饱的情况下，谈道德的事例比比皆是。

道德是随着人类的诞生而出現的。

在追求温饱的过程中尤其应该谈道德。

对与辩题有关问题的协调：

温饱之后，道德水准也举自然而然地得到提高，有时甚至会倒退。

理性的人存在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

这其中有些问题是每一位辩手都要强调的。比如，对于尚未实现温饱的人，谈道德不仅应该可能而且尤为重要。有些问题则应该由各位辩手分而述之。这就牵涉到分工的问题。

新加坡式的辩论我们是按照起、承、转、合的顺序，或者说是采用逻辑、理论、事实、价值的分工。一般来说，一辩要系统地阐述本方底线，解释各种概念，描绘辩题的社会历史大背景，并为以后的展开部分作好铺垫。一辩的定时发言条条框框较多，内在逻辑性很

强，不允许加入太多的油盐酱醋，因此一不小心就有说教之嫌。己方观点在一辩的时候，如同一个初生的婴儿，能否存活，还没有经过世事的检验，但“三岁看到老”，这个阶段是基础和关键。

二辩则承继一辩观点，主要对底线中“对辩题的论证”部分进行系统阐述，以理论为主。二辩是做长骨头的工作，因此不必急于取得轰动性的效果，听众是不会对一具骨架太感兴趣的。

三辩的任务是事实论证，这到了填补血肉的飞跃阶段，一个蹒跚的婴儿至此成为一尊丰满的躯体，他的一笑一颦都显示出生命的活力与光彩，所有人都会给他鼓掌、为他倾倒。

四辩时，肉体的生育已告结束，通过与对手的搏击，这个生命的各个侧面也已展示给世人，接下来就看它能不能涅槃了。四辩的任务便是给肉体赋予灵性，最终完成他的精神发育。登高一呼，应者如云。

四位辩手各自牵引着这个生命走过一段历程，给官的不同时期深深地打上具有个性特征的烙印。但他们决不应仅仅把自己视为是一个阶段的监护人，他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对整个过程负责，同气连枝方能同心协力，他们的共同点就在于使这个生命搏击出最璀璨的光辉，无论是在婴儿阶段，还是成熟以后。

如何塑造一个生命呢，换言之，怎样才能使一段辩词脉络清晰又生动翔实呢？还是让我们来举一个例子，这是严嘉在初赛中的发言，请允许我将它全文抄录于下：

严嘉：谢谢主席，各位好。如果我的财产充公，能够为很多人谋福利的话，那我想，我会选择这样做的，因为人要做有道德的人。（掌声）今天为什么我方观点跟对方会出现定主我上的如此大的差别呢？是因为对方辩友将温饱这个衣温食饱的概念混同于了生存。如果原

此办理的话，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不温饱的人了，因为他们都不生存不活着了。（掌声）但是世界上还有很多不温饱的人存在啊。下面我从事实的角度进一步论述我方观点。

第一，在贫困的情况下，完全可以谈道德。鲁哀公六年，孔子和他的众学生“在陈绝粮”，困境之下，孔子是否就不谈道德了呢？孔子对子路说：“君子困穷，小人穷斯滥矣”，其实，在中国历史数千年的流变过程中，从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到北海牧羊的苏武，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到拒斥嗟来之食的朱自清，众多的志士仁人无不以其德行甚至生命，驳斥了认为只有在温饱过后才能谈道德的“肠胃决定论”。二次大战的时候，面对法西斯的疯狂空袭，英国民众也并没有放弃他们讲求道德的绅士传统。热爱祖国、伸张正义的信念使得众多尚处在不温饱状态下的英国民众们顽强抗争着。面对着这些贫寒但是高贵的灵魂，来自英国的对方辩友难道还要告诉我们“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吗？

第二，即使温饱了，富腴，道德水准也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就得到提高，有时候甚至会倒退。中国就有句古话，叫做“饱暖思淫欲”，而古巴比伦王国、罗马帝国的由盛及衰，正是由于其举国上下，不重视道德修养与道德教化，物欲横流的恶果。日本可以算是富甲天下了吧？但是政坛丑闻却不绝于耳。竹下登被贿赂蹬下了台，宇野宗佑被美色诱下了水，而金丸信呢，终究未能取信于民。（掌声）

第三，对于尚未实现温饱的社会来说，谈道德不仅

仅应该、可能，而且尤为重要。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理论，杜维明先生的新儒学与工业东亚的阐述，无不表明了道德在社会发展中巨大的不可替代的推进作用。在经济资源愈是匮乏的时候，良心和社会舆论就愈是应该而且可能承担它们的责任。历史和现实都已经昭示了我们（铃响），谢谢。（掌声）

从结构上看，辩词的第一段是针对对方辩友发言的反驳，里面运用了诸如“寸土志向争”、“攻其要害”等技巧和策略。

第二段到第四段是从事实角度进一步展开，论证完全是围绕底线进行。虽然是三段事实论证，但每段的侧重和特色各有不同。第二段首先用半文半白的形式讲述贫困下谈道德的先驱——孔子，点明历史起源，接着二个排比勾勒出时代发展的线索，表明了贫贱不能移的普遍性，这里作小结的“肠胃决定论”是颇有攻击力的。最后，采用了“与对手对话”的方式再次点题。这一段基本上以大义凛然的正面陈述为主。第三段话锋一转，进入严嘉驾轻就熟的讽刺与幽默。先以古巴比伦王国和罗马帝国作一下铺垫，然后三个谐音句把气氛推向高潮。第四段是知识密集部分，将实证性的阐释推进到理论化的公式，加强了观点的不可辩驳性。

这篇辩词应该说是比较典型的辩论型文章，特点是时空跨度大，古今中外，既有旧史，又有新闻，层次丰富，既有理论佐证，又有事实说明；可读性强，既有抽象分析又有形象论述。读起来铿锵有力，一气呵成。只有这样的辩词才能在最短时间内给予论点最充分和有代表性的论证，使听辩论成为一种享受。

衡量一篇辩词的武装度如何，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度量指标——单位时间内的有效信息量。这个词的前身是我们的老校长谢希德教授提出的“单位时间信息量”。谢老在观看了1988得复旦大

学辩论队的一场练习赛后，针对有些队员废话较多的缺点提出了这个辩论专用语。我们根据需要进一步完善成“单位时间内的有效信息量”。这个指标的意思是一个辩手在某一时段能提供的并为听众所接受的信息单位。之所以要加上“有效”，是因为在辩论中常有一些选手盲目堆砌材料，拼命加快语速，词中虽然金子不少，但由于泥沙俱下，很难让人慧眼识真金。辩论和任何其他带有表演性质的形式一样是双向的，台上台下需要交流和理解，所以那种只图痛快发泄，不管听众没有胃口的方法，是辩论之大忌。

（2）自由辩论自由吗？

从广义上讲，自由辩论是可以准备的，可以准备一些短小的资料，有进攻力的问题，当然更主要的是准备所要开辟的战场。所谓战场，就是己方想在哪儿几个地方与对方交锋，不打无准备之仗。比如在与台湾大学队的决赛中，我们就开辟了三个战场，一是善花如何结出恶果；二是人性本善的“本”是原始社会进化论上的“本”还是人一生下来的“本”？三是打语录仗。但是，辩场如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对事先的准备必须随机应变。比如，我们开辟的三个战场有的只打了半个回合，而“语录仗”整整打了五个半回合。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辩论又是无法准备的。

所以说，自由辩论的自由是有规则的自由，可以制造些炮弹带上场，但是否发射却要临时判断；可以规定一般的发言次序，但也不禁止“抢档”，如果你有惊人妙语能将自由辩论中的自由和规则的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的辩论队是令人生畏的。

总之，武器是人的奴隶，一个武装到牙齿缝的人更要超然物外。

三、技术艺术化

如果说第一、二节讲的是零碎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有用之术，那么这一节要讲的就是整体的，难以捉摸的无形感觉了。远远不敢说照这个法子去练就会成为辩论艺术家，用这个题目无非是想说明任何一样东西到了后来都有些可望而不及的成份在里面，若是不想去追求这部分，就感悟不到其真谛。

1. 全息胚

常常有感于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庄严与神圣，运动员沐浴焚香，所有的观众穿着节日的盛装，运动会举行的日子便是斋戒期，在那段时间里，所有人的心目中只有那团圣火。体育在那个时代绝不仅仅是一项竞技术，而是有着完整的外在仪式和内在感受的艺术。

我希望辩论也能成为这样。

早在赴新加坡之前，在学校的各种辩论赛事中，许多辩手就有一个习惯，在每场比赛之前须沐浴，开始是为了使自己更精神，后来便成了习惯，不仅是外表的修饰，更是内心的准备。

在新加坡，每次早早地用完晚餐，便在休息室闭目养神，脑子里什么都不想，静静听自己的呼吸和心跳，慢慢便似乎到了入定的境界。临上场前五分钟，生物钟将我唤醒，与严嘉对辩几句，达到最佳兴奋点。

有时，为了试验话筒，主办当局会在正式比赛之前安排一场热身赛，辩题往往很放松，诸如“妇女是否应该走出厨房”。但对我们来说，与对手的较量是不存在放松这个概念的，无论是练习还是正

式比赛。在和剑桥大学队的热身赛中，我方显示出逻辑的极大混乱，严嘉有一次发言甚至反串了对方的论点，我们的对手明显地露出了不屑的神情。没想到，正式比赛中的复旦大学队与先前判若两队，自由辩论中剑桥大学队屡次出现冷场。比赛一结束，剑桥一辩汤之敏便跑来问王老师：“我没给复旦丢脸吧？”（汤去英国前在复旦就读）我们的“强而示之弱”的战术奏效了。

相反，在与悉尼大学队的战前接触中，我们采用了先声夺人的策略，力争在正式比赛前就给对方造成心理包袱，几个攻击波下来，本来就胆气不壮的悉尼大学队队员有些面面相觑了。

在比赛中正好有阴历七月七——中国的情人节，台湾大学队给每个队送来一盒精美的心形巧克力，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心理战。

据说在1988年辩论赛上，复旦大学队曾有过一个不成文规定，晚对手五分钟上场，目的是让对手多晒一会儿灯光，这样的灯光烧烤滋味是不好受的。

可见辩论不仅是场上的较量。近年来，有人提出全息胚的观点，认为在人体上某些部位，比如耳朵可以反映出全身的健康信息。辩论也是一个全息胚，它反映的是参赛者全部的知识、阅历和智慧。我希望有朝一日辩论的每一环节都能有章可循，就像日本的茶道一样，从沏茶、端茶到喝茶，井井有序，成为一项精巧的艺术。

2. 有主题变奏

讲了那么多技巧，我想是到了进一些超技巧的时候了。对于认真真看了前面这么多1、2、3……的朋友，我要说一声抱歉，不是因为说的技巧不真实，不，它们都是我们的切身体验；也不是因为佐证是虚构的，不，有兴趣的读者完全可以在《狮城舌战》附录的辩词中找到所有的出处。但如果你按照我所说的方法去辩论，很可能

上了场脑子里一片空白，因为这些是教人的方法，而不是比赛的方法。比赛时，面对对方的进攻，工是无暇去想该用“因粮于敌”还是“强加于人”的，一切都是出于本能。

日常训练是艰苦的，那么多的方法、战术，我们都曾一条条演练过，但比赛时不能这样，就像吃进去的食物原样吐出来是没有意义的一样，它必须化为能量贮存在身体里，在不知不觉中释放。

辩论是有严格的规律可遵循的，辩论又是毫无规律可遵循的。我们做过大量的“定义训练”，但比赛时，教练告诉我们，定义越流动越好；训练中我们有问必答，而比赛时教练告诉我们有答必问才能掌握场上主动；训练时要“寸土必争”，比赛时教练却说不能影响主战场的开辟，故“地有所不争”；训练时必须严格服从教练指挥”比赛时甚至教练也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到了这时，你才会理解为什么孙子说：“人皆知吾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

六个月前的一天，在复旦大学文科大楼的十楼，顾晓鸣教授在给参加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的复旦大学集训队员讲辩论心理，这位精研过气功、易经的学者要我们上场之前忘掉所有的辩论技巧，处于一种空灵的状态。

六个月后的今天，我坐在复旦大学5号楼的宿舍中，望着窗外满天的星斗，那无尽的宇不知已向多少人昭示过它的神秘。我突然想，也许多少年后，又一位渴望探寻辩论奥秘的人，面对这同一片星空，他会想什么呢？

吩咐彩虹女神^{*}

——从信息看辩论

张 谦

雄辩——要求既令人愉快又令人觉得
真实；但愉快须以真实为前提。

——帕斯卡《思想录》

又是辩论，又是辩论。

1993年对于我们十个人来说无疑都称得上是“辩论之年”，真算是春花夏果，秋收冬藏。一年之中诸多的际遇都因之而起，忧患必于是，欢喜必于是，听见新年钟声时我真觉得自己是在辩论中又长了一岁。就这样在围绕着辩论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热闹生活中，我几乎是不知不觉地迎来了新的一年，还未来得及整理一下这“辩论之年”中的所得所失，1994年又已从辩论开始——动笔撰写这篇有关辩论的文字。

思考辩论决不是件轻松的事情，至少对于我是这样。我是个年轻人，不免有那些像“美丽短”一样摆脱不干净的幼稚和浅薄，但我相信我毕竟是在前进的，尽管步子可能比同龄人踉跄一些，也慢一些，但经过四个月的集训，眼中总还是有了新景观的，描述出来供读者借鉴、批评、驳斥、晒笑，或许总能派上点用场。对于方兴未艾的雄辩之学，也算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了。

我还是一个大学生、一个学信息管理的学生——当然，我所学

* 彩虹女神，Iris，古希腊神话中为诸神传信的女神。

的诸如“数据结构”之类的东西几乎丝毫不能在辩论场上发挥作用。也许我会因此而有一些关于辩论的与众不同的思考。

辩论是什么？

问题被简化得越厉害，往往也就越沉重，越难以回答。姜丰好说“辩论多了也就无所谓辩论了”，这种无为之辩的境界我尚未领悟到，那么我眼中的辩论到底是什么呢？

也许我真的有了些对于信息的敏感和偏好，我想从信息的观点来看辩论。

辩论难道不是个自信事件甚至是个信息工程吗？这简直是不言自明的。就让我把这作为打开辩论之门的钥匙，从信息的洪流中发现一条走向雄辩的路径吧。

信息无处不在。

辩论更是涵泳在信息的海洋中。

一、哈哈爱兮爱乎爱乎

——信息之源

我们先来追寻辩论的源头。

追本溯源大概是人无法舍弃的一种癖好，可能由于人们都明白“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总是长久不了的东西，于是即便是当身边的一切如风的时候，人们仍总念念不忘让自己找到根蒂。同样，对自己所关注之物也概莫能外。

我无法获知，远古时代，当人类还被淹没在洪荒蛮陋之中时，我们原始的先人们是否就已开始有了辩论。但可以想象，在一个语言体系尚未完全建构起来的社会中，语言所能起的传达、交流信息的功能是相当有限的，口舌之争或许有之，我们理解中的辩论恐怕还无影无踪。况且那还是一个氏族内所有成员必须团结一心，全力

和严酷的自然环境和潜在的外部威胁相抗争的年代，一个氏族部落内人们的利益几乎一致的：为了生存。而血缘关系和长老制更是严格地规范着群体行为，因此人们在利益团体内部是既无须辩也不可辩。至于氏族部落间的冲突，刀耕火种的人们自然不欣赏舌战群儒的风范，暴力和流血可能是最常见的“外交手段”。

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已不难看出辩论得以发展的两个不可缺的要素：辩论的必须性和可行性。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总结人类几大文明的发生、发展史，提出了“轴心时代”的概念，这也就是我下面要来考察的时代。

在轴心时代里，人类历史上的几大文明都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人类文明也因此而获得了辉煌的奠基。在古希腊是苏格拉底等一大批哲学、数学、天文学大师登上舞台，在印度是佛陀的诞生，在中国则是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

如同波涛之于海洋，如同峰峦之于山脉，一大批雄辩之士也在这样一些伟大的时代中应运而生。古希腊有狄摩西尼、吕阿西斯、普罗泰哥拉、伯里克利，古中国有孟子、庄子、墨子、惠子等诸位大师。而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辩论名篇也自然是层出不穷。苏格拉底自称是“雅典的牛虻”，整日蓬头垢面四处寻访，但求一辩；他的学生柏拉图记述的三十余篇对千方百计录正是这些辉煌业绩的见证。而在中国，庄子、惠子的濠梁之辩，孟子、告子的人性之辩，都是以彪炳青史；就连《列子》中记载的“两小儿辩日”，至今读来不仍能引人掩卷遐思吗？

古罗马人将人类历史的发展阶段分为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和英雄时代，而随着历史的延伸，时代状况并不是改善，而是愈加没落。这里头的含义当然不是九斤老太所说的“一代不如一代了”那样的低级牢骚。人类在越走越快也越走越远的时候，未必总是朝着美好的方向的。无论如何，在“轴心时代”里

不难见到的人性的充分张扬到了现时代的确是有些杳如黄鹤的味道了。

那是个思想如潮涌的时代，人类的先哲往圣们好像猛然觉醒，睁开了好奇的眼睛探寻起周遭一切的奥秘来。而那又恰好是个少有束缚的时代，没有什么“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化”和如紧箍咒一样让人动弹不得的传说，无数块诱人的思想的处女地呼唤人们去探险。当然，那时也有人是惴惴不安深恐礼崩乐坏的，孔子不就是一个吗。我们这位万世师表尽管心知‘凤鸟不至，河不出图’，仍能“知其不可而为之”地孜孜不倦地传播自己的仁政之说，他用的是什么呢？所谓“有德者必有言”，孔子不也堪称辩论的先行者吗？

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又发现了辩论的两个催化剂，活跃思想和开放的风气。

历史还在证明这些。

当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在“车同轨，书同文”的同时，也来了个焚书坑儒。正如后世的文人慨叹“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对文化的剿灭并没有保住秦朝的江山金汤永固，传之万世。这其间的辩论有吗？当然有！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赵高的“指鹿为马”。这罕见的鹿马之辩恐怕也可看作是“百二秦关终属楚”这一幕大剧的引子。

自董仲舒为始作俑者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垄断了历史舞台之后，诸子百家的兴盛时代便从此销声匿迹。这漫长的年代中，中华文化虽屡有发展但也只能称得上是中规中矩。隋唐八股举士，而唐太宗李世民躲在城楼上看见进士们从门中鱼贯而入时，心中窃喜，说的又是什么呢？“天下英雄皆入我彀中矣！”到宋朝更有朱熹集注四书章句，理学名教更加森严。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辩论持续了很长时间倒也是件幸事，但似乎终究也改不了“陋宋”灰暗的色彩。

这又可见思想的禁锢和风气的闭锁是扼住辩论咽喉的恶手。漫长年代中偶有些能辩好辩之士，还少不了被斥为清谈误国，而如嵇康这样的真名士，风流到头也只化作了“广陵散从此绝矣！”（后来读金庸先生的《笑傲江湖》，看到了广陵散的复活，虽有一丝欣慰，但心中毕竟知道那只是小说。）如今我每想到嵇康便总会陷进一种“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回味中。

辩论的再一次大爆发是在19和20世纪的转折点上。国难当头，洋夷的坚船利炮敲开了闭锁国门之后，辩论反倒复活了。政治上、文化上、军事上、商业上，何处不辩？丁文江与张君勱等人的“科玄之辩”，章士钊之为陈独秀的法庭辩论，都是值得回味的。

至于后来到“文化大革命”中，作为“四大”之一的大辩论，倒是历史开的一个冷峻的玩笑了，那只为辩论在善良的人心中投下了一片阴影。

再看西方的历史也是如此。那些留下精彩辩论最多的时代往往是人类思想发展最得意的时代。其间虽然有阵痛，有流血牺牲，但人类终于在这筚路蓝缕之中从蒙昧走向了开化。布鲁诺为宣传哥白尼的日心说呕心沥血，与反动教会抗争到最后，直到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的火刑柱上；赫胥黎捍卫达尔文的进化论不遗余力，自称是达尔文的“斗犬”；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虽屡被人视为异端邪说，他本人也被污为流氓，但他仍不改初衷，矢志不渝地坚持。而这三次理论上的大辩论所捍卫和巩固的三大学说却正构成了人类在认识自身和世界的历程中的三次里程碑式的转折：从地球中心到太阳中心，从上帝造人到从猿猴进化而来，从至高理性的人到非理性的人。虽然在这三次转折中人的地位逐步下跌，但人类的精神却在逐步提升。这其中岂没有辩论的功劳？

当然也有的人为辩论忙得不亦乐乎，却只是贻笑大方，那是辩论的异化。

从这些对历史的回顾中我愈加坚信，辩论伴随着人类的前进，记载了人类思想的探索、挫折与崛起，也因此而成为真理的守护者和人类理性的结晶。辩论与思想的活跃程度和社会的开化程度成正比的关系。一个消灭了辩论的时代是沉闷和无活力的；一点也不想辩论、不会辩论的人是麻木的，至少是缺乏生机和灵气的。我想起那位在万马齐喑的时代里奋力抗争的龚自珍先生来，他在《乙丙之际著议》一文中提出了对当时社会的沉闷和停滞的无情鞭挞：“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阍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柳巷无才偷，市无才狙，藪泽无才盗；则非但黜君子也，抑小人甚焉。当彼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一个昏庸的社会就连才偷、才盗都出不了，更何尝会有才气纵横的雄辩之士呢？

那么究竟辩论是什么？它根源于什么？

找到正确的根源是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必经之路。在辩论中如是，在思考辩论时亦如是。我想起1990年第三届亚洲大专辩论会中的一场辩论来。

当时的辩题是“人类永久和平是可能实现的理想”。面对这样一个辩题任何一个老练的辩手都会想到“和平的对立面是什么？”或曰暴力，或曰战争。那么“暴力或战争的根源是什么呢？”不了解根源谈何消除暴力、战争，又谈何实现永久和平。

这样，“战争的根源是什么”这个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被提出来了，这实际上也成为了双方各自立论的基础和争执的焦点。对于这个问题人们大概很容易想到德国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在他的名著《战争论》中的经典性断语：“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人们还不难想到由于经济、文化、民族等等的各种矛盾、冲突而导致战争。我记得这场辩论赛中的反方却是颇有新意地认为战争根源于人性的不完美，人的攻击本性，简单地说就是人性中的恶，也正因为此，才使得

战争不可消除，永久和平不可能实现。辩论场上的事实证明这个立论是反方获胜的法宝。

我想，对于辩论也一样，它到底是什么，它又根源于什么，对这些问题的解答肯定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在我看来，辩论是相矛盾的信息之间的冲突，对抗和矛盾的解决。

有辩证法常识的人都知道，矛盾的解决可能有三种方式，即共同消亡，继续共存，和一方压倒、消灭另一方。上面所说的“相矛盾的信息之间的冲突、对抗和矛盾的解决”，自然包括了这三种解决方式。

刚才我所唠叨的那一大串历史事件都可以作为这一定义的佐证：

原始的氏族部落中众口一辞，只求共同生存，谈不上私有利益，矛盾的信息自然少有。辩论偶有发生大概也是某甲说河的上游鱼多而某乙却扬言下游鱼多，各不相让，但若僵持久了又无人裁决，恐怕他们会一顿拳脚了事，到这步田地就不只是信息的冲突和对抗了。

后来呢？孟子说人性之善如水之趋下，而告子却说人性无善无恶就如湍水往东南西北皆可以流，只看哪个方向决口了。言既不和，两人又不是好惹的，当然要辩论；结果是仍各自保留意见，谁也没说服谁。这已经是很典型的辩论了。

到了赵高手里，当他指鹿为马的时候，他与说鹿是鹿的秦二世之间的辩论何尝又不是信息的矛盾呢？而且这还只是表面文章，当那些或是耿直或是莽撞的朝臣们依常识说话而支持了二世时，不就被赵高看出了深层信息的矛盾，并从而判定这些人与己是同床异梦了吗？这可真的是要命的信息。

同样，普罗泰哥拉与伯利克里辩论到底是飞行的标枪，还是掷标枪的人、还是主办运动会的人导致了被标枪戳之中人的死亡，哥

白尼与教会辩论到底是地球绕太阳转还是太阳绕地球转，这无不是源于自信的矛盾。

明确这一点之后，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思想愈活跃，社会风气愈开放的时候，辩论就会越多越精彩。思想活跃便如同水被加热后，分子的动能增大，活动增强，挣脱束缚、追求自由的力量也愈强烈；而开放的风气和思想的活跃是相辅相承的，就如外界的升温和散开的环境，使汽化的水蒸汽能弥漫和奔放。在一个像《召公谏厉王止谤》篇中所描述的那样人们只能“道路以目”来交流信息的时代中，信息冲突和辩论都是极难一致见的。再如果像清朝康、雍、乾三代之时那样文网严密，以致写一句“维民所止”会被理解成“雍正去头”（指维和止二字），就因此招致灭顶之灾，那就更不会有什么信息敢跟统治者的信息发生冲突和对抗了。

把辩论看成矛盾信息间的冲突和对抗便可知辩论于一个时代之必须。更何况在今天，信息革命早已不是纸上谈兵，信息已成为当今社会前进的驱动力。

把辩论看成矛盾信息间的冲突和对抗便不难发现，辩论实际上是信息之争。当然这里的信息是广义的。

辩论之重要和可行似已无庸赘言，那么辩论该如何操行呢？如何由可辩走向能辩、善辩和雄辩呢？

我看到过几次黄河，但给我的印象总是一副老态龙钟，喘喘将息的样子；天干燥的时候，宽阔的河面只像一大片粘滞的泥沼。但李白的诗句却给我描绘了一幅气势磅礴的黄河万里图：“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我以为做任何事若有这般雄壮的气势，则是无论什么铜墙铁壁也是阻挡不了的。辩论亦如是。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天上来的气势大概皆非凡境，但我想源头活水是可遇亦可攸的，而这也将是雄辩的起点。

辩论既然是信息之争，其源泉自然也就是信息的积累。可以想

象，如果我们的信息积累丰厚得象格拉丹冬雪山下的姜根迪如大冰川，来源丰富得遍布秦岭与南岭之间，那我们的辩论才可能像长江一样浩荡不尽。因此，信息的准备是任何雄辩之士所必须精心钻研的。

我们先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信息源的环境。珠穆朗玛峰只可能屹立在青藏高原上而不是撒哈拉沙漠，而水体并不算小的罗市泊由于处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其生存就只能是有若若无。雄厚的信息积累不可能不受环境的影响。韩愈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

“幽远之小民，其足迹未尝至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于乡里之吏者鲜矣，况能自辩于县吏乎？能自辩于县吏者鲜矣，况能自辩于刺史之庭乎！”^①

地处穷乡僻壤，信息产塞，其辩论之源何处来？雄辩无疑是镜花水月。

宽广的视野和敏锐的信息嗅觉是形成丰厚信息积累之必不可少的前提。而这仍要与有较高信息浓度的环境结合起来才可能开花结果。历史上之才俊固然有蜗居一壤，寒窗苦读而终成大器的，但他们终究靠书籍而保证了拥有巨大的信息量，更何况闭门造车毕竟不是最佳途径。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就是一个有名的反例。曾占有成就的他后来由于躲进穷乡僻壤，远离多变的社会，便难免造成闭目塞听，以致思想、见地上再难有所长进，学冲破也就从此不甚了了。这实在可为后来者鉴。

我们的古人早已劝谕莘莘学子不要书卷埋头无了日，而应“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其中不也包含了多识多见，广纳深吸之意吗？如林则徐所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固然需要海一样的度量，但若没有众多的河流汇集也成不了

^① 韩愈：《赠崔复序》。

气候。

高尔基说：“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信息也正依靠书的积累和传播而成为广大的人群所共有且可共用的财富。而比起匡衡凿壁偷光和孙康映雪、车胤囊萤的时代来，我们所可占有的信息丰富了不知多少，也似乎不再需要表演悬梁刺股的场景。

信息相比于其他种类的资源有其特殊的属性。信息有共用性，一条信息可以给无数个人使用；信息有无消耗性，你把“复旦大学辩论队荣获新加坡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冠军”的消息传播千万遍也不会消耗它什么；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信息还有无边际效应性，也就嫌信息的单位价值并不会因为其数量增多而递减。这和其他一些信息的特殊属性一起对从信息看辩论都会有实际的指导作用。

再从微观的角度来看个人的信息积累。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是文章，信息的确是无处不在的，而可供个人积累的也完全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庄子不是就慨叹“吾生也有涯，而学也无涯”吗。学海无涯苦作舟这当然是天经地义、古今不变的至理。

※[1]

我们有必要先看看，雄辩需要的是什么信息。在辩论队中我们几个所受的熏陶、教化，最基础的一条就是：“做一个辩才之前先要学会做人。”也就是说，人格之力是雄辩的根本，也是君子辩与小人辩、德者之言与无德之言的差别。这是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的，因为深知这是个无止境的修炼，我们始终是学习者，松懈不得。人格也是一种信息吗？我不敢这样说。但可以肯定的是人格的培养是以广博和精良的信息为基础的，而人格之作用在某些场合下也是信息的作用，比如辩论。什么叫“有关国家书常读，无益身心事莫为”？什么叫“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可见广博和精良的信息对于人格培养的重要。

再具体到辩论这种形式，更可见雄辩所需要的信息其涵盖之广和钻研之深了。

狮城舌战夺冠之后，我们所敬爱的老校长谢希德先生在《新民晚报》上发文称赞：辩论的胜利是读书的胜利。老校长是懂得她的学生们的，因为她太了解复旦了。从谢校长的这句话中可以看出雄辩的力量从哪里来。我当然不敢妄称是读书人，读书的人体验和领悟也只是微不足道，但我确实感到是辩论教会了我读书。

复旦的校训中有一句是从《论语》中来的，“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这其中包涵的读书、治学的道理就弥足珍贵。现在包括复旦在内的很多高校都已明确地提出了施行“通才教育”，其题中之义也在乎此。

但知识毕竟不能代替才德，要德才均备才可能合乎雄辩之道。这方面的事例更是俯拾皆是，不胜枚举。宋代的书法大家素以“苏黄米蔡”并称，这与苏东坡、黄庭坚和米芾并称一时之俊杰的“蔡”又是谁呢？按书法的水准论，当推蔡京，可蔡京是臭名昭著的大奸臣，其德行深为人所不齿，因此后人倒宁肯推书法造诣不如蔡京的他的侄子蔡湘来享用这“苏黄米蔡”四大书家的荣耀。同样，尽管我们不得不承认希特勒的演讲是极富煽动性也极有气势的，但我们谁也不情愿让这位纳粹元首戴上雄辩家、演讲大师的帽子。

高尚的人格和广博的知识是雄辩的精神所在，也是我们要追寻的信息之源，雄辩之体。季翔曾用铸剑来比喻辩论的磨炼，可见是深知其中旨趣的人。仅仅以我们在辩论上的所学所为，就已经可以看出这个从铸剑到练剑到用剑的过程将是何等的艰辛而又奇趣纵横。铸剑的故事不用多说，古人还说要“练剑四十年”，而要真正能作剑用到像《笑傲江湖》中独孤求败大侠那样以独孤九剑遍访天下，但求一败而不可得的境界，恐怕是要穷毕生的精力了。狮城舌战的辉煌对于尚且年幼的我们来说也许可称得上是“华山论剑”

了。我无疑已昏了这个机会。对于自己那极不精妙的剑术也只好怀着无人喝彩的遗憾带自珍了。好在我还与这么多的名师共同生活在复旦园中，谁又能肯定将来某一天我不能豪迈地来一次：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

我们仍只是剑艺上的学徒，但又似乎能理解一点铸剑人的心情，那是一种极难以名状的悲壮和豪迈。鲁迅先生在他的《故事新编》的《铸剑》一文中讲的就是铸剑人的故事，在那里，铸剑人的心情化作了一首古怪的歌，歌的第一句就是：

“哈哈爱兮爱乎爱乎！”

二 到雪上撒点野

——信息之流

关于辩论，《墨子·小取》中是这样说的：“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可见，通过矛盾信息的冲突和对抗，我们往往是希望去解决更深层次更广义上的矛盾的，即所谓“是非之分，治乱之纪，同异之处，名实之理”等等。

伊壁鸠鲁是被西方尊为“无神论之父”的古希腊哲学家。作为一名无神论者要和庞大的有神论势力相抗争，可以想象这需要何等的才智和勇气。伊壁鸠鲁有一段著名的话，以有力的论据和有趣的诘难驳斥了有神论者：“我们应该承认，神或者是愿意但只是没有能力除掉世间的丑恶；或者是有能力而不愿意除掉世间的丑恶；或者，是既有能力而且又愿意除掉世间的丑恶。如果神是愿意而没有能力除掉世间的丑恶，那么他就不算是万能的，而这种无能为力和神的本性相矛盾。如果他是有能力而不愿意除掉世间的丑恶，那

么就证明了它的恶意，而这种恶意同样是同神的本性相矛盾的，如果神愿意而且有能力除掉世间的丑恶，那么，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世间还有丑恶呢？”至此，有神论者大概难以找到立足之地了。这段驳斥和“上帝能否创造出一块他自己也推不动的巨石来？”这样的驳难可谓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伊壁鸠鲁的雄辩为的就是要明“是非之分”。

但伊壁鸠鲁之所以雄辩不仅是因为有了明“是非之分”的目的就可以的，驳斥的有力主要还得力于他对归谬法的巧妙运用，也就是说他的雄辩还要仰仗其高超的辩论技巧。

在思考了雄辩之体、信息之源以后，要走向雄辩还必须掌握雄辩之术，也就是信息之流。辩论作为矛盾信息的冲突和对抗，而辩者的目的又是寻求一种有利于己的矛盾解决方式，这显然要考虑如何才能通过有技巧、有策略的信息冲突和对抗来达到有利的解决，这也就是一个相关信息如何组织和传达的问题。

再来看一则故事。欧布利德是古希腊著名的诡辩家（注意，不是雄辩家），他留下的一些诡辩的故事在令人忍俊不禁的同时也更映衬了诡辩相比于雄辩的苍白与滑稽。这里讲的是他曾对自己邻居说：“如果你从没有丢失掉一件东西，那你就肯定有这样东西，对吗？”忠厚的邻居不假思索地加以了肯定。欧布利德顿时眼睛一亮，又说：“那你肯定从来也没有丢失过头上的角吧？这么说来你一定是有角的喽。”邻居虽明知欧布利德是胡说，却又一时不知从何驳起，两人于是便一顿恶吵。争吵最后被提到了执法官那儿。聪明的执法官问清了缘由，就对欧布利德说：“在我的管辖范围内，你从没有丢失过坐牢的权利，是吗？那好，你自然就拥有它，我就让你来享受这种权利吧。来人，关他三天！”欧布利德的诡辩换来的是一段不易有的牢狱生活的经历。

这里，执法官面对欧布利德的诡辩，面对这种诡辩逻辑与正确

逻辑的矛盾，他是如何来从对抗中消灭它的呢？他用的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与中国唐朝时请君入瓮的故事如出一辙。法官正是用这种方式来传达自己的信息，并让它与欧布利德的诡辩相对抗，至于对抗的结果，欧布利德想必一定是没齿不忘的。如果只是一味用正确但多少有点学究气的言辞来驳斥欧布利德的逻辑之谬，怕是难以收到这种奇峰突起的效果的，由此亦可见，信息之流是否活跃和机巧，也是雄辩超出腐儒之辩的法宝。

辩论的首要原则如果有的话则必然是“寸土必争”。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当信息的矛盾只有通过冲突和对抗来解决的时候，任何一步的退让很可能就是一溃千里的不祥之兆。不是东风压倒了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了东风，辩论就是这个道理。策略上固然可以有欲擒故纵和以退为进等等，但其最终的目的还是想收复失地，直捣黄龙。因此寸土必争是时刻必须牢记的原则。

我们所经受的训练当中这也是极重要的一环，当时俞老师、王老师提出的要求是，不管对方的话多么精彩，引起了多么强烈的共鸣，都要以更精彩的话打回去，赢得更强烈的共鸣，不然就失分了。这当然是极难以达到的，但狮城舌战中这种知难而上、迎头痛击的情况也是不乏其例的。如决赛中的这段辩辞：

正方一辩：正因为人性本善，所以人可以随时随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严嘉：我请问，如果人都是本善的话，谁会拿起屠刀呢？

严嘉这一招绝对称得上智勇双全了。从中亦可见，要在狭路相逢中做个勇者并不是仅凭无所谓的勇气就可以了。纵然神勇如张飞者，当跨乌骓马，挺丈八蛇矛，于当阳桥头几声大喝震退了数万

曹军之时，也还是要兵不厌诈地让兵士们纵马在小树林后扬起尘土作有精兵埋伏状的。当有勇气而无谋无力的话，只会是以卵击石，况且有所谓艺高人胆大，无谋无力则恐怕勇气也无处来了。那么，谋、力安出？

要拥有丰厚的信息资源作为谋、力的源泉自不在话下，用之得当也是不可忽视的致胜之道，以下我将从九个方面来阐述如何实现信息的高效的组织和有力的传达。

1. 信息量的丰富。以知对无知，必胜。

在两股对抗的信息流中，一方突然找到了对方一处不设防或无力抵抗的缺口，那么很可能因此而势如破竹了。在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上的半决赛中，复旦大学队对悉尼大学队关于“艾滋病是社会问题还是医学问题”的一场里，季翔对艾滋病日11号的发问无疑点到了对方的软档上，而这又是个不得不回答的问题，对方的答非所问便招来了一阵子的狼狈处境。从这一点更可见信息之源雄厚与否在实践中往往会成为决定战局的因素。老实说，在知道辩题之前，对我们辩论队中的每一个人而言，艾滋病都是个遥远且多少有些令人反感的话题。因此面对这样一个陌生的领域我们要补的课太金了，我们的课是从最基础的病理学和遗传学知识开始的，给我们主讲的竟是复旦大学遗传所所长、博士生导师赵寿元教授，让我们深觉有高射炮打蚊子之憾。之后又屡请上海卫生防疫部门的艾滋病专家来讲课才算大致心中有数。而在课下，我们还翻看了从《传染病学》到《西方社会病》，从《大众医学》到《家庭医生》等一大堆相关书籍，谁还记得“时不我待”这个致命武器是在哪个角落里找到的呢。

2. 信息的深度。能以其本击其末，或釜底抽薪，必胜。

信息几乎总是处在传播与流变过程中的，因此导源于同一客体的信息流可能会朝向不同的方向，可能分进合击，可能分道扬镳，也可能是回转连环。所谓信息的深度则是指能沿其流而溯其源，并联系起来把握相关的源流，从而才能在一个广阔的流域内，在信息的各种层次上都游刃有余直至融汇贯通了。只知其表不知其里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都表明了信息深度的匮乏。

在人类知识体系这个错综复杂的信息立体网络中，任何一个信息点都可能引发出难以穷尽的长串的关联，因此可以说任何信息点都是具有深度的信息支持的。当然我们谁也不可能穷尽地了解知识领域中所有信息点后所有的深度信息支持，但明确这种普遍的信息结构对于思考和驳难无疑是大有助益的。而对于具体某一主题的辩论，则应该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多地掌握相关信息点后的深度信息支持。同样，将这一思想用于辩论过程中就可以发现，作为一种信息的冲突和对抗而言，对对方所传达的信息不应该是孤立地而应是联系起其深度信息支持来考察。正因为一个失去深度信息支持的信息点瞬时就会被虚化成一片风雨中的飘萍而变得无根基可依托，也从而失去了它的正确性和说服力，所以若能从深度信息支持来着力攻击，驳难对方表面上的信息点，其功效自是不言而喻的。联系到自身的防守亦同样的道理，用缺乏深度信息支持的信息点建构起的阵营是不堪一击的，光用华美的词藻是掩盖不了内容的虚脱的。

狮城舌战中就有这样的一番对阵：

正方三辩：荀子说错了！荀子说他看到什么是恶的，还是说没有看到恶，你就说是恶的。没有看到善是不善，不是

恶，对方辩友。

蒋昌建：你说荀子说错了就说错了吗？那要那么多儒学家干什么？（笑声、掌声）

以上这回合的交锋发生在决赛复旦大学队对台湾大学队关于“人性本善”的一场中。这里正方得出的这个结论性的信息点：“荀子说错了”显然是缺乏深度信息支持的，也就是说从这句话追溯上去我们并不能找到任何发生发展的源流和可以佐证的材料，因而其一旦遭到从纵深角度的攻击，便束手无策，无以立足了。

再看一个小故事。林肯在早年做律师的时候曾为自己朋友的儿子小阿姆斯特朗被控谋财害命一案辩护。查阅案卷之后，他发现全案的关键在于原靠的证人福尔逊，他所做的关于在月光下清楚地目击小阿姆斯特朗用枪行凶的证词是极不利于被告的。

在复审中林肯对这一点发起了猛攻：

“我们欣赏到了一幕精彩的骗局，但它终究改变不了事实。证人一口咬定在10月18日晚上11时在月光下看清了被告的脸。可10月18日那天是上弦月，到晚上11点时月亮已经下山，何来月光之事？退一步说，即便当时月亮还有，但我们仍可从刚才证人对现场的描绘中发现被告当时是背对月光的，证人又怎么可能看清他的脸呢？”

伪证不堪一击。林肯的敏锐之处在于从证人提供的信息点进行回溯，却找出了相反的信息支持。从而使证人的证辞成为没有根据的不实之辞。

3. 信息的正确性和权威性。以正对误，以公理对假设，以名言对妄语，必胜。

辩论中出现口误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它往往会致表达

了错误的信息，而这种错误又往往是显而易见的。到这种时候，任凭怎样的勇气大概也难以颠倒黑白。信息的正确性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成因，比如是约定俗成的，我们说“打扫卫生”，可真要将卫生都打扫走了，又怎么干净得了呢？但习惯表达，大家都对此不以为忤。尽管如此，在众多的信息中缺乏既定的正确性规定的仍是不可胜数。如果一切信息都是确知其对错的，也就不会有信息的冲突、对抗而导致辩论了。而在这些言人人殊的领域内，信息的认同程度和权威性就成了决定实力对比的首要因素，所谓认同度就是其支持者、赞同者的多少，人多力量大这一点在人类社会中大概是不易变的。因此以新奇的信息来与被大众广泛接受的近乎常识的信息相抗争总是会艰难些的，在辩论中往往是吃力不讨好。所谓权威性可以到无可违抗的上帝的旨意、主的意志或真龙天子的圣喻。从这一点很自然地可说明论辩中引证的作用。

请看一个小笑话：

某神父谆谆告诫自己的教民切不可饮酒，因为酒乃人之大敌。无奈心口不一是人常犯的毛病，此神父也未能幸免，嗜酒如命的他常常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这一次又在喝醉的时候被人发现。这自然少不了一番责难。

“神父，酒不是人类之敌吗？您怎么也喝酒呢？”

“酒乃人类之敌，然了。但《圣经》上不还说吗：‘要爱你们的敌人！’所以我要饮酒。”

神父当然是巧言令色的，但他这种临时抱佛脚，祭出具有无上权威的法宝，也还算是有点吓唬人的力量的。

诡辩尚且如此，何况雄辩。

4. 信息的灵活性。四两拨千斤，小亦可胜大。

所谓灵活性就是指信息的制宜之策。这其实是辩论技巧活的

灵魂所在，不仅修炼起来难，就连想要三言两语讲清楚怕也很怪。总之，辩论要看天时、地利、人和，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才不致陷入呆板迟滞，形容枯槁。

德国伟大诗人海涅是个犹太人，这在德国少不了要受些刁难。某一次海涅与一富商在一海岛上的渡假胜地相遇。腰缠万贯的富商便想在海涅身上讨点便宜。富商作遗憾状对海涅说：“这个岛上真是应有尽有，只是少了犹太人和驴子。”海涅毫不客气地答道：“我们俩来到岛上之后，这儿就什么都不缺了。”

面对这种恶意的攻击，迂腐地空谈道理是难以奏效的，像海涅这样将计就计才可称奇巧。这其中体现的制宜之策是颇值得玩味的。

5. 信息的敏锐性。所谓“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机巧敏锐常可出其不意，建立奇功。

信息的敏锐性实质上是通过与信息进行高速的综合、判断、分析而获得的。它使一名辩手于论辩中能始终将己方与对方各自守卫的阵地观察清楚，捕捉到对手各种细小的但很可能是致命的漏洞，这是一种善于捕捉战机的高超本领，尤其在反驳当中功效突出。

辩论中最好的反驳武器无疑应数归谬法，抓住对方的立论逻辑，并用其推导出一个错误的结论，从而将对方的整个信息组织的骨架击垮，这种反驳一旦用上，摧毁性是极大的。请看狮城舌战中的这样一个例子：

蒋昌建：对方把温饱等于生存的话，我们说人类社会一开始就处在饥寒状态，那么按照对方的逻辑的话，人类社会

早就不存在了，你我之间恐怕不是在这里辩论了，而是在哪个阴曹地府里展开了。

这出现在初赛对剑桥大学队关于“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一场的自由辩论中。对于这个辩题来说，确定何为温饱何为饥寒是正方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因此蒋昌建抓住了对方将温饱等同于生存以此来强调温饱的绝对必要性这样一个逻辑，将它引向了一个错误的结论：没有温饱就没有生存，因而在饥寒状态下的人早该死光了。这样对方逻辑上的漏洞便昭然若揭，而任何以此逻辑来组织的论证都将是徒劳的。

信息的敏锐性还反应在整体的布局谋篇中。以己之长攻敌之短无疑是会事半功倍的。但这样有利的攻击点往往并不常见，因此一旦捕捉到了，则应该集中优势兵力重点攻击，这就叫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但将布局仅囿于一小点上将会显得局促和小气，这就需要能敏锐地发现新战场，并抓准时机转战。

6. 信息的美感

信息就其本质而言是一致的，不论以何种形式表达。但其载体运用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信息传递的效果，而这种运用则主要体现在对语言这一信息载体的驾驭上。以幽默对呆板，以华美对贫乏，其语言感染力，信息传递效果上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这样的例子仅在这次狮城舌战中就可以说是俯拾皆是，美不胜收的。还应该指出的是，语言的美固然需要使用者的高超驾驭能力，但她自身的丰富内涵和魅力同样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辩论赛无论谁胜，在其中大放光彩的华语都是无可变更的胜利者。

7. 信息的持续性

这往往是很容易被人忽视的一点，大概因为人们作为信息传递者时往往对信息接受者有着过高的预期，因而也就没有认识到以增强信息持续性来保证传递效果的必要。而实际上，信息接受者要从几乎是庞杂的信息堆中发现并保存传递信息者的意图，可能是相当艰难的。这时候，就需要给重点的信息以更高的持续性。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曾叫嚣：“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变成了真理！”我们当然要摒弃这种用谎言来欺骗的行径，但这不正揭示了信息持续性的巨大威力吗？

这次的国际大专辩论会中，复旦大学队在对剑桥大学队和悉尼大学队两场比赛的自由辩论中都获得了长时间的发言时间剩余，当对方此时信息的持续性变为了零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信息传递上的垄断，处于这种劣势下要获胜是极难的。这就是巧妙利用信息持续性的一种战术。

8. 信息的组织

很简单，必须用严密而清晰的逻辑来组织信息。没有逻辑的信息就如一大把散铜线，无法串起来；更有甚者是内部出现矛盾，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尴尬是论辩中的大忌。

9. 其他形式的信息辅助

这里说的所谓其他形式是指非文字语言形式的信息传达，主要是体态语言。一个辩论队员或其他任何论辩者，都不应该忘记自己是以一个活生生的人来出现的，而不是一台会发声的录音机；而作为人的魅力如何展现出来，这就不光是语言的表达问题的，三国时的一代枭雄曹操，曾有一次要接见匈奴来的使节。曹操自傲地说

不够伟岸，拿出去未免会丢了中原大国的威风，因此就找了贴身侍卫中仪表堂堂的崔琰假扮成自己召见了使者，而他则穿上侍卫的号衣，擒着刀站在假曹操身旁静观局势。召见之后，曹操派人到圣官里想得到一点匈奴使者对其印象的反馈，匈奴使节说了什么呢？他说：“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者，此乃真英雄也！”一语中的，“捉刀人”的称呼也就由此而传之后世了。曹操一语未发而只是捉刀静立，然而那种“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的王者之气仍旧咄咄逼人，这就是体态语言所传达的人之魅力。

在这次狮城夺冠的历程中，我们可爱的姜丰小姐始终展现的不温不火和温柔亲切真可说是将她所专攻的美学化成了具体的人之美，而这一点为复旦立下的功勋怕是难以计量的了。

辩论是一项时时处处都需要身体力行的学问，要将各种雄辩之技巧上升成雄辩之艺术，这需要的就不只是技巧上的磨练，而还需要注入一种对辩论的激情才行了。

任何一个雄辩之士都不会是从同一个窠臼中成长出来的，他们的雄辩不光有着普遍技巧，还有作为这些技巧的统帅的、带有鲜明的个人风格烙印的雄辩之艺术。从技巧走向艺术，从模式走向风格，这可能才是成为雄辩之才最关键的一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辩论是用来更深更广地发现自我的，而绝不是去削足适履，模仿别人。在论辩之中迷失了自我，忽略了对自身魅力的发掘，只能导致迷惘之辩、刻板之辩。一个有志于辩论的人应该经常保持着对自身的冷静观照，如曾子所说要“吾日三省吾身”，将雄辩的精神熔铸到自己的人格之中去，然后再外发出来，才可能散发出智慧和人性的光彩。一个人即便聪明睿智丝毫不亚于严嘉，但他若是去模仿严嘉，那只会成为个蹩脚的“假严嘉”，而失去了一个独具魅力的真自我。

投入到辩论中去的绝不能只是自己的思考和理性，而应是全

身心地拥抱它，用激情去感受它。这种激情应融入辩论中的方方面面，这样才可能造就出雄辩的气象和神韵，走上辩论场固然是去代表理性、施展理性，但对整个这一过程的感受则应是充满激情的，甚至是狂放不羁的，这才可能达到淋漓尽致地展现真我之风采，如看见一块完美无瑕的平整的雪地，便想扑上去挣脱所有束缚，纵情地撒个野似的狂喜。如果只知恪守技巧的条框，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那样的辩论只会如和尚念经一样催人入睡，倒人胃口。“我本楚狂人，风歌笑孔丘”，参加1988年亚洲大专辩论会的复旦大学的辩论队员们若不是怀着这样一种豪放，又怎么可能在决赛中将孔子诠释得出神入化呢？《世说新语》中有个故事讲刘伶喝醉酒后常会赤身裸体躺倒在房内，有一次恰巧被几个朋友在房中撞见，朋友们很不以为然，这样不成体统哪能行？刘伶马上诘问道：“天地就是我的房屋，我以天为房，以地为床；而这小房屋就是我的衣裤，诸君怎么钻到我的裤裆里来了？！”如果不是酒后的沉醉沉迷、无拘无束，又怎能反应出这样奇谲怪异的诘问呢！

辩论应成为雄辩之士的本能，成为他人格魅力甚至整个自我的不可分割的组成，每一句论辩之辞都是在展现自我的英雄本色，而那些技巧的条框早已化为虚无；需如此方可能像庖丁解牛一样以无间入有间而游刃有余了，而辩论中的信息之流方可呈现出波澜壮阔的宏伟气象。

三、看得见风景的房间

——信息之思

矛盾信息间的冲突又岂止是在辩论场上呢？

大到美国国会山上日复一日演出着的群英会，乌拉圭回合关贸谈判年深日久的拉锯战，小到汽车上面红耳赤的一次口角和灶

台边、饭桌前的一番争论，人类社会几乎无时无刻不浸没在信息的冲突中。信息已经像前人所臆想的以太一样，浮游在、渗透在我们每一分的生存空间中。

人类的信息时代已经来临。这已不是什么未来学家的大胆预测，而是已经“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地进入到了人类生活中的一个事实。美国克林顿总统已在 1993 年的国情咨文中明确地提出，要在 2000 年前建成连结起美国千家万户的“信息超级公路”，希望能藉此将美国送上一条在信息时代中高速发展的坦途。人类在汽车轮子和发动机的驱动下奔驰了两个多世纪之后，是否已经开始在借助计算机、光缆这些新的翅膀而在一个新的时代中腾飞了呢？

辩论几乎成为了信息流动的必然产物。当我们发现在历史上，辩论的命运总是和思想活跃程度和社会风气开化程度休戚相关的时候，这其中不也揭示出了信息流的一些“生活习性”吗？因此，不管在什么时候，辩论都不应当仅仅被看成是辩论而已，我们同样应该发掘任何一场有意义的辩论后头的“深度信息支持”。从辩论所体现出的矛盾信息间的冲突和对抗中，我们或许可以捕捉到人类生活的信息洪流中一些值得注意的流向，获得一些超出辩论之外的深度信息。

同样，我们也不应该只让辩论和辩论引起的思考留在赛场上，因为我们从辩论中学到的不只是舌战群儒式的口才，而简直是培养起了一种信息时代中不可或缺的生活本领。只要我们还需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下去，还希望明天会变得更美好，我们就将会随时随地地去接纳、消化、产生、传递、排斥、攻击各种各样的信息，和各种各样的、或远在天边或近在眼前、或爱得刻骨铭心或恨得咬牙切齿的人进行无休止（以我们的生命为界限）的辩论。雄辩的孟轲先生当年慨叹道：“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这很可能也将为众多的

现代人所感到“心有戚戚焉”。而孔子他老人家不也曾说过吗：“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既然不得不辩，何不好之，乐之呢？

所以我们需要雄辩，需要开发自己身上潜藏着的“口力资源”。但也许我们还更需要像辩论一样去思考这个社会，思考我们生命中无处不在的信息。因此说，狮城舌战给我们每个人的都是很多很多，而我们只是还发掘得太少。辩论场上的胜利固然光彩夺目，而我们今后的生活可能才是更深远和广阔的战场。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真正的雄辩家将在信息的海洋中“浮出海面”，而不会只一味固守新加坡之战的一方孤岛。所以，我不想只到了狮城舌战就止步，前面可采撷的奇花异卉也许会美不胜收，又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敝帚自珍、固步自封的呢？

我相信这世界将是丰富多彩的，我不愿意看见世界的人都穿着毛式的蓝灰外装，更不愿意看到所有的女性背上都绑个小布囊，逢人要鞠90度的躬；我还相信这个世界终究有它一致的东西，各色各样的人都会希望未来变得更美好，人类始终会前进；不然的话，这世界就会是“沧海乱流”了，任何的雄辩都将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则是嘴尖皮厚、巧言令色的诡辩，而人类也终将被这失去了控制的狂躁芜杂的信息乱流所吞没，如一头猛兽之陷于沼泽之中，愈是挣扎，则愈陷得深，直至不能自拔。由此亦可见雄辩必然有它所倚重的根基和力量，才使得它不至如雨打浮萍般肤浅，而这个根基和力量就是高尚人格所象征着的人性中的真、善、美，和万卷诗书所传达出来的人之成为万物之灵长、宇宙之精华的崇高理性。这也是我们无论何时何地思考辩论和进行辩论时万为不离其宗的灵魂。有了对这个根基和力量的信念和执着，我们才能大胆地说不，大胆地与矛盾信息去冲突和对抗。也只有坚信了这一点，我们的社会才有可能对信息进行宏观调控，使人类社会这艘并不是牢不可

破的航船平稳地出没在风波里。

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认为，信息是一种社会权力。由此，就必然产生一个由谁来掌握这个权力的问题，对于社会而言，这就是信息的宏观调控。我们的社会应当生产、传播一些什么样的信息？由谁来生产、来传播？作为社会的成员应该需要一些什么样的信息？这些信息又如何传递给他们？这样的问题肯定不止这几个，而这都是一个处在信息时代中的社会所应该关心的。而作为我们每个人来讲，首先应该意识到这是个走到哪儿都可能被信息碰着世界，不要在无所谓之中就成了乱流、杂流、污流或其他什么流里翻动的泡沫，自己对信息应该地鉴别会挑选会拒绝；独善其身之余，未尝不可以兼济天下，于是还可在己事和家事之外，考虑和做一点国事和天下事。而实际上要在这样一个信息高度密集、且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洪流中“胜似闲庭信步”，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毫不怀疑任何一个有正常理性的人都是在追求一种更高境界的，这种境界可能是一场更精彩的辩论，一份深刻而真挚的爱情，或者只是传语报平安的一封家书，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但这种更高境界一定是有的。商汤在他洗澡的铜盆上刻着这样一句话：“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可谓一语道破天机，这就是那种人类自古以来就有之的对更高境界的追求。平凡人组成了这个世界，平凡人也就特别有理由希望得到一个更高境界中的世界和自我。当赵传唱起“我只是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时，若闷之中仍有一份想跃上更高枝头的渴望吗？而当苏轼先生说：“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寓之而成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此乃造物之无尽藏也，而子与我所共适。”这份超然物外的洒脱中却多少隐含着对命定的无奈。两者相比，究竟哪个更不平

凡,更不消极呢?

因此我相信,对于每个人来说,无论他或她多么平凡,在追求自信与超越这一点上几乎都是共同的。从狮城舌战中亦可看出这一点。复旦大学辩论队得胜归来后所受到的欢迎和造成的影响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我们甚至可以看到“辩论的发烧友”、“蒋昌建的追星族”悄然出现,某报上说,时下沪上一些青年由崇拜港台歌星转而崇拜“复旦才子蒋昌建”,这都透露了些什么样的消息呢?

昌建是很谦虚的,他的口头禅是“以学心听,以公心辩”,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他值得我们喜爱。但如果把他放在狮城舌战之个背景中看,则可发现他不仅是位博学、儒雅而谦逊的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而是一种象征,一种优势信息的象征。而这种优势信息对于众多(包括我在内)正和劣势信息进行着不知不觉的“辩论”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种鼓舞,甚至成为有力的武器,那么,他所象征着的这种优势信息是什么呢?我无法列举出它千变万化的种种形式,但它根本的力量是知识和人格凝成的,是雄辩的精神和艺术所铸就的。

这里我把那些有利于我们达到更高人生境界的信息叫做优势信息,因为我相信它在个人及社会追求自信和超越的征途中,在人类价值的天平上终究是具有优势的。相反,那些会勾起我们心底迷乱的念头,蒙蔽我们那寻找光明的黑眼睛的信息,我把它称为劣势信息。因此我可以说,狮城舌战之胜过原来飞扬跋扈的一些狂歌乱舞、轻吟浅唱,是优势信息之于劣势信息的胜利,这是必然的。

当大众传媒无所不至的触角已经让我们对某歌星的宠物哪一天得了病了或某影星喝咖啡时有个特别的习惯都可以了如指掌时,我们不得不怀疑,我们是否真的需要这些。如果我们也在澡盆上刻上一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让自己在清洗身体时

也清洗一下头脑，我们会发现，可能头脑中洗出的脏东西和废物更多。这时再想想自己心底追求超越与自信的念头，更会觉得有一种对优势信息的饥渴，而恨不得让那些无聊的劣势信息从此钻入下水道，再不要出来。好在社会上这样的优势信息愈来愈多了，狮城舌战也只不过是惊鸿一瞥。大多数的人们都在抗争着，寻找自己所城机的优势信息，用它来进行自己与劣势信息的辩论，来追求自信与超越，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人们需要的是对旧我的超越而不是迷恋。

追求自信又何以见得呢？新加坡方面屡次主办亚洲的或国际的华语大专辩论会，其初衷何在？这大概是并不为人所尽知的。他们所希望的并不是一时的热闹，他们有着深切的寄托。新加坡方面希望通过主办华语辩论赛来向世人展现华语的伟大魅力，向世人证明我们的母语——华语，不仅可以交流情感，可以应付生计，而且同样可以用来谈论哲学、政治、文学、美学、经济等等任何一种人类的思想和学说，华语是美丽的。我想一个以华语为母语的华人是很容易被这种热忱所打动的。而这不正是一种寻求和建立民族自信的创举吗。的确，对于我们已太谙熟的华语，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不大容易去体会她，去品味她，去珍惜她。正如罗丹所说，“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当我们很多人在为一种文化上的失落而感到若闷，为一种信心的消弥而萎靡不振的时候，我们是否想到过正是这被用来和菜市场的小贩讨价还价，对纠缠的乞丐恶语相向的华语，竟也可以在哲学、文学等领域迸发出耀眼的光彩，展现出巨大的魅力呢？狮城舌战如果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哪怕是极微小的，也足以令新加坡的主办者和我们这些为此而付出过努力的人感到由衷欣慰了。其实，我们也几乎是在这次对华语的深入学习和使用后才完全地被她所征服，并因此而获得了一种昂首挺胸的感觉。而我们对华语的了解和运用又有多少呢？九牛一

毛。只要翻翻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任何一本经典之作，你就会再一次为你是说华语的而骄傲得真想流泪。想想吧，《诗经》写在距今两千多年前，而“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样的句子竟可以让你感到是一只活生生的妙手在拨动你的心弦。崇拜华语，崇拜我们的祖先吧。

可惜的是，华语尚未得到她应的地位，即使在中国人心中，可喜的是，现在已有了很多人在认识她，热爱她。其实，对华语的热爱只是一部分，更广泛的是对我们伟大民族文化的热爱不也在加深吗？中国人需要这种深层文化意义上的自信。

我也是一个在追求着更高人生境界、追求着自信和超越的平凡人。我所追求到的很多很多都是来自这次的辩论，更广一点说，来自复旦。同样，我以为狮城舌战向社会，向人群所昭示的任何东西，其中都有来自于复旦的魅力。复旦是这样一个地方，她聚集了大量体现人性之真、善、美的高尚人格和弘扬人类崇高理性的知识，正由于这些知识和人格的力量，使她成为了很多人的精神家园，为很多的人提供了可享用一生的超越与自信。这样的地方有很多。有人说，思想家的任务就是为人们提供精神家园。而人总是需要一个精神家园的，对我来说，复旦是这样一个精神家园，但也许又不全是。精神家园可以从往圣先哲们那儿继承得来的，但也可以是自己建造起来的；我们有时候想走出家园，甚至想砸碎这个家，但我们终究是要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可作为归宿的精神家园的。

我想起了复时大学 21 世纪学会成立时的情景。21 世纪学会是杨福家校长为培养 21 世纪的通才而倡议建立的一个学生学术团体。她集中了全校从本科生到博士生中的优秀分子组成，并由各学科中学有造诣的中青年学者担任辅导老师，还组成了足以代表复旦学术水平的专家指导团，这当中的成员有：谢希德，谷超豪，胡

和生、吴浩青、谈家桢等共 16 位，而杨福家校长则亲任团长，我们的王沪宁顾问是副团长。我不会忘记成立大会上，我们的名誉校长苏步青老先生的一番演讲。一位世纪老人，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激励即将走向 21 世纪的后生晚辈们，那些话语和场景都是催人泪下的。苏老回顾了自己自 30 年代回国起，和陈建功先生一起，历经抗战西迁、内战烽火，而矢志不渝，花几十年的心力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超过了自己的学生，创立了国际上公认的“苏步青—陈建功微分几何学派”。苏老与其说是在勉励，不如说是在鞭策复旦的学子们：“如果在下个世纪你们这一代人手中还不能搞出个样子，我们和你们都是要负责任的！一定要坐得住冷板凳，要下十几年、几十年的功夫，为创建复旦学派而不懈努力！”我像是听到了愚公移山时驳斥智叟的那一番豪迈，但我相信我们复旦人会比愚公的子孙更出色。我感觉到复旦的火世正从老一辈手中向我们这一代人传递，苏老等老一代复旦人为我们建起了一座家园，这就是现在我们所拥有复旦，在新世纪里我们能把这座家园带入更高的境界吗？这可是我们的复旦啊！

复旦可能只是个具体而微小的家园，更大的家园是容纳了我们整个民族的中华大地。而对于这个更大的家园，我有着同样的爱，同样的责任和使用。我相信我和我们这一代人继承的是一座辉煌而且温暖的家园。她的温暖是我自小生长其中所深刻感觉到的，而她的辉煌则有不少是从这四个月的磨练当中发掘出来的。当我们读到张载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段话时，便无可逃避地感觉到这是我们所拥的这可爱的中华对我们的召唤，我们别无选择。而对于这样一项使用我却显得那么单薄和虚弱，我不能不怀疑自己是否有足够结实的肩膀和坚强的神经。我知道，自己需要磨炼，需要走出家园去经受些风吹雨打。因此我也更有理由感激复旦，感激这次狮城舌战带来的机遇，

感谢我的老师们：王沪宁、俞吾金、张骥珠、林尚立；感谢比我聪明得多却仍比我勤奋因而也就比我出色得多的战友们：姜丰、季翔、严嘉、蒋昌建、何小兰；感谢前前后后所有给过我帮助的人，这是发自我内心的感谢。他们给予了我太多，给了我更高的人生境界，给了我自信和超越，而实际上我却错过了其中的很多。

· 如果说复旦给了我一个精神家园，那么辩论赛给我的就是一个看得见风景的房间，我已经并还将从这里看到很多很多。但我知道，人所知的越多也将带来的无知越多，就像圆周所接触到的外缘一样；况且是径一周之，一分知识的增进带来的是三倍的无知的发现。这样看来，我的无知还是不够多的。我还知道，一个人衰老的程度是可以用梦想的减少来衡量的，而我却还很幸运地拥有很多的梦想。我梦想，有一天能登上全世界的屋顶。

情理交融的辩论世界

——对言辞的超越

何小兰

有的人很会说话，但却不大会写。这是因为：会场和听众可使他们热情奔放，又可以从他们的头脑中引发更多的文采；若没有那种热情奔放的冲动，他们是不会想到那么多文采的。

——帕斯卡《思想录》

时光飞逝如电……

当我们结束了紧张的训练，又重新回到熟悉的日常生活中去的时候，训练时的一切都显得那样美丽。一个如此温暖的集体，一场场激烈的辩论，一声声亲爱师长的教诲，全都带上了温情的印记汇入记忆。我不知道自己的一生中会有几次这样倾心的投入。在那段日子，曾经是那样累，累得精疲力竭；曾经又是那样充实，头脑和思维都得到了充分的考验。而当时流逝，当岁月轮到到1994年的时候，这一切仍无法抹去，我想我会留存一生的。

一个下雪天，辩论队又在南区研究生团学联一间朝南的办公室汇合了。电炉上的开水冒出缕缕白气，窗子被白蒙蒙的水汽盖得模模糊糊。小小的空间，又装下了一个小小的集体。这时王沪宁教授说：“我们应该好好总结辩论中所得到的经验。”我们每个人都觉得有写些东西的必要了，不光是《狮城舌战》中我们拼搏的足迹。

开完会出门的时候，会发现天上飘下来很漂亮的雪。

我实在是一个极普通的女孩子，学的虽是文科，却没有十足的灵气和满腹经纶的才气。在辩队中年龄最小，常常又把喜怒哀乐放在脸上，是个情绪化极了的人。通过训练，也只能称得上是一个辩手而已。我能再总结一些什么呢？

当我在白雪覆盖着的校园草地上来回寻思的时候，我终于找到一个我可以谈谈的话题：辩论中情感的运用。这无疑对我这个情绪化而且又有丰富感情的辩手来说是最适合的话题。

一、理性、情感、言辞

古往今来，人们对辩论的认识是不同的，有的认为是一种口头表达上的游戏，辩论的题目可以随手拈来，又可以随口而辩，也有的人认为辩论是一场考验，考验一个辩手的反应、口才、知识。那么，辩论到底是什么呢？

作为一名辩手，我们在辩论训练和经验交流的时候也常常提到这个问题。从对辩论的无知到感知辩论是什么的过程，其实也是我们增长知识、得到辩论要领的过程。辩论是理性的较量，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作为论点对立的双方辩手，要对方放弃自身的立论，认同己方的观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要具有完备的立论，整体的配合和内在的逻辑力量。在一次专家的授课上，一位教授就告诫我们：“上辩论场的时候，要绝对理性，因为真理已掌握在你的手上，只有这样用你认为的真理来说服观众，才有赢的把握。”

理性，应该是辩论的基础和核心所在。面对一个辩题，我们要建构起一套有说服力的理论框架，通过四位辩手的启、承、转、合来

充分表达自己的立场与理由。准备辩论的时候，还要设计底线，寻找论据。这些都是辩论准备第一步的工作，也就是竖起一杆理性的旗帜。比如说，在大决赛时，作为反方的我们的观点是“人性本恶”。在弄清该怎样辩的时候，我们先得准备：什么是恶？说人性本恶，怎么才能让崇尚善的新加坡人民接受？为什么人性是恶，而后天又会行善事？第一个善来自哪里？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必须解决。解决了，心里才有底，辩起来才有信心。而弄清了这一系列问题，其实也在理性这一领域做了不少的工作。

辩论是基于理性基础上的，但它毕竟还是一种综合的竞赛。一个好的辩手，光有理性是不够的。我们常常看到，在辩论的时候，一个极为感性的辩手往往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投入，他的激昂，他的忧患，他的嘲弄，都具有十足的魅力。魅力来自哪里呢？他本人是否英俊或许并不重要，他的博学也不一定尽数表达，关键在于他在辩论的时候运用了适当的感情，用感情来传达理性，这便是他成功的诀窍。

小时候，我们都做过这样一个游戏：根据两手相握的方式来判断一个人是情感型还是理智型，这其实是将情感与理智对立了起来。在辩论中，情感和理智不是完全对立的，情感的适当运用，对于表达理性的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因为首先，辩论都是双方对垒，辩明真理，而且，现今的辩又都带有比赛性和表演性，是要给人看的。上海地区近年来组织的“大学生白猫杯辩论赛”，以及新加坡广播局的国际大专辩论会就是这样的比赛。拥有观众，就不能将他们简简单单地当成看客，需要拉拢他们，成为己方的支持者和拥护者。这不是光靠理性就可以解决问题的。适当运用感情，便可以使言辞与理性感染人，打动人。这样讲是有一定依据的。我们可以分析一下观众的组成。观众中对比赛结果有直接作用的是评判团的成员，他们往往在学术上颇有

专长,在名声上很有影响,是比较内行的人,如这次国际大专辩论会的评委,他们关注的是立论、结构、逻辑、配合等多方面的内容。其余的观众,有的是双方辩手的支持者,有的是对辩论感兴趣者。这些观众中,内行、外行兼而有之了。一个辩手怎样来争取观众呢?门道与热闹都需要借助一定的情感的力量。“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不就是很好的概括吗?

其次,适当运用感情,可以使辩论员的人格形象更加完美。在总结辩论的时候,我们的顾问王沪宁教授、教练俞吾金教授都很强调人格的完美。他们认为做一个辩手,首先应学会做人,这是一个必要条件。完美的人格会导致辩手在辩论场上很好的比赛作风和很好的举止风度。我想,一个辩手具有真情实感也该是完美人格的一部分。具有真情实感的辩手,是真正有血有肉的人,这是对观众的一种尊重,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尊重。它犹如一场戏,如果一个演员没有自己的生活体验,完全为了这个角色而表演,那么他的表演就一定不会成功。这与社会学家戈夫曼的戏剧论也有不谋而合之处。他认为社会是个大舞台,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这些角色必须要有扮演的基础,否则会导致演出的失败,感情的投入也可算是演好一个角色的重要保证了。一个优秀的辩论员不可能超脱辩论场的氛围,他必须记住自己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用情来打动人,比说千百句高深的道理更为有用。从古到今,没有一个雄辩家是板起脸来说教的,我们的四位冠军队员也是这样的。

再次,适当运用情感,可以使辩手更具魅力。在新加坡举行的大专辩论赛,除了在最后评出冠军队伍以外,每场比赛都要评出一个最佳辩论员。这个最佳辩论员的称号是对辩手辩论技巧的肯定和他出色表现的赞誉。在观众眼里,这个最佳辩论员无疑也是最具魅力的。什么样的辩手可称为具有魅力?除了他敏捷的反应、

翩翩的风度以外，他发言的感染力也重要的一环，而这感染力，便是来自于感情的合理应用。

本次大专辩论赛最佳辩论员蒋昌建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看过三场比赛的朋友一定不会忘记他在场上三次出色的表现。他除了陈词慷慨激昂、态度从容不迫外，又多了几分情感的投入，乃至有些许的冲动。这就是他的魅力所在。看过比赛的人能忘记他那浑厚的嗓音吗？能忘记他所引用的带有号召力的词句吗？能忘记他把理性升华到观众可接受的层面吗？当比赛的录像播放以后，昌建成了青少年心目中新的偶像。

昌建感情的投入，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个极有感情的人。他在辩论队里年级最高，阅历最丰富，所以对事物的感觉和评价也最真挚。这是他能够进入感情投入的基础。他刻苦的训练和对完美的孜孜以求，便是通往成功的重要保证。他的音色很好，语感也好，又有过上课讲的经验，所以他在发音上有比我们更好的基础。但他对感情与语言的结合在开始的时候并不算最好，他便刻苦练习。在赴狮城的最后阶段，他天天早上要作一篇即兴讲演，让我们评价他的神态、语言及感情。训练的时候，也是昌建母亲病重的时候，远在安徽的母亲把儿子带大又供他上大学，鼓励他来复旦读王沪宁教授的研究生，这是多么不容易。现在母亲正需要儿子的照顾。昌建被准了假却没有回去。他对我们说：“妈妈有我姐姐照顾，没有关系的。”可是在7月的一天，当我们又进行语音训练的时候，他拿起了艾育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充满激情地朗诵：

“大堰河，是我的保姆。

她的名字就是生她的村庄的名字，

她是童养媳，

大堰河，是我的保姆。

……”

读着读着，他的感情越来越投入，最后竟泣不成声。艾青写这首诗的时候怀着的是对大堰河的一种感激之情。大堰河爱他，他也爱大堰河。相同的思想感情使得昌建立即联想到自己的母亲，感情的闸门便打开了。他是一个有感情的人，所以他在辩论场上可以很好地投入，这就不足为怪了。

情感的投入增加了辩手的魅力，而这也 在训练时让辩手付出了更多的心血与汗水。

第四，适当运用感情，可以使辩手更好地投入辩论。在四位辩手中，但任“启”和“承”的辩手最会遇到不投入的情况，因为他们的发言顺序在先，对方意见的分歧还没有达到白热化的状态。对方辩友的漏洞还不容易被抓到。辩手本身没有投入，怎么还能调动观众的兴趣与热情呢？一场好的辩论，一个优秀的辩论队伍，应该在一开始就要争取观众，给人以先入为主的好印象的。

进行训练的时候，我们也常常碰到不能投入的情况。我们每晚会辩论一场，从“J 有天会不会下雨”辩到“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有时候我们一下子进入状态，有时候却不行，双方三辩都陈词完了，还没有进入状态。不投入的辩论不仅引不起观看辩论的老师们的兴趣，连我们自己觉得没有劲，自己口中讲出的话不像是自己要表达的东西，不知在为谁而辩，不知为什么问题而辩。后来老师让我们抓毛病、找原因，我们才发现凡是 我们很能投入的辩论，往往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问题，而在论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又用了很多实例来论证，对这些实例我们都带有或褒或贬的情感，在表达的时候，也很有信心，所以才能投入。我们也发现在人多的时候，容易调动起感情，有一种极想表现自己，证明训练没有白进行的欲望，也

易投入。这一些都与情感有关，可见情感有助于辩论的投入。打一个很简单的比方：一个人，你对他有很有感情，你就可以不惜一切为他做很多事情，这就叫做投入；如果你对他没有感情，也就不可能亲近他，甚至会疏远他。

一般说来，在辩论场上，女辩手比较容易情感投入。像1988年和复旦大学辩论队一起进行大决赛的台湾大学队的女辩手王菲菲，就很会运用感情。她的语调控制比较好，陈词的内容也比较接近实际。决赛辩题是“儒家思想可以抵御西方歪风”。作为正方一辩的她，在讲西方歪风时，就举了很多发人深省的例子，她用充满感情的语言，最大限度地表现了西方歪风的可怕，连观众也投入了。这便是情感的表现力所在。我们的一辩手姜丰在运用情感投入辩论方面也作过很多的努力。姜丰看上去小小巧巧，但已经是学西方美学的二年级硕士生，她是个随和而又懂得享受生活的可爱女孩，却不太容易投入剑拔弩张的辩论，尤其是陈词。为了能够达到这个要求，她很注重自己稿子的质量，把稿子写成最易表达情感的文章。她又常常沉醉于她本身就很喜爱的唐诗宋词之中，以求得一种更高层次的感情培养。这样，她的提高就很愉，就如她在三场比赛中发挥的那样，在一刀壁手势的衬长下，她风度极好地驳斥对方观点，维护我方立论，在自由辩论中也说了很多有效果的话，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此可见，情感对于理性的表达具有很大的作用。情是感性的、具体的、生动感人的，它虽然难以深刻揭示事情的本质，但它有打动人的作用。在辩论场上，还有什么比赢得观众的掌声，得到评判和观众的认可，更美好的事情呢？

接着我们再来谈谈言辞的问题。

古人云“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雄师。”这就给我们揭示了言辞的力量，我看过很多辩论理论方面的书籍，

有很多专家就非常推崇言辞的作用。诚然，辩是以口来辩，言辞这一媒介是不可缺少的。言辞可以将己方的观点公布，言辞也可将对方的观点批驳。所谓“妙语连珠”、“字字珠玑”，就是因此而出。言辞，作为一种文化，是一种人与人交往的工具，也是辩论中的常规武器。言辞本身就有许多变化，如语气的急、缓、重、轻可以表达辩论员的思想变化；语调的高低可以表达辩论员的激昂或是忧患；节奏的快慢可以表达辩论员的心理状态。这一系列的变化，都可以产生一种语意环境中的美感。

在训练的时候，我们常常进行语言训练。诵读的教材有《西方文学史》、《唐诗百首》、《全宋词》及一些国际政治方面的资料。指导老师从我们的语音纯正与否出发，教会了我们很多运用语言的技巧。

情感能够让理性更为观众接受，语言能够表达理性，它们都是为理性服务的。然而光用言辞就能充分表达理性吗？显而易见是不够的。它必须要通过情感的烘托，有了情感的烘托，语言才变得更有说服力。

如果说理性是根，言辞是叶，那么情感就是茎。这条茎沟通了根和叶，也沟通了辩论员和观众。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一场辩论理性是必须具有的，言辞也是一个辩手不可或缺的基本功，但是否能够适度地运用情感却不是一件易事。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对言辞的超越。

谁能够摆脱辩论场上感情的沟通呢？谁又能抵御对言辞超越的诱惑呢？

马克思说过：热情、激情是人类走向他的对象拼命追求的本质力量。

二、以声传情 以情传声

我已经提到了情感和言辞的关系,要超越言辞,还必须注意言辞中一个最重要的要素——声。对言辞的超越很大的程度上谈的就是声与情的关系。

记得我们辩论队的第一个讲座是艺术教研室的王世靖老师给我们上的。他对于语言及形象语言的表达有很深入的研究。他给我们讲语言的构成、发展,教会我们一些语言表达方面的技巧。他尤其强调的是发声技巧的语音、语调。那时候我们的训练刚刚开始,还不十分紧张,所以我们常常花很多的时间练习王世靖老师布置的绕口令、短诗集,什么“大树底下一颗枣”,还有“四和十、十和四”,甚是有趣。

王世靖老师告诉我们,把握言辞的表达能力,是从声开始的。这里所说的声,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声音。它应该是一个涵盖面很广的内容。包括:音色,发声技巧,语调,节奏等多个层面。声是一样很奇怪的东西。一个人的声与其内在修养没有必然的联系,与一个人的智慧与技能与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一个辩论员表现的好坏,是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被观众接受,却和声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以声传情,是一个辩论员的必修功课,是超越言辞的一条必由之路。

1993年4月份,是复旦校园最热闹时候之一。很多老师说很久没有见着这样的盛况了。3月份,自接到国家教委的参赛邀请信后,复旦大学辩论队的选拔工作就紧锣密鼓地进行。选拔广告一贴出,吸引了复旦的广大学生,短短几天,报名人数达108人。选拔赛

分为六个阶段。纵观选拔赛的安排，我们可以发现，如果一个辩手在发声方面有一定的技巧的话，他就比其他的选手多一点入选的机会。尽管专家教授挑选的条件既苛刻又具有发展的眼光，但最终挑选出的选手在声方面都是有一定功底或者有发展潜力的，这就是一个优势。

我们再看一下正规辩论赛的时间规定。一方陈词的时间是3+3+3+4，共13分钟，其中自由辩论只有4分钟。在上一章节里我们已分析了观众的克成，如何使时间多于自由辩论近3倍的陈词部分吸引观众呢？我们不得不以声传情。有这个技巧，不怕没有在理性上志同道合的朋友。

要真正做到以声传情，就要在音色、语音、语调和节奏上下功夫。

1. 音色

先从一个人的先天音色说起。常常有人会这么说：“这人长了一副好嗓子。”这样的人无疑是让人羡慕的，如果他倾心于表演艺术或是广播电视，一定会有更多的机会来寻求发展。不同的人，先天音色相差很多。有的音色甜美纯净，有的音色浑厚凝重，有的音色沙哑粗豪。当然，一个人的先天音色不是可以改观，在生长发育期的时候，声带也随之发育，这时便是个良好的改观时期。

问题是，我们只是一个个普普通通的人，即使是辨认手，也没有那么长远的眼光在声带发育的时候就为这次大专辩论赛作好准备。在刚被选上那会儿，我们的音色相差很大。昌建是进行过专门声音训练的，而且有过两年的教学经验，所以他浑厚有力的男中音在我们这里可算是一枝独秀。我在初中的时候碰到了一极好的音乐老师，她严格而又科学地教我们用气来唱歌，这也等于教会了我用气发声的方法，因此对声音的驾驭对我来说也不算太难。再说我

的声音本来就响亮，也算是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了。姜丰的声音有点细，季翔和张谦的音色还比较理想，严嘉在发高音的时候有些浮。当初我们一意识到语言表达的重要性之后，就急于改进，王世靖老师成了我们的专业指导老师。他教会我们用气来发音，他教得很仔细，先讲发声的原理，再讲初步练习的方法。那时我们经常找一些简单的字进行单调而又频繁的重复，来寻找王老师要我们体会的气冲丹田的感觉。为了使声音变得雄浑有力，求得声音的共鸣，四位男辩手还打开十楼训练室的窗户，临窗而吟。老大哥昌建也经常来指导我们发声，他告诉我要克服表达上的演讲腔，必须含蓄一些。他帮助姜丰的次数是最多的，有时耐心到一字一句。当某一场比赛姜丰的声音运用得非常好时，昌建不忘及时地夸奖一阵；以后上场就用刚才的发声办法。

从这些事情看来，要改变一个辩手的先天音色是比较困难的。在短时间的强化训练中会有所改观，但贵在持之以恒。

2. 语音

新加坡广播局举办的大专辩论赛从1986年开始，基本上是两年一次。他们在举办这种大规模辩论赛的时候，明确强调了比赛的宗旨：推广华语，加强各个国家和地区间的联系。

在新加坡，华人占有绝大多数，华人社会对华语往往有很深的很难解的情绪。除新加坡以外，东南亚各国及一些地区，华人也占有多数。华语，是中华民族的语言，是所有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的炎黄子孙拥有的宝贵财富。尽管在海外的许多华人不再具有中国的国籍，但如同他们的肤色一样，中华民族广博精深的传统文化和代表着传统文化的语言是华人的印记。华语有极大的魅力。阴平，阳平，上声，去声，都可以表达许许多多不同种类的感情。从古代诗人气势磅礴的诗句到慷慨激昂的演说；从《琵琶行》的委婉凄

哀到当代朦胧诗的清新亮丽，无不可以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恩格斯从审美的角度把意大利语比喻成“像和风一样清新而舒畅”，把西班牙语比作“像林间的清风”，把法语比作“像小河一样发出淙淙的流水声”。如果他听过来自东方的能够如此深刻表现思想与感情和华语，他又会作何种比喻呢？

小的时候，我很喜欢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小说的主要人物韩麦尔先生对主人公所讲的一段话也同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语言是一个民族兴盛与衰弱的象征，它是一把钥匙，是一个人的融入其民族的表征。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我对华语也同样充满着热爱之情。

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省，华语被留存、发展，在50年代，大陆又推行简体字，并于晚些时候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以北京方言为基础的普通话。但是在海外的华人社会、华人身上，华语却渐渐走向衰弱。第一代在海外的华人还带有方言，这类人已不多了；第二代华人继承父辈的意愿，不忘民族的语言；而在第三、第四代人身上呢？由于生存的环境不同，语言也同样被同化了，我们很认真地研究过参赛各个国家华人社会的情况，得知华语在马来西亚已如英语普及。在香港地区，很多大学生英语与奥语讲得呱呱叫，国语却讲得不太好。不知为什么，当一些香港的大学生来复旦参观时，负责接待的我面对一样肤色与特征的同龄人，只能靠英语来沟通时，便会感到一阵莫名的失落。他们失落了根，而我呢？是否失落了一种同胞间应有的亲近和关切呢？身为华人，却失落了根，这无疑是很悲哀的一件事。

幸好，华语还是被重视的。如新加坡广播局组织的这场比赛，就是用来推广华语。而参赛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队又如此认真地备战以待。比赛用的华语，已是相当宽泛的概念了。字有繁、简体之分；音调有平声、上声之分。台湾的国语就与普通话在音调上有些

出入，新加坡的华语也和大陆的普通话不尽相同。我们辩论队是很重视把好这个语言关的。俞老师、王老师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我们是中华民族文化一脉相承的继承者，如果我们所讲的华语都不纯正，那会有怎样的后果呢？张老师也对我们说：我们是代表复旦去参赛的，也代表中国的大学生，我们必须以最好的风度与最纯正的语言来向世界上的华人展现我们的风采。

如此高的立意，如此重大的责任，让我们每个人都把弦绷得紧紧的。如果用很苛刻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六个队员的普通话离标准都有差距。我和季翔是上海人，虽没有带着江南吴语的糯与甜，却不免在平舌音、翘舌音上要犯常规性的错误；姜丰来自东北，说话有时带有东北口音；张谦的语音是比较纯正的，细心而又严格的张老师仍旧指出他的缺点；昌建来自安徽，在语音上面，常会有一些诸如 l 和 n 的混淆。

自从张老师仔细听出我们的缺点，两位教授讲明语音的重要性之后，我们训练室一大推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的书中又添了两本又大又厚的汉语词典，俞老师把女儿俞臻的《新华字典》也拿来备用了。我们每天的日程表上都有语音训练这一个项目，尽管有时时间并不很长。一个人念，其余人听，或概括那段语句的精华，或指出其错误的语音。遇见大家不太知道或有分歧的字，我们立即查字典，那虔诚之态度，和刚学汉字的小学生没有什么差别。现在想来，那时的我们真是会钻牛角尖。可话又说回来，如果不是这样刻苦而又认真的学习，又怎能让我们华人听到四位翩翩风度的辩手在辩论台上纯正而又华美的语言呢？

为了练语音，曾经也发生过几个笑话。我们的最佳辩手蒋昌建常犯 n 和 l 不分的毛病，有一天也正巧，他在交流新闻的时候，把柬埔寨王子“拉那烈”说成了“那那捏”（音），这给我们严肃的辩论场中的气氛带来了很大的转机，我们大笑，并把此词作为昌建的经

典之作。像我年纪比较小的，又比较好动的人终于抓住老大哥的把柄，找机会就攻击他几下。他倒不在意。相反地认真来请教该怎样克服这个毛病了。他一二再，再二三地练习，现在已完全不会再犯类似的错误了。

还有一次晚上辩论，张谦在自由辩论中频频击败对手，所以在四辩总结时特别地投入。但到最后，突然说出了一句湖南家乡话，本来听得入迷的我们一下子被逗乐了，气氛再也紧张不起来。他也被弄得不好意思了。总结这场辩论的时候，我们都意识到了普通话的重要性。如果一不小心在场上讲出一句方言，这会有多尴尬？

标准的语音可以把情感准确地传递给观众，会给观众带来一种美感，会让华语散发出更加美丽的色彩，所以有一口标准的语音对一个辩手来说是多么重要！

3. 语调

据史书记载，北宋朝廷中有一个叫王沔的人，善读文章。他读文章时抑扬顿挫。掷地有声，即使文采不好的文章，经过他一读也能令听者投入。因此，很多考生在交卷后总喜欢祈祷一番，希望能让王沔在皇帝面前读他的文章。这读文章的抑扬之法，其实就是语调的变化。

帕斯卡说过：说话的语调可以左右最明智的人，并且能改变一篇文章或一首诗的力量。这其实也告诉我们语调的变化对于表达思想、表达情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语调，是言辞的一个重要组成成份。语调不同于声调，平和声组成了声调，而语调是句子里声音的高低变化和轻重快慢，以表示一定的语气和情感。高昂的语调能够调动辩论员的情感投入，也能激起观众的共鸣；低沉的语调能把观众带入沉思和忧患，语调在辩论员的发言中可以充当很多角色，兴奋剂、催化剂……

没有经过训练的人，他对自己语调的把握有一固定的模式，这是基于他的语感、他对所读的文章理解程度上的。正规的辩论赛却不能允许太多的自我语调模式，而需要辩论员能够把握住语调的运用，充分地表情达意，求得观众的认可。

这里我可以举一个蒋昌建的例子。有一次我们刚刚开始语音训练，朗诵的内容是古代诗词。老师要求我们每人熟读一首，昌建选的是一首五言绝句：“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昌建用的便是自己的语调模式：前两个字读平声，第三个字着重，第四个字扬声，第五个字去声。这下可好，四句诗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有规律可寻的模式，不仅没有一种意境，反而有些好笑了。这就是一保持自我语调的例子。昌建是努力的，他在意识到这种规律的不完美性后，就在以后的练习中加以注意，并有了很大的进步，所以我们才能听到他用男中音朗诵《虞美人》和在辩论场上那句句充满哲理的语言。

一个辩论员在辩论中应用什么样的语调，是没有什么一定规律可循的，它来自于临场的经验和对语感的把握。正规的比赛在赛前给双方以准备的时间，对陈词稿中语调的把握辩手可以作相应的准备，进行有关陈词的语调训练。这样做，是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的。

怎样来控制语调？没有实实在在的规律可循。需要辩手具有良好的语感。但如果说经验，还是有一些的。一般说来，遇到以下几种情况，语调可以这样处理。

①陈述观点（包括论点、分论点、我方立场、有利于论点的格言），语调平稳有力。

②驳斥对方，尽量用反诘句，可以适度夸张对方的错误，视实际情况抑或扬。

③事实论证，尽量缓慢，力求把事情讲明白，讲清楚。事实是论

据的一方面，是观众最易接受的。必须把自己的感觉与评价融入到语言中去，以求得与观众感情上的理解与沟通。

④总结陈词，这是感情的升华，特别是正方四辩，他是场上最后一位发言者，再也没有别人有机会反驳，所以他的声音可以响亮一些，语调可以自然些，高昂些，给人一种有力量、有思考回味无穷的感觉。

在熟练掌握语调的变化之后，辩手不该忽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辩论艺术的特性。辩论不是一项纯语言的表达活动。尽管它需要艺术修养，追求一定的艺术效果。这就在语调的运用上把演讲、表演的语言区分了开来。演讲的语调是偏向于激昂的，这与演讲的目的具有煽动性有关。表演，特别是舞台剧的表演，它的语调具有唱白的特性。辩论的目的是为了辩明一个真理，为了争取观众，在语调上可以借鉴别的艺术的表现形式，却不可一味地求新，以脱离了辩论本身的特色。

4. 节奏

一位语言专家对节奏的重要性说过这样一段话：行云流水与短暂沉默之间的交替转化所引起的心理反映是十分奇妙的。它创造了回鼓掌的余地，用期待心理提供了下一步跃迁的跳板，又为发言人本身的审时度势创造了机会。同时，一张一弛，韵味十足，这也符合人们的审美意识。这段话说明了两个层面的意思：节奏的含义、节奏的作用。

节奏有缓与急之分，抑扬顿挫中的“顿挫”就属于节奏的范畴。通常谈节奏，都是从停顿入手的。

看过辩论赛大决赛的朋友一定会对辩论主席黎学平宣布冠军队名字时卖的关子记忆犹新：“评判团经过慎重考虑之后，一致同意，优胜队伍是——反方复旦大学。”这个卖关子就是对停顿有效

的运用。他利用观众的心理，控制了辩论场的气氛，这一首很高很妙。

停顿是常用的一种节奏变化方式，可分为自然停顿和感情停顿。自然停顿就是依据语句本身的结构，在该停的时候作一下停顿。后人所创的标点符号，就是自然停顿的一种标志，这是比较机械的。感情的停顿就不同，它是辩论员在感情需要适当变化的时候作的停顿。有的是为了像黎学平一样的卖关子，有的是调整感情，有的是稳定情绪，所以说要谈到停顿的技巧，还是谈感情停顿为宜，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比赛中我方运用感情停顿的一个实例。

初赛：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

正方：对方一直回避这样的问题：超道德行为到底是不是道德行为？请对方回答。

反方：超道德当然不是道德。但如果按照对方的逻辑，那么裴多斐的《自由与爱情》诗大概就得改成——“爱情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若为温饱故，二者皆可抛”了。

这里的停顿，严嘉是用在改过的裴多斐的诗中间。《自由与爱情》是广大观众所熟悉的一首诗，严嘉把对方的逻辑作为改诗的前提，这首诗会改成什么样呢？大家翘首以待。一个停顿，吊起了观众的胃口。当“若为温饱故，二者皆可抛”出来之后，吊着的胃口放下了，而且伴着被幽默打动的笑声，这句话当然得分了。

运用停顿有好处，可也要注意两点。一是切忌被标点符号框住，情感的发挥往往不是机械化的，一个被标点打断的长句并不表明其感情亦是长而不可分割的。二是切忌滥用停顿，随意的停顿会使一篇优美的文章支离破碎，缺乏整体的美感。频繁的停顿会令观众认为辩手是一个好表现的、故弄玄虚的人，反而会引起不必要

的对立情绪。因此没有十足的把握,就不要任意而又主观地运用停顿。

节奏的作用也大致在此,可以增加文章的美感,有利于观众的接受。好的节奏会使优美的语句锦上添花,会使平淡的语句增添光彩,听来如唱歌般的悦耳。对节奏的运用,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练就的。同样需要多读、多练,即使是模仿,也会有成效的。

以上谈的音色、语音、语调和节奏都是声的技巧,以声传情,就是通过这些具体方面的变化谐调而产生的效果。至于以情传声,相对来说就方便一些。以情传声,也可以吸引观众对情的投入,爱屋及乌,以求得对辩手声音的好感。

如果说表演的最佳状态是声情并茂,那么辩论的最佳状态便是“以声传情”与“以情传声”的结合。一位政治家说过:“对于任何行为而言,竞争和对垒都是一种刺激和调动因素。在这种‘寸上必争,互不相让’的情况下,任何一种手段的略胜一筹,稍占上风,都可以具有决定意义。”声和情的关系及情对声的超越便是这样一种秘密武器。

三、情感的多层表达形式

情感,是最朴实的,也是最奇怪的一样东西。情感不仅表现了辩论中的理性,还对一个辩论员起到了各种良好的谐调作用。人的情感有不同的层次区分,人对于自身情感的表达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在辩论场上,各位辩论员不会是以同样的方式来表达情感,但他们总是配合默契,以真实为主的。

一支优秀的辩论队伍,对每一个辩手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不同的辩手通过不同的情感表现方式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打击”对

方，争取观众。这次参赛的我方四位辩手，在感情方面表现得各有千秋，正如新加坡大众传媒所报道的那样：姜丰不温不火，非常亲切；季翔严肃理性；严嘉口齿伶俐；昌建成熟稳重。这是对他们辩论风格的精确概括，也是对他们感情表达方式的具体概括。可以说，这也是在比赛前就根据他们的特点设计好的。女辩手在场上应是最具有情感的，她应以文静、亲切、热情显示东方女性特有的魅力。姜丰的情感表达稍有含蓄，却不失文静与亲切，因此给新加坡人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这里还要提一下参加1986年、1988年亚洲大专辩论赛的台湾大学女辩手王菲菲。两次参赛，她的情感设计变化极大。第一次她担任一辩，很感性，语言充满感表；第二次她担任四辩，对情感的表达含蓄多了，这也说明同样一种感情，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表达，情感的设计也需和辩手年龄、个性保持高度的一致。季翔的情感设计是沉稳，他看上去比较严肃，因此在表达方面绝不可太用情，也不能用夸张的宣泄方式。严嘉时常把笑容挂在脸上，为人热情开朗，因此他的情感就可以外露，争取更多的观众。昌建的生活阅历最丰富，他对感情的控制也比较强，所以不必太刻意地为他来设计。四位辩手都 有了自己设计好的情感表达方式，从不同的角度默契配合，取得了极好的整体之势。尤其是昌建，他的情感表达的多面性表现得尤为突出。在一场比赛中，他显示了多个侧面，每一个侧面都是真实而又个性鲜明的，如在大决赛时昌建在自由辩论上的表现。

正方：犯错、犯罪都是人性本恶，就符合您本恶的立场了吗？那么犯罪干嘛要处罚他呢？

昌建：我还没说完呢，你们说进入社会是本善的，是在进化论原始社会的本，还是人一生下来的本，请回答！

这里他避而不答对方的回答，感情中透出了严肃的成分，这是干脆利落的情感表达方式。

正方：我们就很担心人性本恶如果成立的话，那样不过是顺性而为，有什么需要惩罚的呢？

昌建：对方终于模糊了，我倒想请问，你们开来开去善花如何开出恶果，第五次了啊！

这里的他充满了攻击性，用一种直陈的情感表达方式。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在一个辩论场上，每个辩手根据自己的任务、位置、特征设计不同的情感表达方式。每个辩手又在设计的框架内，运用或是含蓄、或是直陈、或是热情、或是冷漠的方式来充分表达情感，显示理性的力量。这也是队员默契配合的一个方面。

通过训练，我概括出几个基本的情感表达方式：

① **热情。**适用于比较开朗的辩手。热情的辩手在语言和表情上都和观众有很多的沟通，对观点和爱憎的表现力很强，是情感中最具有色彩的一个表现形式。严嘉就主要采用这样的表达方式，遣词造句浅显生动，表情自然，态度可亲。

② **深沉。**适用于比较沉稳的辩手。深沉又不是假装出来的，而是一个辩手本身的气质的一种体现。一个用深沉的方式表现情感的辩手，其形象比较容易获得观众的吸引，博得观众的好感，具有一种理性的感召力。

③ **幽默。**幽默传递给观众的是轻松，轻松之后，又给观众启发和思考，极易讨巧。在紧张折辩论场上，用幽默来传递情感，最容易得到掌声，是拿分的杀手锏。

④ **实在。**这是情感表达高层次的境界，一个辩手能在辩论场上面对观众与摄像机还一个真实的自我，实在是不易的。而就是最

真实的人，才最能被接受。辩手的思想要与观众的思想交流，辩手的语言要与观众的接受能力接轨，这都是基于平等基础上的。情感自然的流露，随着辩论的需要自然地变化，这不等于与观众同喜同悲吗？超技巧的辩手是个优秀的辩手，就是这个意思。

顺便提一下，即使为了辩论的需要，在事先我们进行了情感的设计，但这不等于说辩手不能突破这个框架。就如同节奏不能遵循机械化的模式一样，情感的表达也不是机械化的，都要从辩手实际情况出发，争取最好的表达效果。

这是辩论场上的情感表达方式。其实，作为一个辩论队，从它组队之日始，就赋予了情感表达更深一层的含义。辩论队上场比赛的是四位队员，可是一个辩论队还包括我们的领导小组组长、顾问、教练、候补队员、陪练队员，为了弘扬华语，夺取辩论赛的桂冠，辩论队每一分子都用不同的情感表达方式奉献自己的一切知识与力量。

张老师给我们的思想、生活、学习以指导，而教练俞吾金老师用的是不同的情感表达方式。他是位博学多智的教授，不善流露感情，却可以让我感受到他丰富的内心世界。每天他早出晚归，和我们一起训练、学习、讨论；他顾不上女儿，顾不上自己的专业研究。他常常喉咙疼，可仍边服药边给我们上西方哲学史，讲西方哲学的各个流派。在3103那一场不太成功的公开赛之后，他又严肃又客观地批评了我们，那一天他很生气，也看得出他很着急，这一切的出发点，都是为了能够把我们培养成一支完美优秀的辩论队。

王沪宁老师，我们的顾问，从不轻易地表露自己的喜怒哀乐，或许是我年纪太小，无法很深刻地理解王老师深邃的思想与丰富的感情，常常觉得他高深莫测。可他在《狮城舌战》一书中所提到的一节让我所悟：“我们的队员，我可以说，我是爱他们的。辩论结束了，我是无情地说出了一个事实：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大家都不

愿意听，因为这一场辩论使我们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感情。我是轻易不动感情的，在这个时候，我并没有。但是，我知道，我内心深处有着无比壮阔的感情波澜。……”这一段话我是不会忘记的，这又何偿不是一种情感的表达方式呢？

我们的林尚立副教练，天天早上很早就到训练室报到，很晚才回到自己温暖的小家。他放弃了自己的论文写作，放弃了假期里的研究。我经常看到他大把大把的书和期刊从六楼国政系资料室借到训练室，他常常笑嘻嘻的，和我们既随意又平和，在这平和和随意之中，他又倾注了多少感情呢？

张谦，还有辩论队的陪练队员，他们总是在辩论队最需要的时候出现，有时候，情感并不一定通过语言来表达，一个人的行为可以说明一切。在《狮城舌战》中我已经讲了他们的故事，直到现在，他们的陪练时的一言一行还是那样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里，我是那样敬爱他们。有一天，在图书馆门口遇见徐勇，他说：“小兰，《狮城舌战》看过了，你该多用点篇幅写写我们陪练队员噢！”我正想解释，他忽然笑着说：“骗你的，别当真。”他们就是这样真实与可爱，即使这次同样我没有用多点篇幅来写他们，可他们的那种毫不矫饰的情感表达已写在了我的记忆中，会把他们当成我永远的朋友。

这便是辩论场外的情感表达方式，它比辩论场上的表达方式更为丰富与自然。拥有一个共同的方向与目标，是多么的奇妙？它赋予了每个人前进和克服困难的动力。明星是个别明星的身后有一圈亮丽的光环，与明星发出的光芒相互辉映。光芒，来自于一个人丰富的内心世界，理智、情感、言辞，统一得如此完善。尤其是情感的投入与表达。

情感的表达是难以用语言来描述清楚的。

列宁说过：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

四、声情并茂与过犹不及

在前面的章节我们已经谈过声与情的关系，并且说到辩论的最佳状态是以声传情和以情传声的结合。一般来说，一个优秀的辩手在陈词发言的时候都可以达到了声情并茂的境界。例如1990年南京大学参加亚洲大专辩论赛的四辩，就是声情并茂的典型。他在结尾的时候，朗诵了席勒的《欢乐颂》，为南大赢得了较多的掌声。又如1988年亚洲大专辩论会台湾大学代表队的一辩王菲菲，在她陈词的时候亦是声情并茂。但是，辩论毕竟是充满理性的，一个辩手如果没有掌握好声情并茂的尺度，会得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会给辩论带来遗憾。因此，在肯定声情并茂对辩论有积极意义的同时，必须把握好声情并茂这个度。

把握这个度，第一步要做的是以清醒的头脑摆正自己的位置。就像有人考试会场上晕一样，一个辩论员在灯光与观众面前往往会产生一系列的心理反应。不管怎样，在克服不良心理因素的时候，一定要认识到自己是一个辩手，是整个辩论队的一分子，到这里不是来表演，而是来讲明道理的。有这样清醒的头脑，即命名是极为投入，也不会声情并茂过了火候。如我方三辩严嘉在初赛的时候陈词发言都比较精采。在他的第一个分论点里，他举了孔子在陈绝粮的故事，赞颂了从伯夷、叔齐到朱自清这些不为贫困而放弃道德的典范，引用了二次大战时英国民众坚持讲道德的史实。这些人物和事迹很容易使陈述的辩手达到声情并茂的状态。严嘉是久经沙场的辩手，他没有沉醉于声情并茂，很快超脱了出来，在第一段结束的时候，还不忘理智地问一句：“面对这些贫寒而又高贵的灵魂，来自英国的对方辩友难道还要告诉我们‘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

条件’吗？”

要把握这个度，第二步要做到对辩词有深刻的理解。辩论稿不同于演讲稿，辩论稿不会因为需要声情并茂而把整篇稿子设计成极为感性的文章。辩论稿是用来讲理的，四位辩手的稿子分别从逻辑、理论、事实、价值万万岁来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为了得到观众的认可，一般来说可以加入一些让辩手有情感发挥余地的词句，但手应该对此作具体的分析。例如蒋昌建在半决赛（辩题是：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的总结陈词中，引用了一句古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句诗告诉我们事物总是在不断发展之中的，迷与我方的观点有很大的联系；现在没有办法治愈艾滋病，但事物是在发展的，只要全社会人们都关心，重视这个问题，治愈艾滋病就不会是个梦想。通过这样的理解，就不会单单地陷入声情并茂中了，而会产生一种紧迫感和责任感，因此用在这里的这句话，已不可能是一种声情并茂的读法了。

把握了声情并茂的度，一个辩手在陈词的时候必定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蒋昌建不愧为本届比赛的最佳辩论员，在初赛时的陈词中，他对康德名言的引述进入了情理交融的境界。一方面，昌建讲到这里，感情已经达到了最高的境界；另一方面，他的感生语言又揭示了一个极为理性的箴言。声情并茂，给观众和评判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也留下了回味的余地。

话又说回来，要把握好声情并茂这个度并不十分容易，一个没有临场经验，不能认识辩论的实质的辩手常常会偏离这个度。一旦偏离，就产生了过犹不及的情况。

《论语·先进》中有一段子贡和孔子的对答。子贡问孔子：“子张和子夏哪一个更贤能呢？”孔子回答说：“子张贤过头了，子夏还没有及得上贤。”子贡说：“那么子张更贤了！”孔子说：“过头和不及是一个样的。”这就是过犹不及的由来。辩论也是一样，声情并茂过

了头也是不能让观众接受的，它与平平淡淡的论述一样，而且白白浪费了感情。

过犹不及的表现有以下几个：

其一：自我陶醉。一个很注重情感的辩手，在场上最容易犯这个毛病。一旦进入了自己为自己设计的情感圈套而又无力自拔，那么，就会被感陶醉而回不到激烈的辩论中来，而且还会脱离观众。在选拔赛“两两对辩”的时候，就有过这样一个例子。那一场辩论的题目是：科学技术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反方辩手在陈词的时候相当投入，把古今中外很多例子都拉了出来，获得了观众的认可。但他陶醉于自己的发言之中，一发不可收，在自由辩论的时候回不过神来，一下子卡壳。

其二：情绪化。情感不能受理智的支配便导致情绪化。一个辩手在过度的声情并茂之后，往往会产生这种情况。这种辩手，有极强的表现欲，为了突出自己，在陈词的时候过分渲染，情感的缠绵一旦脱离了理智，要收回来就难了。于是，便出现两种情绪化的极端：一是依旧抢足风头，每句话必驳，破坏了整体之势；二是过份沉默，难以进行正常合理的思考。情绪化的危害是大的，它会给一个辩论集体进行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和极大的心理压力，也会给观众造成嫌恶之意。

其三：脱离辩论。声情并茂过头，会给观众什么印象呢？观众会认为辩手不是在辩而是在演。这种情感过激使辩手走到了声情并茂的对立面。往往表现为“说过头话”、“拿过头调”、“做过头事”。而在遇到对方攻击时，又显得极为愤怒与亢奋。在这方面，我自己的感受比较深。我是个很情绪化的女孩子，在日常生产中感情的起伏就比较大。再说我是演讲和朗诵爱好者。一在正规的场合操起普通话，便会有一种演讲腔。在语言训练的时候，张老师就指出我这个缺点。她对我说：“你的陈词听起来演讲味很浓，让观众听起来

不太舒服。”张老师说得很极有道理。在选拔赛的时候，也有类似的声音条件很好、很会用感情的选手被淘汰，原因很简单，他们没有给人一种在辩论的感觉。

其四：言语程式化。这是一种很做作的故意用情的方式。辩手急于求成，就故意调动一切情感手段来任意发挥，在辩论赛上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假我。这是最令观众生厌的。我觉得，在辩论场上，一个真我比假我更为重要与可行。我们前面提到过情感设计，这并非指要营造一个假我，而是从辩手自身特色出发，也是一种真我的形式。

要划清声情并茂与达犹不及的界限，主要靠辩手自己的经验。把握好声情并茂与过犹不及，还需要借助心理调节的力量。总之，头脑清醒，正确的角色定位是第一位的。

声情并茂是辩手的一个高要求，做得好，可以赢得很多的观众；做得不好，便过犹不及，事倍功半，一个辩手没有做到声情并茂也是无可厚非的。但复旦大学辩论队的辩手要追求的是一份完美。

在断断续续写好以上那些体验之后，我仍觉得意犹未尽。辩论中的经验来自于自己的斟酌总结，更来自于专家教授、顾问教练的悉心传授。作为一介学子的我，在四个月经受知识、逻辑与毅力的洗礼之后，又得到了多少难以用文字表达的东西呢？

是辩论训练，让我感受到一个人没有丰富的知识，那将会多么贫乏！我难以忘记在选拔赛最后一关口试关上，面对专家教授的我的窘态。面对博学的朱维铮先生，面对含蓄的俞吾金教授，面对充满智慧的王沪宁教授，我领会到了知识的感召力。也许我只能做一个平平凡凡的人，但是我一定不会让我的头脑空。没有丰富的知识，一个人的世界就不会有太广阔的视野；没有丰富的知识，每项

事业的发展就不会太顺利。

是辩论训练，让我感受到生活中不仅要接受，还必须学会付出。有多少人曾给予我们无私的关怀啊！学校的领导，团委、学生会的师生，图书馆的老师，开电梯的师傅……他们都那样质朴与平凡，带给我们鼓励，带给我们动力。以前的我真的很习惯接受上帝的给予，也曾拼命追求一份浪漫而又平静的生活，可惜，我没有真正学会为别人考虑，没有担负起真正的责任。逝世的一切我无法再去挽回，可通过这样一场生活的考验，我真的感到做一个人的责任了。不想苛求生活什么，也不想苛求别人什么，唯愿用一份真心与一份诚意，给需要的人，需要我的事。

是辩论训练，让我感受到华语的魅力和民族的力量所在。当看到姜丰从李显龙准将手中接过奖杯的时候，我是流泪的。整个的一场大决赛，由昌建的精彩陈词结束，让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华语如此之美，凭这一点我就要为我的民族骄傲与自豪。可是当我面对现实的时候，我又不免有些悲凉的感觉：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包括语言在我们这一代身上又体现了多少呢？我们为什么不试图挖掘我们身上的潜力来发扬光大呢？又有多少同龄人了解我们的文化传统，并为之自豪呢？社会在不断地向前发展，我们更需要在这样的时刻发挥我们民族的力量。

辩论赛给我的实在很多。

夺冠以后，我们被邀去做报告，受到中学生的欢迎；我们又重去了衡山集团，和他们的团员青年交心；《狮城舌战》出版发行，我们去参加首发式……荣誉的光辉照耀着我们，我仍觉得有些局促——尽管老师说这是我们应该得的——我却总觉得做得太少。

训练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引用法国诗人兰波的一句诗：生活在别处。就我理解，那时精疲力竭的我们想象有一份空闲而又安逸的

生活。如今，我仍要说生活在别处。因为投入的真实的一程已经逝去了，再要有这样的生活，必须要经过更大的努力。谁知道呢？或许是惊心动魄的，或许是平平淡淡的，我只晓得一种幸福而又真实的生活不会来得太轻易。

这些所得，同样与辩论中情感对理性的作用一样，是一种对言辞的超越。

写到这里，已是月到中天的时候。今天并非一个特殊的日子，但我仍想许下几个愿：

愿我的所得能够给辩论爱好者带来一些启发，让辩论给情感留有一份重要的位置。

愿我的努力能让我成为一个内涵丰富的，有利于别人也有利于社会的人，在梦想和现实之间缩短距离。

愿我们华美的民族语言发扬光大。愿这一把钥匙会在我们这代人，及以后的每一代人身上体现得更丰富，更具魅力。

也许，我的愿望很奢侈，但我总觉得会实现的，一定会的。

在成熟中超越 在超越中成熟

——逻辑的心理学与心理学的逻辑

张雷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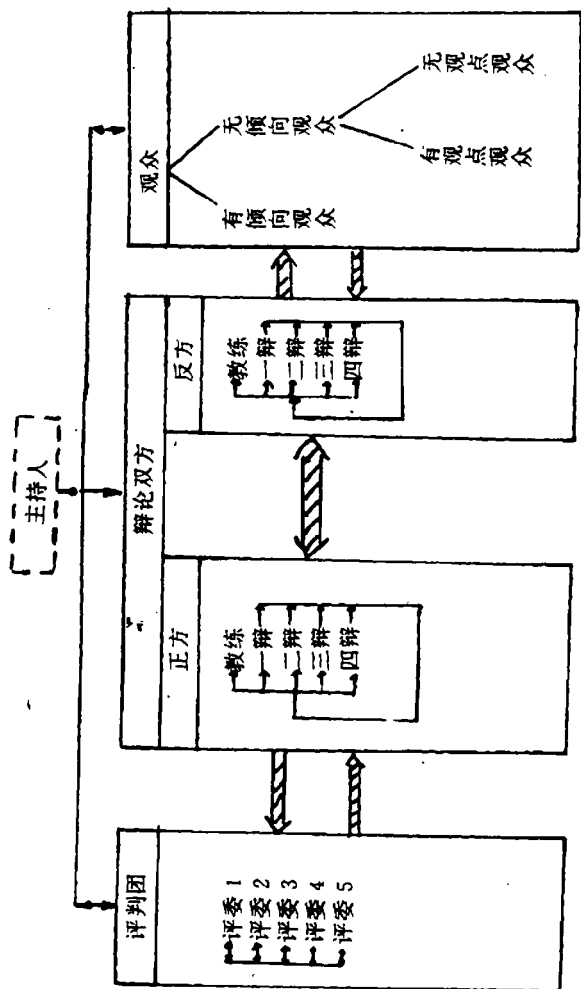
逻辑是不能打败的，因为打败逻辑必须使用逻辑。

心理是无法超越的，因为超越心理必须依靠心理。

逻辑、心理与知识皆为辩论的要素，存在于辩论比赛的各个环节，贯穿始终。其中知识内容因辩题而异，逻辑与心理则相辅相成，有规律可循。

辩论赛前，参赛代表队在获知辩题、抽签决定之本方应持立场之后，经过反复讨论斟酌，设计辩论方案（下文称之为“预案”）。为此，首先要构建方案的逻辑框架，然后组织安排好（理论的、事实的）材料的运用，决定应采取的战略战术。在比赛现场，辩论队与辩手们根据比赛进展的实际情况，在实施预案的过程中不断作出相应的修正与调整。这种现场的实时（on line）的推理与判断，是在队员个人与辩论队整体的心理活动控制下进行的。同样，评判团与在现场观众也有相应的心理活动，共同营造了整场比赛的心理氛围。

凡人，只要能思考，就离不开逻辑；如何思考，怎样付诸于言行却受制于心理状态与心理活动。辩论亦然。当我们抽去每场辩论中绚丽多彩、姿态各异的内容之后，剩下的就是逻辑与心理。打个



- 注: 1. 矢线粗细表示信息量大小
 2. 子系统内部矢线粗细与信息量大小无关。

图一 辩论赛的系统组成框图

比方,辩论赛好像一个人,逻辑就是他的“骨架”,根据辩题组织形成的全部内容生长在“骨架”之上,成为“血肉之躯”,心理赋予这“血肉之躯”以活的生命。本文将对逻辑与心理之间的内在联系,即逻辑如何受心理的制约,心理又如何按逻辑规律演绎,作些精浅的探讨。

从系统分析的角度着叟,我们把辩论赛的其他组成部分(如大会组织筹备班子,社会舆论宣传系统等)放置一旁,构建一个辩论赛的简化系统:它由两支参赛队、一个评判团和众多观众组成,这三个部分各自成为系统中的子系统(见图一)。每个子系统内部、子系统之间大量的信息传递与反馈,图中用箭头的矢线——标出信息传递的路径,由实线的粗细表明传递信息量的大小与影响程度,当然线越粗量越大、影响也越大。实际上,借助于这种信息的传递与反馈,实现系统内在的逻辑联系,产生心理的交流与影响。

下面我们站在辩论队的立场上,对图一所反映的系统内各子系统间、各子系统内的子系统与元素间的逻辑关系、心理影响等,从系统分析的角度进行讨论。

一、高尚人格,超凡技艺

——辩论员的逻辑与心理

综观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的几场比赛,如果说辩手们自己的学识和口才征服评委与观众,不如说他们是以自身的人格魅力征服评委与观众。1993年8月28日,新加坡的《联合早报》载韩咏梅女士的一篇报道有两段关于“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辩论情况的评论:

复旦有书卷气

复旦大学的代表经过两场辩论后，都各显出自己的风格，女将姜丰不温不火，非常亲切。季翔严肃理性，严嘉口齿伶俐。而蒋昌建成熟稳重。四位代表虽有风格，但合作起来也不失默契，整体表现出他们所特有的书卷气。

.....

悉尼大学的代表也可圈可点。自由辩论时反应相当敏捷，并没有因为碰上强队而示弱。相反地，在自由辩论中，双方一来一往，悉尼大学没有因为复旦的文字功底而显出弱势。

悉尼大学的另一个优点就是非常和缓，不论遇上什么难题他们都从容以对，非常理智。

.....

不能得理不饶人

.....

不过他（指评委许庭芳律师）也提醒复旦的代表，在得理不饶人的同时应该加一点谦和。

韩女士对我校四位辩手的风格，概括得恰到好处，确实抓住了各自的“人格”特点，批评也十分中肯。对悉尼大学代表队的评析也是这样。

在比赛中，每位选手需要最大容量地接收来自本方队友、对方辩友、评判团评委和观众所发出的各种信息，快速高效地进行加工、处理，作出合乎逻辑的推理判断，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决定自己应采取的行动，并付诸实践。这样一个搜集、整理、加工、推论、决策、行动的过程伴随其心理活动过程而展开。任何人，无论在何种

场合,尤其在情况变化急剧、竞争激烈的状况下,其心理活动必然受到人格的制约,最终成为每位辩手的人格淋漓尽致的表演。

何以谓“人格”?人格又如何制约人的行为?怎样去塑造人格?……种种问题并不那么容易回答。人格究竟是什么,见仁见智,历来不大一致。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关于“人格理论”条目下指出:“人格一词含义很多,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但有一个共同的核心意思,即指个体独具的各种特质或特点的总体。”在“人格”条目下又指出:“每个人所特有的心理—生理性状(或特征)的有机结合,包括遗传的和后天获得的成分,人格使一个人区别于他人,并可通过他与环境和社会群体的关系表现出来。”有影响的心理学家吉尔富特具体指出主要的人格特质有七种:需要、兴趣、态度、气质、能力倾向、形态和生理。在我们接受这些说法和定义的时候,就已经在理论上和事实上承认了人格的先天遗传性与后天获得性,承认了人格是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特质。于是,也就承认了在同一环境背景之下,不同人格的人就会的截然不同的心理活动,并采取与之相应的言行,可谓判若云泥。

下面我们分别列表概括:在一般情况下,辩手们在收到来自不同方面的信息之后,会做怎样的分析,可能诱导哪些不良心态与后果,应该怎么做。

1. 来自本方队友的信息

按惯例,在正式比赛之前,辩论双方均已根据辩题和己方立场,在教练指导下,就逻辑、理论、事实、价值诸方面对辩题进行剖析,统一认知,制订一套或数套方案。其中有一套基本方案,其他的则是针对赛场上可能出现情况的调整方案。这样,选手在接收到本方队友通过陈词或发言所传递的信息之后,立即与预案作比照,作出预案执行状况的判断,结合现场反应,产生不同的心理状态,或

按这一心态作出反应，或在意志控制下调整自己的不良心态，然后作出反应。有关几种可能情况列于表1。

表1所列举的情况是在粗线条划分的前提下归纳的。赛场的实况要复杂得多。至于表中所列不良心态会不会出现，出现后又能不能及时克服，就完全取决于辩手个人的心理素质与品德涵养了，当然与训练水平、队员相互间的默契也有密切关系。所幸，在这次辩论赛上，复旦大学四位选手的表现是出色的，可以认为他们的心理状况基本上处于最佳境界。即使在个别场合、个别队员有些许失误，也总会有人及时采取积极行动，进行弥补。例如在“人性本善”的辩论中有这样一段论辩：

吴淑燕：我想请问对方同学，再次请问你，如果人性本恶的话，到底谁第一个教导人要行善的呢？

季翔：我方已经不想再次回答同一个问题了！我们要请问，孟子不也说过：“形…色，天…天性也”嘛，请问什么叫天性呀？

许天龙：你讲得吞吞吐吐，我实在听不懂。对方辩友，请你回答我们，荀子说的是性恶说，还是性无善无恶。

严嘉：这点都搞不清楚，还来辩论性善、性恶？（笑声、掌声）
……

当时季翔的语言没有组织好，把引用的孟子“形色，天性也”的关键语句说得结结巴巴，遭到对手的攻击，严嘉在这个情况下，不正面回答或重复孟子的同一句话，而针对许天龙提出的荀子是性恶说还是无善无恶说，作了一个一箭双雕的回答：“这点都搞不清楚还来辩论性善性恶！”实在妙不可言，扭转了被动局面。

我很欣赏悉尼大学代表队同学在复赛中心理素质的表现：

表1 与来自本方队友信息有关的处理影响与决策

信息性质判断	场上效果	可能诱导的不良心态	相应行动后果	应具有心态	拟采取对策	目的与结果
执行预案	很好	得意忘形	轻敌,“大意失荆州”,有损形象	谦和、冷静、积极	继续按预案进行	保持主动权
	好	得意				驾驭比赛进展
	一般	平淡	无气势、无感染力	增加激情、积极	继续预案、注意观察	调动评委、观众情绪
	差	急躁	无所适从	沉着、保持自信	修正或调整预案	争取主动权
	很差	慌乱	丧失自信			
调整预案 (或采用备用方案)	很好	得意忘形	轻敌,大意,有损形象	谦和、冷静	积极配合	保持整体默契
	好	得意			转入调整方案	
	一般	平淡	无感染力和说服力	增加气势与激情	保持协调	
	差	急躁	失去整体默契	谅解队友、积极行动	对方案作再调整	弥补失误或过失
	很差	慌乱、埋怨	丧失观众、评委			
偏离方案 (或有失误差错)	一般	急躁、埋怨	自自为战	高度冷静	极力弥补	加强底线防守
	较差	气愤				纠正偏差
	差	惊慌		互相谅解	死守最后一道底线寻找时机	力争开辟新战场
偏离底线	极差	无自信	乱了方寸	互相鼓励		变被动为主动
	无论何种反应	急于判断		冷静、沉着	继续观察分析	弄清情况,准确判断

季翔：我倒想请对方辩友回答我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口号是什么？

（略有停顿）

李耀华：今年的口号是“更要加强预防”，怎么预防呢？要用医学的方法去预防啊。

季翔：错了，今年的口号是“时不我待”，对方辩友连这个基本的问题都不知道，怪不得谈起艾滋病来还是不紧不慢的。（掌声、笑声）

蔡美玲：既然对方辩友说，“时不我待”，那为什么还不赶快从医学问题研究，赶快发明一种对人体有益的疫苗，赶快解决这个问题呢？

应该说季翔对悉尼大学代表队作了一次出其不意的攻击，李耀华同学在别的队友都回答不上来的时候，敢于站起来应对已属不易，虽说回答不正确，但也不太离谱；季翔同学再次进攻之后，蔡美玲同学很机智地把“时不我待”的说法为己所用，向复旦队反击，这实在难能可贵。事实上，季翔也没有把口号完整地说出来，基于进攻已达到目的，所以几位辩手都没有急于补充，直至蒋昌建在总结陈词中才说：‘今天离“世界艾滋病日”只有126天，它的口号就是：“时不我待，行动起来”。这难道是社会对医学界的一个独门偈语吗？’这样，对知道这个口号的专家和观众说明了我方是熟知“Time to act”这个口号的；向不了解的观众道出了口号完整的提法。这也说明了，并不是场上出现的任何一个纰漏都要及时更正，应该选好时机与火候。对于队友一些小的失误，例如不影响整个辩论态势和进程的某些口误，则可置之不理。

至此，大家一定体会到，在辩论中对本方队友的谅解、宽容和无条件的支持有多么重要，真正做到有错不怕，处乱不惊又是何等

的不容易。如果没有这种谅解与支持,队员个人的心态受队友情绪的影响,形格势禁,导致心理失衡、表现反常。

2. 来自对方辩友的信息

尽管赛前各参赛队在准备预案的同时,对于对垒队的立论依据、可能采用的作战方案作各种揣测分析,在大多数情况下,两支水平相近的队伍,这种分析与揣测大约有七、八分的准确性,但是对方大框架下的具体排阵、布防,特别是在自由辩论中可能开辟什么样的战场,会抛出什么杀手锏,却是防不胜防的。如何在“实战”中把握对手的战术,摸清对方的底细,攻能伤其骨、防能损其锐,张弛得当,层次分明,是要靠选手们在辩论进行的过程之中不断地作推理判断。表2表示的是来自对垒方的信息,经过加工处理后,产生的各种可能影响。

在总结经验体会时,蒋昌建用了“以学心听,以公心辩”这样一种概括,我是非常同意的。辩论双方既是竞争的对手,又是切磋技艺、学识的朋友。为此,双方都有置对手于艰难被动、无反击之力之困境的强烈愿望和积极行动;同时又有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要求。自然在辩论过程中也应该始终保持与之相应的心态。在这次比赛会上,我校参加的三场比赛中,我最欣赏与剑桥大学代表队展开的,关于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这一场的风格与气质。整场比赛由陈词到自由辩论、由自由辩论到总结陈词都充满了学术探究、温文尔雅的气氛,又不乏机智幽默的应对,充分展示了辩论双方的人格魅力。1993年8月26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在“复旦击败剑桥大学进入半决赛”的报导中有如下一段概括:“无论如何,昨晚的比赛是一场精彩的舌战,双方的语言掌握能力和知识都是一流的,从中国的《礼记》、《论语》、《大学》,到西方苏格拉底、邱吉尔、康德,辩论起来引经据典,让观众享受了一场真正的智

表2 来自对方辩友的信息及其影响

信息性质判断	场上效果	可能诱导心态	相应后果	应有心态	拟采取对策	目的、效果
战术方案	很好	急躁躁	影响本队水平 正常发挥	保持自信、 争取主动	发挥自己长处 抑制对方优势	执行本方预案
	好			注意	继续观察	
	一般	平淡	轻敌大意	谦和、警惕	扩大本方优势 抓住对方弱点	
	差 很差					
战术方案 在意料外	很好	惊慌、动摇	自乱阵脚	稳定情绪、 保持自信	一旦抓住漏洞 及时反攻	适当调整本方方案、 适应变化
	好			注意	扩大本方优势 抓住对方失误	
	一般	无所谓	大意轻敌	谦和、不咸锐气		执行本方预案
	差 很差					
攻击在意料中	好	不在乎	大意、失误	更加强自己 保持警惕	按预案继续 进行	保持主动权
	一般					
攻击在意料外	好	惊慌失措	丧失自信 没有对策	保持镇定、 自信	暂回避、设法开 避自己的战场	变被动为主动
	一般					
有人身攻击 出现矛盾	差	不在乎	失去观众 进行反攻	谦和	可不予回驳	争取观众评委 置对方于被动
				宽容大度	以德服人 有分寸地反击	

慧之辩。尤其在自由辩论时间，双方针锋相对，马上指出对方的弱点，因此掌声和笑声也是四场初赛中最热烈的。”

掌握对方辩友的逻辑与心态较之把握本方队友的情况要困难得多，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现判断上的差错，甚至落入对方预先设计好的陷阱之中。没有一种积极奋争而又谦和大度的心态不难把握时机，当然也不可能出现场上效果。下面我们用一些例子来印证这一点。

例一，蒋昌建在全场辩论中的第一次亮相（与剑桥大学辩论的自由发言）中，以其浑厚的男中音，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首先指出对方一个常识性的错误：李光耀是总理而不是总统。”博得满堂彩。我以为，这次发言已为蒋昌建获得全场最佳辩论员的称号迈出第一步，‘先入为主’。

例二，在同一场辩论中，剑桥大学队的吴俊仲说：“我方的论点对方没有任何的反驳，所以我方的定义已经成立”。季翔同学立即指出：“你的论点不是自己说成立就成立了，不然还要评判干什么？”原本吴俊仲同学是想说明反方没有针对他们的立论实质进行攻击或者攻击不力，但因他的逻辑推理简单地归结到是否驳斥“定义”这个问题，语言表达自然欠妥，被季翔抓住又用了一句很幽默的话点明，反倒被动尴尬；反之，复旦大学一方却争取了评委，争取了观众。

例三，在决赛中，台湾大学队王信国说：“我倒要问对方辩友，在人性本恶之下，我们为什么要法律，为什么要惩治的制度呢？”姜丰立即表示：“对呀，这不正好论证了我方的观点嘛！（笑声、掌声）如果人性都是善的还要法律和规范干什么？”（掌声）仔细想一想，王信国的意思是明确的：都是恶，就不会限制恶，更不会制订法律去限制恶，建立惩治恶的制度。这是对我们立论的根本进行攻击。但经姜丰一转化，把王信国的推理提问变成：都是善，就无须法律

与惩治的制度；而人所共知的是，社会是由法律和各種惩治制度等所维系的，因此符合了我方“善”就是对人类欲望无节制的扩张（即“恶”）的限制，人心向善的逻辑。双方话不多，一来一往，在应变能力上姜丰更胜一筹。

例四，在关于艾滋病的那场比赛里有这样一个回合的论辩。

朱天斌：我们已经说过，艾滋病从医学来说可能是绝症。但以前很多绝症不是通过医学的角度解决了吗？

蒋昌建：一个老太婆被车撞倒了，请问审救人的问题呢还是撞人的问题？

陈 慧：那不是病啊！（笑声）

季 翔：恰是她不也要去医院吗？那就是医学问题了吗？不，它是交通事故！（笑声）

朱天斌：可是有成百上千的医务工作人员在帮助这个老太太吗？艾滋病的研究是需要成百上千的工作人员、医务人员啊！

严 嘉：一个人得了病不是社会问题，千百万人得了艾滋病，难道还不成为社会问题吗？

朱天斌：千百万人还曾得过感冒，千百万人也曾得过心脏病，难道心脏病是社会问题吗？

蔡 丰：一个人打喷嚏不是社会问题，但我们全场人同时打喷嚏，还不是社会问题吗？（掌声）

朱天斌：对方还是没听清楚我说的！如果成百上千的人得了心脏病，心脏病也成了社会问题吗？

我们把辩论双方的推理演绎概括如图二。由此可见，双方观点明确，推理的逻辑层次分明、严谨；双方心理状况稳定，反应灵敏，针

正方

前提 1. 有成百上千医务人员参加的事是医学问题

为防治艾滋病有成百上千医务人员参加

结论: 艾滋病是医学问题

所以: 艾滋病是医学问题, 不是社会问题

前提 2. 历史证明有的绝症能治好, 它们不是社会问题

能治好的绝症不是社会问题

谁也不能否认人类能治好艾滋病

当代绝症艾滋病有可治好

结论: 艾滋病不是社会问题

反方

前提 1. 一个人得病不是社会问题, 得病人数达到一定数量就是社会问题

感染、患艾滋病的人数已达一定数量

结论: 艾滋病是社会问题

所以: 艾滋病是社会问题, 不是医学问题

前提 2. 老太太被车撞伤送医院不是医学问题
医学参与不等于医学问题

结论: 艾滋病防治有医学参与, 但不等于就是医学问题

图二 在复赛中的一段自由辩论中双方的挂是框图

锋相对,充满幽默。但我总感到没有“尽兴”。在这短短的交锋中,悉尼大学队针对复旦大学队的逻辑连续提了两个很在威慑力的问题:其一,能治好的“绝症”算不算社会问题?其二,作为现代文明社会发病率与死亡率最高的心脏病算不算社会问题?这两个问题是反方队员赛前没有研究透的问题,临时难以作出恰当的应对,不易化解,于是以攻为守,巧妙地回避了问题。但我总为双方感到遗憾。作为反方的复旦大学队应该正面回答这两个问题。更可惜的是正方悉尼大学队的选手们,没有乘胜追击、连续追问、丧失时机、失去主动,反而跟在的方后面走。类似的问题还出现过几次。无怪乎许庭芳律师在评析时要说:“……有边界冲突,而没有上升为全面战争,双方各自守着自己的成份多,攻击对方少。”我以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清楚,双方选手在立场上要维护“不是”远比说“是……”要难得多,因而在心理上重守怕攻,稍有冲突就尽快避开,不敢纠缠。

3. 辩论员对自身表现的认识

在每次陈词发言之后,选手必定有一个自我评价的思维活动,并参照外界对自己的评价反应产生相应的心理活动,从而影响下一步行动。

表3给出了选手关于本队队友对自己评价的判断、自我感觉的各种心态及有关情况。

一般说来,每位参赛队员都有强烈的追求完善、获取好评的自我意识,为此他们总是竭尽全力去做,在评委与观众面前施展自己的才能与魅力。而实际上,他们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也有可能,受囿于外界环境和时间、能力和水平而不能尽善尽美;说不定还会弄巧成拙,出现不应有的差错,这时容易产生自责心理,倘若不能及时纠正,必然导致消极情绪,产生思想负担,怕再出错,不敢多

表3 选手对自身表现的评价及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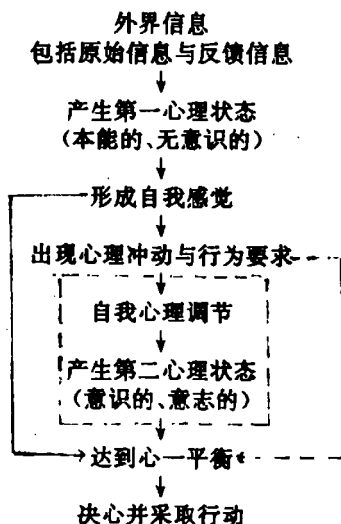
分析、判断	可能诱导心态	相应后果	应有态度	拟采取措施	目的与效果	备注
自我感觉	很好	突出个人 损伤整体配合	保持良好心态, 切勿骄傲、大意	按原计划进行	保持良好心态 积极施行决策 保证整体配合	自我判断、评价因有连续性, 结合外界信息, 忌主观臆断
	好	同上				
	一般	表现一般	增加激情	更多投入感情 增加语言魅力		
	差	影响后续表现	保持自信、沉住 气,稳定情绪	调整情绪,做 好“后面的事”	稳定心态, 保持自信	
	很差	出现失误				
队友的反应	很好	突出个人、大意	保持良好心态, 忌大意、骄傲	按原计划进行	保持良好心态, 保证整体默契 与方案执行	以黄己严、黄 人宽的态度对 待队友反应, 主动积极配合
	好	突出个人、大意				
	一般	影响协调	集中注意力	积极配合队友		
	差	消极、出现失误	克服不满情绪, 宽容、谅解	调整心态, 稳定情绪	保证整体配合	
	很差	消极、出现失误				

发言,这样就对同队队友产生依赖心理。

在表现较好得到赞扬时,容易自满、得意,如果不及时纠正也会导致失态,例如:突出个人,从而影响整体配合。

在队友对其评价不高,或者评价很不好时,可能产生负疚感,情绪消极;最糟糕的是出现逆反心理,移怨于队友,不再积极配合;或者急于弥补失误,产生急躁情绪。实际上在这样一种激烈的竞赛中,出现小的差错在所难免,人对己无法不必苛求。要知道,过去的事是无法追悔的,能够把握的是当前与未来。

有关观众、评委所发出的信息对选手产生何种影响的分析留在后文。根据上面的分析和实例,我们可以把辩论场上,选手在各种信息影响下的心理活动过程用逻辑关系框图较直观地表示出来



图三 辩论员心理活动逻辑关系图

(见图三)。图中所提到的第一心理状态和第二心理状态的提法并非规范。我借以分别表达在外界刺激下出现的“本能”心理反应，以及经过心理调节后，产生的“理智的”心理状态。

选手能否在比赛过程中始终保持良好的心理平衡，处于最佳竞技状态，与赛前准备是充分有关。但是它更取决于选手自身的人格心理水平。也就是说，当赛前准备充分，辩论场上能掌握主动权，预案实施顺利，辩手容易保持心态平衡、行动积极、反应敏捷，即使有一点小失误，也能妥当处理。然而，无论赛前准备怎样充分，赛场情况复杂多变，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能不能驾驭辩论的进程，则主要决定地选手的人格。如果比赛顺利、观众反应较好，因此而骄傲，轻视对手，搞不好就要“大意失荆州”，由优势变为劣势；同时也有损一个人形象，引起反感，失去“人和”。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一再强调：学会“做人”是学会做优秀辩论员的必要前提。为此，每个有志于成为优秀辩论家的人，一定要竭尽全力完善自己的人格形象；只有这样，才能在比赛场上施展自己的人格魅力，征服评委、征服观众，也征服对手。

二、整体意识，流动默契

——辩论队的逻辑与心理

在台湾大学队与复旦大学队的决赛评析中，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先生说了宋一段话：“……一般说来，反方颇能显示出一种流动的整体意识。整个队伍运用一种整体配合的作战方案，加强了一种整体的攻击力，保证了对整体目标的一种优势。也增加了整个辩论队伍的气势，显得中心课题比较明显，活而不乱，错落有致。”我个人认为，与其把这段话理解为对复旦大学队的评价，不如理解为一支优秀的辩论队在整体配合上应该达到的一种境界。就我们来

说,也只是初步达到了这个要求。

辩论队是由四名具有鲜明个性特点、风格迥异的人组成的小团体。几个能人在一起是 $1+1=0$,或 $1+1\leq 2$ 还是 $1+1\geq 2$?取决于每位选手的整体意识、团体精神和准确定位。辩论赛是一种比理性、比智慧、比知识、比语言、比人格的综合性竞赛。比赛中每位队员自有一套个人的逻辑演绎系统,但这套小系统应该服从于、服务于辩论队整体的一个大的逻辑演绎系统,成为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大、小逻辑演绎是在时间、状态、条件不断变化的前提下展开的,属于动态逻辑范畴。于是就有了在半个多小时的比赛中,能否始终做到优势互补,建立心契,实现 $1+1\geq 2$ 这样的“流动的整体意识”的要求。

由于内容不同、规则不同,要不要有整体意识、要什么样的整体意识,在不同的竞赛之间是大相径庭的。拿围棋赛来说,它是一种至一的比赛,当然没有配合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棋手完全可以“我行我素”而“毫无顾忌”。再看桥牌赛,是二对二的,搭档间的配合表现在叫牌、防守两个方面。由于有事先约定的叫法,所以在叫牌过程中可以相互摸清各人手上的牌型;“定约”之后,庄家要摊开一人的牌,所以防守方的配合又多了一个条件,于是双方就围着“搭桥”与“反搭桥”而展开智斗。桥牌的攻守有一定的逻辑规律(当然也有许多变化),也是动态逻辑演绎,但与辩论赛相比,搭档的配合要简单一些。为了便于比较,仿照辩论赛的规则,设计一种四对四的“集体围棋赛”。规则大致为:执黑先行;双方第一位选手对下,执黑者先投一子,然后执白者投一子,……各下8手棋;第二对选手,第三对选手也按黑白次序间隔投子,各8手。这一段相当于辩论赛中的陈词。第二阶段,黑方任一位选手投一子,白方任一位选手投一子,……双方各下满50手。自然,这有点象自由辩论。最后,由双方第四对选手按白先黑后原则收盘,各下10手棋,像不像“总

结陈词”？试想，这种辩论式的围棋赛如何能顺利进行、选手们该有怎样的、流动式的配合啊。可见，由四个人组成一支队伍，去完成一个动态的推理演绎有多么困难啊。

“流动的整体意识”建立在队员个人的群体意识、团队精神的基础上，靠良好的心态来保证。为了最有效地发挥每个队员的积极性，教练要根据各人的特点为其分派角色，在团体中定位。这种定位与角色分派应在思想上、事实上被队员认同，且贯穿于整个比赛的始终。现在看一看我们的四位选手是如何定位的吧：

姜丰

一位很甜美的女孩，有较强的自尊心与自信心，由她担任一辩，意图达到先声夺人，平稳启动预案的作用。对她的风格要求是：逻辑层次分明、语言亲切感人，娓娓道来，以大家闺秀 质柔化全队的进攻，使之少一点“咄咄逼人”的架势。在实际比赛的自由辩论中，姜丰发言最少，许多精彩的、能出效果的机会都让给了三个男孩子。委曲求全、难能可贵。尽管如此，在观众与评委的心目中，她的形象仍然是丰满的。

季翔

作为所有参赛选手中年龄最小的季翔，平时不苟言笑，有点“少年老成”，在选拔赛中，就以情绪稳定，说理透彻，说服力强而被评委和同学们看好。姜丰之后，由季翔为我方作理论上的陈述，再合适不过了。由于季翔感情不太外露，总给人以“处变不惊”的感觉（他私下对我说，比赛时好紧张，有时腿也发抖，好在桌子挡着，没有“露馅”），能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自然 Keeper 的角色（作用相当于场上队长）非他莫属。为此，季翔必须保证全队火力集中于“主战场”，一旦“跑题”纠缠枝节问题时，必须抢先发言，把“战斗”拉回

到“主战场”。

严嘉

书生包装下，隐藏着严嘉的热情、活泼与机智。记得在选拔赛第三场辩论中，作为“第三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环境污染问题”中持正方观点的严嘉，因陈述了因汽车而造成公害时，对方攻击说，是不是要用毛驴去代替汽车呢？严嘉一本正经地说：“难道毛驴就没有污染了吗？”全场哄堂大笑，掌声不绝，是五轮比赛中幽默效果最好的一次。也许，就在这喝彩声中，教练已经安排下了严嘉的位置？用感情陈述事实，使观众对我方立论有直观、形象的了解，在感情上予以认同的三辩位置给了严嘉。自由辩论中出效果、出幽默的“散打”任务也就当仁不让了。

蒋昌建

作业国际政治系三年级硕士研究生，他理论功底在四位选手中是最好的。对同一个问题的见解往往胜人一筹，有时讲些深奥的东西，让人觉得一头雾水，不知所云。昌建天生一副好嗓子，又经过一些发声训练，所以音色、音质俱佳，有相当的语言感染力。他虽为年龄比他小，学识比他浅的队友所敬重，仍不乏谦让，感情融洽。安排他做四辩，承担总结陈词任务，以求达到从价值层面上把我方观点深化、升华、“登高一呼”的目的。又根据他在知识结构、文化和积累上的优势，能较准确发现对方的矛盾与疏漏的长处，“主攻手”的任务落在昌建身上。此次大赛中获最佳辩论员称号，证明他的确成功地扮演了预定的角色。

实践证明，我们对四位选手的气质、特性的把握基本上是正确的，角色分派也是妥当的。四位选手都能准确把握自己在整体中的角色分寸，每个人都有上乘的表演。时至今日我还喜欢反复观看三

场比赛录像。欣赏那些充满机智幽默的论辩，实在是一种享受。当然我也十分挑剔，总能发现一些小毛病。不过，从总体上来说队员们在整体配合上的表现，角色分寸的把握是经得起推敲的。

下面我以“人性本善”的辩论为例，说明对逻辑与心理摧在联系、集中优势（包括心理优势）攻防后点认识。

在这个辩题下，正反两方遇到的逻辑难题可谓“旗鼓相当”。对“本善”的正方而言，必须回答“善花如何结恶果”，对“本恶”的反方而言，自然要回答“恶花如何结善果”。因为，不论人性本为善或为恶，现实社会中的确善恶共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辩论实况看，双方都在这个问题上下了功夫，并以此为主要攻击目标。先摘录在陈词阶段有关这方面的发言。为简单起见，省略的部分不再使用“……”标出。

正方一辩：我方不否认在人类社会中存在恶行，但是恶行的产生是由外在环境所造成的。所以恶是结果不是因。如果硬说是因不是果，也就是说人性本恶，那么人世间不能产生真正的道德。

反方一辩：对方所讲到的种种善行，那完全是后天的，又怎么能证明我们命题中的“本”呢？……如果人性是善的话，那么这些罪恶行为从何而来？

归根到底，恶是指（人的）本能和欲望的无限扩张。

正方二辩：（以西瓜种子为例）人世间为什么这么多善行呢，当然是在人性中就有善的种子嘛。

反方二辩：既然社会是由人构成的，对方辩友却认为社会环境之恶和人之恶没有关系，那么请问外界环境中的恶从哪里来的呢？你的善又如何导出恶的呢？我方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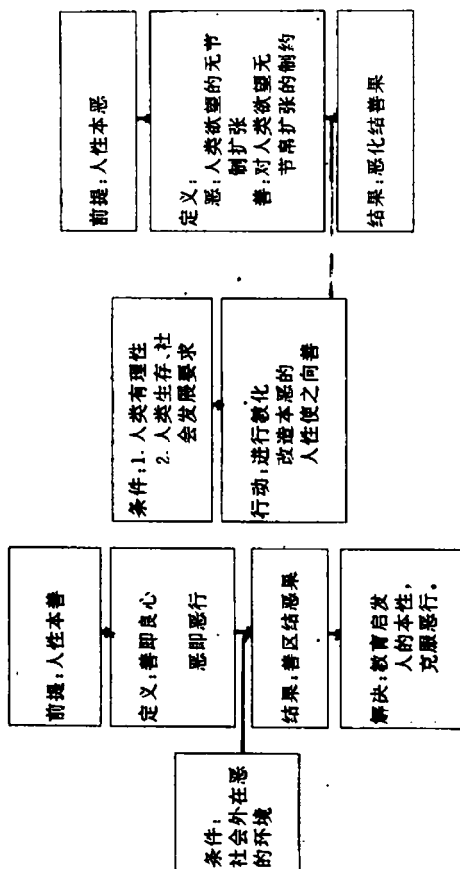
业不认为本能和欲望就是恶,本能与欲望的无节制扩张才是恶。(掌声)

正方三辩:(针对反方人性本恶,但人有理性,会摒弃恶的说法)本恶的人会摒弃恶的价值吗?

反方三辩:说到善端是从哪里来的?我告诉对方辩友,如果人人皆自私的话,那么人人都不能自私,因此在制约、权衡中产生节制,这就是最早的善源。

与其他几场辩论不同,一开场双方就摆开了进攻的架势。进入自由辩论阶段,这种攻防变为全面战斗。反方队以“善花如何结恶果”,“人性本善又如何产生使之结恶果的,后天的、社会的环境”的问题连续五次发问、攻势猛烈。而正方始终没有解答后天的、由本善的人构成的外在环境中的恶由何而来;加上对正方攻击乏力,始终限于被动。图四给出了双方推理的逻辑图。

从逻辑上看,反方思路明确,立意较高,对何谓“善”,何谓“恶”作了对应、协调的定义,从而在人类需要生存、社会需要发展、人类有理智的条件下,实施教化,扼制恶的本性,产生善。相应的辩词在逻辑上没有矛盾,构成了一个关于“恶花结痒果”的有效论证。而正方把“善”界定为“良心”所谓“侧隐之心人皆有之”,把“本”定义为“人之初,性本善”的个人之“本”。由于外在环境的恶,产生后天影响,改变了个人的本性,产生了“恶”。这当然也是一咱逻辑认识,而且,在其相应层面上也没有逻辑矛盾。既然如此,怎么又会陷入僵局呢?这是由于反方的认识与逻辑层次高于正方,在攻击中能居高临下,以“人类”性之本去攻击对方的“个人”性之本转化的条件,使对方出现逻辑悖论,从而将对方只适合于个体的有效论证,改变为不适合“类”的无效论证。同样的道理,正方对反方的攻击,不可谓火力不猛,但都是用“个人”性之本去理解反方的立论,



反方

正方

图四 关于善花结恶果、“恶花结善果”的逻辑推理

所以攻击无力。又因为反复发言所追问的是反方在陈词中已经定义得很清楚的问题，反方不予回答，完全转为“防御战”。

弄清了双方辩论中的逻辑思路与辩论态势，我们就比较容易分析场上辩手的心态了。任何一个人在思维推理过程中出现障碍（即演绎推理出现矛盾）时，必须导致心理活动不顺畅，轻则出现情绪波动，重则出现心理障碍。从现场比赛实况看，台湾大学的代表，在反方同一问题的连续追问下产生了急躁情绪，真是湿手沾面粉，怎么甩也甩不掉。反方复旦大学队，充分利用自己的战术与心理上的优势，不为对方的进攻所干扰，始终攻击一个主要目标，使已经急躁的正方心理压力不断增大，以致个别人第一心理反应占了主导地位，表现为“情绪激动”，在语言运用上多有不当，甚至对反方队员作人格攻击中。在这种心理氛围影响下，反方四位选手总体表现是好的，没有反唇相讥，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但是，反方在情绪与心态上也或多或少受到感染，较之初赛、复赛两场少了一点儒雅的风度，有一点急躁。

实践证明，整体的心态与其内部个体的心态互相依存，互相影响；对垒的两支队伍之间也会发生心理联系，产生心理影响，因而他们在比赛过程中共同营造赛场的心理环境，并受其影响。一支辩论队能否展开良好的、整体的心理活动，不受外界干扰，能否实现在“流动”过程中的整体默契，即有没有整体意识的流动的美，其关键在于整体的心理素质水平。

三、兼容并包，积极参与

——观众的逻辑与心理

就字面意义而言，观众是“看客”，是一群旁观者。实则不然，竞技场上的观众的心态是复杂多样的，有些观众的参与意识并不亚于

参赛选手。不信，就看看“世界杯”足球赛吧：哪一场比赛不是观众如潮，人声鼎沸。看台上“分帮结派”的啦啦队，如醉如痴的球迷们，手舞足蹈，摇旗呐喊，击鼓吹号，或喝采、或辱骂……那一股疯狂，那一种“你死我活”的“拼杀”劲头，较之绿茵场上的角逐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比赛达到白热化的时候，有不少球迷在心理上失控，每每酿成惨剧。观众这种强烈的参与意识和举动对参赛队员造成极大的影响：或鼓舞他们的斗志，使之达到最佳状态；或形成巨大的心理压力，使之发挥失常。自然会会影响整支球队战术方案的实施。试想一下，那些知名的球队，若在一个空寂无人的、静谧的球场上，没有了观众，失去了球迷的支持，会是怎样的心态？比赛还能扣人心弦吗？球王贝利说：“足球赛是一种投入感情的比赛，它需要足球运动员，也需要球迷。”

辩论赛作为一种有输赢的竞赛，又有很高的欣赏价值，观众的情绪必定人跟着辩论的进程、论辩的激烈而跌宕起伏，自然形成一种环境，影响选手的心态与技巧的发挥。从表面上看，辩论赛场绝没有足球赛场上的喧嚣，观众们温文尔雅、全神贯注于辩手的表演。仔细地听、认真地看、积极揣摩，与辩论双方同步思维、同步推理，只有这样，观众们才能把握双方的论点、论据和逻辑思维的轨迹，作出自己的判断，然后，通过观众丰富的表情变化、性质和程度不同的掌声与笑声，传达他们的评价信息。观众这种近于深思熟虑的表现，是选手们作出自我评价，或对他人作评价的重要依据，当然也要影响到选手的心理状态，并使其对行动采取相应的修正或调整。如此看来，辩论场上观众的反应较之体育竞赛场上观众对选手的影响要深刻得多。可以说，观众也参与了竞赛。

刻 在我们辩论队经过一个月初步训练后，1993年5月26日为全校同学作了一场表演赛。对手是一支临时组织起来的“志愿队”。由于同学们对代表队寄予很高的期望，所以对队员的表现十分

“挑剔”。也许是“哀兵必胜”、同情弱者的心态，观众的支持原本就是向“志愿队”倾斜的。因为当晚我另有讲课任务，没到比赛现场。事后得知训练队的表现令人失望。除了开头有几次稀稀拉拉的掌声，后面得到的多是不满的“嘘”声。于是我认真看了录像。平心而论，在立论、陈词、2 技巧方面，训练队的确比对手技高一筹。但我不得不承认训练队输了，因为它完全失去了观众。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心理反常，造成失态，完全输在“德”上。具体分析，犹如“多米诺骨牌”现象。第一张倒下的牌竟是一件与辩论进程本身无关的“小事”：按国际比赛惯例，主持人介绍训练队选手的时候，队员仅点头向观众示意，没有起立，此时已有不满的议论，礼节性的掌声也越来越少；而“志愿队”则个个含笑起立，赢得观众的赞赏和掌声，此时观众已由感情倾斜转变为明显偏袒。出师不利，又急于扭转局面，情急之下，口误甚多，而且有影响射或直接攻击对方辩友和观众的语言，……辩论进行到后半段，队员们心理负担越来越重，无心恋战，希望尽快结束比赛。当然这是意料外的，不应逼失误。好在我们从中吸取了教训，把“德”的教育放在了训练的首位，也注意到了心理素质训练的重要性，算是吃一堑长一智吧！

辩论赛和其他体育比赛的另一个重要差别是：观众的判断与情绪将直接进入评价裁决系统。足球场上，无论球迷们多么卖力地为本方球队加油喝彩，多么声嘶力竭，裁判绝不会以此为依据给有关队多加一分，或让他们多踢一个点球；自然，也不会因为对另一方球队的指责与辱骂而多发一张黄牌警告。输赢评判的标准是硬指标——破门进球的个数多少。辩论比赛则不然，观众的反应与评价是评委打分的参考内容之一，因为辩论赛的评价裁决体系是由一些量化了的软指标组成（参见图五）。从这个意义上讲，观众是无冕的裁判，是评判团外的“评委”。于是观众的反应与心态极为参赛选手所重视。前两大部分我们说到的，队员对来自队友和对

方辩友的信息作分析判断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据场上观众的反应。

综上所述,如何把握观众心态,为我所用,进而驾驭比赛的进展,调动观众的情绪,就成了选手和辩论队的基本技巧之一。在图一里我们把观众分成了几种类型,表4列举了不同类型观众的不同心态与反应,现分别讨论之。

表4 各种类型观众的心态

观众		对辩论队态度		目 的	队员 应持心态或行动
		本方(或观点相同方)	对方(或观点不同方)		
有倾向		无条件支持	比较挑剔	鼓舞本方士气 干扰对方心态	冷静沉着 以德取胜
无倾向性	有观点	观点认同 积极支持	审 视 挑毛病	希望己方观点 取胜	注意 有理、有利、有节
	无观点	以同等态度对待双方		输赢无所谓 希望辩论激烈	主要诉诸对象, 积极争取

1. 有倾向性的观众

此类观众因利益一致原则,与某方辩论队的输赢有直接关系。例如,观众对本国或本地区的代表队多持积极支持态度,而且为了“帮助”他们取胜,会采取相应的行动去鼓舞本方士气,干扰对方心理,甚至希望影响裁判的裁决。在这种动机之下,对本方的表现抱积极认同的态度,对其出色表现极力渲染;较好的表现则设法夸大;对一些失误与差错采取宽容态度。相反地,对对方的良好表现以低调处理,对于问题与失误则比较挑剔,通过一些动作与反应,希望引起裁判注意。作为参赛队员面对这样的观众反应,一定要冷

静分析,可结合其他信息去伪存真,作出正确判断。受支持一方不能盲目自满;不被支持的一方不受干扰。

这类观众的心态在辩论过程中也不是凝固不变的。因为他们对所支持的队伍持较高的期望值,“求胜心切”,因而对被支持的一方要求也比较高,虽对某些失误与差错比较能宽容,但是一旦差错过多、失误过大,也会产生不满情绪,甚至不能容忍,埋怨指责,结果给选手造成的心理压力更大,物极必反。

正是因为这类观众在选手中造场心理影响较大,有时,有的参赛队把组织观众与“啦啦队”也列为“作战方案”的组成部分,安排“观众”,以把握士气,干扰对方。有时,虽无本方代表队参赛,但因竞赛队中哪队出线,将决定下轮比赛的对手,有的代表队或观众,也会将这种心态带入比赛场,如鼓掌等等。我个人认为,作为观众有这种倾向性心态无可指责,但作为参赛队,利用这种心态做“小动作”就不可取了。

2. 无倾向而有观点的观众

有的观众对辩题所涉及的学术领域比较熟悉,有个人的见解与观点,他们是内行;或者因传统文化的熏陶,受社会习俗的影响,虽在学术上并无深刻的见解,但却有明确的观点。例如在“人性本善”的那场辩论场上,新加坡的观众基本上都持有“人性本善”的立场。面对这样的观众,取了与之相同立场的队,可说已占“天时、地利、人和”之利,应该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调动观众的感情与心理,获得最佳的场上效果。这类观众强烈地希望持同一观点的队伍能为他们申诉认识与看法,对如何反驳对方的论点、论据、辩词往往有自己设想的方案;尤其那些有学术根底的观众。但因为没有输赢的利害关系,所以对双方选手的表现有比较客观的看法和反应。选手们应充分重视这类观众的反应,以便准确把握自己推理的正

确性与严密性。

赛前应对可能出场的观众背景有所了解、充分估计。选取与绝大部分观众立场观点不同的论点时，必须在预案准备阶段就研究适当的处理办法。在辩论中决不能有直接攻击这部分观众观点的言行，以免引起反感。相反地，在辩论时要尊重他们的观念与感情。我们在“人性本恶”立场下展开的辩论就是如此。有关情况已在《辩论赛是综合素质的较量》一文中作过分析，这里不再赘述。

3. 无倾向且无明显观点的观众

由于辩论赛并不是纯粹的学术争论，辩论所涉及的范围多属“热点”问题，出于常识，每个人或多或少有自己的立场与看法。但由于这种立场没有扎实的学术底蕴，所以是不牢固的。在辩论中随着对垒双方的陈述与发言，容易出现“公说公理，婆说婆有理”，到底谁有理实在难分清的情况。这类观众是以观赏的心态看待双方的辩论，重视台风，重视技巧，心理反应与现场表现较少主观意念的控制，比较自然。辩论队与选手要尽力诉诸于这类观众，“说服”他们支持本方立场，从而形成一种整体的、赛场上的气势，渲染效果，增加自己的信心，开形中也向对手施加了心理压力。为准确了解判断观众的反应和感染观众，选手与现场观众应进行心理交流、感情沟通。比如，当观众鼓掌、喝彩时可适当表示谢意。由于辩论赛对每位选手、每支队伍有严格的发言时间的控制，所以选手为了在最少的时间传达最大的信息量，说话很快，忽略了应为观众留一眯时间这一“小节”。即使在自己获得掌声时，仍不间断地、急于讲后面的话；有时为了让人听清自己在讲什么，反而加大音量、压过观众的掌声，这既不礼貌也不合理。实际上，选手应该学会欣赏观众的表现，对鼓励要有回报，可以停顿一下给观众表达感情的时间，或者微笑颌首表示感谢，当然也可以说一声“谢谢”，这样与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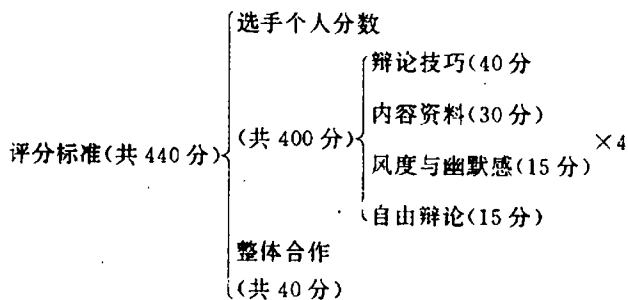
众进行了感的交流,在心理上融为一体。

四、铁面无私,公正裁决

——评委的逻辑与心理

由于评判团的专家评委的意见与看法直接关系到对辩手与参赛队的评价,从而决定输赢,所以最为选手所重视,有很强的心理导向作用。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专家评委都力争做到“铁面”无私。我这里所用的“铁面”一词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是说不徇私情,公正执法,与“无私”是同义的;其二是指导评委们非常注意控制自己的感情,在整个评判过程中几乎没有什么表情,让人揣摩不透,以免给辩手造成心理压力。不到比赛结束评判团代表进行评析的时候,很难知道专家评委们的确切态度。

不过,世间万物皆有其发展变化的规律,评委的评判活动也有客观的逻辑与心理规律可寻。首先,评委对选手和参赛队伍的分析评价是按照大会组委会制订的“评分标准”(即对每支队伍与个



图五 评分标准分配图

人的评价体系)进行的。该评价体系详细列出了受评价的项目、内容及相应的分数分配(见图五)。这是一个经过量化的软指标系统,评委在作评判打分的时候,无非是作加分或减分的工作。譬如说,如果某个队员情绪比较激动,有攻击对方个人的语言,在风度一栏里就要被扣分;如果一支队伍,在对方辩友关于同一问题连续追问了几次之后没有反应,在整体配合一栏下就要被扣分。我相信在大决赛陈词中严嘉三次获得掌声(①“如果人都是本善的话,谁会拿起屠刀呢”,②“好多人在做恶事的时候,晃要教,不要学就会去做的”,③“看暴力片、色情片是从来没有公开倡导和鼓励的,但为什么总会有那么多人要趋之若鹜呢?”)时,肯定在辩论技巧和幽默这两项中得分。由于评分标准的公正性和公开性,观众的反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评委的心态,特别是在辩论技巧、风度、幽默的评价方面,无形中成为了解评委“执法”听参照系数。

其次,从评委的工作特点和工作环境进行分析。评委们在比赛的全过程中精力高度集中,搜集、归纳、分析辩手的发言,逐步形成对每位选手的完整印象并给出相应评价;把握参赛队的总体风格、水平、技巧、学识等等,也要给出合适的评价。为了确保公正,这种从信息搜集、加工、分析判断到最后作出评价的整套“流水作业”过程是极其紧张、快速的。因此,评委们受自身思维活动的影响,经常会情不自禁地流露内心的感受。所谓“铁面”并非铁板一块,真到绝妙处,他们也会不由自主地会心微笑或点头。当评委们提笔记录什么的时候,一般有三种可能:为参赛选手或参赛队加分、减分、记录有价值的内容供评析之用。虽然在比赛现场只能从评判团那里得到一些零散的信息,但是只要结合当时的观众反应,辩手的自我感觉和对辩论进展的把握程度对照分析。这些“蛛丝马迹”的信息价值也是相当高的。

表5 评委态度对辩论队的影响

信息性质判断		可能诱发心态	相应后果	应有心态	拟采取行动	目的、效果
关于本方的	好	得意	骄傲、大意	康和	继续已执行方案	保持激情与场上优势
	一般		进程平淡	自信、稳定	增加语言感染力	
	差	急躁	出现失误	沉着、自信	必要时调整方案	
关于对方的	好	急躁	被动	沉住气	寻找、抓住机会	保持特点、保持主动
	一般		进程平淡	稳定	继续观察	
	差	得意	骄傲、大意	谦和、警惕	保持优势	

赛场上,无论是什么情况,任何一个选手关于比赛态势的分析判断不会由单一的信息来源作出,而是一个综合各信息源(评委、观众,本方队友,对方辩友)的信息,再加上自身的感觉后所做的综合分析判断。判断的结果大致有三种可能:本方占据场上优势、对方占据场上优势、双方处于相持状态。当本方取得场上主动权的时候,切忌疏忽大意,更不能得意忘形,有损人格形象;此时,应保持良好心态,积极实施预案或已调整过的方案,保持场上的主动权。如果本方处于劣势、被动挨攻的情况,容易产生急躁情绪,甚至不知所措,任凭自己由直觉去行事。其实,只要稳定情绪,增强斗志,注意捕捉对方的矛盾与失误,及时发起进攻,可以变被动为主动。此时,切忌一味防守,跟在对手后面转。在比赛双方处于旗鼓相当的均势时,或本方表现一般,场上气氛平淡时,原则上仍采用预案作战,但要调动自己的感情,在语言上做点文章,增加幽默感,用语言的魅力来引发观众与评委的兴趣。总而言之,辩论队及其成

员们在赛场上的一切心度和行为都应围绕着一个目的，即形成优势，把握观众与评委的情绪，驾驭整场比赛的气氛与进程。

由于一些重要的大型比赛的组织者，总要聘请一些辩题所涉及的学术领域的专家学者担任评委，如这次大赛就有新儒家杜维明教授和著名的武侠小说家查良镛先生（笔名金庸）等专家担任决赛评委。因此，参赛队在赛前要尽可能多地学习了解有关专家的主要学术著作或文章，掌握他们的论点和最新研究成果。在比赛中绝对不能攻击学术权威的论述，尤其不能攻击在场专家的论述，即使在对方已经引证来攻击本方的时候。相反，在发言中，要巧妙、恰当地使用有关评委的观点与对某些问题的提法，这是很能增加评委对本方推理的认同感的。例如，复旦大学代表队在决赛中使用了“轴心时代”的提法，季翔在陈词中说：“早在两千年前，所谓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荀子的性恶论与犹太教的原罪说就遥相呼应。……”接着他又引用了《天龙八部》中恶贯满盈、无恶不作、凶神恶煞、穷凶极恶的四大恶人为例子证明我方论点，现场评委或观众的反应极好。在同一场比赛的自由辩论时有一段关于荀子学说的论辩如下：

许金龙：……荀子说：“无为则性不能自美”。说性像泥巴一样把它塑成砖就塑成砖，塑成房子就塑成房子，这是无恶无善说啊！对方辩友。

蒋昌建：荀子也说：后天的所谓善是在“注错习之所积耳”，什么叫“注错习之所积耳”啊？请回答。

许金龙：荀子错了！荀子说他看到什么是恶的，还是说没有看到善，你就说是恶的。没有看到善是不善，不是恶，对方辩友。

蒋昌建：你说荀子说错了就错了吗？那要那么多儒家干什

么？（笑声、掌声）

在这段辩论中许同学犯了一个大忌，就是直接攻击说“荀子错了”，从而影响了自身的形象。事实上，在辩论中经常要打“语录仗”，尤其喜欢引用有利于本方立场的、学术权威或其他权威人士（如领袖等）的见解去攻击对方，同样对方也会引证别的语录来反攻击，“语录仗”打得越激烈，辩论就越精彩。但要注意，在打“语录仗”的时候切忌直接否定语录，更不能攻击有关“语录”的专家或权威。我想许同学的本意并不想攻击荀子，只是由于情绪相当激动，心情急躁，情急之下脱口而出，算是比较严重的口误。蒋同学反应灵敏，及时抓住了这个失误并把它突出，取得很好的场上效果，确是很妙的战术。

一场大赛，从初褚赋予决赛要历经多少次比赛，自然不能由同一批专家组成一个自始至终不变的评判团。那么评判团是稳定一点好还是变化大一点好呢？先谈谈我的实际感受。去年四月份，我校在组队选拔过程中共举行了五场淘汰赛。队第一场是限时演讲外，其他四场都是辩论赛（有1对1的和4对4的两种）。按我们领导小组的愿意想组织一个稳定的评委会，由于种种原因，实际上每场的评委构成都有变化。实践证明，几位自始至终参加评选工作的专家在标准掌握上比较稳定，对被选拔对象的评价逐步趋于一致。而一些只偶尔参加一、两场评判选拔的专家，在评分标准的掌握上，对被选拔对象的评价上与前者有较大的出入。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有对评选标准的理解与实践把握上的差异等。但是，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稳定的”评委专家由于多次接触被选拔对象，逐步形成一种看法，出现某种心理定势，于是在后两场比赛的评选中已带上了原有的印象，在评分时无形中加入了“印象分”；而参加评选工作少的专家很少有这种“印象”，比较多的

从现场实际出发进行评判。因此,从这一角度讲,新评委的参与又有利的项。结合这样的体会,我以为评委班子宜在有“继承性”(基本稳定的评委)的基础上适当“更新”(更换个别评委或增加新评委)。新“加盟”的评委若能在评判前亲临赛场观看一两场比赛,那么评委班子的评判将更客观公正。

对于选手与参赛队来讲,无论评判的结果如何,应该尊重评判的结果,积极肯定对手的长处,认真反省自己的不足。切勿说三道四。这也是一种基本的比赛道德。

五、至善至美,不倦诲人

——教练的逻辑与心理

教练是辩论队的灵魂。可以说教练的素质与水平决定了辩论队的素质与水平。教练的职责和目标是明确的:组织、训练队伍并指导它在辩论中取胜。为此,教练应做好三件大事:一是选拔优秀的学生组成训练队;二是赛前训练;三是比赛指导。整个工作构成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目标订得高,任务艰巨复杂,工作量大。一位教练不可能事必躬亲,否则会分散精力,难以完成主要任务。认识到这一点,我们组织了一个“参赛领导小组”,有关人员明确分工,协调配合,让几位教练不因琐事而分心,始终把主要精力集中于训练。

上述三项工作实际内容丰富,涉及面广,《狮城舌战》一书中有王沪宁、俞吾金、林尚立三位教师撰写的文章,内容生动,见解精辟。在此我仅从心理的角度谈点粗浅的感受。

1. 选拔、组队

好铁才能炼好钢。辩论队员的个人素质至关重要,其中人格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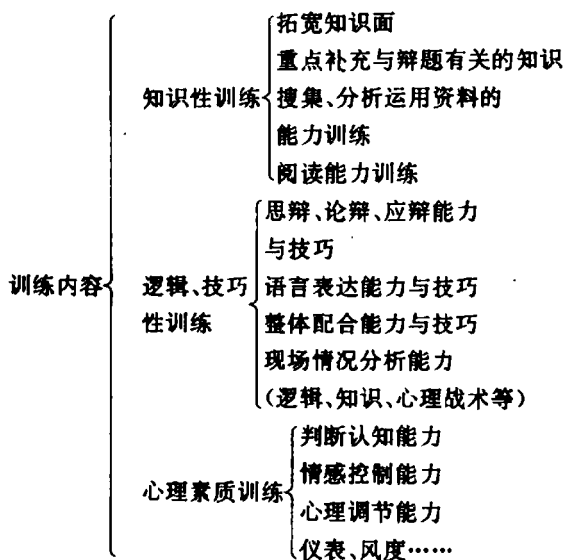
象又居各项要求之首。只有在认知过程、情感过程、意志行为和个性等各方面统一协调、起点较高的人，才有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经过系统的训练，在知识、智慧、能力、人格等各方面有一次超越与升华。俞教授有一个很好的比喻：“按照我们的观点，辩论队员犹如一棵树，如果他的人格力量是树干的话，他的辩论技巧不过是枝叶。只有根深才能叶茂；只有具有光彩照人的人格力量，其辩论技巧才能臻于游刃有余的上乘境界。”

应该说，经过五轮选拔赛和一场专家面试，入的六位同学都是比较优秀的，尽管他们也还有许多不足。当然，我们不能反过来说没有入的同学都有什么大的缺陷或问题，“山外青山楼外楼”，强中自有强中手。同样不能否认的是，也确实有少数参赛选手因气质、风度、心理等方面的原因被淘汰。如，有的比较懒散，组织纪律观念较差；有的突出个人，抢时间、抢发言，缺乏整体观念；有的好报复，有意无意地攻击对手个人；有的自尊心过强，遇到强手就打退堂鼓……在这些学生中有的很有才气，知识结构也不错，口齿伶俐，可以造就。只因时间紧迫，难以在短时间内有明显改进，只得淘汰了。

2. 训练

要训练有成效，必须要有好的训练环境。在这个环境中相互尊重，相互信任，教学相长，奋发向上，人人心情舒畅。这样就能事半功倍，取得最好的训练效果。训练环境形成要靠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的努力，教练们的榜样尤为重要。所以教师们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每天都有饱满的精神，以自身的人格力量去教育影响队员。

以夺冠为目标，通过集中训练要解决的问题相当多，大致如图六所示。



图六 训练内容分类图

具体训练内容与计划安排可因队、因人而异。当然图六所列也只是
一家之见，不一定全面。在实际训练中有关内容相互交叉、穿插进
行。心理素质的训练又贯穿在每一次、第一项目的训练之中。例如，
为了补充知识，队员们要连续不断地听专家讲课，大量快速地阅读
参考书、搜集整理资料，……在这种大容量、高强度的学习过程中，
队员们增强了毅力，增加了信心，改进了学风，有关的心理素质自
然也会有长足的进步；而提高心理素质后，又会影响其他训练计划
的完成，互为因果，相辅相成。

训练中教练与队员之间有关大量的交流，为达到共同的目标，

共同制订计划、互相监督实施计划、检查阶段目标的实现。图七表示了这种关系。



图七 训练计划制订与执行关系图

围绕着这张图,再着重谈几个训练中应处理好或解决好的问题:

① 教练与队员的关系。任何一个有战斗力的集体,必须有权威,令行禁止,统一行动。勿容置疑,辩论队的权威应该是教练(如果是一个教练班子,总教练就是头)。

教练能否真正成为辩论队的核心,关键在教练本身。一个好的教练应该人格高尚、学识渊博、机智果断、沉着冷静、为人师表。

教练应在思想品德上严格要求队中;执行计划时不折不扣;在学识与技巧训练中循循善诱;在生活上体贴关心,无微不至;在感情上打成一片,没有隔阂;在计划的制订与调整中充分听取队员意见,教学相长。

队员则应该尊重教练,服从的安排,努力领会教练意图并加以贯彻,及时反映想法与要求,积极参与训练计划的制订,保持主动精神。我们队里的六位同学对几位教练非常崇拜,这无疑是一种有

益的心态。

② 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如前所述,教练要根据每位队员的个性、特点分派角色,准确定位。为此,教练要用一定的时间去了解队员,并在实际训练过程中观察、掌握每个人的情况,真正做到心中有数。我们的实际做法是让队员轮流充当不同的角色,如当一辩、二辩,……;当主攻手、辅攻手……等等。目的有二:一是通过实践观察了解每个队员,分析每个人最适合担任的角色,也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搭档组合的比较,选择最佳搭档方案;二是,不同角色的扮演实践使每个人对不同的角色都有了真实的心理感受,了解不同类型的角色对其他队友的要求,这样就能在正式比赛中产生一种自然的心理感应、默契配合,达到“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境界。这次,我们作出的定位安排,是经过较长一段实践的摸索比较,到训练后期才决定的。

一旦确定了每位队员在比赛中的位置,分派了任务之后,教练就应该督促、指导队员去钻研自己的角色,把握分寸,明确职责,并在实践中努力去提高技巧。也还有许多整体配合中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如:遇到意外情况,一时无人应对怎么办?能出效果时,几位辩手抢着发言怎么办?队友出现失误怎么办?……等等。当然可以有一些事先的约定和演练,但是,最重要的还是队员们的临场心理状态与配合。

至于队员们如何树立集体主义精神,互相关心等等常理就不多说了。

③ 动力与压力。由于辩论队是代表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参加比赛的,这既是动力又是压力。过五关斩六将被选入集训队的学生免不了有一种光荣感与自豪感,教练们被委以重任,自然也是一份荣耀。但是面对全校上下志在必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期望,确产也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集训初期,作为训练要求,我们多次播看前三届“亚洲大专辩论赛”的比赛录像。也许是因为复旦自己的代表队参赛和《儒家思想能够抵御西方歪风》这个辩题所涉及到的内容,我们反复观看的是1988年辩论会上,复旦大学队和台湾大学队的决赛。看得多,自然议论就多,也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但在当时,我们不约而同地有一个共识,就是:1988年复旦队的风格与水平可望而不可及,对能否夺冠信心不足。记得当时只有王沪宁教授是最沉得住气的。我们三位教师,在分析、总结阶段训练情况时,常常流露出急躁情绪,这种情绪自然会影响到队员。

杨福家校长在获知我们这种情况后,在会见辩论队时表示:辩论队全体应该全力以赴,积极争取夺冠。但是,经济努力以后,如果只得了亚军,“回来也给你们庆功”。校长的一段鼓励、体谅的话,使我们得到了一种心理上的解脱。于是我们统一了认识,调整了心态。一致决定,要竭尽全力,追求至善至美,一定搞好训练,做到问心无愧,至于是不是能夺冠军的问题姑且放在一边。也算是到了“无差别境界”吧。

随着比赛日期的接近,能不能赢的问题又冒了出来。有一件事很感人。临行前,团委的几位书记到辩论队训练场来,燕爽(团委书记)说:“我们几个人商量过了,如果你们赢了,我们向个就不去机场接你们了。但是,如果你们输了,我们一定去接你们。”并解释说:“如果赢,接的人一定很多,我们去不去无所谓了。如果输了,接的人一定很少,那我们一定要去。”这样的谅解与支持,在相当程度使出征队伍少了许多压力。

在训练的实践中,我们也逐步取得了共识:不必刻意去追求、模仿哪支具体队伍的风格,要发挥自己的长处,形成自己的风格。无疑,这也是一种有益于训练提高的心理解脱。

④ 鼓励与批评。正是受到我在前面提到的那种急躁心理

的影响,出现过急于求成、不切实际的要求,结果是欲速而不达。

记得开始一个阶段我们对队员的要求很高、很严。每次训练结束后,轮番点评,且多是指出不足与缺点,很少表扬与鼓励,搞得队员有点怕我们。后来发现,在训练辩论技巧时队员们发言积极性不高,即使发言也尽量少说话,兴奋不起来。开初我以为这是训练强度大、队员过于疲劳造成的。后来队员说了“老实话”:话说得越多,被你们抓的毛病越多,挨垢批评也越多。明白了消极心理产生的原因,自然要从教师纠正起,在克服急于求成心理之后,我们也改进了做法,对队员的进步充分肯定,指出问题时也适当注意方式方法,“响鼓不用重捶。”与此同时,也注意对队员说清楚,今天多暴露问题、多受点批评,是为了在比赛场上少出现失误。不能怕错,引导他们克服怕受挫折、挨批评的心态。谁唱“红脸”、谁唱“白脸”,以及王老师的“武警大队队长”的雅号,也就是在那个情况下产生的。

处理好了这一层关系,情况就有了变化,队员们又以积极的态度投入训练。

⑤ 关于逆反心理。逆反心理是一种有趣的心理现象。当我们强调某一件事不能做时,被劝告者或产生好奇心,总想“偷食禁果”;或者“无意识”地去做那“不能做”的事。在这次训练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这种“逆反心理”的情况。

几个男孩在辩论时手势又单调又多,有碍于观感。于是,作为一项硬性要求要队员注意改进,但收效甚微。以后,又采取措施,用固定手的位置(如放在背后或撑在桌子上)来限制手势;进而,又要求队员设计与辩论内容相关的手势。精力花了不少,结果如何呢?一天在电教中心演播室作模拟比赛,由于没有对手的位置作硬性规定,全部手势“复辟”,且原先没有过多手势的女队员也出现了较

多的类似手势，……迫于手势与思维、语言的心理联系越来越强，最后教练不得不撤销对限制手势的要求。

以后，随着训练的深入，辩论技巧的提高与熟练，在准备比较充分、队员自信心大时，例如在正式比赛中，自然出现与发言内容相关的手势，多余手势也大量减少。

这件事说明，当我们需要纠正不良习惯时，不能就事论事，应该在不良习惯的心理链条上，找到第一个与之相关的环节，从根本上解决，否则极易产生逆反心理，结果事与愿违。

⑥ 关于心理适应能力。如前所述，在比赛中，辩论队和辩论队员的心理状态会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与干扰。怎样使队员接受积极的、正面的影响，排除消极的、负面的影响，防止心理失衡，始终处于自信、沉着、机智的良好心态之下，这完全取决于队员与整支队伍的心理素质。为此，在训练中我们加强了队员心理适应能力的训练。

心理素质的提高不能靠说教，更不能靠强制。通常采用心理暗示和情景训练的办法。情景训练可以帮助队员处于可能出现的心理环境中，使之体验、感知，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通常意义上的模拟训练就属于情景训练的范畴。在这种训练中，教练也能够实际观察了解队员的心理活动特点，指导时心中有数。可惜这次训练正值期末和暑假，没有可能组织类似于5月26日那样的比赛，虽有几场与陪练队的模拟赛，但终因没有观众，效果差了很多。

通常情况下，与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一样，心理训练贯穿于训练的每一个环节。所以无论自觉与否，教练都在有意无意地做着心理训练。不过，有计划地、科学地、有针对性地进行系统的心理训练受益肯定更大。

3. 赛前指导

这里所指的赛前指导，基本上从拿到辩题开始算起。

在比赛中，辩论队与选手能否进入最佳竞技状态取决于能否进入最佳心理状态，而心理状态的发坏又决定地队员有没有充分的取胜自信。队员的自信心建立关对可能实施的辩论方案枯学术上、感情上的认同与把握；自信心来源于对教练的信赖与对队友的作任。为此，在赛前剖析辩题、设计方案时要让队员积极参与、充分发表他们的意见，鼓励他们争论，指导撰写陈词……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组织一、两场模拟赛，甚至让辩论队员分别扮演正、反方两种角色，以充分体验可能遇到的情况，作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在比赛方案中应该包括心理战术的内容。通常是辩论双方并没有预定的心理战术方案，但由于辩论的逻辑演绎过程与心理活动过程紧密相连，所以，一当某一方展开出奇制胜的攻击时，也会起到心理干扰的作用。举个例子，在复赛辩论中，悉尼大学二辩陈慧同学念了一段资料：“1987年，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就告诉我们，他们的研究员已经分离出一种艾滋病毒，已经开始艾滋病病源和分子生物学研究，已经得出了研究结果，而且是有效的。”以此攻击我方医学在对付艾滋病的问题尚无解决办法。这份材料我们在准备时也看到，对研究结果到底有没有鉴定，是否已有实效请教过有关专家。于是蒋昌建马上反驳说，某某专家已指出该项成果的实际效果尚无科学实践的证明。我们注意到，在此之后，悉尼大学的代表不再引用报刊上发表的有关研究成果的报告了。一个反击致使对手对所占有的部分资料产生怀疑，以致不得不放弃某种战术。当然，这个例子也告诉我们，为保证场上的自信，赛前必须对所有可能引用的事实材料反复核实、准确无误。

在这一节，我们力图通过教练的心理与逻辑把前面四节分散

讨论的内容加以概括,明确了逻辑与心理在辩论中的地位与作用,自然会把有关内容贯穿于教练的各个工作环节,成为训练与指导的主要内容。由于我们在心理方面的训练缺乏经验,没有系统性,计划性也不强。所以,整支辩论队的心理素质也有欠缺;比赛方案中也缺少对心理战术的设计。总之,我们的工作、我们的队伍,追求的目标是至善至美,但远未达到至善至美。

逻辑,严谨规范却又变幻无穷,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任何东西能打败逻辑。但在比赛中,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用更严谨的逻辑去战胜对方的逻辑,用适用范围更大的逻辑去包容对方的逻辑,用立意层次更高的逻辑去演绎对方的逻辑,在这个意义上说,逻辑又可被逻辑打败。此即:“逻辑是不能打败的因为打败逻辑必须使用逻辑。”(一位哲人的至理名言)

心理,绚丽多彩却也变幻无穷,无时不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心理是不能超越的。但在比赛中,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总要用理性去克制那些无益的感情冲动,去控制那些不浪的心态反应,从而达到一个协调的、良好的心理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心理又是可以超越的。此即:“心理是无法超越的,因为超越心理必须依靠心理。”(这句话是我仿照那位哲人的推理模式自编的)

逻辑与心理互相依存,互为因果。任何人、任何集体的思维推理都是在相应的心理活动控制下进行的,而心理活动本身又按一定的逻辑规律演绎。逻辑与心理的一次升华就意味着人的进一步成熟,人也只有在成熟中认识自我,敢只有在成熟中超越自我。每一次超越又酝酿着新的成熟。

法国作家雨果说:“世界上最浩瀚的是大海,比大海浩瀚的是天空,比天空还要浩瀚的是人的心灵。”我深深地迷恋于这浩瀚无

根的心灵世界,我喜欢去观察、去探究那形形色色的心灵,充满了好奇。但是,我只是一个爱好者,甚至没有好好地读过有关心理学的书籍,凭我一点常识,加上在训练队工作的一点实践写了这篇文章,遣词用语都欠规范,见解也很肤浅,只能算是一篇“杂记”。

附录：辩论队员答来信

□ 表示读者

△ 表示辩论队员

一、姜丰答来信

南京某中学×××

- 元旦那两天，你和蒋昌建哥哥来南京签名售书，人那时起，我便认识了你——一个亲切可爱、聪明的姐姐。12月31日晚上你在广播里做的节目很成功，也使我真心喜欢上了你这个姐姐。当你落落大方地站在辩论台上滔滔不绝地谈论自己观点的时候，当你微笑着从李显龙副总理手中接过那闪着荣耀的奖杯时，你知道吗，你为复旦人、为中国学生、为中国人争得了荣誉！现在我面临着中考，面临着激烈的竞争。我很不安，我害怕失败。怎样才能使自己变得大方，怎样才能提高口才，怎样才能以坦然心境面对竞争？这是我迫切想解决的问题。
- △ 你要知道，人人都害怕失败。当你面对竞争对手时，你怕他，他也怕你，这是很正常的心理。当你一旦认识到这一点，心里也

就坦然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弱点。首先要承认自己的不足，正视自己的不足，再尽量去克服和改正它。如果一时不能得到显著改善或提高，也不要心急，不要烦躁。我们不必太苛求结果，只要尽力而为，也就无愧无悔。如果能够做到心安理得地接受无论成功还是失败的结果，人也就能够坦然、大方，应对自如。

福建某县某中学高二学生×××

- 在8月29日下午的辩论会上，我原以为你们不可能取胜，但事实却出乎我的意料，台湾大学队竟然败了，而且败得那样的惨。我自从初二看到“人性本善”这句话以来，便一直想去考证一下，却又常被人性本恶的事实所阻。我本以为，人之初，脑子便如白纸一张，既谈不上善，也谈不上恶，而之所以会有善、恶之分，只是由于外界的不同“着色”，以及在不同情境之下的各种不同划分法产生的。看了你们的辩论会，便想写信向您讨教，不知您的看法如何？是否真如辩论什的一样？
- △ 关于人性善恶的问题，是一个至今也无定论的千年命题。古今中外的很多学者名家都曾对此发表过各处中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即使是儒家同一学派，也有不同看法，比如孔子、孟子主张性善，而承继了他们思想衣钵的荀子却主张性恶。国际大专辩论会之所以选择人性善恶作为辩题，也是因为这个千年命题能够提供很大的论辩空间、有利于展现双方辩手的实力。辩论双方的立场是抽签决定的，并不代表辩手本人的观点。就我个人来说，我的看法同您相近，我认为本来的人性无所谓善恶。但在辩论场上，我要维护的不是我本人的观点，而是我方抽到的立场。从这个意义上说，辩论会只是一场有规则的游

戏。

南京某医院×××

□ 我是个比你小不了多少的女孩子。我很为你们这次在新加坡取得的成功而感到骄傲,当然也很羡慕你,辩论队中唯一的女辩手,我也很想像你一样,拥有一副好口才,但是,现实并不给我这样的机会。中学毕业后,我就上了中专,现在我已就业于一有医院,而且,不是个护士小姐,我的校园梦彻底破了,也是现实对我太爱幻想的小小惩罚。还好,现在我终于明白,一切要从现在做起,还来得及,并且也努力这样做了,只是做得还不够好。现在,我想请你送我一张有着你们全体辩论队员签名的合影。我一般不崇拜什么人,但这次我崇拜你们。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有朝一日能像你们一样以自己出色的口才与辩驳,赢得众人的喝采。

△ 看得出来,你是位有主见的自信的女孩。我钦佩你一般不崇拜什么人,而且建议您永远不要崇拜什么人,正如我们身上有优于您的地方,您也有着我们没有的长处。年轻意味着有无数的可能性,没有人能预料未来的你会是如何出色的一个。相信总有一天您的愿望地实现,您会赢得喝采,只要一切从现在做起。真的,你说的对,一切还来得及,快去做吧。我们的合影或我们的签名都是无足轻重的,这只是你生命中遇到的一件小事。

江苏某厂厂长×××

□ 在《金陵晚报》上得知您元旦在南京市新华书店门口签名售书的消息时,已是元月二日,就未去请您签名,当然书也未能买到。你们复旦队在新加坡的比赛实况,我在家里都看到了,很

是敬佩您的口才和雄辩能力。我是一个抓企业的，多么希望能有像你们那样的口才，方能在谈判桌上稳坐钓鱼台。今天写这封信给您，想请您在演讲雄辩方面指点一二。

- △ 谢谢您的关注，谢谢您的支持，谢谢您的溢美之辞。您作为一位企业家，我想一定是具有相当的胆识与魄力、机智与毅力、知识与智慧，而这些正是口才与雄辩的基础与源泉。

吉林某部战士×××

- 我是一名普通的解放军战士，同时也是一个爱好交际的人。在中学时代担任校学生会主席时，我曾多次代表学校到外面参加各种演讲赛，可是成绩总是让自己感到不满意。为此，我订阅了《演讲与口才》、《青年交际》等书报，但也没什么收效，我感到十分地苦恼，不知怎么办才好？
- △ 您的苦恼似乎相当可爱。其实，我倒觉得，您的苦恼、您对自己的不满意，可能更多地来自您对自己的期望值。因为您既然在中学时代能够担当校学生会主席，还曾多次代表学校到外面参加各处中演座赛，那么我相信您一定是有着滔滔论道的口才。我虽然参加了国际大专辩论会，并同队友们一道取得了冠军，但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个“辩才”，所谓“漫漫其修无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从个人的体会看，我想提高口才的首要途径无疑是知识的积累。真正的口才不是巧舌如簧，那只是孔老夫子所说的“巧言令色，鲜矣仁”，好的口才是一种厚积薄发，是知识底蕴的自然流露，是人的修养、内涵达到一定高度的水到渠成。除此之外，多给自己实践锻炼的机会，以提高表达能力和表现能力，这对于提高口才也是必不可少的。祝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山西某中学高三×××

□ 得知您和金庸先生相会，好生羡慕，因为我最爱看武侠小说，尤其是金庸先生写的。能有一张先生的照片是我多年的愿望，所以我诚惶诚恐地向您索取一张您与金庸先生的合影。我想您会尽量满足我这个小小的要求。说到武侠小说，而您又是研究中国语言文学的，不知您对另一位武侠巨匠古龙的武侠小说有什么高见。古龙的代表作《多情剑客无情剑》、《武林外史》、《那一剑的风情》等等，我认为故事情节及其塑造的人物，尤其是书中文字有相当文学价值，不知您对古龙武侠小说有何看法。

△ 能够有幸一睹金庸先生风采，对我来说也是荣幸的事。只是我不得不同样诚惶诚恐地告诉您，我实在无法赠您一张与金庸先生的合影，因为讨照片的人不止您一位，而我只有一张，为了公平起见，或许还是我自留下的好。不过，我想当您拿到这本书时，您的愿望已得到了满足。说到武侠小说，很惭愧，我只浮光掠影地读过《鹿鼎记》，我很喜欢伟小宝，也很喜欢这部小说。此外我还读过一点《天龙八部》。至于古龙先生的大作，我连“低见”也发表，因为我从未读过恐怕只能让您失望了。但是，我相信您这位武侠迷、古龙迷一定人极好多知音，我有一位大学同学就是个爱做剑气满天花满楼的梦的女孩。

河南开封某中学教师×××

□ 雄辩雄才、巧言华语用到你们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12 演播室里你那谦逊有礼的容颜时时都在我脑中振振地敲击。我想诚心地向您请教一个问题，就是雄辩与诡辩的说法，是不是多数人坚持正确的就是雄辩，极少数甚至没有人承认就是诡辩？

△ 既然真理和谬误只有一步之遥，我想，雄辩与诡辩也是一墙之隔的邻居。孔老夫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这种巧言令色的论辩也就是诡辩。说到雄辩和诡辩的区分，一个重要的衡量尺度就在于论辩的出发点。如果论辩是从一个卑下的目的出发，那么往往是巧舌如簧的诡辩；反之，如果是为了正义的目的，出于高尚的动机，那么通常这种滔滔论辩是雄辩。雄辩言之有据，以理服人，诡辩则强词夺理，甚至蛮不讲理。至于我们这种大专辩论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旨在一定规则之下进行的游戏，它的辩题选择是双方都有道理可讲，同时又都有漏洞好抓，换句话说，任何一方的观点都不是圆满的结论，这似乎带有诡辩的色彩，但因为它旨在展示双方辩手的智慧与知识底蕴、机敏与应变能力，因此，赛场上的辩论可以说是雄辩。

宁徽某幼师班×××

□ 姜丰姐姐，你们在辩论会上和其他学校的同学进行激烈舌战，那你们私下里和他们是好朋友吗？还有你和季翔、严嘉、蒋昌建平时是不是经常能见面？你们的友谊一定很好吧。

△ 新加坡广播局和中国中央电视台联合主办国际大专辩论会，除了要体现华语的优美和魅力，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推广华语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宗旨和意义，就在于为各国的大学学生们提供一个交流思想、建立友谊的机会。我们参赛也是抱着以辩会友的初衷。参加辩论会的8所大学都是世界著名学府，各国队友都有自己的特长和风采，让我们钦佩。可以说，在短短的八九天时间里，我们建立了真挚的友谊。除了场上交锋，我们还有好多共同的活动，一道闲聊、一道唱歌、一道用餐等等。比赛结束后，大家道别的时候是依依不舍的。有的队员在回国之后仍有联系。

我们辩论队朝夕相处了几个月，感就更加深厚了。我们彼此相当熟悉，而且在训练和比赛之中达成了一定的默契，互相之间真诚地关心和体谅、尊重的热爱。我同严嘉、昌建见面更多，因为我们都是研究生，同住复旦南区宿舍。年龄最小的季翔还在读本科，住在北区宿舍。不过，他今年夏天就要直升研究生，入主南区了。

浙江某中学×××

□ 我们带着异常的好奇，观看了比赛。当你从容稳重地进行辩论时，我们为你的博学多才、你的桀骜锋利、你的柔中带刚而喝彩，你的表现使我们相当钦佩。第二天，许多同学都在讨论辩论会，几乎每一位同学都谈到了你。于是我们萌发了给你写信交流的念头，许多同学都支持我们。我们希望得以你的赐教。当你捧着冠军奖杯时，你在想什么？我相信，你一定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请问你的兴趣是怎样培养起来的？你是怎样集中精神读书的？你认为成功的重要因素是什么？最重要的要诀是什么？

△ 捧着奖杯时，我心里想的全是我们的教头们，我想他们此刻一定很欣慰，我们总算没有辜负老师几个月的苦心训导。

我对文学克实有兴趣，而且我本身又是中文系的学生。兴趣不是理性的选择，而是自然萌生的东西。兴趣不可能刻意培养，因而也无须刻意培养。况且兴趣本身也没有优劣之分。比如你们对文学没兴趣，却对自然科学有举兴趣，那么发挥自己所爱所长，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所突破，又有什么不好呢？

我也有不能集中精神读书的时候，就如你们敢有时不能集中精神读书一样，这方面我想我并不比你们高明。

不同的成功会有不同的因素，但在我看来对一切成功来

说,最首要的东西是自信。

重庆某中学高中×××

□ 在难忘的国庆之里,我从电视中看到了你们在狮城的精彩表演,看到你们与悉尼大学、剑桥大学及实力雄厚的台湾大学之间进行的唇枪舌战。我着实佩服你和你的同伴们那张仪、苏秦似的口才。那些并无甚规律的文字,经你们之口说出,竟把一个复杂难懂的问题阐述得清清楚楚;那些并无甚规律的语句,经你们之口说出,竟有如“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气势。我着实佩服你们啊。姜丰姐姐,我的语文总浊很好,平时考试,语文充其量也就中上水平。我想向您请教怎么样提高语文水平。我是学文科的,语文对我来说显得尤其重要。姜丰姐姐,您是中文系的研究生,您能告诉我您在学语文过程中的心得体会吗?

△ 说实施,我中学时代怎么学语文的,我现在也忘记了。不过,我中学时代语文确实学利润错,我一直是语文课代表,也许对于语文最初的喜爱源于喜欢朗读课文。我小时候读课文常常受到老师的表扬。但是,我高中却是学理科的,因为当时我喜欢物理和化学,但我的教学成绩却挺糟糕。我想,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喜欢的东西一般都学得好。学语文,功夫在课外。多读多写,可能是最好的途径。你会在课外的书中,发现一个精彩的世界。

上海某中不高一×××

□ 我——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学生,喜欢上了你们,季翔——翔哥的严肃、理智,嘉哥的 humor,建哥的老成,而我更恋上了你——丰丰姐姐,你的恬,你的美。第一次见你,在中央台的转播

中，与剑桥的辩论中的，钦佩你列居四强之首，担负一辩重任，一个出色的女孩，正如羡慕数学班里唯一的女生一样。看了《青春无悔》，我羡慕，羡慕与你相处的人，羡慕妙慧，羡慕得到你校徽的女孩，甚至有些忌妒你对黄敏的怀念，也许我又有些太过份了，但确实不能自己。我们会相逢，可谓：人生何处不相逢，只需毋忘我。请好好保重身体，向嘉哥学习，争取白白胖胖又胖前进白白，多多代为关心建哥这“笔杆”“油条”。辩论的忧忧喜喜，也许将是永远挥不去的情，曾经一起站在文华之巅，遐思这“钢铁是怎样炼成的”。’93的星洲圆梦，将会使你使我青春无悔。

- △ 让我向你透露点“内参”：翔哥在生活中并非总那么“严肃”，而是相当风趣、幽默；嘉哥确实有幽默天才，除此之外，他还是个连年获一等奖学金、免试直升研究生的好学生；建哥除了老成的一面，还有童心的一面，他喜欢开玩笑，有时会像个小孩子。而我，爱睡懒觉，常常为赶上食堂的午饭而奋斗。我们和你一样。我们也都喜欢你。

湖北某中学高三文科班×××

- 我们这班中学生真的好想得到你的照片，我们知道这不大可能，如果真的不可能，也没有什么关系，你现在一定很多事情要做，是吗？
- △ 谢谢你的宽容、你的善解人意。我现在确实有好多事情要做。因为我面临毕业，毕业论文是件大事，不能投机取巧，偷工减料。除此之外，我还在我的导师朱立元教授的带领下，参加一本关于中国古黄美学的书的撰写工作，上个学期的西行漫游，途经洛阳、西安、敦煌、乌鲁木齐、成都、重庆、宜昌、武汉等地，耗时一个月，又积累了好多杂事，还有一些活动和稿约。相信

你们现在在也好忙碌，你们在读高三呀！只能道声祝福，愿你们高考取得好成绩。我的照片实在没什么，对一个人的印象不必留在照片上，它在心目中，该淡忘的，自然就淡忘了。这只是你成长过程中遇到的一件小事，无足轻重。

浙江某中学高三×××

- 看了朋友从复旦给我带来的《狮城舌战》，我真的好激动。你们的辩论会，我每场都从电视上看过了。当看到你们精彩的辩论时，我不禁为你们大声鼓掌喝彩，每场下来手也红了。但是，这次看了《狮城舌战》，我的心真的久久不能平静，总有一种想哭的冲动，一种什么感觉我也说不清……

我是高三文科班的，我也很喜欢辩论，同学常说我长大了应该去做律师，不过与你们比我真是沙子与地球了。真羡慕你们复旦人，我们学校也有几个成为复旦人，我外公是个复旦人，后来又在复旦任教，说起复旦总是津津乐道，小时候，每每听外公讲总希望自己长大也能成为复旦人，现在想来那也许是个终身遗憾了。一段日子由于学习的挫败，曾迷茫、徘徊过，现在雾过天晴，我也走出了低谷。

- △ 或许，人生总是在波峰与波谷的交叠之中，你能走出低谷，真好。无论你能否走进复旦，最重要的是找好人生的位置。我们都非常感谢你这位小妹妹。我们能取胜，也正是由于有这么多的支持、这么多的喝采。什么感觉不一定要说清，只是以后当心鼓掌别怕痛了手喔。

上海某中学初二×××

- 我是一个来自嘉定区的女孩子，今年14岁，在我的一生中只喜欢一个女的，她——就是你——姜丰。

给你写这封信，我显得很激动，本来想好的一肚子话，现在却不知该说些什么，写得不妥当之处，请别见笑！

我知道，你的功课一定很忙，时间一定很少，但我只想和你交个朋友，真的，把你当一个知心姐姐看，好吗？！

我在此作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女，14岁，初二，属狮子座。

崇拜者，刘德华、你，喜欢音乐（以前学过电子琴，现在学二胡、笛子）。

最令我难忘的事，复旦大学—台湾大学（“人性本善”论赛）。

最大愿望，当饭店女经理，考取复理大学，和你交朋友。

颜色：白色。

请你也作一份自我介绍，OK？

- △ 姜丰，女24岁，研究生三年级，属白羊座，以前学过吉经，半途而废。没有崇拜者，没有最令我难忘的事，没有最大的愿望。喜爱颜色和你一样，也算一点缘。

辽宁锦西某中学高一×××

- 给你写信或许出于一时的冲动，但也确实事出有因。一来是想了解一下大学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在我这个高一学生的眼中，大学似乎是一个神秘的地方，是轻松的还是紧张的？是不是充满了竞争？还有，我总是觉得大学应该是人从校园走出，去接触和适应社会的一个阶梯，但我发现你在言谈举止之中却透着稚气、天真，这是为什么呢？二来就是想多交个朋友。我是一个略带忧伤的女孩，我的理想是当个律师或者搞金融，但父母亲却说我应该学理科。面临即将文理分班的今天，我有点不知所措，你能否就此事给我指点指点。

- △ 真正了解一个环境，只能是身其中的时候。相信两年以后你就会知道大学生活的面貌，那既是一个轻松的地方，又是一个紧张的地方。我想每个经历过大学生活的人都会难忘那段时光，那是一段有声有色、有笑有歌、有爱有愁的时光。四年后，背起行囊作别校园时，最深的感触是：我长大了。说到稚气和天真，这是宝贵的东西，却是无须留恋的东西。而成熟和天真，本来是相对而言的，没有绝对的成熟，也没有绝对的天真，我只是按照我的步伐成长着。至于文理分班，父母的意见往往有道理的，应该细加考虑，但最重要的是要了解自己的真实心意。无论怎样，决定了，就别后悔。

二、季翔答来信

浙江省绍兴市某中学×××

- 你是怎样看待学生（不论大学生、中学生）恋爱问题的，请不要误会，我只不过听惯父母、老师训导学生的腔调，想听听作为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是怎样回答的。
- △ 我觉得在人生的黄金年龄有一份黄金般的感情是十分美好的。看过美国影片《爱情的故事》的人们一定会为男女主人公——两位大学生柔情寸肠的恋爱感动不已，年轻人是有能力去爱别人的，爱情不是历经沧桑者的专利。

两个人的世界是很精彩的，但并不是唯一精彩的，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既有恋人，又有友人；既有爱情，又有亲情；既有生活，又有事业，那才是健全的人生。

我想，对我们来说，应该有一份炽热的情感，一个从来没有爱过别人的人是不可能对社会承担起责任来，但我们不应

恒于这份情感,这只是人生长路上的第一道七彩阳光,沉湎于此就只能见到一个半明半暗的世界,向前奔跑吧,地平线在向你召唤,拥抱途中的每一分阳光和空气,最终你会拥有整个世界。

南京大学法律系×××

- [] 我也是法律系二年级学生,除了法律外,其他爱好有:萨特、它、唱、跳 Lesley(张国荣)、Presclia(陈慧娴)、扬子晚报、《人像世界》杂志,不知你的爱好有哪些?当然,除了游泳之外
- △ 谢谢你记得我喜欢游泳,有机会赛一场否?来信中说你很喜欢 Lesley,张国荣也是不少人比较佩服的一位香港明星,他的告别演唱会是最感人的 MTV 了。且不谈《阿飞正传》和《霸王别姬》的成就,单就他的嗓音,的确只能用真情流露来形容。可是他却告别了歌坛,当他发现他的音乐不得不与一种庸俗可鄙的东西掺杂在一起,而他又绝对无法摆脱的时候,也毅然离开了歌坛。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的,可我认为,这才是一种真正的敬业精神。“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其实,像我们这些学法律的人,不需要这样的敬业精神吗?因为我们所分辨与舍取的,已不仅仅是美与丑、高尚与鄙俗,而是正义与邪恶!在如此沉重的砝码面前,仅仅依靠巧舌如簧是远远不够的,更主要是要有一颗良心,一颗既对得起他人又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你说对吗?愿与你共勉!

北京市海淀区立新学校×××

- [] 现在我已经高三了,还有 6 个月就要考大学了,而语文却这么差,我就像热锅上的蚂蚁,真是不知所措,又不知道在短时间内提高语文水平的有效办法,而我对你扎实、深厚的语文功底

佩服不已，不知道你是否能给我指出一条捷径（特别是在文言文方面），或者谈谈你学习语文的经验呢？先让我渡过高考这一关。

- △ 你问我是否有一条捷径，我可以给你肯定的回答，有！尽管我不曾参加过高考，不曾经过那黑色七月的洗礼，但历年来大大小小的考试竞赛，也让我积累了不少经验。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那条捷径就是：“填”！你也许认为北京填鸭很难睥，但“填”也许是你想在短时期内语文水平获得一大飞跃的唯一途径了。大致方法有以下几条：①背成语词典，挑出那些比较常用的词，了解确切的意思和用法，贵在于精而不在于多。②广泛阅读《作文通讯》之类他人的佳作，遇到精彩之处可以仔细地品味，甚至可以背诵下来，特别注意他人佳作中结构层次的安排。③多记一些名人典故，不可找那些他人用滥的掌故，越生僻越好，年代越近越好。④尽量多练笔，将自己的作品与他人作比较，反复修改，直至完善。最后一条乃上策，学会这一条，前面三条，皆不必用。

上海市浦东上南中学×××

- 我也在求索，寻求那父母、朋友看来似乎无法实现的梦，但我却想让梦变成现实，埃及的金字塔、罗马的竞技场、撒哈拉大漠、巴黎的卢浮宫、印加文明、两河流域的古文明……我渴望了解人类，也渴望了解这个世界，甚至于整个宇宙。那么，你眼中的世界是怎样的？是很现实呢？还是充满梦想？
- △ 如果你认为梦是现实，那么梦就是现实。太唯心了，是吗？可是没有梦的现实往往是严酷的，而没有现实的梦，却总是美好的。趁我们还年轻，为什么不多做几个梦呢？谁不向往无垠沙海中伟岸的金字塔；谁不向往雅典卫城撼人心魄的帕提农神

庙；罗马的柱廊凝结了古代艺术家们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精粹，而卢浮宫的珍藏更是世界文明华美篇章的聚焦！也许我们知道得太少，但我们的眼光又何尝不希望留下一个印迹，哪怕是一瞥也好啊。梦，每个人都有那么多难圆的梦！直到贝聿铭先生大胆地将一个透明玻璃金字塔放到了卢浮宫的前面的时候，我才如醍醐灌顶般“悟”了。金字塔可以和卢浮宫并存，埃及文明可以和西欧文明融合，时间与空间可以被任意地缩短与碰撞，这是因为世界上一切最伟大的文明都是相通的！我们梦想了解世界，了解宇宙。可是我们了解自己吗？了解自己旁边最易被忽视的那一些吗？我们了解我们民族的文明吗？芥子中有世界啊！当我口袋里揣着我的梦想，脚下踏着坚实的土壤的时候，我才感到自己是最充实的！

辽宁省沈阳市汇文高中×××

□ 下了一千次决心，却没能实现一交怎样才能取得下一次的信任，并能做好？这对我有多坏影响？

△ 根本没有什么影响。不要背上任何的十字架，思想包袱这个东西，说重可以如千钧，说轻像羽毛一般可以随风而折，就看你怎么看了。时下人爱讲潇洒，拿得起，放得下，才是现代人的潇洒。我为什么不劝告你做什么事情都要有毅力或是诸如此类的大道理呢？因为我想你对自己的责备恐怕加起来有一车了，我可不想再给你加上一块“花岗岩”。这样吧，咱们来研究一下怎样才能成功它一次。把目标定低一点怎么样？别上来就想夺年级第一名。有时候我给自己定过这样的目标：如中午吃完四两饭；两天之内洗完三盆衣服之类的。这样的目标，不是很容易实现吗？说穿了，有时候老给自己定目标、下决心，并没有什么意义，甚至上课很累。关键在于，要给自己创造一个舒适

而宽松的一样。正所谓：“问渠哪得清如入海？为有源头活水来。”让自己用一个积极而喜悦的心情去迎接每一个黎明。许多平时自以为头疼的问题，往往在这样的心境和环境顺利地迎刃而解了。试一试，怎么样？

浙江省绍兴市稽山中学×××

□ 你既然知道《天龙八部》，那么你一定也看过不少小说，你是如何从金庸的书堆中钻出来，然后潇洒地踱进图书馆，对你的“四大恶人”不闻不问呢？

△ I'm Very Sorry！至今我仍没有从金庸的书堆中钻出来，潇洒地踱进图书馆，对“四大恶人”不闻不问。我一直认为，以金庸、古龙为代表的现代武侠小说，是我国近现代小说中的一支奇葩（有点像超市中的红富士苹果，是属于那种大众化的美）。我并非一定要摒弃对通俗文学的欣赏，而去孤独地攀登严肃文学殿堂的台阶。——就像我可以一边聆听詹妮·杰克逊的BIVES 舞曲，一边品味莫扎特的歌剧。我想：人们往往喜欢在“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选择一项来提高身份或是夸耀品味，我倒是一个杂食动物，只要是对身体有益的，不管是青菜萝卜或是鱼翅海参，但吃无妨。优点在于：不致于“贫血”，又增加抵抗力。每个人都有一双辨别是非、判断真伪的眼睛，我们应该相信自己的眼睛。人是一个复杂的高智商的有机结合物，相信了的能力吧！

浙江省某中学×××

你认为哪些东西，哪种朋友对学习有利（不利）的呢？

△ 我知道一个偷懒的方法：当你在学习的时候（注意是专心致志地学习），偶然想到的某一个人或是某一个事物，在当时情况

下,它并不让你厌烦、恐惧或是想入非非,那么我想,这样的一个人或是一件事物必然是对学习有利的(至少是无害的)。但这仅仅是一个“理论公式”,决不是一个“经验公式”,事实上,世界上本没有绝对的东西,好与坏,对与错也总是相对的,甚至是可以互换的。譬如说,人吃饭是好事,吃多了就会胀死,这是一个尺度问题啊。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不仅要学会分辨人与事物的本质,更重要的是学会处理问题的尺度感。我想,只要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坏蛋”(这样的人事实上也很少),什么样的朋友都是可交的,关键是,我们不可以让他人的思想、他人的行为影响了自己判断事物的能力,每个人的心中都应该有一把尺,有了这把尺,说法可以量出自己 and 成功之间到底有多远的距离。

江苏省东台市富安镇中学×××

□ 我小时候的理想就是想当一位律师,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愿望越来越强烈,但由于我成绩不太突出,加上不善言辞,对律师这个职位,只能望洋兴叹,你能给我一点建议吗? -

△ 林肯是以口才著称的总统之一,他的能言善辩得益于他的律师生涯,但幼时的林肯不善言辞,甚至有些木讷。纵观历史,从狄摩梯尼到苏秦、张仪,伟大的雄辩家又有几位是天才神童呢?再追本溯源就更平等了,没有一个人是生来会说话的。

既然“吾非生而知之也”,那么后天的教化就是成功的关键。我们都已过了蒙昧开启的阶段,此时“教化”这个词的含义就更多地意味着主动地示知了,在解方程的时候想着这是为了当律师,在厌倦时想着我要当律师,让你的理想成为生活的中心。只要精诚所至,就会金石为开。

当然,不是光读几本好书就能成为一个好律师的,“律师

是社会的良心”，我想，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成为一个好人。

山东省商业职工大学×××

□ 我对于我最终选择的道路——从商，已渐渐地适应，对于我所学的课程也慢慢地有了兴趣，甚至可以说是喜欢。不知你如何看待商业？是不是也认为“无商不奸”？

△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的《货殖列传》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天才地道出了“商”的本质。

商业的服务对象是多元的，既“熙熙”又“攘攘”，所以它为社会所必需；商业的目的是一元的，说来说去还是为了“利”，因此有不择手段昧着良心赚钱之嫌。中国人的商业观便是这一对矛盾斗争的结果。

既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那么，“无商不奸”便顺理成章了。但我以为，上千年的传统观念是到了改一改的时候了，无商不活，无商不富已为实践所证明，为“利”又有什么不好，只要合情、合理、合法，我相信市场经济终究是法制经济。

选择道路只能是自己的事，我想你的选择并不是因为“经商热”，所以我相信你会在这条路上义无反顾地走下去，即便某一天热度下降，甚至无人喝彩，选择人生道路是不以行人多寡为依据的。

上海市虹口区北虹中学×××

□ 怎样在嘈杂的环境中高效率地学习，并不断提高自身阅读及记忆能力？我家的房子是沿街，对面是车站，屋外可谓“车水马龙”，可对我学习上的干扰就“殃及无辜”了。

△ 对你的处境，我深表理解。在我们辩论训练的过程中也有过类

似的经历,不过所谓“车水马龙”是在屋内,而不是屋外。每当我们发言时,就会有铺天盖地“嘲笑”声从天而降,常常弄得我们阵脚大乱;那是教练们用妹制的磁带施行的干扰,天长日久,我们面对各种笑声、嘘声便都能安之若素了。

抗干扰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个人的力量是如此的有限,以致于并不能时时使自己的周围有一个适宜的环境,能否在不便甚至艰苦的环境中正常生活,往往是成功的关键因素。毛泽东在枪林弹雨中“胜似闲庭信步”的气魄不能说他青年时代于市场中读书的刻意磨练毫无关系。

抗干扰能力是可以训练的,尽管你是“无辜”的,可你对自己的处境并不是无能为力的。做点什么,好吗?

上海市虹口区北虹中学×××

□ 在繁重学习之余,如何有效地阅读一些课外读物,并读有所获呢?家长、老师只希望我们钻入“题海”,而作为—一个兄长,作为一个过来人,你想必懂得“Work while you work, Play while you play”的道理,可否给我一些建议呢?

△ 不敢妄称是“过来人”,因为“学海无涯”,但我想建议还是有的,我始终腐烂“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开卷有益”,很难说在某时某刻不经意间翻过的不可不杂志中会航考的作文命题,我读《天龙八部》时压根没有想到它会在辩论中派上用处。

如果说,中学阶段留下的印象只是忙碌,那么大学就使我感到充实,因为这里给我提供了读书的空间和时间,而读的大多数书都不是为了应付,而是出于喜欢。忙碌和充实是没的,前者比后者被动的多一些。

但我丝毫不觉得中学在浪费时间,不论“题海”。

还是“填鸭”，那都是现行教育制度下所必须的，只有经过独木桥，才能进入象牙塔。

“Work while you work, Play while you play”，这是说一心不能二用因时制宜的意思，读书也是一样。

浙江省绍少市稽山中学×××

□ 你从小学一年级(或幼稚园)起是否一直都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父母眼中的好儿子呢？

△ 教我如何来回答这个问题呢？若说是，则不免显得骄傲，犯了“儒家思想”的大忌；若说不是，又像是故意做作，染上了时下最流行的正话反说的毛病。姑且“中庸”一下吧：有时是，有时不是。

在幼儿园的时候，我曾经因为一盘跳棋的输赢，一怒之下，用一块砖头砸破了一位同伴的脑袋，我当时并没有惊慌失措，尽管他流了很多血。后来我转了学，十几年没回童年生活过的那座城市。直到前不久，阿姨捎来位儿时玩伴的祝贺，我一猜就是他——这位同伴是我一生中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个人。

我想，我们的童年与《汤姆·索亚历险记》中的描述相比，绝对都是循规蹈矩的，这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安定的社会中，遵纪守法不仅是对大人的要求。当然，好学生、好儿子，也可以犯一些无伤大雅的错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不安分的年龄。

上海市虹口区北虹中学×××

□ 怎样合理地处理学习与学习以外生活的关系，例如：既要坚持读托预，担任班中宣传工作，还要参与校内的学生会工作等？

△ 看了你的问题，仿佛又找回了自己从前的忙碌，我很熟悉在上课的间隙，出墙报、写广播稿、组织晚会的生活，我也是在中学阶段念完托福预备班的。

有着做不完的事，那是因为我们年轻，觉得即便整个世界都难以填满自己的心灵，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心比天高”吧。但时间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当你发现没有额外的第25个小时并为此而寝食不安时，那就说明该检查一下你的时间表了。

适当的社会工作能开阔一个人的视野，丰富一个人的生活，但学生毕竟是“以学为主”，所以在“学习”和“学习以外”之间权衡，自然“学习”是首位的。

仔细想一想对你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能胜任所有的一切吗？如果不能，那就只好忍痛割爱。我想：生活不是别人强加给你的，而应是你选择的那一部分。

贵州师大附中高三×××

□ 作为一名高三学生，我深知尽最大努力进入高等院校继续学习是自己最好的选择，但我很害怕在黑色七月的“独木桥战役”中被诸多强硬的对手轻易地推下桥去，于是我很想知道你当年在此战役中是如何与“敌”相比较的？

△ 我很幸运地躲一节初中以来的历次升学考，可以说是一个没有丝毫临“敌”经验的人，但我很欣赏高敏跳水时的心态，心如止水，旁若无人。考试也是一种竞技，知识的竞技，在这里，与别人竞争固然重要，但最终还是与自己的角力，与自己的怯懦、犹豫、不安的较量。不要管别人发挥得怎么样，你应该做的是跳出自己最漂亮最辉煌的姿势。

三、严嘉答来信

上海金山食品工业学校×××

□ 看了你们在新加坡的辩论赛，对你们复旦四位同学的口才，我真是佩服得很，特别是佻和蒋昌建同学，看了一下手稿的开头，就能持续不断地讲下去，而且内容有时又很风趣，还能恰到好处地夹着一些诗词……

△ 我想初看辩论赛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就像我第一次看1988年的亚洲大专辩论会录像，就深为辩手们的风度、学识、口才所倾倒。当现在有过“神交”的经历之后，最吸引我的是文字排列组合后所变幻出的奥妙无穷的天地。当然辩论这一充满智慧、美感的形式经过我们演绎也会有一些新的特点。

信中提到“口才”的问题。人的天赋固然重要，生就一副伶牙俐齿，自然会为你赢得人前人后把话说圆后的悠哉，抑或是淋漓尽致地解说后的酣畅。“拿了稿子，就能持续不断地讲下去”，我想许多人都是能达到的，只要肯说、敢说、要说。但“好口才”的背后就绝不仅仅是“伶牙俐齿”、“口若悬河”了。人的学识、风度、智慧是“好口才”的真正释意。能领悟到语言之精妙的人必有“成竹”在胸，这也是我很喜爱辩论这种形式的原因吧，既然你有此愿望，再拉一个人“下水”也无妨。

至于“风趣”、“恰到好处地引用诗词”，我想当你“下水”之后自然会拥有的。说话，真是人生挡不住的诱惑。”

辽宁省橡胶塑料机械厂×××

□ 你们在大赛中，总是充当驳斥方——反方，你们怎么抽的签

啊？我们看到的第一场辩题“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这个理所当然对你们有利。因为“艾滋病”毕竟是社会造成的，社会影响大。不过悉尼大学雨步不让，寸土必争，虽然有点语言障碍，也驳得好凶啊！……

- △ 这次我们辩论的一大特色便是“一路反到底”，还处处“亮绿灯”，虽“有惊”，总算“无险”，直到捧得冠军奖杯。抽签这事是全无定数的。第一场是复旦前校长谢希德教授托朋友在新加坡抽的签，是反方。这好像就注定了我们“反方”的命，后两场都是我们教练俞吾金教授抽的，也都是当场凭一签定立场，然后我们四人便拼死维护我们的立场，教练、邻队也一起给我们叫劲：“反得有理”。

跟悉尼大学队的比赛属“有惊”的一场。“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作为反方来讲，其实是极难辩的，“艾滋病是医学问题”大概在社会宣传时可忽略，但在讲求“立论、推论、逻辑”的辩论中是很难否认的，这就需要“技巧”了。所以后来总结这场比赛时，我们一致认为是“技巧之胜”。

“寸步不让，寸土必争”倒是很形象地描述出了2的味道，这味道真够浓烈的，你们看了是否也被呛着了呢？

辽宁省橡胶塑料机械厂×××

- 我们看的第二场也就是大决赛复旦大学队对台湾大学队的“人性本善”的辩论。乍一听到这个辩题，真为你们担心，“人之初，性本善”这《三字经》上的位置有哪个不晓得，然而你们都是反方。但是你们竟奇变般地赢得了胜利，……
- △ “人之初，性本善”，这一《三字经》上的话，相当多的人是熟知的，所以对我们辩“人性本恶”竟能取胜感到有点“悬乎”。说悬不悬，因为辩论的内涵是很丰富的，在那一套规定之下，特

别是出题人的“意旨”之下，天下是没有不可辩之题的，关键看你思路是否打得开，逻辑是否无懈可击，知识功底是否深厚等等。像“人性本恶”，中外许多先哲就是持此观点者，中国的荀子便是一个典型，只不过荀子的影响远不及孔孟，更谈不上把荀子的思想通俗到《三字经》这样的读物中“启民智”。这是从辩论内容来讲。

但是辩论除了有内容，还有技巧。“性善”、“性恶”作为立论的不同起点，胜利与否还在于如何维护它。所以仅从题目是断不下胜负的，不然我们岂不太吃亏了。

当然，我们还是吃了点“亏”的，亏在人们对辩题的最初认同上，新加坡又是深受儒家正统思想影响的。但我们终于胜了，非“胜之不武”之辈，心里满足感到是“直线上升”了。

四川省宣汉县江口中学×××

□ 大哥哥，大姐姐，你们能告诉我什么是“大讨辩论会”吗？这里面又包含了些什么呢？你们参加过这样的会多少次了？

△ 首先解释一下“大专辩论会”中的“大专”与我们目前通行的“专科”并不一样，其实是“大学”。

“大专辩论会”首先由新加坡广播局发起的，每两三年举行一次，自1986年以来共举办了四届。第一届有四支队伍参赛，中国北京大学队获冠军；第二届台湾大学队首次参赛，大陆派出了复旦大学代表队，结果复旦、台大最后相遇，共辩“儒家思想可以抵御西方歪风”，被舆论界称为“世纪之辩”，影响颇深。复旦凯旋而归。第三届台湾大学队夺冠，南京大学队获亚军。第四届与以往三届有所不同，是中国中央电视台与新加坡广播局联袂主办的，参赛队伍扩大到国际范围，英国剑桥大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都组队参

赛,所以是“首届国际华语大专辩论会”。冠亚军决赛又逢台大与复旦。当时报刊杂志都把此事炒得沸沸扬扬。复旦最终“狮城圆梦”了。

除了“大专辩论会”,我们在复旦和上海市也参加各类辩论赛。特别是赴新选拔赛,各路好手纷纷登台亮相,在复旦校园掀起辩论“热潮”。我们的胜利从心底来说确定是复旦胜利。

山东东营胜利油田六十中×××

□ 当今许多大学生都去打工,你打工过吗?你对打工的看法是什么?我觉得打工有两个好处,第一,锻炼自己适应社会;第二,可以赚钱,是自己挣的钱,一定有自豪感了!

△ “打工”,在大学校园里称“社会实践”,“勤工助学”或“实习”不一而足。说之,一句话:有偿的服务劳动。复旦大学地处“商品经济的前沿阵地”——上海,在校罗中央海报栏里每天都飘着五颜六色的招聘、出售等广告,“社会实践潮”越涌越汹。当然“社会实践”除了有偿的劳动外,相当一部分是无偿的,是学生自己组织或学校出面组织的。每年暑假、寒假,很多同学都加入各种各样、规模不一的“社会实践考察团”,浩浩荡荡开赴各地。返校后,一个个黑黑瘦瘦,尘土未尽的模样;校门口橱窗内贴上了“考察团”的照片论文专题汇展,充满了青春的朝气,把整个校园映照得更绿更青。社会实践的利弊,与读书的关系,我曾设计过问卷分发给不同年级、系科的同学,基本上是持肯定态度。

我自己参加过 1991 年赴东北考察团,1992 年在上海市对外律师事务所实习,抽空又去了厦门,还有其他地方。每次返回校园,尘世的喧嚣才一点点褪尽,感到了做学生的宝贵。我们就是这样一批人,一只脚踩在校园里,一只脚试探地落在

外面的“精彩而无奈”的世界里。

辽宁省鞍山市某市级中学×××

□ 以前，我曾为学“文”而感到羞愧，因为很多人认为学“文”的大都脑子很笨，我虽不算笨，甚至有点小聪明，但还是选择了学文科。我想，很多学理科的同学听了你们的辩论会都会为之震惊的。

△ 我想你的想法有一定的代表性，因为确实有些人学“理”脑了用不上，趁着文理大分科进了文科班。而文科的特点容易跟“死记硬背”联系上，再加上“学了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也是影响较深的一种社会说法，造成你这种“羞愧”。其实大没必要。我想现在你已进了文科班，是否感到越学越笨呢？学理能培养人思路的清晰和简洁，而学文却能培养人的抽象思维、形象思维、逻辑推理能力。我想如果你对自己有很深的了解，较准的把握，不会产生那种想法的。当初分文理科时，我也犹豫过，倒不是觉得学文怎么样，而是觉得自己文理科成绩都还可以，进任何一科都行，后来才愈发感到成绩绝不代表你的“特质”。我是比较适合于文科的思维方式，在南京明孝陵的神道上，暮色苍茫中，远远地眺望那位石头“文臣”，心头一动：路，真是没走错。

至于理科学生听了“辩论会”会为之震惊，我想还不至于，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偶像，在另一个天地中建立起他们的自信之门。门外涌入的潮水也许会引起他们的惊喜和欣赏。我想，学文的我们不一样，吐纳百川，不亦乐乎！

马来西来×××

□ 我的志愿是当一名律师，爱好是阅读、交友。以前经常练习字

体与书法。请问你是否能够来信向我讲解你在大学里面的生活是怎样的？

- △ 我从小也喜爱画画、书法，中学时还专门练守一阵，临摹过柳公权的《玄秘塔碑》和智永的《千字文》，后来也就荒废了。上大学时，还专程赴绍兴兰亭朝圣那天正好有些微雨，青山绿水，迷迷蒙蒙，带着雾气的假山、石碑、树丛，到处透着股灵气，怪不得王羲之能写出那一笔“矫若惊龙，飘若浮云”的字来，江南水乡的灵秀和游历大山名种之后蕴育心中的气韵，在微醉的诗意状诚中一气呵成，写下了“千古绝笔”。那天，我抱了本《兰亭集序》真像捧得了本圣书，痴迷其中，流连忘返。

大学的生活还是很丰富，特别是文科相当活跃，形成了特有“校园文化”。像我所在的法律系，有系学生会、法学社等组织的活动，更不用说全校的各类团体、组织，可谓五彩缤纷。每天的海报栏成了复旦校园文化的巨型广告牌。当然各类活动也是以“学术为魂”的。因此，讲座、研讨、研讨会是最基本的形式。我一进大学门系学生会帮忙，后来当了一年多的主席，亲手组织的活动有模拟法庭、法律社会咨询、把法律意识注入民族灵魂等，每一次活动都给我在复旦的生活增添了许多难忘的回忆。虽已毕业，但同学相聚时，唱起“老朋友怎能忘记掉过去的好时光……”还是禁不住眼睛潮乎乎的，毕竟曾经亲手营造过我们共同的大学校园时代。真诚地欢迎你到中国来，到复旦来，亲身体会一下这儿的真正生活，OK？

河北秦皇岛一中×××

- 你将业有什么打算，继续深造然后定居外国吗？不少大学生梦求的都是这条路。我曾经见过一些大学生，爱学习，但是否爱国？虽然他们说爱，但我却不敢全信。在当今的时代，对我们

的国家民族有责任心有才识的人为什么那么少？社会的腐败真令人痛心。一想起不久的将来，我也将迈入这是非混浊的大圈子，我真怕。

- △ 问我将来的打算，说实话还未趋明朗化。“定居外国”我想基本上不会，如有机会去国外深造那自然是大好事。我从南通一个县城考入上海复旦，短短几年，别的不说，眼界开阔了许多。我想中国人能有机会出去看看，对于了解自己的国家也是大有好处的，不同的视角，异域的风情，会给你我一咱“暮然回首”的感悟。

我从小深受正统思想的影响，也许言行“不逊”，但我想我的中国式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已深入骨髓，也许我会出国，而且会滞留相当长的时间，但我终归是要回到说中国话的人最多的地方。我相信。

社会是复杂的。记得有一首歌好像唱蝴蝶经过蛹的挣扎才能拥有一对能挡风雨的坚强的翅膀。象牙塔中的你我都试着伸出我们的触角，探一探风向，测一测温度，咬咬牙飞出去，那时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湖北省荆门市职教中心×××

- 在辩论会上，辩论的问题十分多，并且范围广，那就要求你们的知识面广，那么你们赛前是不是进行了很长时间的研究，并收集很多你们认为有可能在辩论会上出现的问题的资料呢？你们赛前的准备工作是不是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你们是在赛前知道辩论的问题，还是在赛场上才知道所要辩论的问题？你们在赛前有没有想会输给别的代表队？
- △ 新加坡赛制之下的辩论归根到底是一种游戏，一种口才、知识和智慧相比较的游戏。它的对抗性不仅表现在赛场上的口舌之

争中,而且存在于对与辩题相关的材料的收集、整理、加工和对己方逻辑底线的讨论、统一等工作之中。辩题一般在正式比赛前一些天就发到辩论队手中,但立场往往要再晚点经抽签决定。收到题目之日,其实也就是双方较量的开始之时。辩论的较量是综合实力的较量,而综合力量的培养自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必需有较长期的准备。至于输赢,只要比赛都会有。为了取胜,我们进行这样心理暗示:这个问题上我比你认识得清楚,因此我不是来和你辩论,而是来教你的。

湖北省荆门市龙泉中学×××

□ 跟“追星族”的中学生不同,我崇拜的不是影视明星,而正是你们这种能为国争光,有胆识、有才智的人。我认为这才应该是中学生奋斗的目标。但是以我目前的成绩想进入复旦,用“蛤蟆想吃天鹅肉”来形容是再恰当不过的了。我想你们一定从小就是出类拔萃的学生吧,那你们有什么好的学习方法和经验呢?能否介绍给像我这样求知欲很强的学生呢?我的确很想成为像你们这样的有用的人。

△ 很欣赏您强烈的求知欲。强烈的求知欲如能转化为强大的学习动力,那我想,复旦也并非“可望而不可及”的。和您一样,我们都是普通的学生。承蒙您夸奖,但我们觉得,能为团队(甚至可大至国家)做一些事固然很愉快,但一次比赛的胜利所能说明的问题的确是有限的。

说到学习,我们几个人从小到现在一直都还可以。好的学习方法各人有各人的特色,以下几点或许是共同的:①肯吃苦,可以说没有勤奋与刻苦,便没有成功;②有兴趣,兴趣真是最好的老师,学习要于无兴趣处觅兴味;③善整理,勤思考,“学而不思则殆”也。

广西壮族自治区陆川县中学×××

□ 只要你一发表见解,那幽默而又富有哲理性的语言,会引得全场人哄堂大笑,随即会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只是我觉得你好像少说了一点(这是我的第六感觉,一向不大准确),你平时说话多吗?

△ 感谢您的夸奖。在新加坡缺乏场比赛现场效果总的来说确实还可以,但我们自己认为,可以提高的地方还非常多,“幽默而又富有哲理性”或许更多的量种尚需追求的境界。

说到平时的说话,可以给您讲一个我在中央电视台“12演播室”制作专题节目时讲过的一个故事:在我从新加坡回来后,我妈告诉我:她的一位老学生事前得知我要去参加首届国际华语大专辩论会,很惊诧,悄悄地跟我妈说:“你家严嘉平时很少说话的,要去外国辩论,行吗?”我妈笑笑未作答。

平时的我,除了课堂讨论、组织活动等讲话较多外,一般倒确是不大开口的。关于辩论场上我的话是否少了,您的第六感觉可算准又不准。讲“准”,因为的确我当时还有很多话可以讲;讲“不准”,因为我们每个队员都还有很多话。但时间有限,只能大致平均以求“恰如其份”。

湖北中医学院中医系×××

□ 古往今来,很多人都赞成“人性本善”的观点,而你们却要反其道而用之,从“人性本恶”谈起。刚开始实在叫我们难以接受,然而经过你们一场有力的说服,我们也动摇了。在这里我想请甌一下:你们实际所持观点是什么?我们私下里议论,你们所持的“人性本恶”并非你们原有观点,只是为了发挥辩论才能而坚持的,对吗?

- △ 辩论比赛的立场是抽签所决定的，抽之前我们将维护哪一方，不知道。因此，我们持“人性本恶”的观点获得辩论的胜利，的确并不表明我们就是“性恶论”者。

人性本善还是本恶，在人类的思想史上可以说是“千年之辩”。平心而论，这两种较极端的论点都有其真理性的因素。以儒家思想为例，在孔子那儿，只是讲“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并没有明确表示对“人性本”的态度，从全其他的论述看，似乎更倾向于“本善”一点；此外，孟子一支打出“人性本善”的旗号，荀子一支则坚持“人性本恶”；在孟荀以降的流变中，孟子逐渐被尊为正宗，所以影响力自然大一些。最后，至于我们的实际观点：生而“白板”，再“兼而有之”。

山东东营胜利油田六十中××

- 我和××常谈上海的浦东开发新区，远方的你，是否也准备为它的建设而尽力呢？
- △ 我在复旦大学求学的几年，也正是浦东开发进入实质性操作，获得长足发展的时期。身在离“前沿”很近的地方，自然也就不会不感受到“火爆开发”的辐射。

浦东，确实是一块富有魅力的神奇土地，对于青年人，或许尤其具有吸引力。在辩论集训期间，我们还曾全队出发，赴陆家嘴、金桥和外高桥三个开发区作社会考察，开发的宏阔思路、实践中的大手教条、发展所能提供的众多机会，尽管我们曾经了解，但还是再一次地让我们深深地震撼了。处在社会跃迁时代的青年是幸运的，能为这种跃迁作出贡献是幸福的。

我当然很愿意为浦东新区的开发尽一点力，我的专业更为我提供了较多的可能。其实，我本科的一些同学已经直接进入到了浦东建设的行列中去了，有的在开发区的总公司，有几个

则参与筹建了浦东司法局下后个合作制律师事务所。对我,现在更多的当然还是积累,但系里的老师承担了浦东立法经济块的主要工作,我也参与了其中,算是部分直接介入吧。

福建龙岩财经学校×××

- 你参加的辩论会有许多值得讨论,比如对方指出错误,你能马上反驳说对方逻辑上的错误,这不是一种诡辩?
- △ 辩论比赛和一般意义上的辩论还是有一定差别的,生活中真的辩论应是维护自己确信的观点,双方心平气和,在充分表达自己观点和充分领会对方观点的基础上,进行论争。论辩的目的是说服对方,求得认识上的统一。在这样的辩论中,如果不是以理服人,而一味地玩弄技巧,无理搅三分,这种论辩的确是诡辩。辩论比赛,特别是新加坡赛制之下的辩论赛,则是生活中辩论的模拟,各方比赛时由于不是真执己见,所以评判胜负依据的是立论的构建,各种知识的掌握和运用,以及辩论的特定技巧等,包括你提到对对方指出本方错误时采用的“强压”战术,辩论的输赢是由作为第三方的评委决定,而不是以对方被说服为标志(即使对方真的被说服了,也还是会“负隅顽抗”)。在这样一种机制下,判断“诡辩”与否的标准无疑与在真实辩论中是不同的,我记得我曾经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过:辩论赛中,雄辩与诡辩的重要分水岭在于知识底蕴深厚与否。而这种知识底蕴自然不是由死的知识所能构成的。

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系××

- 1994年第一天,从不“追星”的我,追蒋昌建他们大半个石城。总算在饥肠辘辘中一睹“芳容”,且乘机要到了你的地址,不

亦乐乎！大半天的辛苦辗转也终有所得。不过看到你那篇淋漓尽致表扬与羞羞答答的自我表扬的《文华之巅的遐思》（你不会生气吧？）却感到些许捻。你写的时候是不是也很累？

△ 让我开始我的“自我辩护”吧。

说真的，写的时候倒确实没有感觉到你所说的那种累。《文华之巅的遐思》我是在较短的时间里一气呵成的。因为是有感而发。“淋漓尽致的表扬”来自我对爱训期间所学到的知识、技巧和做人的感悟，能够生活在一个由出色的老师和优秀的队友所组成的集体中，感激之情油然而生和我的对师友们的“表扬”是基于事实，我自信是真挚的。但言辞中如果没有表达出我的真挚，我对自己也是感到些许的失望了。至于“羞羞答答的自我表扬”，字里行间大概是有点罢，虽然它比自我吹嘘要好一些，但我还是愿意把我的文章写得更埋荡些。您的信很独特，也很坦陈，我当然不会生气，我愿说的是：谢谢。

河北秦皇岛一中××

□ 你的理想就是当律师吗？为什么想学法律呢？

△ 我觉得，人生活在世界中从事何种职业还是其次的，人是在对安身立命不断追求中存在、发展和获得意义的。所以我的理想可以说是愿更好地做一个人，一个有着自觉意识的、有益于社会的、堂堂正正的人。对于职业的选择，我还没作出最后的决定，可能从事实务工作，比如做律师；也可能选择学术作为自己的职业。毕竟那还是两年以后的事情。但我想，无论以哪一种作为主要的工作方式，都不会断然将另一者撇开。实务需从理论中汲取养料，理论工作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有鲜活的研究对象，有切实的运用场所。为什么我会学法律呢？最初或许冥冥中注定的，因为人要作出完全自主的抉择并不是那

么容易的。但在我经过一段对法律专业，特别是国际经济法的研读之后，逐渐入门，产开始对法律产生了感情（或许社科中的学科读出味道来了都会有感情的）。法律科学的严密、简洁和思辩给人以静默的美感，而层出不穷、千姿百态的案例让人直接感受到来自生活的丰富与多彩。要知道梨子的滋味，真的需要亲口去品尝的呢。

四、蒋昌建答来信

天津市河西区第四十二中学×××

- 你能告诉我，你是怎样增长才智，走向成功之路的吗？能告诉我你在这样的年纪是怎样学习的吗？
- △ 同很多朋友一样，读完大学读研究生，再读博士，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如果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可能就在于我非常怕学校的老师，老师掌握着是否能让你得到社会承认的最初的大权。或许是自尊和虚荣的缘故，我不大愿意让老师在板着脸的时候点我的名，说我作业没交、上课调皮、成绩退步等。所以，我最大的能力就是循规蹈矩，不折不扣地贯彻老师的各项命令。当今这看上去会没有创造力，也没有戏剧性，一个人的才智增长和成功的取得不可能这样的平常，否则，怎么会有许多人无法达到他们的期望呢？其实，有一句歌词蛮耐人寻味的，就是：平平淡淡是最真。一个人他或许没有成功，并不意味着他所做所为都是凡夫俗子之举；一个人他取得了成功，也并不意味着他的所思所想有什么高人之处。成功与否，关键不在于他的路程一定要有像小说、电影描绘的那样艰难困苦、坎坷不平，而在于他是否能够大胆把握与他能力和潜

质相符的机会。而机会不是唯五决定性因素,成功的公式或许是:扎实的积累加相称的机会。

辽宁省鞍山市第十三中学×××

□ 今天是发卷纸的日子,前几天我们进行了其中考试,我的成绩很不理想。真是很伤心。这次要开家长会,不知道应该怎样向父母交待。黑板上写着距离高考还有 230 天了,我的心很急,也许注定要名落孙山了。你念高中时一定没有这样的烦恼吧。因为您是好学生一定没有失败过。我很羡慕您,复旦大学简直想都不敢想,您感到自豪吗?

△ 我念高中时烦恼实在不少,那时候社会上就业机会不是很多,要得到一分牢靠的工作,首先就要通过招工考试或高校分配,学习的压力非常大。况且,我读的那所中学又不是什么重点,不可能给我们的入学和就业打上包票,那时的心情和您一样,也是非常的急。说出来您可能不信,高二念完后,我参加了高考,结果榜上无名,扛着老师的希望回到家中。家长没有埋怨我,他们觉得我尽了力,我也并没有沮丧,我觉得学习方法不对,功夫下的不够,考那样的成绩比较客观。后来的一年里,我调整了自己的学习计划,终于考取了大学。当有朋友告诉我,我的成绩已超过本科分数线的时候,我甚至怀疑自己的耳朵。我想我至多刚过大专分数线。复旦大学也是我做中学生的時候想不都不敢想的高等学府,然而,大学毕业两年后,不知怎么地,鬼使神差地考进这所学校读研究生,的确感到自豪,这自豪是用自己很多的辛劳换得的。其实,复旦大学也没有你想的那么神秘,她对社会是充分敞开怀抱的。当然,怀抱再大也有局限,她会作某些选择,这或许是给我们一次机会,让我们站出来接受她的挑选。这次不行,下次再来,或许下次不是她

要不要您的问题，而是您愿不愿成为这个集体一员的问题。

山西省大同市矿务局二中×××

□ 我是准备学文的(我们高三分科)，可能是年纪小，涉世不深的缘故，我对未来既抱有很大的理想，又很消极，总觉得自己的前途很渺茫。你也是学文的，那你当时的理想是什么？后来你的理想实现了吗？您是怎么执着地追求的？你当时的理科成绩是不是很棒啊？

△ 我在做中学生的时候，说真的，还没有什么明确的理想，但有个朦朦胧胧的想法，那就是社会和家庭培养自己那么多年，要争取机会做那么一点点的事儿回报它们。从现在看，我的想法还没怎么实现，但我似乎没有必要强迫自己做跳跃发展，我觉得一个人能将当下的事情做好就相当不容易了。您有很大的是一件好事，理想使人有明确的奋斗目标，能够有的放矢地调动一个人的能量和资源。您为什么会感到前途渺茫呢？从来信中我无法了解清楚，我觉得前途再光明，也要我们付出努力去迎接，否则，那只是遥不可及的光辉而已。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要去做，可能会有两咱结果，一是给我们带来成功，一是给我们带来失败。我们也许投入大量的情感去设想失败的痛苦，去首先拥抱一种失败的可能性，不愿去做任何的尝试，将这一可能性错误地绝对化成为必然性。其实，按同样的逻辑，我们也完全有理由去占有成功的可能性。理想尽管渺茫，但它还存在，这就有实现它的希望。如您说您现在还小，之所以会变得渺茫，或许是因为您可以调动的能量和资源还十分有限，不济实现理想之需，但这次不是您的错，是时间过于吝啬，您将来有的是时间来充实自己，不是吗？至于我的理科成绩，不算太差，也不算太好，很中庸。

华东政法学院×××

□ ……然而最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你对将业的打算。所以有几个问题请教：1. 你认为你活着是为了什么，有什么志向？（尽管这问题很难用几知表达出来，但我仍觉得很有必要问）2. 你为什么打算选择教 2 职业而不打算从事政治工作（况且你现在所傍的就是国际政治）？难道仅仅是希望教导几个学生吗？这其中是否存在逃避现实的感情色彩？

△ 要完整、全面地回答活着是为什么的问题，恐怕要等到 70 多岁才能做到，因为像孔子那样的圣人到 70 岁才能从心所欲，何况我是凡的一个。今天，我们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有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生存的问题已解决，否则，答案只有一个：活着就是为了吃饭。在具备这个前提下，我想我活着就是为争取价值实现。价值实现和价值定位相联系，价值定位应是主观能力和客观需要与条件相结合的产物。从事教育工作是我的基本志向，具体说来，按王沪宁教授的说法，就是读几本好书，写几本好书，教几个好的学生。至于我为什么选择教师职业，我想答案就在您对枯燥无味的教学方法的埋怨中就在您长大后为了孩子入学的四处忙碌中。说到专业，您也一定会同意，不是所有的体育学院的学生都要到奥运会上支吧，否则，体育学院的老现没人做，体育学院还会存在下去吗？做教师与其说是逃避现实，不如说是迎接现实，。现在又有多少人愿意去面对教师那一心一意做学问、两袖清风做人的现实呢？

上海师范大学政法系×××

□ 我是政法系的学生，和你的专业有相似之处吧，但我们所学的

只是皮毛,而你已经深入内部了。仅仅是皮毛,已令我头痛不已了,《资本论》、哲学原著、政治经济学、中国政党史、法学概论……考试时,我却能通过“临时抱佛脚”而取得漂亮的分数,一考完,我就又忘得一千二净了。实在佩服你,怎么能将如此抽象、枯燥的哲学思想、儒家学说等储入大脑,且能够融汇贯通,运用自如呢?给我点建议和启示,好吗?

- △ 我也曾是师大政治系的一名学生,您列举的这些课程我感到特亲切。在大学读书时,我也非常怕考试,所以就提早复习,曾经试过用“临时抱佛脚”的方法,但由于天资太差,没有什么效果。我真有点佩服您,能对像《资本论》这样的功课采取临时准备办法,就能取得“漂亮分数”,这是相当不容易的。

哲学思想的确让人看起来枯燥无味,更不用说去记它。但哲学思想说到底,它也是经验生活的抽象,并不是什么神秘的学问。死记哲学家的只言片语没有任何意义,关键是要弄清他是如何从某个特定的角度去解释经验生活的种种现象的。人们的经验生活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疑惑,分析解释这些疑惑,使哲学有其存在的必要,也使人们对哲学产生兴趣,有兴趣,做什么事都会觉得容易,您说呢?对于哲学,牛津大学研究员伯林先生有这样一段话,也许对您会有启发,他说:“哲学问题本身就是十分有趣的。它们涉及的对象往往都是一些作为许多寻浑信念的基础的假设。人们一般是不希望别人过多地对他们假定的东西刨根问底的——如果非得考察自己的信念究竟建立在什么基础上,他们应付感到很不自在——而事实上,造成大量寻常意义上的常识假定的前提,恰恰就是哲学分析的课题。如果对这些假定前提作批判的考察,结果就会发现,它们有时远远不如看上去那样可靠;它们或明或暗的意义也远不如初看上去那样明确。而哲

学家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可以增进人们的自我认识。”

山西省太原市财贸学校×××

□ 辩论会举行了数次,它是几年举行一次?从报纸上得知,这次辩论会共赛了7场,你们共参加了3场,那么其他4场辩题又是什么呢?顺便能告诉我前几次辩论会的决赛题是什么?

△ 辩论会有好几种级别,国际华语大专辩论会的前身是亚洲华语大专2会,亚洲华语大专辩论会的前身是新加坡大专学校同港澳大专学校的华语辩论会。至今为止,大陆曾四次派代表参加亚洲华语大专辩论会和国际华语大专辩论会。1986年第一届亚洲华语大专辩论会有北京大学辩论队参加,共有4个队参赛,结果,北京大学队获得冠军奖和最佳辩论员奖;1988年第二届亚洲华语大专辩论会有复旦大学辩论队参加,结果,复旦大学队捧走了冠军奖杯,新加坡大学队夺得最佳辩论员奖;1990年首届国际华语大专辩论会再有复旦大学辩论队参加,结果,南京大学队夺得最佳辩论员奖,台湾大学捧走冠军杯;1993年首届国际华语大专辩论会再有复旦大学辩论队参加,共有8支来自四大洲的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参赛队伍,结果,复旦大学队一气捧走了冠军奖杯和最佳辩论员奖。

一般说来,大规模的华语大专辩论会每隔两三年举行一次,以往的主办当局是新加坡广播局,或是新加坡广播局和中国中央电视台,辩论会的地点都是在新加坡。至于将来的国际华语大专辩论会在何时何地举行,目前尚无定数,据有关人士透露,很可能如期在一个新的地点举行。

首届国际华语大专辩论会作了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人性本善外,还有现代化等于西方化、卫星电视的普及利大于弊、发展中国家的

经济发展必然导致环境污染、安乐死应该合法化等,共有 7 个辩题。

内蒙古呼和浩特第一中学×××

□ 看你们辩论时那么潇洒自如,我想知道当时你和伙伴们有没有紧张的感觉,还是感觉稳操胜券呢?还有你们去的狮城好玩吗?

△ 首届国际华语大专辩论会共有 8 支队伍参加,每支队伍都有一定的实力,因此,任何一个队不大可能有稳操胜券的感觉。复旦大学初赛就遭遇素有辩论传统的英国险桥大学辩论队,辩论会规定有 50% 的淘汰率,即输了这一场就地乐趣进入半决赛,至于决赛就更不用谈,比赛时候辩论员的心情如何就不用说了。台湾大学辩论队是一支辩论实力非常强的队伍,但即使遇到香港大学和新加坡大学辩论队,也赢得非常辛苦,比赛时的心情更显紧张。当然,在镜头前,您不大能看到复旦大学辩论队的紧张情绪,这也许是战略战术上的考虑,我们即使感到紧张,一定不能在辩论时表露出来,否则,一旦对方觉察到,就易长对方的气势,消自己的斗志。其实,在辩论会开始之前,两方辩论员都是口中念念有词、神情疲不堪。

据说,新加坡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旅游城市,不但有风格迥异的现代建筑、宽敞清洁的街道、物品丰盛的商店,还有神奇无比的海洋公园、风情万种的社区文化、芳香四溢的热带水果。然而,这一切我们地缘,比赛日程安排得相当紧,参赛方案又几度更改,在新加坡的生活模式可以说是三点一线:酒店——大排档——辩论场,所以,新加坡究竟好不好玩,我无法仔细谈清楚,不过我可以这样说,如果您有机会去新加坡的话,一定会感觉到自己是不虚此行的。

□ 现在我想谈一谈崇拜与欣赏，我能理解你不要别人崇拜，但我不理解，也不赞同你说：“连欣赏也不要。”为什么呢？你作得出色，别人就欣赏，为什么连欣赏也不要呢？难道你想我行我素，不需要别人的肯定吗？

△ 欣赏是一种心理活动，带有很强的主观性，我当然不能要或是不需要别人去欣赏某个人或物。但我也有表达看法的权利，由于采访时间所限，对此我没有充分说明。之所以我认为连欣赏都不要，是因为我没有资格成为他人的欣赏对象，这不是谦虚的说法。在我们的周围，有许多的年轻的朋友，他们在自己的岗位默默地耕耘着，他们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是我和我的伙伴们不能比拟的，他们为之付出的汗水和泪水是令人难于想象的，只是由于各种原因镜头还没有对准他们，他们才是人们心中永远的欣赏对象。就如镜头无法对准所有勤勉苦作、机敏过人、功德无量的人一样，所有风光于镜头之上的各路人马也未必都称得上成为他人欣赏的对象。常言道：假不掩玉，这句话倒过来说也成立，即玉不掩瑕。应该全面观察一个人，而不是只看到他在荧屏上做秀的一瞬，那只是他生活极端有限的一面，如果据此而定某人为欣赏的对象，就实在有点委屈自己。就我而言，如果您能看到我真实生活的全貌，您一定会有点同意我的看法。最后一个问题提得好，在社会处于转型期，环境多变，选择复杂，更要独自行道、不为利诱所动。然而，这不是像我这样的凡夫俗子所能成就得了的。对个人所做所为的肯定，只是这个人所作所为的副产品，而不是他要追逐的目标。孔子可谓是万世之师表，但生前，他老先生不也是徒有圣任却无圣誉、特立独行的普通教师吗？

- 曾听一位哲人说过,要真正了解一俱,应先要了解此人的世界观与人生观,那么,就不免地想要发此一问。记得你曾说过,一个人的性格及其思想、气质就是在不断地培养之中形成的。那么,请问:在你的成长的道路中,你是怎样去培养自己的,又是向着哪一个去着力培养自己的?当然,我想,在你成长的过程中,挫折与痛苦也一定在你面前逞过威,你又是怎样去克服它、去战胜它的呢?古人云:人必先自助,而后天助之。不知你如何理解?你又是如何自助的?人说:“战胜他人是容易的,而战胜自己却是艰难而痛苦的。”那么,再请问:你有没有战胜自己?

- △ 要完全回答完这些问题要写成一本书,好在本人经历平平,用不了很多的笔墨。人的成长过程是一断受教育的过 程,最早是在家庭受教育,其次是在学校受教育,再就是在社会受教育。怎样培养自己的问题单靠我自己一个人来回答可能难保全面,培养自己的着力方向可能也不是我个人意愿所能决定得了的,而是父母、老师、长辈、朋友和自己合力的结果。记得一位我非常敬仰的老师说过:“一个成功的人,往往令他成功事件是完全有悖于他的初衷,原先他打算要走的道路,并不是使他最终成功所走的道路。”这是不是对您的问题有所启发呢?每个人在学习、生活、工作中都可能碰到种种的挫折与痛苦?这是动人心弦的生活旋律所不可缺少的音符,不可能回避它,要从挫折中,首先对自己要有信心,人被击败的不是外部环境的恶劣和冷酷,而是自己内心对困难的妥协。

的确,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薄弱的,但却是决定性的,后天卑鄙种外在性的因素的加入,终归要通过你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起作用。就拿作学生的有些人来说,他们自己学习成绩不

好，经常抱怨老师的教学水平，从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宰予是孔子班上的一名学生，成天上课睡大觉，孔子是一个诲人不倦的好老师，最后，孔子也只能对积重难返的宰予摇摇头，感叹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圻也。”可见，再有力的后天外在因素，如果自己不努力，也不会有如意的结果。退一万步说，即使后天外在因素把一个人捧得很高，但自己没有支撑自己的能力，一旦后天外在因素撤去，这个人很可能会重重的落下，结局就可想而知了。

我不敢说战胜过自己，战胜自己的前提条件，就是要认清自己，苏格拉底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说：认识你自己！而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又有多少呢？

灌输省镇江市化工中专××

□ 你是个大學生，我身边的人都是中專生，不知道大學生活是不是很有意思？不過，我猜你的大部分業餘時間應該是在圖書館里度過的吧？我們這兒沒有圖書館，所以星期天總是去書店飽飽眼福，偶爾買點書，因為我們還負擔不起什麼成套的書的消費。上個星期花了十幾元買了幾本書，最後剩下三毛錢，只好徒步回家。不知道你們大學生是不是像電視上、電影上所描寫的那樣奔放、熱情、敢做敢當？是不是和很多的青年一樣崇拜各種明星？

△ 大學里年輕人相對其他單位來說要多得多，大學生活有濃厚的青春氣息，這一點和您所在的學校差不多。不同的生活、學習、工作的領域有不同的特點，我並不覺得所有的學生對大學生活都感到很有意思，實際上，很多朋友在學校里沒呆多少天，就急得直想到外面的世界去闖一闖，他們認為大學裡頭過於沉悶、平靜、乏味、清苦，沒有外面的世界那麼絢麗、沸

腾、刺激、富足，所以，一身两职的同学大有人在。《大学》中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她是一个较能远离尘嚣的场所，她能让你用理趣去调动青年的血性和执着，用距离纯净你睿智和眼神；她让你不是地感到不足，以前行者的荣耀激励你不停 的脚步，以大患中的坚韧和旷达传播知人知生的道理。对我来说，大学的确很有意思，因为总是越远离她就越亲近她。

如果我的业余时间 在图书馆的话，我就没有什么业余时间可言了。而且，我自己喜欢一个人看书，我有自己看书的习惯，就是每隔两个钟头，要出去走走，或是听听音乐，在图书馆就没有那么自由了，动辄会影响到他人。

和您一样，作学生的总是穷得叮当响，博士生一个月的助学金只有不到 150 元，所以，您还算不错，敢上街买书，而且不能剩下三毛钱，我们可能连街都不敢上，上海那么大，也许买了书只剩不了三分钱的我们怎么能够回和来呢？

千万别把电视或电影上所描写的大学生当作真正的大学生，那是被导演和演员艺术化的形象。大学也是一个千姿百态的小社会，有热情的，也有冷漠的；有奔放的，也有含蓄的；有敢作敢当的，也有敢作不敢当的，电视和电影上描写的仅仅是大学生形象的有限的方面。

安徽省涡阳县卫生防疫站×××

□ 你同不同意“深沉厚重是第一等资质，磊落豪爽是第二等资质，聪明才辩是第三等资质”的主张？你在口才上是不是经过特别的苦练？你的业余生活是怎样安排的？你看哪些书”听哪些音乐？

△ 我不大同意以上那种等级排列的秩序，从做人的逻辑上讲，我

觉得“磊落豪爽”比较有德性的涵义，应放在第一等的位置；“深沉厚重”指的是脾性，放在第二等的位置；再次就是“聪明才辩”，放在第三等。这只是从做人的逻辑上讲，一个人的健康全面的发展，应顾及到做人的方方面面。

如果说苦练的话，那只是两三个月的事。在参加辩论会之前，我不知道自己的口才究竟如何，甚至都没有去考虑报告参加辩论队的选拔赛。到了辩论队的选拔赛上，从辩友的卓越表现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口才好，相比之下，笨嘴拙舌的我更觉得有苦练的必要。于是，一点也不敢怠慢，和队友一起听从教练的指挥，整整折腾了一个暑期。

作学生的总是离不开书本，很难说得清怎么来划分专业时间和业余时间，特别是研究生和博士生，课程非常少，大部分时间要自己去完成老师布置的读书任务。8小时以除了读书还是读书，在旁人眼里的业余时间，我们主要用来读书，倒不是因为我们特爱读书，而不读书就没法去上下节课，那么少的人上课，没读书，老师很容易发现，轮到自己发言时若是张口结舌、答非所问，就说不过去。当然，到星期六，以“考察舞场文化”名，溜到舞场上看看同学的舞姿，研究研究新的排列组合，也算是业务时间的一项安排，所以，舞曲没跳一支，大多是站在墙角跟保卫似的，饱饱眼福罢了。

看哪些书？我一时难于回答，要开书单的话，可能占的篇幅太长，总之，老师布置的任务要完成，有时间再读一些自己觉得比较好的书。谈到音乐，我没有特别的偏好，只要自己觉得好听，古典的、现代的；经典的、通俗的；中国的、外国的；交响乐，摇滚乐等都去欣赏。

上海市长阳路×××

- 你在最后一场辩论中，隐隐散出些“政治俗味”，即你公开褒扬新加坡人民和评委，像有“奉承”之意，不知我说的对不对？
- △ 辩论不是一个孤立的行为，而联系到辩论环境的诸多相关性因素。辩论的胜败关键在于你是否能在短时间内说服观众和评判，我们不是不能举出其他的事例来引证自己的观点，问题在于最有临场说服力的，无异于引用当地观众和评判比较熟悉的事例，这样较易缩短观众和评判理解你方观点的时间，达到一定的场上效果。如果你方引用的事例个性化太强，令观众和评判十分费解，不能引起观众和评判的共鸣，场上出不来效果，一方面会影响辩论员的情绪，另一方面给观众和评判带来理解上的压力，他们对你队的情绪就易受干扰。以往的辩论会，这种事例很多，有的还直接拿场上主席翩翩的风度作引证呢。

北京市 2856 信箱×××

- 学理工科的我却又有多愁善感，有时会“胡思乱想”，想过去，想现在，更多的是想未来。书本上所学的究竟能有多少用处，学校里这种规范式的学习是不是浪费时间，甚至是浪费生命。每每因为要完成课内任务或是考试，而不得不把自己所喜爱的学科放在一边，脑子里总会产生这样的问题：这样做值吗？我到底应该怎么做？
- △ 理工科的事我了解不多，不能乱发表意见。但您的问题在我的身上也出现地，记得还是在大一的时候，我曾一度要求转系，我对自己的专业没有太大的兴趣，由于转系牵连到许多的手续，最后只能作罢。这时，我系里的一位教授告诉我：一个人不

能带有现实的偏见去看一个专业,如果你觉得现实不太理想,那说明两个问题,一是理论没能够指导现实,理论需要发展;一是现实偏离理论太远,理论需要应用到现实中去,从这个意义上说,你是有用武之地的。不过,我还要说明的是,千万不要将理论完全等同于现实,否则,理论就失去了它的指导意义。这位教授的一席话令我清醒了很多,让我知道如何看待我的专业,以及让我有继续我的专业的动力和信心。您的情况可能跟我不一样,说这些不知道对您有没有用。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一个同学对自己专业的钟爱应是来自自己的悟性。但在此我也提出一个看法,就是往旆成就你的示必是你原先兴趣之所在。

我不大同意以功利的眼光来看待知识,那难免有一点俗气。知识的作用不单单是能够满足人们的物理方面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它能培育出一个人的精神气质。所以,我不认为对知识的付出是一种浪费,相反,是一种珍惜。更何况,汲取知识是一种生活方式,是生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个人的生命并不重在他的物质生命方面,而重在于文化生命方面。以上是我对您的问题的一些可能是不着边际的看法,希望能听到您的批评。

天津外国语学院应用英语系××

- 不知我能否过问一下私人问题?我很想知道荧屏外的你是什么样儿的性格?依然是那种不失幽默风度、侃侃而谈的样子吗?至少我个人认为自己有双面性格,你有这种感觉吗?
- △ 我几乎没有什么不能在阳光底下晾着的私事,打从小时候起,妈就说我不知道害羞。您的问题问得很磊落,不至于让我很尴尬,没有理由不回答。

我从来也没有认真地反思过我的性格，只是有时候借别人的生肖卡片或血型研究的小册子翻翻，对照着自己的生肖和血型看看比比，再瞅瞅其他生肖和血型下说的是什么，总觉得都在理，但都不全面。荧民间外我的性格大体是：遇急事不急，遇慢事不慢。有人说这性格挺好，我却不这么想。急事不急，指的不是我有临危不惧、处变不惊的能耐，而是每每到急事来的时候，总是傻等着脑子能转出点新的绝招，结果弄巧成拙，坐失良机。慢事不慢，指的也不是我能充分地利用时间先把事情做好，而是总干那种让人家在冰天雪地里的车站提早等一两个钟头的事，直急得朋友挺着东红的鼻子向我喷气。该说的话不说，不该说的话猛说。有人说我思路借位，我并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一个人说他（她）有天真浪漫、纯净似水的表现，我们心里有数，总不能因此让我对他（她）幼稚无知不发表任何看法吧，何况现在受骗上当的人那么多；一个人说他（她）的衣着典雅、穿戴独特，我们眼里生辉，但你不能不提醒这是腊月的天气得捂着点，何况“三资”企业不管公费医疗……等等，一下子说不了那么多，总之，我的性格得罪了不少人，甚至连……然而，我仍痴心不改。性格更改了以后，我还是我吗？每个人的性格都有多面性，一个人即使年龄再大也会像孩子似的，不可能把自己的一切都公开，常常是自己作自己的朋友。一个人性格丰富多彩些有好处，特别是在不能尽如人意的时候。

在生活中，我的幽默不太多。天天在校园里，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没弄清楚，幽默没素材，有时想玩点幽默，但说的话自己在心里乐了半天，别人却听了之后呆若木鸡。平时，说话最多的时候是在课堂上，研究生开的基本上都是讨论课，允许对某个理论有不同的观点，一周看书的体会不说出来，憋在肚

子里难受，大伙争先恐后地发言。

广东省广州市百灵路知用中学×××

□ 广州，就像纽约，即是天堂又是地狱。对我来讲，这是个地狱，因为每天都会遇到不高兴的事。你在大街上走，随意就会听到那些涂红戴绿的、或西装革履的为一点小事就脱口而出地骂一些极不干净的话，每个人就像您说的那样“性本恶”，虚伪。这是不是有点夸张？说真的，我以前也梦想过要做个律师或记者的。可是现在我拿不出出众的成绩，又怎能堂堂正正地进高等学府呢？可以说，我现在对考大学只有野心而没有信心了。我想请教一下，你如何对学习保持一贯的热衷呢？

△ 您的确有点夸张了，我曾匆匆地经过广州几次，广州给我的印象是，她的发展特别快，街道虽不够整齐但很繁华，来来往往的人流充满生气，社会有活力也有秩序，我并不觉得她哪儿像地狱。那大的城市，那么多的人，难免经常会有一陋些不文明的行为，但我们不能因为一座城市有这么一点不协和音，就断定她很糟糕，就像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身上的一些缺点，就断定他不可救药了。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您不希望您的视野里出现不文明的行为，这与广州市的迅猛发展是不相协调的，您希望一个人的举止同他的外表相一致，不要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也许是您对广州爱之切，所以言过苛吧。我周围也有许多来自广州的同学和朋友，他们相当的热情，乐于助人、急人所急、直率坦诚、情真意切，我并没有感到他们的“性本恶”和“虚伪”之处，相反，和他们在一起非常的开心，就像谈到您的信一样。

· 好的成绩不是说说就能达到的，您还在读高一，离高考的

时间还早呢,我觉得有时间来弥补自己的不足,现在就行动。有很多的同学朋友来信问我准备高考的秘诀,其实,讲起来也相当简单,就是把课本的页码加起来,除以整段的复习时间,最后以小时记每天的复习量,严格按计划完成。这是一个笨的方法,但对基础薄弱的我来说,是起了一点效果的。不过我的高考成绩实在难见人,险些被大学淘汰。所以,这点经验实在值得怀疑。

要对学习保持热衷,靠强力压是压不出的。我想有朝一日您觉得学习比做其他的事更符合您的年龄和潜质的话,您就会对它感兴趣。对有些人来说,学习就是他的生活方式,脱离学习就感觉生活缺少了什么,学习就成为他永恒的行为。我目前还无法做到,偶尔也会开开小差,不过不算严重,作学生的以学为主,总要以完成学习任务为前提。您说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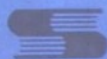
五、何小兰答来信

上海嘉定一中×××

- 你们的书《狮城舌战》在我们学校很受欢迎,我想请问你们是怎样成为一个好辩手的”作为候补队员的你,又有什么感想呢?
- △ 辩手的成功与否,靠的全是自身的努力。首先当然是想成为辩手,然后在这个动力下不断磨练自己,给自己增加营养——知识的、思想的、道德的。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相信仔细领会了我们几体会文章,你会更了解其中的意义的。虽然我是候补队员,没有去新加坡,可我仍感到幸运。我进辩论

队的时候，只有一年级，四个月的训练让我有脱胎换骨的感觉。老师、同学包括复旦都给我太多，这一笔宝贵财富会令我一生享受不尽。所以，我说我很幸运。

ISBN7-208-01773-5/H·4



定价 11.50元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狮城舌战启示录——怎样造就优秀的辩才

作者=王沪宁, 俞吾金主编

页数=365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03

SS号=10837123

DX号=000000428291

URL=<http://book2.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0428291&d=D075A4F27AD5FC>

D4FC5B5FC2A81730FA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格物致知 修身辩论——辩才的制造&王沪宁

一、以开放指导选拔

二、以逻辑领导理性

三、以广博修炼理论

四、以常心进化本能

五、以严密要求技巧

六、以仿真营造实践

七、以艺术冶炼人格

逻辑·理论·价值——生存论本体论视野中的雄
辩术&俞吾金

二、理论是交锋的核心

三、画龙点睛在价值

辩论的美与美的辩论——辩论中的审美意识&
姜丰

一、游戏：游戏的诞生。游戏规则

二、拒绝再现：辩论中的审美创造

三、行江有水千江月：辩论的判别、

欣赏与接受

四、我们和我们追逐的梦：狮城舌战

之后

辩论生态分析——辩论行为和辩论环境的相互
关系&蒋昌建

一、从真理到游戏：用理趣去在乎输赢

结果

二、从抗拒到维持：让自己彻底地反对

一次自己

你 三、从陌生到熟悉：把我的虚弱传染给

懂 四、从博采到精取：我的世界只有他最

混沌与变幻——辩论的“散打”风格&严嘉

一、道是无序却有序

二、世事洞明皆学问

三、以正合 以奇胜

技巧与超技巧——辩论技巧的艺术&季翔

一、攻守辩证法

二、武器和武装

三、技术艺术化

吩咐彩虹女神——从信息看辩论&张谦

一、哈哈爱兮爱乎爱乎——信息之源

二、到雪地上撒点野——信息之流

三、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信息之思

情理交融的辩论世界——对言辞的超越&何小兰

一、理性、情感、言辞

二、以声传情 以情传声

三、情感的多层表达形式

四、声情并茂与过犹不及

在成熟中超越 在超越中成熟——逻辑的心理学与心理学的逻辑&张霁珠

的 logic 与心理 一、高尚人格，超凡技艺——辩论员的

的 logic 与心理 二、整体意识，流动默契——辩论队的

三、兼容并包，积极参与——观众的逻辑

辑与心理

四、铁面无私，公正裁决——评委的逻辑与心理

五、至善至美，不倦诲人——教练的逻辑与心理

附录：辩论队员答来信

附录页